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王景生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CONTENTS

目 录

[译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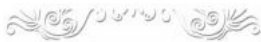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王景生 译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 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 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

www.ireadweek.com **QQ群：**

5503383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 (俄) 托尔斯泰 (Tolstoy, L.N.) 著;
王景生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02-2536-0

I. ①复... II. ①托...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248359号

复 活

作 者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王景生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

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5×1220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74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

次印刷

定 价 17.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译 序

高尔基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为自己所建造的三座纪念碑。”高尔基此论绝非河汉斯言，大而无当。从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文学来看，能与托尔斯泰比肩同声者，实无几人。托尔斯泰有如高山，令后世所仰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托尔斯泰以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故事》登上俄国文坛，旋即引起欧洲文学界的注意，然而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托尔斯泰在欧洲文坛上却还不是一个叫得响的名字。一八七九年，《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的出版震撼了世界文坛，托尔斯泰小说的声誉从此鹊起，而后《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发表更使其专美于世，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丽篇章。

《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正如托尔斯泰此前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的情节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据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回忆，一八八七年六月，他到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向作家讲述过他亲自接触的一个故事。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被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个青年，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以前在一个阔亲戚家客居时诱奸的养女。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后来，这个女

犯病死狱中，那个青年也不知所终。当时，托尔斯泰非常认真地倾听了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这个青年和妓女的故事触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不过，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铁面无私的大书。

小说名曰“复活”，顾名思义，其中必有人“复活”。那么，“复活”的人究竟是谁呢？是聂赫留朵夫，还是玛丝洛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对此，评家众说纷纭。不过，细品全书，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恐怕更接近于作者的愿望。

聂赫留朵夫品性善良，且有抱负。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贵族特权深为不满，把名下的那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起初，他对姑母家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爱是真诚的。后来，他参军当了军官，军营生活却使他堕落成为一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诱奸了自己当初曾热恋过的姑娘。此后，他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法庭上遇见卡秋莎之前，他正与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同时又向一个贵族小姐求婚；此外，他已放弃否定土地私有的理论，准备接受母亲的大宗遗产。法庭上和卡秋莎的不期而遇，极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尤其是她被判苦役后发出的哭声，更是触动了他那似乎并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他痛悔过去的劣行，开始走上精神“复活”的道路。

为了赎罪，聂赫留朵夫多方替玛丝洛娃奔走上訴，并打算同她结婚。他对事物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到不满并持批评态度；对他曾想与之结婚的贵族小姐及其一家人的庸俗和虚伪心生厌恶；对他探监时耳闻目睹的专制制度的黑暗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的精神“复活”进入第

二个阶段，即从对自己罪恶的认识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认识，从对玛丝洛娃一人的同情转到对整个劳动阶级的同情。这时，他头脑中的贵族阶级思想逐渐为宗法制农民思想所代替。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土地被地主阶级所霸占。于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玛丝洛娃的上诉被驳回，聂赫留朵夫对统治阶级及其法律本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他的精神逐渐“复活”，伴随玛丝洛娃踏上了去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遥远路程。

在西伯利亚的三个月，是聂赫留朵夫彻底醒悟的三个月。他最终认清了统治阶级吃人的本质，然而令他苦恼的是，他非但看不出任何可以战胜它的方法，甚至连怎样做才可以战胜它也不能理解。无奈之中，他拿起了《福音书》，不料却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摆脱苦难，惟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可惩罚他人，也不可纠正他人。聂赫留朵夫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的精神和道德“复活”了。

不可否认，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也有她自己的“复活”历程。不过，她的“复活”却完全没有聂赫留朵夫的那种赎罪的味道。当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时，她所“复活”的仅仅是她当初的那个清清白白的自我而已，她那时仍处于“堕落”之中。她习惯性地冲他媚笑，还索要卢布。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监时，特意向她表示忏悔，并提出同她结婚的要求，这一切引起了玛丝洛娃对往事的回忆和对他的仇恨；回忆的大门一经打开，玛丝洛娃便逐渐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苏醒过

来。聂赫留朵夫第三次见到她时，她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聂赫留朵夫在日记中说她正在“复活”，的确不无道理。不过，玛丝洛娃的“复活”虽然始自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所引起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但它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她与流放地的政治犯接触之后。她受到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的影响，学到了他们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尤其是西蒙松对她的发自内心的爱情，更使她意识到了人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她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不愿因此耽误他的前程而甘愿同西蒙松结合。少女时代的卡秋莎终于回归。她纯洁的道德也失而复得。玛丝洛娃在精神上彻底“复活”了，或者毋宁说她得到了完全的新生。

毋庸讳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各自的“忏悔”与“宽恕”，双双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使其“人性”得以复归，这一切带有浓厚的“不以暴力抗恶”及“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味道；作为说教者，托尔斯泰自有其可笑的地方。然而，作家借聂赫留朵夫上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俄国城乡的阴暗面以及对宫廷、法庭、监狱和教会的抨击与揭露，却是他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这一切分明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确有其伟大之处。

较之为托尔斯泰赢得盛誉的《战争与和平》和有“艺术之神”称号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艺术性似有所不及。其中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在思想和哲学方面的追求与探索，其执著和真诚的程度，不但在俄罗斯文学，就是在整个世界文学中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他一生苦心经营自己的理想王国，试图为俄国乃至全人类提供一幅道

德完善、社会改良的美好蓝图（蓝图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托尔斯泰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其实正是他的文学作品才为他的思想赢得更多的读者和崇拜者。尽管托尔斯泰有着思想家、宗教领袖、现代文明的批评者、“俄罗斯的良心”等诸般尊贵的称号，但他主要是一位艺术家，而且是少数几个攀上艺术顶峰的作家之一。不过，托尔斯泰似乎并未十分珍惜他作为艺术家所享有的极高地位和他文学作品的声誉，尤其在他后期，文学几乎成了他传达思想的工具，他甚至为了思想追求而否定自己的作品。正如美国作家豪威尔斯所说，托尔斯泰“用人类的良心代替了艺术的良心”。假若我们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它应当成为把握托尔斯泰后期一些作品艺术性衰弱现象的一个前提。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即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随着托尔斯泰世界观“激变”的发生，他叙事的倾向明显起了变化：一方面，试图从根本上探寻社会和道德的真理；另一方面，则渴望以他所向往的真正的道德生活替代不公平的罪恶生活。托尔斯泰后期叙事的倾向性也使其叙事的风格产生了变化；其实，托尔斯泰叙事的风格此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处在演变之中。即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在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内心的直接意识活动十分突出地出现于叙述的前景。作为描写直接意识活动最主要方法的内心独白，包含性极为广阔地跃然纸上，而作为内心独白“极端形式”的意识流也同时得到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期，托尔斯泰的叙事风格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托尔斯泰在此前的文学叙事中曾嫌普希金的心理描写过于粗线条和“光秃秃”，那么此时则转而强调研究普希金《别尔

金小说集》这个“宝库”和学习“普希金原则”的重要性。虽则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内心独白依旧蔚然可观，而意识流在其叙述上也几近炉火纯青的境界。托尔斯泰叙事风格的真正改变，诚如上述，始自其世界观“激变”所引发的叙事倾向的转移。仍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中前期独领风骚的内心独白叙述退居次席，意识流几乎完全消失，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通过场面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叙述（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

《复活》作为托尔斯泰后期叙事中最重要的作品，以“外部表现、动作、行为、场面”表现内心活动和心理叙述，自然成为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主要原则。于是，以细致展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见长的内心独白，便失去了它以往的辉煌地位。《复活》的叙事中已然找不到多种类型竞逐、意识全面展开的内心独白叙述，有的只是次数稀少、类型简化和长度缩短的内心独白，且大多出现于男女主人公，尤其是聂赫留朵夫的意识活动中。

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型主人公系列中的人物。他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与变化是叙事的主旨之一。托尔斯泰往往更多地以叙述者的直接心理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来表现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作者的独白、全知全能的作者的声音在叙事中起着决定性的和结构上的突出作用。然而，从人物心理真实（托尔斯泰的叙事恰恰十分看重这一点）的角度而言，像聂赫留朵夫那样热衷于自我剖析的人物，他的内心活动中不直接出现内心话语则是不可想像的。不过，用于聂赫留朵夫身上的内心独白叙述，其运用场合及次数却颇有选择性和节制性。例如，法庭审理玛丝洛娃案

件的二十几章叙事中，聂赫留朵夫自始至终皆在场。当认出被审的女犯便是他当年诱奸的卡秋莎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即用内心独白的形式来表现：“‘这决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瞧着这个女被告的脸，暗自想道，‘可是怎么叫柳包芙呢？’听到她的回答，他心里想。”此后的审理中，聂赫留朵夫还有两句内心独白。第十一章：“‘难道她认出来啦？’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感觉血直往脸上涌。”第十九章：“‘她认出来啦！’他想。于是，聂赫留朵夫身子缩成一团，似乎在等待着打击。”与玛丝洛娃的不期而遇，犹如一块石头，激起聂赫留朵夫心海中的层层波澜。再现意识活动的语言天地里，心理叙述占据了叙述的前台，内心独白似乎仅仅起着点缀的作用。但它无疑又是叙述中最为活跃的话语部分，或者换言之，最为活跃的意识层次，而且是聂赫留朵夫心理活动的直接展示。这种适时的心理展示，画龙点睛，为其叙述平添了生动之感。

玛丝洛娃内心世界的描写，是托尔斯泰的一项“真正的艺术发现”。她道德沦丧和“复活”的过程，同样是托尔斯泰的叙事主旨之一。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中显然缺少诸如聂赫留朵夫等贵族老爷们的那种复杂、多变、犹豫与反复的意识成分。但她的内心世界并非一片空白，“复活”后的玛丝洛娃，身上闪现出动人的光彩。对于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托尔斯泰选择的叙述方法，诚如俄罗斯学者所说，“不是大段的内心独白和对话，梦，回忆，而是托尔斯泰本人所说的‘通过场面表现的内心生活’。”^[1]此处托尔斯泰所谓的“场面”，指的是动作、姿势、表情、眼神等心理活动的外显行为，于是内心独白似乎

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其实不然。在一些必要的地方，作者并未回避这种行之有效的叙述方法：

“他在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喝酒说笑，我却在这儿，在泥地上，在黑暗中，在雨里和风里——站着哭。”卡秋莎想，停住脚步，把头向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

“判我刑的时候，我还哭了呢，”她说，“我真得终生感谢上帝才是。要不我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我现在知道的这些事。”

第一例出自第一部第三十七章。玛丝洛娃被判了苦役。那一夜，她久久不能入睡，想起了许多往事，惟独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而且在法庭上也没有认出他来。作者用倒叙的叙述方法向我们提供了她最后见到聂赫留朵夫时的情景：那天夜里，她便怀了孕，本指望他会顺路来一趟的，但他打来电报，说不能来。她决定亲自往火车站见他一面。这是个秋天的夜晚，风雨交加。她跑到车站，刚刚从车窗里找到他，火车就徐徐开动了。她跟着火车走，聂赫留朵夫没有看见她。火车越开越快，她在后面跑，跑过水塔，风迎面吹来，吹掉了她的头巾，她还在跑。一个女孩叫她。她停住脚，于是便有了上引之内心独白，隔过三行叙述，又有一句内心独白：“等会儿再来火车——往车底下一跳，就完事儿了。”

第二例摘自第三部第三章。她每天和政治犯在一起，尽管行路艰难，但这些她从未见过的人们，为她揭示了她从不知道的各种生活趣味。于是便有了这段思想的直接表露。

就这两例内心独白在叙述话语的时间位置而言，两者皆出现于玛丝洛娃人生道路的转折点：前者是她

精神的最初觉醒，她看清了车厢内外（实则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两个世界的对立，她从此不再信善，也不再信上帝。不过，在她当时的思想状况下，这一觉醒却导致她走向堕落，但这也是贫家妇女经常遭到的可怜命运；后者则是她的最终觉醒，是她在“新同伴”启发下获得的新生。其叙事功能已不言而喻。从这两个例子不难发现，对于内心独白的叙述方法，托尔斯泰此时已惜墨如金，只是在人物心灵变化的关键时刻才加以运用。至于内心独白的话语特征，则是十分口语化的句型和词汇，颇为符合玛丝洛娃的身份。

以上蜻蜓点水式的分析，仅仅涉及《复活》叙事艺术的一个侧面，但滴水中也可映现出太阳的光辉。小说历经十年的惨淡经营，其叙事的完整与统一，浑然天作，而情节的集中，结构的紧凑，细节的细腻，肖像的生动，足见托尔斯泰对艺术的追求，老来更显其精纯。

《复活》成书的那一年，托尔斯泰七十一岁。在世纪末的浮躁中，这位老人依然故我地在其精神世界中俯视俄国的社会，不辞辛劳地建造他的理想王国。他把自己的思想倾注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然而，一个七旬老翁，特别是“激变”之后的托尔斯泰那样的老翁与一个三十五岁的、喜爱声色犬马生活的青年贵族聂赫留朵夫，两者的心灵硬安在一起，不免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也缺乏客观的真实性。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所带有的作者夫子自道的色彩毕竟过于浓烈，现实生活中又能去哪里寻呢？而小说第三部的叙事，多次直接引用《福音书》中的道德说教，则令人读之尤为生厌。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削弱，自不待言。

虽则如此，《复活》作为托尔斯泰的“艺术遗

嘱”，依旧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章之一。诚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言，《复活》较之其他作品，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直达心灵的眼睛。

注 释

【1】 参阅奥普尔斯卡娅：《列·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演变》，《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发展》第三卷第三十三至三十四页，莫斯科，一九七四年。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一

尽管几十万人集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把他们住得很拥挤的土地毁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在地上铺满石头，不让任何东西生长，尽管小草刚一出土就被除掉，尽管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树木遭到砍伐，鸟兽尽被驱逐——春天甚至在城市里，依旧还是春天。太阳暖暖地照着，青草在没有被铲尽的地方，不仅在林阴路的草坪上，而且在石板的夹缝里，死而复生，呈现出一片绿色。桦树、杨树和稠李长出黏黏的、散发着清香的嫩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绽裂的幼芽。寒鸦、麻雀和鸽子像春天那样欢快地

筑起巢来，连被太阳晒暖的苍蝇，也沿着墙根儿嗡嗡地飞动。植物啊，鸟雀啊，昆虫啊，儿童啊，全都快快乐乐。惟独人们——大人们，成年人们——却永不休止地在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在折磨自己和相互折磨。成年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这种专为造福万物而出现的人间的美——能激发和平、亲睦、友爱的美，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那套一个人统治另一个人的把戏。

譬如，省监狱办公室的人们就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能感受到春天的魅力和欢乐，而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件编着号码、盖着大印、标着罪名的公文，上面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前，将狱中三名在押的案犯——两女一男，解送法庭受审。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要犯，必须单独解送。于是，遵照这道命令，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看守长走进女监又暗又臭的走廊。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一个面带倦容、鬓发花白的女人，穿着袖口镶金绦的制服，腰里系着蓝边的带子。这是女看守。

“您是玛丝洛娃？”她一边问，一边跟这位当班的看守长朝走廊里的一间牢房门口走去。

看守长哗啦一声打开铁锁，拉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臭的气味涌了出来。他吆喝道：

“玛丝洛娃，去过堂！”又把牢门掩上，等她

出来。

监狱的院子里，还是新鲜的、爽人的田野上的空气，那是风从城外刮过来的。然而走廊里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带着伤寒病菌的空气，充满粪便、焦油和腐物的气味，足以让任何一个刚进来的人立即感到烦闷和忧郁。女看守虽然闻惯了这种恶浊的空气，乍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她刚进走廊，顿时感到周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忙乱的声音：女人说话的声音和光着脚走路的声音。

“快点儿，找什么呢，别在那儿磨蹭，玛丝洛娃，听见没有！”看守长冲着牢门喊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材不高、胸部非常丰满的年轻女人，穿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袍，大步走出牢门，灵活地转了一下身子，在看守长身旁站住。这个女人脚上穿着麻布长袜，外面套着棉囚鞋，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几绺鬈曲的黑发显然故意从头巾里露了出来。她脸色惨白，长期坐牢的人大多具有这种特别的脸色，仿佛地窖里的土豆新生出的白芽。她那双不大的胖乎乎的手和从囚袍宽大的领口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种颜色。在这张脸上，尤其是在惨白无光泽的脸色的衬托下，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叫人称奇，眼睛稍稍有些浮肿，但非常有神，其中一只

眼睛略微带点儿斜视。她把身子挺得笔直，丰满的胸脯高高耸起。她来到走廊上，微微仰起头，径直看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露出一一种顺从的神情。看守长刚要关上牢门，不料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冷峻、布满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刚开口对玛丝洛娃说着什么，可是，看守长把门抵住那老太婆的脑袋，她的脑袋就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笑了一笑，把脸转向牢门上装着铁栅栏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里面凑近窗口，用沙哑的嗓音说：

“最要紧的，一句话也别多说，咬定了就别改口，这样就行啦。”

“只要有个结局就够啦，反正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说着，摇了一下头。



“当然，结局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说，露出一位长官的自信，显然以为自己讲话很俏皮。“跟我来，开步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消失了。玛丝洛娃回到走廊的中央，迈着细碎的快步，跟在看守长的后边走着。他们沿着石头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闹的男牢房，每个牢门的小窗口里都有男犯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然后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站着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坐在那儿的文书把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递给一名士兵，指着女犯说道：“交你接管吧。”

那名士兵——有麻子的红脸膛下诺夫戈罗德汉子——把公文掖在军大衣袖口的翻头里面，目光瞟着女犯，笑嘻嘻地朝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卡同伴挤了挤眼睛。两名士兵押着女犯下了楼梯，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这两名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然后走出围墙，沿着铺满石子的街道穿过闹市区。

马车夫、小店伙计、厨娘、做工的、官吏们纷纷止住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摇头，心里想道：“瞧，这就是干坏事儿的下场，还是我们这样做人好。”孩子们恐惧地望着女强盗，只是她被士兵们押着，不会再为非作歹，才使他们安下心来。一个乡下汉子，卖掉了木炭，

在茶馆里喝足了茶，走到她跟前，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说了句什么。

女犯觉察到众人投向自己的目光，并不转过头去，而是悄悄地斜视那些瞧她的人，大家对她的注意，使她感到开心。春天的空气，与牢房里的气味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她感到开心，不过，她好久没有走路了，这时又穿着笨重的棉囚鞋，双脚在石子路上走得生疼，于是她瞧着自己脚下，尽可能把步子迈得轻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受到谁的欺负，女犯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蓝鸽；鸽子腾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擦过她的耳边，掀起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

二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为平凡。玛丝洛娃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女儿，母亲跟随喂牲口的外祖母住在两个地主小姐的庄子里。这个没出嫁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并且像乡下常有的那样，孩子受过洗礼，做母亲的就不再给这个她不愿意他出世、不需要而且妨碍干活儿的孩子喂奶，孩子很快就被饿死。

已经有五个孩子这样死掉了。他们都受过洗礼，然后都吃不到奶，也就都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私通后生下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小姐中的一个来到喂牲口女工们住的木头房子，训斥她们做的奶油有股牛臊气。当时产妇和漂亮的胖娃娃正躺在房子里。老小姐训斥她们奶油做得不好，又训斥她们不该让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女人住进来，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她的教母。她真的为女孩儿施了洗礼，而后因怜悯自己的教女，时常送些钱和牛奶给母亲，于是女孩儿活了下来。两个老小姐因此叫她“得救妞”。

小孩儿长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小姐就把女孩儿带到自己身边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十分活泼可爱，两个老小姐从她那儿得到不少乐趣。

老小姐是姐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为小姑娘施洗的就是她，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索菲娅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读书，一心想把她调教成自己的养女。玛丽娅却说，应当把这孩子调教成一个会干活的人，一个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要求严格，常常处罚她，遇到心情不好时，甚至还

打她。于是，在两种教育态度的影响下，当小姑娘长大时，她的身份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的叫法也不偏不倚，既不叫雅气些的卡金卡，又不叫俗气的卡吉卡，而是叫普普通通的卡秋莎。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煎炸食品，磨咖啡豆，煮咖啡，洗些零散衣物，有时陪两个老小姐坐坐，给她们读书消遣。

有人向她求婚，可她谁也不想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婚的干力气活的人过日子，她受不了，她已过惯地主家舒适的生活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在她满十六岁那年，老小姐家里来了一个在大学念书的侄子，是位很有钱的公爵，卡秋莎一下子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讲，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后来过了两年，这位侄子在奔赴战场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姑家，在她们那儿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骗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五个月，她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怀了孕。

从那时起，她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心里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乐意服侍两个老小姐，敷衍了事，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小姐讲了不少无礼的话，过后自己感到后悔，就提出辞工的要求。

两个老小姐也对她很是不满意，放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她到一个区警察署长家当侍女，但只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因为署长虽是个五十岁的老头儿，却不停地调戏她，有一次，他纠缠得特别凶，她发起火来，骂他是浑蛋和老鬼，使劲推了他一下，他就倒下了。她因粗暴无礼而被解雇。再找地方做事儿已无必要，不久就将生产，她住到乡下一个又做产婆又贩卖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产婆刚给村子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生下的男婴被送进育婴堂，据送去的老太婆讲，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搬进产婆家时，身上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那个公爵给的。等她离开产婆家时，她手里只剩下六个卢布。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别人向她要钱，她也总是给他们。产婆收她四十卢布算作两个月的生活费——伙食费和茶点费，二十五卢布用作送婴儿去育婴堂的费用，四十卢布被产婆借去买奶牛，另外二十卢布买了些衣服、礼物，随便花掉了，因此当卡秋莎病体复原时，她已身无分文，非找工作不可了。她在一个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事儿。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但也和警察署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卡秋莎十分讨厌他，尽力加以回避。

可是他比她老练和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主人，可以任意支使她到什么地方去，终于抓住个机会，占有了她。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正巧碰见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赶了出来，连工钱也没给。于是，卡秋莎到了城里，住在姨母家。姨丈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不错，可如今丢掉了所有的主顾，酗起酒来，家里的东西，逮住什么拿什么，都换酒喝了。

姨母开着一个小小的洗衣店，她和孩子们以此糊口，并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姨母希望玛丝洛娃到她店里当洗衣工。可是，玛丝洛娃看到姨母店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苦日子，心里犹豫起来，又到荐工所找做女仆的差事。差事找到了，雇主是一位太太，她家只有她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她到那家才一个星期，上中学六年级的留着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调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宁。做母亲的把一切都怪罪到玛丝洛娃头上，将她辞掉了。新的差事一时没有着落，可巧玛丝洛娃在荐工所遇到一位手上有好几个宝石戒指、光裸的胖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正在找事儿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后，给她留下自己的地址，约请她到家里去。玛丝洛娃去了她家。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并打发侍女送一张条子到什么地方去。晚

上，一个留着已经变白的长头发和白胡须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这个老头儿立即坐在玛丝洛娃身边，眼睛闪着光，笑眯眯地上下打量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是个雏儿，乡下来的。”然后女主人叫玛丝洛娃过去，对她说，这是位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讨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金钱的。她讨他喜欢了，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答应和她常常相会。钱很快用得精光，一部分还了欠姨母的费用，一部分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接她再去一次。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房子去。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房子里，却爱上了住在同院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自己把这件事告诉了作家，然后搬到一个很小的单独的房子去住。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去了下诺夫戈罗德，显然把她抛弃了，玛丝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本想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可是警察不准她住。警察分局的局长对她说，只有领取黄色执照^[1]，经过医师检查，她才能住下去。她只好又去姨母家里。姨母看到她身上时髦的连衣裙、披肩和帽子，十分恭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提要她当洗衣女工的事，认为她现在过的是上层生活。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如今

的确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她现在十分同情地看着前面几间屋子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那种苦役般的生活，她们脸色苍白，胳膊枯瘦，有的已经得了痨病，冒着三十度^[2]的肥皂水的蒸汽，在不论冬夏都大开着窗户的屋子里不停地洗呀，熨呀，她想到自己也要服这种苦役，就不寒而栗。

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玛丝洛娃没人做靠山而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早就吸上香烟，而在她与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之后，又越来越迷恋上喝酒。酒所以吸引她，并非因为酒味甘美，而主要是因为酒可以使她忘记她所遭遇的痛苦，可以使她随心所欲，增强自尊，没有酒，她就不可能这样。没有酒，她总是感到心情沮丧，自惭形秽。

牙婆请姨母吃饭，并把玛丝洛娃灌醉，然后提出要她进本城一处上好的、最高等的场所，又向她列举这一行当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着一场选择：要么是屈辱的女仆地位，这将使她难以避免来自男人的纠缠和秘密的、临时的通奸；要么是有保障的、安稳的、合法的地位和公开的、法律许可的、报酬优厚的、经常的通奸。她选择了后一种。此外，她想以此来报复诱骗她的公爵、店员和所有欺负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

个吸引她并使她最终作出决定的原因，那就是牙婆说的，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衣服——丝绒的、罗缎的、真丝的衣服和舞会上穿的袒露肩膀和手臂的服装。当玛丝洛娃想像着自己穿上黑丝绒滚边黄灿灿的袒胸露臂的真丝连衣裙时的情景，就再也经不住诱惑，把公民证给了牙婆。当晚，牙婆叫来一辆马车，将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此，玛丝洛娃开始过上一种长期违背上帝的和人的戒律的生活，有千千万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准许，而且受到庇护，最终十个妇女中有九人会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

夜晚纵酒狂欢，白天昏昏沉睡。下午三四点钟疲倦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饮矿泉水解酒，喝咖啡，穿着罩衫、短上衣、睡衣懒洋洋地在各个房间闲逛，从窗帘后面向窗外张望，无精打采地相互对骂；然后洗澡，擦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的事同老鸨争吵，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涂脂抹粉，描眉毛，吃甜腻的食物；然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丝裙；然后走进灯火辉煌、装饰华丽的大厅，客人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与客人们通奸，其中有年轻人，中年人，半大孩子，朽迈的老头，单身汉，结了婚的人，商人，店员，亚美尼

亚人，犹太人，鞑靼人，富人，穷人，健康人，病人，酒鬼，不喝酒的人，野蛮人，温和的人，军人，非军人，大学生，中学生——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和性格的人们。又是喊叫又是调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又是吸烟又是喝酒，又是喝酒又是吸烟，音乐从傍晚一直响到黎明。只有早晨才能脱身，昏昏睡去。每天如此，每个星期全都如此。周末的时候，去一趟国家机关的一个部门，担任公职的官员们和男医生们，有时态度严肃认真，有时态度轻薄猥亵，践踏了不仅人类天生俱有，而且动物类也天生俱有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反复查看这些妇女的身体，向她们发放许可证，以便让她们继续犯罪，犯她们上一星期和同谋者共同犯下的那种罪行。于是，下一星期依旧如此，而且无论冬夏，不分节假，天天如此。

玛丝洛娃如此度过了七年。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进过一次医院。在她跨入妓院的第七年、第一次失身的第八年，当她二十八岁的时候，她出了事，为此被关进监狱，并在与杀人犯和盗窃犯一起监禁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往法院受审。

当玛丝洛娃行了很长的路，累得精疲力竭，正在押解兵的看押下走近区法院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当年诱骗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还躺在高大的、铺着羽绒褥垫和揉皱被单的弹簧床上，身穿干净的、前胸熨得十分平整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口，吸着香烟。他目不转睛地注视前方，心里想着今天该做的事和昨天发生过的事。

他想起昨天在很有钱、也很有名望的科察金家度过的夜晚，大家都认为他应当和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不禁叹了口气，扔掉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香烟，可是改变了主意，把两条光滑白净的腿伸到床下，用脚找到鞋子，拿起真丝长袍披在肥胖的肩膀上，迈着又快又重的步子，走向卧室隔壁的盥漱室，里面充满了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非自然气味。他用特制的牙粉刷净镶补多处的牙齿，用芳香含漱剂漱口，接着上下洗了起来，并用各式各样的毛巾擦干。他先拿香皂洗手，用刷子仔细刷洗长指甲，在大理石制成的大洗脸池里洗过脸和粗胖的脖子，然后走进卧室旁的第三个房间，这儿已准备好了淋浴。他用冷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富、肤色白皙的身体，拿毛茸茸的浴巾揩干，穿上洁净的、熨平整的内衣和擦得像镜子一样光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小刷子梳理鬈曲的黑色小胡

子和头顶前半部已经稀疏的鬃发。

他使用的所有物品、所有化妆品，如内衣、外衣、鞋子、领带、佩针、袖扣，全是最高级、最昂贵的，不大起眼，却朴素、耐用和物有所值。

聂赫留朵夫从十来条领带和胸针中随手选了两件——从前他做此事觉得新鲜有趣，现在却兴味索然了——穿上刷得干干净净、码放在椅子上的衣服，走了出来，虽然算不得精神饱满，却也干净利落，浑身散发着香气。他进了长方形的餐厅，昨天三个农民已把镶木地板擦洗一新，上面摆放着高大的橡木餐柜和同样质地可以活动的大餐桌，桌腿雕成狮爪的形状，宽宽叉开，十分壮观。这张铺着浆硬的、绣有巨大家徽的薄台布的餐桌上，放着装满浓香四溢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盛着煮过乳皮的罐子和放有新鲜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食具旁边是刚收到的书信、报纸和新一期的《两大陆评论》[【3】](#)杂志。聂赫留朵夫刚要拆阅书信，忽然从通往走廊的门里平平稳稳地走来一个体态丰满、已过中年的妇人，身穿丧服，头戴花边发饰，遮掩着头发上变宽的分缝。她叫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原来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母亲不久前在这所宅子里去世后，如今留下来给少爷当管家。

阿格拉菲娜多次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出

国，在国外住过十来年，言谈举止，有些贵妇人的派头。她从小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里，当他还叫小名米金卡的时候，就对他十分熟悉。

“早晨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聂赫留朵夫开着玩笑，问道。

“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女佣早就送来了，还在我房间等着呢。”阿格拉菲娜说着，把信递给他，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吧，这就看。”聂赫留朵夫说完，拿过信，发觉阿格拉菲娜的笑容，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菲娜的笑容表明，信是科察金公爵小姐写的，依她看来，聂赫留朵夫正准备和小姐结婚。阿格拉菲娜的笑容所表达的这种推测，让聂赫留朵夫感到不快。

“那我叫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菲娜拿起桌上放得不是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把它换了一下位置，平平稳稳地走了出去。

聂赫留朵夫打开阿格拉菲娜交给他的那封散发着香味的信，读了起来。

既然甘愿成为您的备忘录——信写在一张边缘不齐整的灰色厚纸上，字体尖细而稀疏——现在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当出庭陪审，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照您昨天所答应的，以您惯有的轻

率态度所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和柯洛索夫去看画展；除非您愿意向区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为的是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离去，我就想起了这件事。千万不要忘了。

公爵小姐玛·科察金娜

信纸背面附着两句话：

妈妈要我告诉您，您的那套餐具将等您到深夜。
您务必要来，时间悉听尊便。

玛·科

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这封便函是科察金娜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在他身上下的巧妙功夫的继续，目的在于用一条条无形的线把他和她越来越紧地拴在一起。不过，年龄不算太轻、又没有处在热恋之中的男人，往往在结婚的问题上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而对聂赫留朵夫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他纵然下了决心，也难以现在前去求婚。这个原因并非他十年前诱骗过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件事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不会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是他眼下与一个有夫之妇有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看，这种关系现在已经中断，但她却不承认他们的关系已经中断。

聂赫留朵夫与女人交往时显得非常腼腆，然而正是他的这种腼腆挑起了那位有夫之妇想要征

服他的欲望。那个女人是县首席贵族的妻子，聂赫留朵夫常去那个县参加选举。这个女人终于勾引他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日益令聂赫留朵夫感到迷恋，同时也日益感到厌恶。起初，聂赫留朵夫经不住诱惑，后来又因为在她面前有负罪感，所以不得到她的同意，他不能中断这种关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有心，也无权向科察金娜求婚。

桌子上正巧放着这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看见他的笔迹和邮戳，聂赫留朵夫的脸一下红了起来，顿觉精神亢奋，每当他面临危险，往往总有这种体验。不过，他的激动是多余的：那位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来信通知聂赫留朵夫，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局的紧急会议，他请聂赫留朵夫务必前来，以便在地方自治局会议讨论有关学校和铁路专用线等当前重大问题时给以支持，这些问题预计将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对。

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人士，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出现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并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丝毫也不知道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因这个人而经历的种种痛苦的时刻：记得有一次他以为丈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作好了决斗的准备，拿定主意决斗时

朝天开枪；还记得那可怕的一幕，当时她在绝望中跑到花园里的池塘边，想投水自尽，他赶快跑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去，在她没有答复我之前，也不能采取什么行动。”聂赫留朵夫暗自想道。他在一星期前给她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承认自己有过错，准备用任何方式来弥补他的过失，不过他依然认为，他们的关系应当一刀两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她好。他正在等待这封信的回音，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没有回信多少是个好兆头。假如她不同意断绝关系，她早就写信了，或者像以前那样，索性亲自赶来了。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心里酸溜溜的，好不难受，同时又使他感到高兴，毕竟有了可以摆脱这种折磨人的虚伪局面的希望。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田产的管家写来的。总管写道，他，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来一趟，以便依法取得继承权，此外还要对继续经营田产的问题作出决定：是按照老夫人在世时的样子经营呢，还是按照他以前曾向老夫人建议而今又向年轻的公爵建议的方法经营，也就是增加农具，把分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改由自己耕种。总管写道，这样经营更为上算。同时总管还表示歉意，原定本月一号汇上的三千卢布，耽误了几天时间。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推迟汇款

的原因，是怎么也收不齐农民的租金，他们刁钻愚顽，不得不求助官府，强制他们缴纳。这封信既让聂赫留朵夫高兴，又使他不快。高兴的是他感到自己拥有庞大的家业，不快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原是赫伯特·斯宾塞[\[4\]](#)的狂热信徒，身为大土地占有者，他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5\]](#)一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观点深感震惊。凭着青年人的坦率和果敢，他不仅口头上讲土地不应当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不仅在大学里就这一问题写过论文，而且当时在行动上把一小部分土地（这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所有，而是他本人从父亲名下直接继承的）分给了农民，因他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他继承母亲的遗产，成了一个大地主，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像十年前处理父亲留下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自己的财产，或者默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是错误而荒谬的。

第一条道路走不通，因为他除去土地之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他不愿去任职，同时又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他以为自己很难改掉这一习惯。再说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年轻时候的信仰、果敢、虚荣和逞强好胜的欲望，已不复存在。至于第二条道路——否认他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的，后来又从亨利·乔治[\[6\]](#)的著作中找到出色论证土地私有制不合理这一明确

无误、颠扑不破的道理，他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

恰恰因为这个缘故，管家的信令他感到不快。

四

聂赫留朵夫喝过咖啡，朝书房走去，查看通知书上要求几点钟到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需要穿过画室。画室里立着一个画架，架上反放着一幅已开了头的画稿，墙上也挂着几张画稿。这幅他下了两年功夫的画稿，这几张习作，以及整个画室让他想起了最近以来特别强烈体验到的一种感觉，他在绘画方面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他把这种感觉解释为他的审美感过于敏锐，不过这种感觉仍然是十分令人不快的。

七年前，他放弃了军职，认定自己具有绘画的才能，并从艺术活动的高度藐视其他一切活动。现在事实表明，他无权自命不凡。因此，任何与此有关的回忆都让他感到不快。他心情沉重地瞧了瞧画室里的奢侈用具，郁郁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又高又大，装饰华丽，设施齐全。

聂赫留朵夫立即从大写字台的一个标有急件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上面写着务必十一点到庭，然后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

请，他将尽量赶去吃饭。可是，信写完后，他把它撕掉了：信上的口气过于亲热；他重新写了一封——口气冷淡，几乎接近于侮辱。他又把它撕掉了，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铃。从门外走进一个中年以上年纪、脸色阴沉的仆人，腰系灰色细布围裙，留着络腮胡子，嘴巴剃得精光。

“请您叫人雇辆马车。”

“是，老爷。”

“再对科察金家等回话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我会尽量去的。”

“是。”

“有点儿失礼，可是信又写不成。反正后天会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想，走出书房去穿衣服。

当他穿好衣服，来到台阶上，一辆熟悉的胶皮轱辘马车已经在等他了。

“昨天您刚刚离开科察金公爵家，”车夫半扭着白衬衫领子里的黧黑强壮的脖子，说道，“我就到了，看门的人说：‘老爷刚走。’”

“连车夫们也知道我和科察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想，于是他面前出现了近来常常萦绕在他脑际的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该不该和科察金小姐结婚呢？这个问题像他这段时间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得到解决。

结婚的理由不外乎，第一，结婚除了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还可以消除不正当的性生活，而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最主要的，聂赫留朵夫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够给他目前空虚的生活增添一些意义。大体说来，赞成结婚的理由不过如此。至于反对结婚，原因无非是，第一，对失去自由充满恐惧，这是所有不太年轻的单身汉们共同的特点；第二，对女人这一神秘的生命体充满莫名的恐惧。

具体说到单单和米西（科察金娜的名字叫玛丽娅，像所有上流社会的家庭一样，她有一个译名）结婚的理由，第一，她出身名门，从衣着到谈吐、步态、笑容，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这不同之处不是别的，而是她的“贵族风范”——他找不出另外的字眼来形容这一品质，并且对这一品质评价甚高；第二，她对他的评价大大高于别人，因此他以为她是了解他的。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说对他的高尚品性的这种承认，在聂赫留朵夫看来，证明了她的智慧和准确的判断能力。反对和米西结婚的理由呢，比如说，第一，极有可能找到一个品行比米西更出色，因而也与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也许已经有过爱情经历——这一想法让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难受。想到她过去爱过的人不是他，即使那是以前的事，他的自尊心也难以容忍。当

然，她那时不可能知道，她将会遇见他，可是一想到她以前会爱过别的什么人，他就感到自己受了侮辱。

结果，赞成结婚的理由和反对结婚的理由同等，至少两者的说服力不相上下。于是，聂赫留朵夫自己嘲笑自己，把自己称作比里当的驴子^[1]。他直到后来始终是这样的驴子，不知道两捆干草中究竟选哪一捆好。

“不过，在没有接到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和没有同她彻底断绝关系之前，我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对自己说。

想到可以而且应当推迟作出决定，他心里愉快起来。

“不过，我还是以后再考虑这些事吧。”当他乘坐的轻便马车悄无声息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时，他对自己说。

“现在我该认真履行社会职责了，我一直都这么做，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何况这种事总是那么有意思。”他对自己说，从看门人身旁走进法院的门廊。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上

已经人来人往，忙个不停。

手拿公文的法律警们在执行任务，一会儿走得很快，一会儿甚至小跑，双脚紧擦着地面，鞋底刷刷作响，气喘吁吁地跑前跑后。警官、律师和法院办事人员不停地走来走去，原告或未被看押的被告心情忧郁地在墙边溜达，或是坐着等待。

“区法庭在哪儿？”聂赫留朵夫向一名法警问道。

“您找哪个法庭？有民事庭，还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庭。您应当早说清楚。从这儿往右，然后往左，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按他指的方向走去。

在法警所说的那个门的旁边，站着两个等候的人：一个是身材高大肥胖、性格温厚的商人，显然刚刚喝过酒，吃过东西，情绪极佳；另一个是犹太裔店员。当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这里是否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羊毛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和我们一样，是陪审员吧？”性情温厚的商人问，愉快地挤挤眼睛。“那好，我们要在一起工作啦，”他听到聂赫留朵夫的肯定答复，继续说道，“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说完，他伸出又软又胖

的手，“要辛苦一番了。请问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不大的房间里，有十几个不同社会阶层的陪审员。大家都是刚刚才到，一些人坐着，另一些人走来走去，相互打量，相互自我介绍。一个退役的军人穿着军服，其他的人穿常礼服和西服，只有一人穿紧腰长外衣。

所有的人——尽管许多人因此事放下了手头儿的工作，并且嘴上说这是件受累的事——所有的人都面带某种愉悦的神情，因为他们意识到是在从事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们有的已经相识，有的还在相互猜测对方的身份，但他们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那些和聂赫留朵夫不相识的人，赶忙过来和他结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幸。聂赫留朵夫如同平时遇到陌生人一样，将此看作理所当然之事。假使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出别人一等，他会无言以对，因为他的整个生活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地方。至于他能讲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他身上的内衣、外衣、领带和袖扣全是从最上等的服饰店买来的，这一切决不能成为——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出类拔萃的理由。然而，他无疑又认定自己具有出类拔萃的品质，并把别人对他表示的尊敬当作理应如此的举动，要是他们不这样做，他就会感到屈辱。在陪审员议

事室，恰恰因有人对他表示不尊敬而使他体验到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陪审员当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这人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甚至有些夸耀自己不知道他的姓），以前当过他姐姐孩子们的老师。这位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念完大学，现在是一所中学的教师。聂赫留朵夫向来不能容忍他那种不拘礼节的作风、那种洋洋自得的哈哈大笑，总之如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那种“市井习气”。

“啊，您也来啦，”彼得·格拉西莫维奇以响亮的哈哈笑声迎接聂赫留朵夫。“没躲掉吧？”

“我根本就没想躲。”聂赫留朵夫严厉而阴郁地说。

“喏，这可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呢。等着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就不会唱这种高调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哈哈的笑声更响亮了。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和我套近乎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露出只有刚刚听到所有亲人的死讯时才会显得自然的忧伤神情，于是离开他，走到一群人跟前，他们围着一个脸刮得精光、仪表堂堂的高个儿先生，听他津津有味地说着什么。这位先生在讲民事庭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对案情十分熟悉，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们的名字和父称。他说一位著名的律师硬是

把那个案子惊人地扭转过来，诉讼一方的那个老太太，尽管完全有理，却不得不因此白白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天才的律师！”他说。

大家恭恭敬敬地听他讲话，有人极力想插嘴发表意见，但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案件的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尽管来迟了，但是还要等待很久。有一位法官直到现在还没有到，耽误了开庭的时间。

六

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庭长身高体胖，满脸的络腮胡子渐渐变白。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却过着极为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相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今天早晨，他接到一个瑞士女人的信，这个女人去年夏天在他们家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到彼得堡来，信上说她下午三点至六点之间在城里的“意大利饭店”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儿开庭，早点儿结束，以便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幽会，去年夏天他和她在别墅里曾有过一段艳事。

他走进办公室，啪嗒一声锁上门，从文件柜

最下一层的格子中取出一对哑铃，向上、向前、向两侧和向下各举二十次，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轻松地蹲三次。

“要想保持活力，没有什么比淋浴和体操更有效的了。”他想，用无名指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着右臂上隆起的肌肉。他还有一项划圆圈的动作要做（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之前，总要练习这两项运动），这时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庭长赶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打开了房门。

“对不起。”他说。

走进房间的是本庭的一位法官，戴着金丝眼镜，个子不高，端着肩膀，阴沉着脸。

“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来。”法官不满地说。

“还没来，”庭长一面穿制服，一面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是怪事，怎么不知道害羞。”法官说完，生气地坐下，掏出香烟。

这位法官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今天早晨和妻子有过一场不愉快的争吵，因为妻子提前把这个月给她的钱花光了。她要求预支费用，可是他说，他不能改变定下的章程。结果大吵了一场。妻子说，如果这样，那家里就不备饭了，他休想在家吃饭。吵到这里，他离开了，害怕妻子真的把她的威胁变成行动，因为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过日子，竟落得这个

样子。”他暗自想到，望着容光焕发、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和性情温厚的庭长，庭长架着胳膊，用漂亮而白细的双手往绣花衣领的两旁理着他那又密又长、渐渐变白的络腮胡子，“他总是得意洋洋，快快活活，可我却受罪。”

书记官走进房间，送来一份案卷。

“非常感谢，”庭长说，点着一支香烟。“先审哪个案子？”

“我看，就审毒害人命的那个案子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那好，毒害人命案就毒害人命案吧，”庭长说，琢磨此案在四点之前可以结束，然后就能走了。“马特维·尼基季奇还没来吗？”

“还没来。”

“布列维在吗？”

“在。”书记官回答。

“那么您见到他时，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害人命案。”

布列维是副检察官，他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起公诉。

书记官刚进走廊，就遇见了布列维。他高高耸起肩膀，敞开制服的扣子，腋下夹着公文包，一溜小跑似的沿走廊走来，鞋后跟登登地敲击地板，空闲的那只手顺着他行进的方向垂直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

好了没有？”书记官向他问道。

“不用说，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子？”

“毒害人命案。”

“好极了。”副检察官说，然而他根本不认为这好极了：他一夜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折腾到夜里两点钟，然后去玩女人，去的地方正是玛丝洛娃六个月以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因此恰巧毒害人命案的案卷没来得及看，现在打算赶快去浏览一遍。书记官知道他没有看毒害人命的案卷，故意向庭长建议先审这个案子。书记官是个具有自由派甚至激进派思想方式的人。布列维却思想保守，而且像所有在俄国供职的德国人一样，甚至特别笃信东正教，所以书记官不喜欢他，对他的职位心怀妒忌。

“那么，阉割派[\[8\]](#)教徒的案子怎么样啦？”书记官问。

“我说过，我不能办，”副检察官说。“因为缺少证人，我要向法庭申明这一点。”

“可是总得要……”

“我不能办。”副检察官说完，又那样摆动手臂，跑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以缺少一个对此案根本不重要、也不必要的证人为借口，推迟起诉阉割派教徒的案子，仅仅因为法庭审案时，陪审团由受过教育的人组

成，此案的结局很可能是宣告无罪。如果说服庭长，这个案子就可以移交县法院审理，那里的农民陪审员多一些，因而判决有罪的机会也更大一些。

走廊上越来越热闹了。民事庭附近的人最多，里面正在审理刚才那位仪表堂堂、专爱探听案情的先生对陪审员们所讲的案子。休庭时，从民事庭里走出一个老太太，那位天才的律师正是从她身上剥夺了她的财产给一个生意人，那个生意人根本无权得到这笔财产——这一点法官们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更清楚；可是他们想出了致命的一招，结果不能不剥夺老太太的财产，也不能不把它判给生意人。老太太身材肥胖，衣着华丽，宽檐女帽上插着几只很大的花朵。她从门里出来后，站在走廊上不走，摊开又粗又短的双手，不住地对她的律师重复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请您说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花朵，心里琢磨着什么，没有听她讲话。

那位著名的律师跟在老太太身后，快步走出民事庭的大门，西装背心大敞着扣子，里面带前胸的衬领闪闪发亮，他那洋洋自得的脸上也同样闪闪发亮，他施展本领，让戴花的老太太落得身无分文，而那个送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得到的却不下十万。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律师，他觉察到这

一点，那神气仿佛在说：“不必对我表示任何崇拜。”——迅速从大家身旁走过去了。

七

马特维·尼基季奇终于来了，于是一个身材瘦削、脖子细长、步态歪斜、凸起的下嘴唇也歪斜的法警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位法警是个诚实的人，受过大学教育，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保不住自己的职位，因为他饮酒无度。三个月以前，他妻子的靠山，一位伯爵夫人，为他谋得这个职位，他至今还没有把它丢掉，并因此而沾沾自喜。

“怎么样，先生们，都到齐了吗？”说完，他戴上夹鼻眼镜，从镜片上方打量着四周。

“好像全到齐了。”一个快活的商人说。

“我们来核对一下。”法警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名单，开始点名，不时地从夹鼻眼镜上方，或者透过镜片打量被点到名字的人。

“五等文官伊·马·尼基福罗夫。”

“是我。”那位仪表堂堂、熟悉一切案情的先生说。

“退役上校伊万·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

“有。”一个身穿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应声答道。

“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绍夫。”

“到，”性情温厚的商人笑着大声说。“准备好啦。”

“禁卫军中尉德米特里·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

法警从夹鼻眼镜上方望着他，特别恭敬而愉快地鞠了一躬，仿佛借此表示他的身份与众不同。

“大尉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丹琴科，商人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库列绍夫。”——等等，等等。

除去两个人，大家都到了。

“现在，先生们，请进法庭吧。”法警用令人愉快的手势指着门说。大家纷纷起身，出门时互相谦让，来到走廊上，再从走廊来到法庭。

法庭设在一个长方形的大厅里。它的一端是个高台，通往高台有三级台阶。高台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桌子铺着带深绿色穗子的绿呢台布。桌子后面摆着三把橡木雕花的高背扶手椅，椅子后面的墙上悬挂着镶有金框的鲜艳的将军全身像，身穿军服，肩挎绶带，手扶军刀，一只脚稍稍向前跨出半步^[9]。右边墙角上方悬挂着供奉头戴荆冠的基督圣像的神龛，下方是读经台，右边是检察官的斜面高写字台。左边，斜面高写字台的对面，远远地摆着书记官的小桌，靠近旁听席的

地方有一道光滑的橡木栏杆，里面是暂时还空着的被告坐的长凳。高台右边放着两排靠背同样很高的椅子，是给陪审员们准备的，高台下边是律师们的桌子。这一切都在大厅的前半部分，大厅被那道栏杆隔成两半。大厅的后半部分摆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一直延伸到后面的墙壁。后半部分前排的长凳上，坐着四个女人，像是工厂的女工或者女仆，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厂的工人，他们显然受到大厅庄严肃穆气氛的震慑，因此胆怯地窃窃私语。

陪审员们刚刚坐好，法警就迈着笔直的步伐走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开庭啰！”

大家站立起来，法官们登上高台：领头的是那肌肉隆起、络腮胡子很漂亮的庭长；然后是戴金丝眼镜、脸色阴郁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加阴郁了，因为开庭前他碰见担任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他，刚刚去过姐姐那儿，姐姐向他声明，家里不再备饭了。

“看来，咱们只好上小饭馆啦。”内弟笑嘻嘻地说。

“没有什么好笑的。”脸色阴郁的法官说，脸色变得越发阴郁起来。

最后上来的第三位法官，是那个总爱迟到的马特维·尼基季奇——此人满脸胡须，一双很大

的、善良的眼睛有些下坠。这个法官患有胃炎，遵照医生的建议，从今天早晨起开始新的起居方式，而这种新的起居方式使他如今比平常在家里耽搁的时间更长。此刻，当他走向高台时，脸上露出凝神沉思的表情，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用各种方法估算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此时他正在估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到高背椅的步数能被三除尽，那么新的起居方式就能治好他的胃炎，如果除不尽，就治不好。他走完二十六步，但又迈了一小步，结果正好二十七步走到高背椅跟前。

庭长和两位法官登上高台，身穿衣领上镶有金色饰物的制服，气势十分威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三个人似乎为自己的气势感到难为情，谦逊地垂下眼睛，赶忙坐到铺着绿呢台布的桌子后面各自的雕花椅子上。桌子上耸立着一件带有老鹰的三角形的陈设物^[10]，摆放着几个高脚玻璃盘，这种盘子在食品店里通常是用来装糖果的，还摆放着一个墨水瓶、几只钢笔、一沓上等的白纸和几支新削的粗细不同的铅笔。副检察官也和法官们一起走进大厅。他腋下夹着公文包，还是那样步履匆匆，那样摆动手臂，走到窗边自己的位子上，立即埋头翻阅案卷，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再对案件作些准备。这是他第四次提起公诉。他功名心极重，一心想向上爬，因此

他认为凡是经他提起公诉的案件，非得判刑不可。毒害人命一案的实质，他大致已经知道，并且拟好了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此刻正忙着从案卷中摘录。

书记官坐在高台的对面，把可能要他宣读的文件准备完毕，又看起他昨天搞到并已读过的那篇被查禁的文章。他想和那位与他观点一致的留络腮胡子的法官谈谈这篇文章，谈话之前想再熟悉一遍。

八

庭长翻阅了文件，向法警和书记官提了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吩咐把被告押上来。栏杆后面的门一下开了，两个戴军帽的宪兵手握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三名被告，打头的是一个满脸雀斑的红头发男人，然后是两个女人。那个男人穿着囚袍，又肥又长，与他的身材极不相称。他进法庭的时候，两手伸得笔直，跷起大拇指，紧紧地贴着裤缝，用这种姿势抵住老往下滑的长袖口。他不看法官和旁听者，而是注视着他绕过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边上，留下地方给别人坐，然后眼睛瞧着庭长，两腮上的肌肉轻轻颤动起来，仿佛在嘟哝什么。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身

上也穿囚袍。这个女人头上包着囚犯用的三角围巾，脸色灰白，没长眉毛和睫毛，但有一双红色的眼睛。她看上去十分镇静。她来到自己的位子旁，囚袍不知被什么东西钩住，她不慌不忙地把它小心摘开，坐了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她刚一进来，大厅里所有男人的眼睛一齐对准她，久久不能离开她那白皙的脸庞、亮晶晶的黑眼睛和囚袍下高高耸起的乳房。甚至那个宪兵，当她在她身旁经过时，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走过去，在座位上坐下，她坐好后，他似乎才意识到自己有失体面，赶忙扭过脸去，提起精神，眼睛呆呆地望着面前的窗户。

庭长在等被告们入座，玛丝洛娃刚刚坐下，他就把目光转向书记官。

例行的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的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问题，处以他们罚金，解决请假陪审员的问题，补充候补陪审员替代缺席陪审员。然后，庭长折了几个纸阄，放进高脚玻璃盘中，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浓密的双手，用魔术师般的动作，摸出一个纸阄，把它打开读了起来。接着庭长放下袖口，请司祭带领陪审员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儿，一张浮肿的脸白中带黄，身着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法衣一侧还

别着一枚小小的勋章。他缓慢地挪动法衣里面浮肿的双腿，走到圣像下边的读经台前。

参加宣誓的陪审员们站了起来，拥挤着朝读经台走去。

“请。”司祭说，用浮肿的右手摸着胸前的十字架，等陪审员们走过来。

这位司祭任神职已有四十六年，正准备再过三年，就像大司祭不久前那样，庆祝自己任职五十周年了。自从设立陪审法院以来，他就在区法院担任此职，他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带领宣誓的陪审员有数万人之多，而且到了晚年，还在继续为教会、国家和家庭的利益工作，他死后将给家庭留下的资产，除去一所房子外，还有不下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他在法院从事的工作是把手放在福音书上带领人们宣誓，而福音书恰恰禁止宣誓，所以他的这项工作并不出色，不过他从未想过这一点，非但不感到因此而受累，反而喜欢这个驾轻就熟的职业，可以借此结交一些出色的人士。今天他就不胜荣幸地认识了那位著名的律师，对他不胜钦佩，仅仅办理了帽子上插着花朵的老太太的一个案子，就得到了一万卢布。

当所有的陪审员沿着台阶登上高台以后，司祭侧着白发已秃的脑袋，钻进祭披的油膩膩的圆孔，理了理稀疏的头发，把脸转向陪审员。

“举起右手，手指这样捏在一起。”他用苍老

的声音缓缓地说，举起每个手指上都长着小圆窝的浮肿的右手，把拇指、中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现在大家跟我念，”他说完，念了起来：“对万能的上帝，当着主的神圣的福音书和主的感召万物的十字架，我保证并发誓，在审理本案时……”他每说一句，中间都要顿一下。“别把手放下，请这样举好，”他对一个放下手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时……”

那个满脸络腮胡子、仪表堂堂的先生，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照司祭要求的样子举起手，捏着三个手指头，似乎有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手举得很高，一丝不苟，可是其他的人似乎显得不大情愿和漫不经心。一些人念誓词时声音过于响亮，那口吻仿佛带有斗气的意味：“反正我跟着念，跟着念就是了。”一些人只是耳语般小声念着，老是落在司祭的后边，一会儿好像惊觉似的，不合节拍地赶上去。一些人似乎害怕落掉什么东西，用挑衅的姿势把三个手指捏得紧而又紧；另一些人却不时地把手指松开，然后再次捏紧。人人都感到十分尴尬，只有那个小老头司祭才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正在做一件非常有益、而且也非常重要的事情。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站起身来，前拥后挤地来到议事室，一进议事室，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即掏出香烟，吸了起来。有人提议选那位

仪表堂堂的先生当首席陪审员，大家马上表示同意，于是把烟蒂丢掉或捻灭，回到大厅。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选举结果，大家又彼此迈过别人的腿，坐到那两排高背椅子上去。

一切进展顺利，毫不耽搁，而且气氛不无隆重，这种正经八百、有条不紊、庄严隆重的气氛显然使参加审案的人员感到十分快意，也更加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一项严肃而重要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体会到了。

陪审员们刚刚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他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停地变换姿势：一会儿左肘支着桌子，一会儿右肘支着桌子，一会儿身子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把胳膊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会儿理理纸，一会儿摆弄裁纸刀，一会儿摸索铅笔。

按照他的话说，他们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向被告提问题，可以使用铅笔和纸，还可以察看物证。他们的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得作假。他们的义务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准向外界透露消息，如有违反，将受到惩罚。

大家毕恭毕敬地用心听他讲话。那个商人浑身散发着酒气，强忍住不打响嗝，对每一句话都点头表示赞成。

庭长讲完话，把脸转向被告。

“西蒙·卡尔津金，请站起来。”他说。

西蒙紧张地跳起来。腮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快

了。

“您的姓名？”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干脆利落地说，显然事先准备好了答话。

“您的身份？”

“农民。”

“什么省、什么县人？”

“图拉省，克拉皮夫纳县，库皮扬斯克乡，博尔基村人。”

“您的年龄？”

“三十三岁，生在一八……”

“宗教信仰？”

“我信俄国教，东正教。”

“结婚没有？”

“没有，老爷。”

“做什么工作？”

“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楼层招待。”

“以前吃过官司吗？”

“从来没有，因为我以前过日子……”

“以前没吃过官司？”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叶菲米娅·伊万诺娃·博奇科娃。”庭长转向下一个被告。

可是，西蒙仍旧站着，挡住了后排的博奇科娃。

“卡尔津金，坐下。”

卡尔津金依旧站着不动。

“卡尔津金，坐下！”

可是，卡尔津金还是站着，直到法警跑过去，歪着脑袋，不自然地睁大眼睛，声调可怖地小声说：“坐下，坐下！”他才坐了下来。

卡尔津金像刚才站起时一样，迅速坐下，掩了掩囚袍，腮帮子又一次无声地抖动起来。

“您的姓名？”庭长疲倦地叹了口气，转向第二名被告，眼睛并不瞧她，只顾翻阅面前的文件。审案对庭长来说，已是轻车熟路，若要加快审案的速度，他可以一下审理两个案子。

博奇科娃四十三岁，科洛姆纳县小市民出身，也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楼层招待。她以前没有吃过官司，起诉书副本已经收到。博奇科娃回答问题时异常果断，那口气仿佛每回答一句话都在说：“对，我是叶菲米娅，我是博奇科娃，副本收到了，我对这事儿感到自豪，谁也不许笑话我。”问话刚一结束，博奇科娃不等人家叫她坐下，自己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您的姓名？”好色的庭长对第三名女被告说话时态度格外殷勤。“应该站起来。”他看见玛丝洛娃坐着不动，温和而亲热地补充说。

玛丝洛娃动作灵活地站起身来，露出顺从的神情，挺着她那高耸的胸脯，一双含满笑意、微微斜视的黑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庭长，没有答话。

“叫什么名字？”

“柳包芙。”她迅速回答。

聂赫留朵夫趁庭长审问被告的时候，戴起夹鼻眼镜，逐个打量他们。“这决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女被告的脸，暗自想道，“可是怎么叫柳包芙呢？”听到她的回答，他心里想。

庭长本打算再往下问，可是戴眼镜的法官生气地小声说了句什么，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又转向玛丝洛娃。

“怎么叫柳包芙？”他说。“您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

被告沉默不语。

“我问您的真名叫什么。”

“受洗时的名字叫什么？”那位生气的法官问道。

“从前叫卡捷琳娜。”

“这决不可能。”聂赫留朵夫继续对自己说，其实他心里丝毫已不怀疑，这就是她，就是那个半是养女半是侍女的姑娘，当年他曾经爱过她，

的确爱过她，并在某种丧失理智的状态下诱骗了她，接着又抛弃了她，以后再也没有想起过她，因为这种回忆太令人痛苦，太容易揭穿他的假相和表明他这个素以品行端正而自豪的人，非但品行不端，而且对这个女人的行为简直是下流透顶。

不错，这就是她。现在他清楚地看到了她脸上的那种独有的、神秘的特征，这种特征使每一张脸和另一张脸区别开来，并使每一张脸成为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尽管她的脸如今苍白和胖得不大自然，但是那一特点，那一可爱的、独有的特点，依旧表现在她的脸上、嘴唇上和微微有些斜视的眼睛上，尤其是表现在她的天真的、充满笑意的眼神里和脸上以至浑身上下流露出来的顺从的神态里。

“您早就应该这样说嘛。”庭长还是那样特别温和地说。“父称是什么？”

“我是私生女。”玛丝洛娃说。

“那按教父的名字怎么称呼呢？”

“米哈伊洛娃。”

“她能干出什么坏事呀？”聂赫留朵夫心里仍然在想，呼吸已有些急促。

“您的姓，您现在用什么姓？”庭长继续问。

“随母亲的姓玛丝洛娃。”

“身份呢？”

“小市民。”

“信仰是东正教吗？”

“是东正教。”

“职业呢？您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沉默不语。

“您做什么工作？”庭长重复问。

“在一个场所。”她说。

“在什么场所？”戴眼镜的法官厉声问。

“您自己明白，是什么场所。”玛丝洛娃说

完，莞尔一笑，接着匆匆瞥了瞥四周，又直勾勾地瞧着庭长。

她脸上的表情有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她说话的含义、她的笑容和刚才匆匆瞥视法庭的目光中也有某种可怕而又可怜的东西，庭长不由得低下了头，法庭上刹那间变得悄然无声。旁听席上一个人的笑声打破了这种沉寂。有人对他发出嘘声。庭长抬起头，继续提问：

“以前判过刑或上过法庭吗？”

“没有。”玛丝洛娃轻声说，叹了口气。

“起诉书副本收到没有？”

“收到了。”

“请坐下。”庭长说。

被告用盛装贵妇整理曳地长裙时的动作，从后面提了提裙子，坐了下来，把白净的、不大的双手抄在囚袍的袖子里，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庭

长。

接下来登记证人的姓名，证人退席，确定法医人选，并请他出庭。然后，书记官站起来宣读起诉书。他读得倒也清楚和响亮，可是太快，以致舌尖音和卷舌音混淆不清，结果他的声音变成了一片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催人欲睡。法官们一会儿把胳膊支在椅子的一个扶手上，一会儿支在另一个扶手上，一会儿支在桌子上，一会儿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彼此交头接耳。一个宪兵几次要打哈欠，好不容易才忍住。

几名被告当中，卡尔津金不停地抖动腮帮子上的肌肉。博奇科娃挺直腰板坐在那儿，神色镇定，偶尔用手指头伸到头巾底下搔搔头皮。

玛丝洛娃时而坐着不动，瞧着书记官，听他宣读，时而浑身战抖，似乎想进行反驳，脸涨得通红，随后重重地叹口气，双手换了下姿势，往四周看了一眼，又目不转睛地盯着宣读起诉书的人。

聂赫留朵夫坐在前排第二把高背椅上，摘掉夹鼻眼镜，望着玛丝洛娃，他的内心深处正进行着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思想活动。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毛里塔尼亚’旅馆有一名旅客突然死亡，经查该名旅客为库尔干市二等商人费拉蓬特·叶梅里亚诺维奇·斯梅里科夫。

“经第四警察分局医官验明，死亡系因饮酒过量引起心力衰竭所致。斯梅里科夫的尸体当即入土安葬。

“案发数日后，斯梅里科夫的同乡挚友、商人季莫欣自彼得堡归来，获悉斯梅里科夫死亡情由，遂即表示怀疑有人图谋他所携带之钱财，将其毒死。

“此项怀疑已由预审证实，现查明：（一）斯梅里科夫死亡前不久曾从银行提取现款三千八百银卢布。而封存死者财物时发现的现金仅为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死前一日及死前最后一夜，斯梅里科夫曾在妓院和‘毛里塔尼亚’旅馆与妓女柳包芙（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在一起，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曾受斯梅里科夫之托，在他本人不在旅馆时，从妓院到该旅馆取钱，她使用斯梅里科夫交给她的钥匙，打开他的皮箱，取走现金，当时在场的有‘毛里塔尼亚’旅馆的楼层招待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和西蒙·卡尔津金。玛丝洛娃打开皮箱时，博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均在场目睹箱内有面值一百卢布的钞票若干叠。

（三）斯梅里科夫和妓女柳包芙返回‘毛里塔尼亚’旅馆后，该妓女受卡尔津金的唆使，给斯梅里科夫饮下一杯白兰地，酒中掺有卡尔津金交与她的白色药粉。（四）第二天早晨，妓女柳包芙

（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即将斯梅里科夫之钻石戒指一枚卖与其妓院鸨母，即本案证人基塔耶娃，自称戒指系斯梅里科夫所赠。（五）斯梅里科夫死后次日，‘毛里塔尼亚’旅馆女招待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即至本地商业银行，在其活期存款户头上存入一千八百银卢布。

“经法医检查，解剖斯梅里科夫的尸体并化验其内脏，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存在，据此可以断定，死亡系因中毒所致。

“玛丝洛娃、博奇科娃、卡尔津金等三名案犯均不认罪。玛丝洛娃辩称，确系受斯梅里科夫委派，从其所谓工作之妓院到‘毛里塔尼亚’旅馆为该商人取钱，她用商人给她的钥匙打开其皮箱，并遵嘱取出四十银卢布，未曾多取分文，此点博奇科娃与卡尔津金可以证明，因开箱、取款、锁箱之际二人均在场。玛丝洛娃还供称，当其第二次来到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时，确曾在卡尔津金的怂恿下，使该商人饮下掺有一种粉末的白兰地，她以为此粉末系安眠药物，可使商人入睡，并可及早脱身。戒指实乃商人所赠，因其受到该名商人殴打，放声痛哭，且欲从其房间离

去。

“叶菲米娅·博奇科娃供称，她对丢钱之事概不知情，她未曾进入该商人房间，出入房间者仅玛丝洛娃一人，商人如有财物被盗，亦系柳包芙持该商人钥匙来取钱时所为。”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周身战栗一下，张着嘴，看了博奇科娃一眼。“当法庭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出示其一千八百卢布银行存单，”书记官继续念道，“并询问其款项来源时，她供称，该款乃她与卡尔津金十二年之积蓄，她已准备与此人结婚。另据西蒙·卡尔津金第一份供词，他和博奇科娃，受持钥匙自妓院赶来的玛丝洛娃的唆使，共同窃得该款，并与玛丝洛娃及博奇科娃均分。”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周身再次战抖，甚至一下站了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想开口说什么，但被法警制止。“最后，”书记官接着念道，“卡尔津金还供认，曾将粉末给玛丝洛娃，以使该商人入睡；而在第二份供词中，他否认参与偷窃和将药粉交给玛丝洛娃，并将全部罪责推与玛丝洛娃一人。关于博奇科娃存入银行之款项，他的供词与博奇科娃相同，系二人在旅馆当差十二年中所得之小费。”

此后，起诉书中列举了对质记录、证人的证词、法院鉴定人的意见，等等。

起诉书的结语如下：

“鉴于上述事实，兹对博尔基村农民西蒙·彼

得罗夫·卡尔津金、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二十七岁，提起公诉：该等罪犯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合伙预谋，窃取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及钻石戒指一枚，共值二千五百银卢布，并蓄意谋害斯梅里科夫的性命，用毒酒将其灌醉，致使该名商人死亡。

“罪犯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典》第一四五三条第四款及第五款。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令》第二〇一条之规定，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及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现交由区法院会同陪审员审理。”

就这样，书记官读完了这份冗长的起诉书，把它一页一页整齐地放好，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双手理了理他的长头发。大家轻松地舒了口气，愉快地意识到，审讯即刻开始，一切马上就要水落石出，正义定会得到伸张。惟独聂赫留朵夫一个人没有体验到这种感觉：他已陷入沉思，他十年前认识的那个清纯可爱的姑娘竟然做出这等事来，不禁让他惊骇万分。

十一

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和另两位法官商议了一下，然后转向卡尔津金，脸上的表情分明在

说，现在我们要把一切都查清楚，查仔细。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把身子向左歪了歪，说道。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两手紧紧贴住裤缝，身子整个倾向前面，腮帮子上的肌肉无声地抖个不停。

“对您的指控是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伙同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和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内的现金，然后拿来砒霜，指使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放在酒里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中毒死亡。您承认自己犯罪吗？”他说完，又把身子歪向右边。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因为我们只管伺候客人……”

“这话您以后再说。您承认自己犯罪吗？”

“根本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您承认自己犯罪吗？”庭长语气平静，然而又十分坚决地重复道。

“我可不干这种事儿，因为……”

法警又一次跑到西蒙·卡尔津金跟前，声调可怖地低声制止他。

庭长脸上露出对他审讯已经结束的神情，拿着文书的手的肘部挪了个地方，把身子转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

“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对您的指控是一八八×

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里塔尼亚’旅馆与西蒙·卡尔津金及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合伙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中的现金和钻石戒指一枚，赃物均分之后，为掩盖罪行，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毒酒，致使他死亡。您承认自己犯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犯，”女被告干脆利落地说。“我连那个房间的门都没进去……这个贱货进去过，准是她作的案。”

“您有话待会儿再说，”庭长又语气温和而坚决地说。“那你是不承认自己犯罪啦？”

“不是我拿的钱，也不是我灌的酒，我连那个房间的门都没进去。我要是进去的话，早把她撵出来了。”

“您不承认自己犯罪吗？”

“决不承认。”

“很好。”

“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庭长转向第三名被告，“对您的指控是带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的钥匙从妓院来到‘毛里塔尼亚’旅馆后，从皮箱里盗窃现金及钻石戒指一枚。”他像背书一样说，同时把耳朵凑近左边的法官，法官说对照物证清单，还缺少一件实物酒瓶。“盗窃皮箱里的现金及钻石戒指一枚。”庭长重复说。“并把赃物均分，然后又和商人斯梅里科夫来到‘毛里塔尼亚’旅馆，您给斯梅里科夫喝下毒酒，致使他死

亡。您承认自己犯罪吗？”

“什么罪也没犯，”她很快地说，“我先说过了，现在还这么说：我没拿钱，没拿就是没拿，我什么也没拿，那个钻石戒指是他自己送我的……”

“您不承认自己犯有盗窃二千五百卢布现金的罪行吗？”庭长说。

“我说了，除了四十卢布，什么都没拿。”

“那么，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的酒里放药粉，对这一罪行您承认吗？”

“这事儿我承认。不过我以为，别人也是这么告诉我的，那是安眠药，吃了没关系。我没想到他会死，也没想过让他死。我对上帝发誓——从没想过。”她说。

“那么说，您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的钱和钻石戒指的罪行，”庭长说。“可是承认给他酒里放了药粉？”

“承认是承认，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的药粉。我放药粉，只是想让他睡觉——没想过让他死，也没想到他会死。”

“很好，”庭长说，显然对取得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说说事情的经过吧，”他说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手放在桌子上。“请把事情的全部经过说一说吧。您要是老实招认，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玛丝洛娃依然那样直勾勾地瞧着庭长，沉默不语。

“说说事情的经过。”

“事情的经过？”玛丝洛娃突然很快地说。“我来到旅馆，有人把我领到他的房间，他醉得特别厉害。”她说到他这个词时，脸上露出异常恐惧的神情，眼睛睁得老大。“我想走，他不放。”

她不做声了，好像一下断了思路，又好像想起了别的什么。

“那后来呢？”

“后来呀！后来我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这时，副检察官一只胳膊肘不自然地支撑着半欠起身子。

“您要提问吗？”庭长说，得到副检察官肯定的答复，向他做了个手势，表示把审问的权利让给他。

“我想提一个问题：被告和西蒙·卡尔津金以前是不是认识？”副检察官说，眼睛并不看玛丝洛娃。

他提过问题，就闭紧嘴唇，皱起眉头。

庭长重复了一遍问题。玛丝洛娃惊惶地瞧着副检察官。

“西蒙？认识。”玛丝洛娃说。

“我现在想知道，被告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是不是经常见面？”

“交情怎么样？他常找我去陪客人，算不上什么交情。”玛丝洛娃回答，惴惴不安地把目光从副检察官的脸上转向庭长，然后又转了回去。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单找玛丝洛娃而不找别的姑娘陪客人。”副检察官眯缝起两眼，面带轻狂而刻薄的笑容说。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玛丝洛娃回答，惊惶地看了一眼四周，目光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停留了片刻。“他想找谁就找谁呗。”

“难道她认出来啦？”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感觉血直往脸上涌；可是玛丝洛娃并没有发现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马上把目光移开，又带着惊惶的神情瞧着副检察官。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和卡尔津金有什么亲密关系啦？很好。我没话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即把胳膊肘从写字桌上拿开，开始记什么。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记，只是用笔在描他笔记上的字母，他常见检察官和律师们这么做：他们每次提过一个巧妙的问题，都在自己的发言稿上写几句足以击败对方的要点。

庭长没有立刻对被告提问，因为他这时在征询戴眼镜法官的意见，是否同意提出事先准备好并已写在纸上的问题。

“后来怎么样了呢？”庭长继续问道。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接着说，她的眼睛

只瞧着庭长一个人，胆子稍稍大了起来，“把钱交给掌班，就上床睡觉了。我刚睡着，我们的一个叫别尔达的姑娘叫醒了我。‘去吧，你那个商人又来了。’我不想出去，可是掌班偏叫我去。他一个劲儿地。”她说到他这个词时，脸上又露出明显的恐惧的神情，“他一个劲儿地让我们姑娘们喝酒，后来还想叫人再去买一瓶，可是他的钱花光了。掌班的信不过他。他就叫我去他的房间。还告诉我，钱放在哪儿，取多少。我就去了。”

庭长这时正和左首的法官小声交谈，没有听见玛丝洛娃说什么，可是为了表示他全听见了，就把她最后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您就去了。那后来呢？”他说。

“我来到旅馆，照他吩咐去做：进了他的房间。我不是一个人进去的，还叫了西蒙·卡尔津金和她。”她说完，指了指博奇科娃。

“她撒谎，我根本就没进去……”博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玛丝洛娃皱起眉头，眼睛不看博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被告取出四十卢布时，是否注意到有多少钱？”检察官又问道。

检察官刚一提问，玛丝洛娃就全身哆嗦了一下。她不知道情况会怎样，然而已经感到，他对她不怀好意。

“我没数过；只看见都是些一百卢布的票子。”

“被告看见了那些一百卢布的票子——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那么，您把钱带回去了？”庭长看看表，继续问道。

“带回去了。”

“那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带我回旅馆了。”玛丝洛娃说。

“那您是怎样给他喝下放粉末的酒的？”庭长问。

“怎么给他喝的？把粉末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您为什么要给他喝？”

她没有回答，沉重地长叹一口气。

“他一直不让我走，”她沉默片刻后，说。“我受不了，累死了。我到走廊上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能放我走才好呢。我累啦。’西蒙·米哈伊洛维奇也说：‘我们也对他烦透了。我们想让他吃安眠药粉；他一睡着，你就可以走了。’我说：‘好吧。’我想，这药粉没什么害处。他就给了我一个纸包。我走进房间，他正在隔板后面躺着，让我马上给他倒一杯白兰地。我拿起桌上一瓶上等香槟酒，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给他，而在他那杯里撒上药粉，给他喝了。我要

是知道那是毒药，就不会给他喝。”

“那么，钻石戒指怎么落到您手里的？”庭长问。

“戒指是他自己送我的。”

“他在什么时候送给您的？”

“我跟他回到房间，我想走，他打了我脑袋一下，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非走不可。他就摘下手上的钻石戒指，送给我，好让我别走。”她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稍稍欠起身子，依旧假装天真地请求再提几个问题，得到允许之后，把头往绣花领子上一歪，问道：

“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

玛丝洛娃又一次感到恐惧，提心吊胆地把眼睛从副检察官身上移向庭长，急忙说道：

“我不记得待了多长时间。”

“那么，被告是否记得，她在离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后，还去过旅馆里别的什么地方？”

玛丝洛娃想了想。

“去过隔壁的一个空房间。”她说。

“您去干什么？”副检察官说，一时过于专心，竟直接审问起来。

“我去整理一下衣服，等马车。”

“卡尔津金是否和被告在那个房间里？”

“他也去了。”

“他去干什么？”

“商人喝剩下一点上等香槟，我们一块儿喝了。”

“哦，一块儿喝了。很好。”

“那被告是否和卡尔津金谈过话，谈的是什么呢？”

玛丝洛娃突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急促说道：

“谈的是什么呢？什么我也没谈。事情的经过我都讲过了，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想拿我怎么办，随你们的便。我没有犯罪，就这样。”

“我没什么要问的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不自然地耸耸肩膀，开始飞快地在自己的发言提纲上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和西蒙一起进过一个空房间。

法庭上一阵沉默。

“您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我全说完了。”她说，叹口气，坐在位子上。

随后，庭长在纸上记了些什么，听到左首法官小声对他说的话，宣布休庭十分钟，匆匆站起来，走出法庭。庭长和左首高个子、大胡子、长着善良的大眼睛的法官在商议，商议的是这位法

官觉得胃里不舒服，想自己做下按摩，喝点药水。他告诉庭长的就是这件事，于是根据他的要求，宣布了休庭。

陪审员、律师、证人也随法官们站起身，愉快地感到这个重要案件已审完大半部分，开始四下走动起来。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下。

十二

是的，这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为了准备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他在两位姑姑家里过了一个夏天。往年的夏天，他总是跟母亲和姐姐住在莫斯科郊外母亲的大庄园里。可是，这一年姐姐出嫁了，母亲到国外有温泉的地方疗养去了。聂赫留朵夫需要写论文，于是决定去姑姑家度夏。在她们那个偏僻的地方，既幽静，又没有什么消遣可以分心；两位姑姑十分疼爱这个侄子和遗产继承人，他也爱她们，喜欢她们充满旧式情调的淳朴生活。

这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姑家体验到一种

欢快的自由心态：这个年轻人第一次不经别人指点，亲身领会到生活的美丽和意义，领会到人在生活中从事的事业的重要性，看到了自己以至整个世界可以达到无限完善的境界，不仅对这种完善的境界充满希望，而且对可以达到他所想像的完善境界具有十足的信心。这一年，他在大学里已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观点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虽不富有，可是母亲却有近一万俄亩土地的陪嫁。他当时第一次懂得了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不公平，而他是那种把为道德需要作出牺牲看作最高精神享受的人，他决定不再享受土地所有权，当时便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交给了农民。他正是以此为题目撰写论文的。

这一年他在乡下姑姑家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他起床很早，有时刚过三点钟，太阳还没有出来，有时还下着满天大雾，他就到山脚下的一条河里游泳，回来时，草和花上还凝结着露珠。每天早晨，喝过咖啡之后，他有时坐下来写论文或翻阅有关资料，但更多的时候不是读书和写作，而是又一次走到户外，在田野和森林中漫步。午饭之前，他在花园里随便找个地方睡一觉，然后吃午饭时他快乐地逗姑姑们开心，逗她们发笑，饭后他骑马或划船，晚上或是读书，或

是陪两位姑姑坐坐，摆纸牌算卦。夜里，尤其是月色很好的夜里，他往往无法入睡，这是因为他尝到的生活欢乐过于强烈和兴奋的缘故，他索性不睡觉，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心中充溢着幻想和思想，有时直到天明。

就这样，他在姑姑家幸福而平静地过了第一个月，丝毫没注意到那个半是养女半是侍女、眼睛乌黑、脚步轻快的卡秋莎。

当时聂赫留朵夫十九岁，一直在母亲的羽翼之下长大，完全是个童男。他若是幻想女人，那个女人也一定是他想像中的妻子。在他的头脑中，凡是不能成为妻子的女人，对他来说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可是，这年夏天的耶稣升天节那天，姑姑家有人来做客，是女邻居带着孩子们：两个小姐、一个男中学生和一个客居他们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喝过茶之后，他们在房子前一块割过草的草地上玩逮人游戏。卡秋莎也被叫来了。玩了几轮，聂赫留朵夫正好赶上和卡秋莎一起跑。聂赫留朵夫平常看到卡秋莎总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不过他的头脑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和她之间会发生什么特别的关系的念头。

“这下可逮不住他们俩啦。”那个要“逮人”的快活的画家说，抬起短小弯曲、但却十分有力的农民的双腿飞快地跑起来，“除非他们自己摔

倒。”

“您呀，别想逮住我们！”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下手掌。卡秋莎强忍住笑，迅速和聂赫留朵夫交换位置，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立即向左边跑去，浆洗过的裙子发出窸窣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想让画家逮住，用尽全力去跑。他四下打量了一眼，看见画家在追赶卡秋莎，但她那富有弹力的年轻的双腿灵活地跑动，渐渐甩开他，向左边躲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它的后边没有人，卡秋莎回头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点头示意他到花坛后边会合。他明白了她的意思，向花坛后边跑去。他没料到花坛后边有一道长满荨麻的小沟；他绊了一下，摔倒了，双手被荨麻刺破，还沾满了傍晚的露水，但他立即感到自己好笑，爬起来，跑到干净的地方。

卡秋莎闪动着像湿润的醋栗似的黑眼睛，笑容满面地迎着他飞跑过去。他们跑到一起，相互抓紧对方的手。[【11】](#)

“我想，您的手让荨麻刺伤了吧。”她一面用那只闲着的手整理松开的辫子，一面喘着气，恭恭敬敬地笑着对他说。

“我不知道这儿有沟。”他也同样笑着说，没

有松开她的手。

她向他跟前挪了挪，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脸朝她那边凑了过去；她没有躲闪，他把她的手抓得更紧，吻了她的嘴唇。

“哎呀，你干什么！”她说完，急忙抽出自己的手，从他身旁跑开。

她跑到丁香花前，折下两枝已经凋谢的白丁香，边拍打自己发烧的脸颊，边向他望着，然后轻快地摆动着双臂，走向正在做游戏的人那儿去了。

从此，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相互倾慕的纯情少男与纯情少女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关系。

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间，或者甚至聂赫留朵夫一从远处看见她的白色围裙，一切对他来说都仿佛被阳光照亮，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开心，更有意义；生活变得更充满欢乐。她也有同样的感觉。不仅仅卡秋莎在眼前或在附近能对聂赫留朵夫产生这样的作用；而且他只要一想到有一个卡秋莎，对玛丝洛娃来说，只要一想到有一个聂赫留朵夫，都会产生这样的作用。聂赫留朵夫收到母亲的令人不快的信也罢，他的论文写得不顺利也罢，或者他感觉到青年人的莫名的惆怅也罢，只要想到有一个卡秋莎，只要他能见到她，所有的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卡秋莎在家里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她总能把一切及时做完，并把空闲的时间用来读书。聂赫留朵夫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给她，这些小说他自己刚刚读完。她最喜欢屠格涅夫的《僻静的角落》。他们彼此碰见时偶尔聊上几句，比如在走廊里，在阳台上，在院子中，有时还在姑姑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的房间里，卡秋莎是和她住在一起的，聂赫留朵夫有时常去那里就着糖块喝茶。他们谈话时，如有玛特廖娜在场，总会感到非常愉快。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谈话往往很别扭。这时候，他们眼睛所说的和嘴里所说的立即变成两样，眼睛所表达的要重要得多，他们嘴唇紧闭，心里忐忑不安，很快便匆匆分开了。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住在姑姑家中时，他和卡秋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姑姑们察觉到这种关系，大吃一惊，甚至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聂赫留朵夫在国外的母亲叶莲娜·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娅姑姑担心侄儿和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她的担心是多余的：聂赫留朵夫自己并不清楚他爱上了卡秋莎，就像纯情的少男少女相互爱慕时那样，他的这种朦胧的爱成了他和她不致堕落的重要保障。他非但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简直对与她发生这种关系的想法感到恐惧。颇具诗人气质的索菲娅姑姑的担心却要实

际得多，她害怕性格坚毅、心口如一的侄儿一旦爱上这个姑娘，就会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毫不犹豫地和她结婚。

假如聂赫留朵夫当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卡秋莎的爱情，尤其是假如当时有人劝他绝对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命运与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么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以他片面处理问题的个性，他定会作出决定，只要他爱她，不管她是什么人，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和她结婚。然而，姑姑们没有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这个姑娘，就这样他离开了姑姑家。

他相信，他对卡秋莎的感情不过是当时充溢他全身的生活的快乐感的一种表现，这个可爱又活泼的姑娘也与他共同分享这一生活的快乐。可是，当他动身离开的时候，卡秋莎同两位姑姑站在台阶上，稍稍有些斜视的黑眼睛满含热泪为他送行，他这才感到他离别的是一种美好的、一去不复返的珍贵情感。他心中不禁十分忧伤。

“再见，卡秋莎，谢谢你所做的一切。”他坐上马车，隔着索菲娅姑姑的睡帽，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用她那令人愉快的、动听的声音说，强忍住满眼的泪水，跑回门廊，在那儿她可以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

十三

从那以后的三年时间里，聂赫留朵夫没有和卡秋莎见过面。直到他刚刚提升为军官，从前往部队的路上，顺便去了趟姑姑家，才又一次见到她，但与三年前那个夏天他住在她们家时相比，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那时他是个诚实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时刻准备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他成了一个荒淫无度的、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心中只知道享乐。那时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个谜，他满怀激情地努力想解开这个谜——如今生活中的一切既简单又明白，通通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来决定。那时接近大自然，接近在他之前生活过、思索过和感觉过的人（哲学，诗歌），是必要而且重要的——如今必要而且重要的，是与人有关的各种制度和与同事们的交往。那时女人是神秘而迷人的、惟其神秘才迷人的生命体——如今除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的妻子，女人的作用非常明确：女人是他已经体验过的最出色的享乐工具之一。那时不需要钱，母亲给的钱连三分之一都用不完，可以放弃父亲名下的田产，并把它送给农民——如今母亲每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却不够用，为了钱已和母亲有过几次不愉快的争执。那时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是真正

的自我——如今却认为健康、精力充沛、肉体的自我，才是他自己。

他身上发生的这一系列可怕的变化，原因仅仅是他不再相信自己，转而去相信别人。至于他不再相信自己，而去相信别人的原因，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生活就会变得过于困难：相信自己，意味着处理各种问题都不能考虑追求肉体轻松快乐的自我，而且几乎总是同他作对；相信别人，意味着无须处理任何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解决问题的原则总是不考虑精神的自我，而只考虑肉体的自我。此外，相信自己，他往往总会遭到人们的指责——相信别人，他却博得周围人们的赞扬。

比如，每当聂赫留朵夫思考、阅读、谈论上帝、真理、财富、贫困的时候——他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是有点儿可笑的，母亲和姑姑会以一种温和的嘲讽口吻称他为我们可爱的哲学家；可是当他读长篇小说，说淫秽的笑话，上法国剧院看轻松喜剧并开心地讲剧中的情节的时候——大家反而称赞和鼓励他。当他认为必须节省开销，穿旧大衣，不喝酒的时候，大家认为这是一种怪癖和标新立异，而当他把大笔的钱用于打猎，或者用于布置一间与众不同的奢华书房的时候，大家却称赞他的鉴赏力，送给他许多贵重的东西。当他是童男，并想将

童贞一直保持到结婚的时候，他的亲人们担心他的身体是否有毛病，当他的母亲知道他从同事手里夺过来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人，她甚至并不感到伤心，而是十分高兴。可是公爵夫人一想到儿子和卡秋莎的事，想到他可能打算同她结婚，心里却感到恐惧。

同样，当聂赫留朵夫到了成年人的年龄，把从父亲名下继承的那份不大的田产分给农民，因为他认为拥有土地是不公平的——他的这个举动也使母亲和亲属们感到恐惧，并成为他们责备和嘲笑他的永久话题。大家不停地对他说，农民得到土地后，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馆，索性不再干农活了。可是当聂赫留朵夫进了近卫军，和那些出身高贵的同事们一起挥金如土，并在赌场上输掉许多钱，以致公爵夫人不得不动用家产，她却几乎没有伤心，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还认为，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过牛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聂赫留朵夫起先作过抗争，但抗争起来煞费力气，因为在相信自己的情况下，他认为好的，别人却认为是坏的，反过来，他在相信自己的情况下认为是坏的，他周围所有的人却认为是好的。结果，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相信自己，而去相信别人。最初，这种自我否定令人感到不快，但这种不快的感觉并未持续多久，聂赫

留朵夫在这期间很快学会了吸烟，接着又学会了喝酒，他不再感到不快，甚至感到非常轻松。

于是，聂赫留朵夫带着他天性中特有的激情投身于这种备受亲友们赞扬的新生活，完全泯灭了内心中的另一种呼声。这一变化是在他搬到彼得堡后开始的，而在他进入军界时便已完成。

在军中任职一般说来很容易使人堕落，它把进入军队的人置于一种完全游手好闲的条件下，也就是缺乏合理而有益的劳动，逃脱人们共同承担的义务，代之以团队、军服、军旗的虚伪的荣誉，而且还代之以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和对上级长官的奴颜婢膝及惟命是从。

然而，如果在整个军中任职及其军服、军旗的荣誉和公然许可的暴力、杀人所引起的堕落之上，再加上只有家资巨万的贵族军官才能入选的近卫军团团队里常有的由财富和亲近皇室所引起的堕落，那么这种堕落就会使这些堕落的人们身上的利己主义达到完全疯狂的地步。聂赫留朵夫自从担任军职，开始像他的同事们那样生活以来，他就一直处于这种疯狂的利己主义的状态之中。

没有任何事情可做，除了穿上不是由他自己而是由别人精心缝制和洗刷干净的军服，戴上军盔，拿起也是由别人制造、擦亮并交到他手里的武器，骑上还是由别人养大、驯顺和喂饱的骏马，跟那些同他一样的人们去训练或接受检阅，

去练骑术，练劈刀，练射击，然后再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其他活动就没有了，而那些上层社会的头面人物，年轻的和年长的，还有沙皇及其亲信们，不仅赞赏他们的这种活动，而且夸奖他们，感谢他们。这些活动结束后，他们认为高尚而重要的是去军官俱乐部或最豪华的饭店吃饭，尤其是喝酒，纵情挥霍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金钱；然后是剧院，舞会，女人，然后又是骑马，劈刀，飞奔，又是散漫使钱和酒、牌、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有一种特别的腐蚀作用，因为假如一个平民过这样的生活，他在内心深处不能不为这样的生活感到羞愧。军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时常夸耀这样的生活，并以此为荣，尤其在战争时期更加如此，聂赫留朵夫正是这个样子，他是在对土耳其宣战后进入军队的。“我们准备在战争中牺牲性命，因此这种自由自在的快乐生活不仅应该原谅，而且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我们理应过这样的生活。”

聂赫留朵夫在他人生的这一时期也隐隐约约地存在着这样的想法；他在这段时间里，特别因摆脱他以前为自己设置的种种道德藩篱而感到万分欣喜，并时常处于利己主义连续不断的疯狂状态中。

当他三年之后顺路去姑姑家时，正处在这样的疯狂状态之中。

十四

聂赫留朵夫去姑姑家，是因为她们的庄园在他追赶部队要走的那条路的旁边，还因为她们非常想让他去一趟，而他此次去那里的主要原因，却是想看看卡秋莎。也许，在他的心灵深处那个现已拥有放荡不羁肉体的人对他私进谗言，使他对卡秋莎起了歹意，不过，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不过是想重游那些曾让他感到美好的地方，看看两位多少有点可笑，但却可爱和善良的姑姑，她们总是在他不知不觉时将他置于充满爱抚和赞许的气氛中，还要看看可爱的卡秋莎，她给他留下了十分愉快的回忆。

他是在三月底耶稣受难日那天到达的，当时道路化冻，泥泞不堪，而且下着倾盆大雨，他从里到外淋得精湿，全身冻得发僵，但依然精神饱满，生气勃勃，那一时期他总感到自己是这个样子。“她还在她们家吗？”他心里想着，乘坐的马车已驶进姑姑家熟悉的旧式地主庄园的院子，院中堆满了从屋顶上掉下来的雪，周围砌着矮矮的砖墙。他本以为她听到铃声定会跑到台阶上，没料到从女仆房间门前的台阶上走出来的是两个裙角掖在腰里、提着水桶、赤着双脚的女人，显然正在擦洗地板。正门台阶上也不见她；出来的只是男仆季洪，系着围裙，看样子也在打扫屋子。

索菲娅姑姑身穿丝绸连衣裙，头戴睡帽，来到前厅。

“啊，你来了，太好啦！”索菲娅·伊万诺夫娜一边吻他，一边说。“玛丽娅姑姑有点儿不舒服，去教堂回来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您领到圣餐，索菲娅姑姑。”聂赫留朵夫说着，吻了一下索菲娅姑姑的手，“对不起，我把您弄湿了。”

“到你的房间去吧。你全身都湿透了。瞧你都长出胡子来啦……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拿咖啡。”

“就来！”走廊里传来那熟悉而动听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的心快活得狂跳起来。“她在这儿！”仿佛太阳一下从乌云中露出来。聂赫留朵夫愉快地跟着季洪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想向季洪打听卡秋莎的情况：她现在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嫁人了？可是，季洪的样子那样毕恭毕敬，同时又那样严肃，而且还坚持亲自拿着洗手器给他冲手，以致聂赫留朵夫不好开口问卡秋莎的事，只问了问他的孙子们的情况，还有那匹叫老伙计的公马和护院狗波尔坎的情况。他的孙子和那匹老马活得挺好，只有波尔坎去年疯了。

聂赫留朵夫脱下湿衣服，刚要穿上干净衣

服，忽然听见轻快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听出了是谁的脚步声和敲门声。这样走路和敲门的人，只能是她。

他披上湿淋淋的军大衣，走向门口。

“请进！”

果真是她，卡秋莎。还是原来那个模样，但比以前越发可爱了。那双天真的、稍稍有些斜视的黑眼睛依旧是那样笑盈盈地从下往上看人。她还和从前一样，身上系着干净的白围裙。她从姑姑那儿给他带来一块刚刚剥去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俄式大浴巾，一条长绒毛巾。无论是那块没用过的、带着字母的香皂，还是那两条毛巾，或者还是她本人——都同样那么干净、新鲜、纯洁、悦目。她那迷人的、轮廓分明的、红艳艳的双唇，仍像以前见到他那样，因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而抿得紧紧的。

“欢迎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用了很大力气才说出口，脸上立刻泛起红晕。

“你好……您好。”他不知道对她称“你”还是称“您”，脸也像她一样变红了。“您还好吗？”

“托上帝的福……这是姑姑让送来的您喜欢的香皂，玫瑰香皂。”她说完，把香皂放在桌上，把毛巾搭在椅子的扶手上。

“少爷他自己有。”季洪以维护客人独立精神的口气说，得意地指着聂赫留朵夫那个已打开

的、露出许多小银盖的大梳妆盒，里面装着大量的玻璃瓶儿、刷子、发蜡、香水等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品。

“请替我谢谢姑姑。我来到这儿，真高兴。”聂赫留朵夫说，感到心里像以前那样亮堂和愉快。

她听了这些话，只微微一笑，就出去了。

两位姑姑一向对聂赫留朵夫十分宠爱，这次见到他，比以前更加高兴。德米特里要去打仗，也许会负伤，也许会被打死。这使姑姑们特别感动。

聂赫留朵夫原计划只在姑姑家停留一天，可是见到卡秋莎后，他同意多待两天，在姑姑家过复活节，于是打电报给他的朋友和同事申博克，他们曾约定在奥德萨会合，请他也到姑姑家来。

聂赫留朵夫见到卡秋莎的第一天，心里就产生了当年对卡秋莎的那种情感。他依然像从前一样，看见卡秋莎的白围裙不能不感到激动，听到她的脚步声、她的说话声、她的笑声不能不感到快乐，瞧见她的像湿润的醋栗似的黑眼睛，尤其是她微笑的时候，不能不感到陶醉，而更主要的，看到她和他相遇时面带红晕的样子，不能不感到心慌意乱。他意识到自己在恋爱，不过与以前不同，以前爱情对他来说是个谜，他不肯承认自己在恋爱，而且以前他相信人一生只能恋爱一

次——现在他恋爱了，他已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感到高兴，尽管他想对自己隐瞒，却模模糊糊地知道，爱情是什么，它的结果又是什么。

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如同在所有人身上一样，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只追求既能成为自己，同时也能成为别人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肉体的人，他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且为了个人的幸福不惜牺牲全世界一切人的幸福。这一时期，彼得堡和军队生活在他身上引起的利己主义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一肉体的人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而且完全压倒了精神的人。可是，他见到卡秋莎后，又一次体验到了他当初对她的那种感觉，于是精神的人抬起头来，开始申请自己的权利。在复活节前的这两天时间里，聂赫留朵夫身上一刻也不停地进行着一场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内心斗争。

在心灵的深处，他知道他应当走了，现在没有理由留在姑姑家里，知道再待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他实在太高兴，太快活了，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些意思告诉自己，还是留下了。

基督复活节前一天的礼拜六晚上，一位教士带着助祭和诵经员来做晨课，他们说，他们的雪橇好不容易穿过一个个水洼和一块没雪的干地，才走完从教堂到姑姑家的这三俄里路程。

聂赫留朵夫同两位姑姑和仆人们站在一起做

晨课，同时目不转睛地瞧着站在门口、送手提香炉来的卡秋莎，晨课结束后，他跟教士和姑姑们互吻三次以示祝贺，接着正要去睡觉，忽然听见走廊里姑姑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和卡秋莎准备一起去教堂行复活节面包和奶糕的净化礼。“我也去。”他想。

到教堂的路，马车和雪橇无法通行，因此在姑姑家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发号施令的聂赫留朵夫，吩咐给他备那匹叫“伙计”的乘用马，他不再想上床睡觉，而是穿起华美的军服和紧身马裤，外面套上军大衣，跨上那匹膘肥体壮、不住嘶鸣的老公马，踏着水洼和积雪，摸黑向教堂的方向走去。

十五

这次晨课，后来成为聂赫留朵夫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一次回忆。

在黑黝黝的，仅仅偶尔有地方闪烁着白雪光亮的夜里，他骑马踏着积水往前走，那匹公马看见教堂周围的灯火，竖起了耳朵。当他进入教堂的院子时，祈祷已经开始了。

有几个农民认出他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侄子，把他领到一块干净的地方下了马，牵走马拴好，然后带他走进教堂。教堂里已挤满了过节的

人们。

右边是农夫：老年人身穿土布长袍和树皮鞋，脚上裹着白净的包脚布；年轻人身穿崭新的呢子长袍，腰系色彩鲜艳的宽腰带，脚登高腰皮靴。左边是农妇，头上戴着红色丝巾，上身穿着波里斯绒的坎肩，露出鲜红的衣袖，下配蓝色、绿色、红色或杂色的裙子，脚上穿着钉掌的半高腰靴子。站在她们后面的是衣着朴素的老年妇女，头上包着白头巾，身穿灰色长袄和老式毛裙，脚穿皮鞋或新树皮鞋；男女人群的中间，是一些打扮得漂漂亮亮、头发抹了油的孩子。农夫们在胸前画十字，甩动着头发鞠躬；女人们，尤其是老年妇女们，用失去光彩的眼睛紧紧盯着蜡烛照耀下的圣像，捏紧的手指使劲点着额头上的头巾、肩膀和腹部，嘴里念叨着什么，弯腰站着或跪在那里。孩子们看到有人看他们，就模仿大人们的样子，起劲地做着祷告。贴金的大蜡烛以及环绕在周围的小蜡烛，将金黄的圣像壁照得闪闪发亮。枝形大烛架上插了蜡烛。从唱诗班那里传来业余歌手们极为欢快的歌声，其中有粗重的男低音和尖细的童高音。

聂赫留朵夫向前走去。教堂正中央站着的是些头面人物：一个地主带着妻子和穿水兵服的儿子，县警察分局局长，电报员，穿高腰皮靴的商人，佩带奖章的村长，而在读经台的右边，也就

是那个地主婆的后面，是穿着闪亮的紫色连衣裙、披着长穗白披巾的玛特廖娜和穿着胸前有褶的白色连衣裙、束着浅蓝色腰带、黑色长发上扎着红色蝴蝶结的卡秋莎。

教堂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喜悦、庄严、欢快和美好：不论身穿银光闪闪的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的教士们，不论身穿漂亮的绣着银线、金线的祭服的助祭和诵经员，不论身穿节日盛装、头上抹着发油的业余歌手们，还是节日赞美诗的舞曲般欢快的音调，以及手持三支一俄磅重的、有花卉作装饰的蜡烛，嘴里反复喊着“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的教士们不停地为人们祝福的声音。一切都那么美好，但最美好的还是穿着白色连衣裙、系着浅蓝色腰带、黑色长发上扎着红色蝴蝶结、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感觉到，她虽然没有回头，却已经看见了他。他是在紧擦着她的身边走向祭坛时，发现这一点的。他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可是经过她身边时，想出来一句要说的话：“姑姑说，做完晚弥撒她就开斋。”

如同每次见到他一样，青春的血液一下涌上她那张可爱的脸，那双黑黑的眼睛含着笑意和欢喜，天真地从下往上注视着聂赫留朵夫。

“我知道。”她微微一笑，说。

这时候，诵经员手拿装圣水的铜咖啡壶，从

人群中挤过来，走过卡秋莎身边时，没有注意到她，祭服的下摆碰了她一下。诵经员显然出于对聂赫留朵夫的尊敬，从他旁边绕着走，这才碰到了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十分奇怪，他，这个诵经员怎么不明白，这里的一切，甚至全世界的一切，都是为卡秋莎一个人而存在的，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等闲视之，但对卡秋莎却不可以，因为她是世界上一切的中心。为了她，圣像壁才闪烁出金光，枝形烛架和烛台上的所有蜡烛才大放光芒，为了她，才有那欢快的歌声：“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高兴吧，人们。”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为她而存在的。他觉得卡秋莎似乎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为她而存在的。聂赫留朵夫的这种感觉，是当他望着她那裹在前胸带皱褶的白色连衣裙下面的匀称躯体和她那喜气洋洋的脸色时产生的，他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出，她的心情和他的心情一模一样，都十分欢畅。

聂赫留朵夫在早弥撒和晚弥撒之间的空当里，走出教堂。人们纷纷给他让路，向他鞠躬。有的人认识他，有的却问：“这是谁家的？”他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停住了脚步。乞丐们把他围住，他把钱包里的零钱全给了他们，然后迈步走下台阶。

天已大亮，但太阳还没有升起。人们在教堂四周的墓地上散开。卡秋莎留在教堂里没有出

来，聂赫留朵夫站下等她。

人们还在往外走，下台阶时，靴底的钉子踩着石板发出叮叮的响声，在教堂的院子里和墓地上逐渐散去。

玛丽娅姑姑家的糕点师，一个年迈的老人，摇晃着脑袋，拦住聂赫留朵夫，同他互吻三次表示过节。他的妻子，一个头戴三角丝巾、丝巾下面露出满是皱纹喉结的老妇，从手帕里拿出一个染得红里透黄的鸡蛋，送给了聂赫留朵夫。这时，一个肌肉发达的年轻农夫，身穿簇新的紧腰长外衣，扎着绿色的宽腰带，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

“基督复活了。”他眼睛笑咪咪地说，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带给他一股庄稼汉特有的、令人愉快的气味，用他那有力的、凉冰冰的嘴唇在聂赫留朵夫嘴唇的正中间吻了三次，髭曲的大胡子扎得他直发痒。

正当聂赫留朵夫同农夫亲吻，收下他送的深棕色鸡蛋的时候，玛特廖娜闪亮的连衣裙和那个黑发上扎着红色蝴蝶结的可爱的面孔出现了。

她隔着走在她前面众人的头顶立即看见了他，他也看见她的脸一下变得明亮起来。

她和玛特廖娜走到教堂门前的台上站住，施给乞丐们一些零钱。一个没有鼻子、只剩一块红色疤拉的乞丐，走近卡秋莎。她从手帕里拿出什

么东西，给了他，然后凑到他前面，和他互吻了三下，不但没有露出丝毫的厌恶，而且恰恰相反，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喜悦的光彩。当她同乞丐相吻的时候，她的眼睛和聂赫留朵夫的目光相遇。她仿佛在问：“她这么做好吗，对吗？”

“对，对，亲爱的，一切都好，一切都很美，我喜欢。”

她们走下台阶，他向她迎上去。他不想同她互吻，只是想离她近一些。

“基督复活了。”玛特廖娜低下头微笑着说，那语气仿佛在讲，今天大家一律平等，接着用叠成老鼠形状的手帕擦了擦嘴，把嘴唇向他伸了过去。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一面回答，一面和她互吻。

他扭头看了一眼卡秋莎。她脸上泛起红晕，立即走到他跟前。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相互吻了两次，似乎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再吻一次，终于决定再吻一次，又相互吻了第三次，然后两人笑了起来。

“你们不找教士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卡秋莎说，仿佛刚刚做完愉快的体力

活儿似的，重重地、深深地呼吸着，同时用她那双温顺、纯洁、充满爱意、微微有些斜视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他的眼睛。

男女间的恋情往往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达到它的顶点，这时他们的恋情中既没有自觉和理性的成分，也没有肉欲的成分。对聂赫留朵夫来说，这个基督复活节的夜晚，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如果他现在回忆起卡秋莎，那么在他见过她的所有场合中，这一刻最为光彩照人。头上那乌黑、光滑、发亮的长发，那紧裹着她的匀称身体和不高胸脯的带皱褶的白色连衣裙，脸上那泛起的红晕，那双因彻夜未眠而略带斜视的乌黑发亮的眼睛，以及她整个身心所表现出来的两个主要特点：她不仅仅将自己的纯洁无瑕的爱给予他——这一点他明白——而且给予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不单单是人世间的美好事物——还给予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知道，她心里存在着这样的爱，因为他在这个夜晚和这个早晨也意识到自己心里存在着这样的爱，同时他还意识到，他和她正是在这样的爱里才合为一体。

唉，要是这一切停留在那天夜里出现的那种感情上，该多好啊！“不错，那件可怕的事就是在复活节之夜过后发生的！”他现在坐在陪审员议事室的窗前，心里想道。

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教堂回来后，和姑姑们一起开斋。为了提神，他按部队的习惯，喝了点白酒和葡萄酒，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即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一阵敲门声把他吵醒。他从敲门声听出，这是她，于是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

“卡秋莎，是你吗？进来吧。”他一边下床，一边说。

她稍稍把门推开一点儿。

“该吃饭啦。”她说。

她仍旧穿着那件白色连衣裙，但头发上没戴蝴蝶结。她望了望他的眼睛，脸上露出笑容，仿佛她宣布了一件不同寻常的喜讯。

“这就去。”他说完，拿起梳子，想梳理一下头发。

她站在那儿没动。他发现后，扔下梳子，向她走去。但就在这个时候，她灵巧地转过身子，迈着往常那种轻快的步子，顺着走廊上的长地毯走了。

“我真是个大傻瓜。”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我怎么不把她留住呢？”

他跑过去，在走廊里追上了她。

他要把她怎么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他

觉得，她已经进了他的房间，他就应当做点什么，也就是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做的那种事，可是他没有做。

“卡秋莎，等一下。”他说。

她回头看了一眼。

“您有什么事？”她收住脚步，说。

“没什么，只是……”

他克制住自己，记起所有男人在这种场合下应该怎么做，他伸手搂住了卡秋莎的腰。

她站住了，望一望他的眼睛。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别这样。”她涨红了脸说，用她那粗糙而有力的手推开他那只搂住她的手。

聂赫留朵夫放她走了，有片刻工夫，他不仅感到尴尬和羞愧，而且感到自己很卑劣。他本应当相信自己，可是他却不明白，这种尴尬和羞愧正是他灵魂中最善良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他反而觉得自己愚蠢，应该像所有人那样做才对。

他又一次追上她，搂住她，吻了一下她的脖子。这一吻完全不同于前两次的吻：一次是在丁香花丛后面无意识的一吻，另一次是今天早晨在教堂里的那一吻。这一吻却是可怕的，这一点连她也感觉到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惊叫起来，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他打碎了一件无价之宝，再也无法挽

回。她从他身旁快步跑开了。

他来到餐厅。两位衣着漂亮的姑姑、一位医生和一位女邻居已经站在那儿吃饭后甜食了。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可是聂赫留朵夫却心潮难平。别人对他说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常常答非所问，心里只想着卡秋莎，不住地回味刚才在走廊上的那一吻。他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情。每次她进来，他不用看她，整个身心就能感觉到她的存在，而且要花很大的力气控制自己，才能不去看她。

午饭后，他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异常激动地走来走去，留心听着家里的响动，期待着她的脚步声。他身上存在着的那个肉体的人，此刻不仅抬起头来，而且把他第一次来姑姑家时，以至今今天早晨在教堂时还存在于他身上的那个精神的人踩在脚下，那个可怕的肉体的人如今独霸了他的心灵。他一刻不停地守候她，尽管如此，一整天也没能和她单独见上面。她大概有意躲避他。但到傍晚时，她碰巧有事到他隔壁的房间。医生留下来过夜，卡秋莎需要给客人整理床铺。听到她的脚步声，聂赫留朵夫屏住呼吸，放轻脚步，好像要去犯罪似的，跟在她后面进了房间。

她双手抓住枕头的两个角，联手一起伸进干净的枕套里，然后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笑了笑，但已不是以前那种快活而欢畅的笑，而是一

种惊恐的、可怜的笑。这笑容仿佛告诉他，他要做的事很恶劣。他一下站住了。此刻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斗争的。她对的那份真情，声音虽然微弱，毕竟还可以听到，它在对他说着她，说着她的感情，说着她的生活。而另一个声音却在说：瞧，你要错过自己的享乐，自己的幸福了。这第二个声音淹没了第一个声音。他毅然走到她跟前。于是，可怕的、无法遏止的肉欲控制了他。

聂赫留朵夫紧紧搂住她，让她坐在床上。他觉得自己应当做点什么，就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好少爷，请放开我吧，”她苦苦哀求说。“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来了！”她一边挣脱，一边叫。真的有人朝门口走来。

“那我夜里去找你。”聂赫留朵夫说。“你是一个人吧？”

“您说什么呀？千万别去！别这样。”她嘴上这么说，可是她那激动而慌乱的心里却说的是另一回事。

来到门口的人果真是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她走进房间，胳膊上搭着一条被子，不无责备地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生气地责怪卡秋莎拿错了被子。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走了出去。他甚至没有感

到羞愧。他从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脸上的表情看出她在谴责他，的确是在谴责他，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恶劣，可是从以前他对她美好的爱情中探出头来的肉欲，控制了他，在他的心灵中独自称尊，拒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情感。他现在懂得，要满足这种肉欲该做什么，并且在寻找这样做的方法。

整个晚上他变得心慌意乱：一会儿走到姑姑们的房间，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来到台阶上，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怎么才能和她单独见面；可是，她在躲避他，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也不许她离开自己半步。

十七

整个晚上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黑夜已经来临。医生去睡觉了。两位姑姑也躺下休息了。聂赫留朵夫知道，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现在正在姑姑们的卧室里，女仆房里只有卡秋莎一个人。他又来到台阶上。外面黑暗，潮湿，温暖，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雾。春天，这种雾往往能使残雪消融，或许它本身就是由残雪融化而成的。从家门前百步开外的陡坡下面的那条河上，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声：那是冰层在破裂。

聂赫留朵夫走下台阶，踩着结了冰的雪跨过

一个个水洼，绕到女仆房的窗前。他的心脏在胸膛里怦怦地跳动，他自己都可以听到；他时而屏住呼吸，时而大口喘气。女仆房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独自坐在桌旁想着心事，两眼望着前方。聂赫留朵夫一动不动地瞧了她很久，想看看她在以为没人注意她的情况下会做些什么。她有两分钟的光景坐着没动，后来抬起眼睛，微微笑了笑，仿佛责备自己似的，摇了摇头，接着换了一个姿势，突然把双手放到桌子上，又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方。

他站在那儿看着她，无意识地听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和从河面上传来的奇怪的响声。在那边雾蒙蒙的河上，进行着一种缓慢而不停的运动，时而吱吱作响，时而噼啪迸裂，时而哗啦崩塌，时而薄冰像玻璃破碎时发出清脆的声音。

他站在那儿，瞧着卡秋莎因内心活动而显得心事重重、痛苦不堪的样子，他对她顿生怜悯之心，然而奇怪的是，这种怜悯反而更加激起他对她的欲望。

他周身充满了这种欲望。

他敲了敲窗户。她仿佛触电一般，身子震颤一下，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她霍地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把脸贴到玻璃上。她两手放在眼睛上面遮住灯光，认出是他，但脸上的惊恐神色依旧没有消失。她的脸色异常严肃——他从未见过

她这个样子。她笑了笑，只是因为他先笑了笑，她微笑的目的，似乎仅仅是为了迎合他，而在她的心里却没有微笑，而只有恐惧。他向她做了个手势，要她到院子里来。可是她摇了摇头，表示不，她不出来，她站在窗前没动。他又一次把脸贴到玻璃上，想喊她出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转过身去看房门口——显然有人在叫她。聂赫留朵夫离开窗户。雾很浓，离开房子五步远就已经分不清窗户的轮廓，只见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从那里闪烁出显得很大的红色灯光。河面上依旧发出冰的奇怪的吱吱声、沙沙声、喀喀声和丁冬声。在浓雾弥漫的院子里，一只公鸡在不远处鸣叫起来；附近的几只公鸡立即响应，接着远处村子里传来此起彼伏的鸡叫，最后汇成一片整齐的鸡鸣。四周除了那条河，悄然无声。这已是第二遍鸡鸣。

聂赫留朵夫在房子的拐角处来回溜达了两趟，有几次脚踩进水洼里，后来又走到女仆房的窗前。灯还亮着，卡秋莎依然独自一人坐在桌旁，似乎有什么事难下决断。他刚走近窗户，她就往窗外望了一眼。他敲了敲窗户。她看也没看敲窗的人是谁，立即从屋里往外跑。他听见通向外边的门开了，发出吱吱的响声。他到门廊上等她，一句话没说就把她抱住。她偎依在他胸前，扬起头，用嘴唇去迎他的吻。他们站立在门廊拐

角处一块化干了雪的地方，他周身充满了难以忍受的、未能得到满足的欲望。忽然，通往外边的门又吧嗒响了一下，又吱吱唧唧地开了，传来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生气的声音：

“卡秋莎！”

她挣脱开他的搂抱，回到女仆房。他听见门扣啪的一声锁上了。随后一切静下来，窗户里那只发出红光的眼睛不见了，只剩下弥漫的浓雾和河面上的喧嚣。

聂赫留朵夫走到窗前——看不到人影。他敲了敲窗户——没有任何回应。聂赫留朵夫从正门的台阶回到房里，可是无法入睡。他脱掉靴子，赤脚顺着走廊向她的房门走去，旁边是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的房间。起先他听见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发出平稳的鼾声，正想进去，突然她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床铺嘎吱发响。他一下停住脚步，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当一切又静下来，平稳的鼾声又响起后，他尽量踩着不轧轧发响的地板往前走，一直走到她的房门跟前。听不见任何声音。她想必没有睡着，因为听不到她的呼吸。他刚刚小声说：“卡秋莎！”——她跳起来，走到门口，劝他离开，他听她说话的口气似乎是生气的样子。

“这像什么话？唉，这怎么可以？姑姑们会听见的。”她嘴上这么说，可是她整个身心却在

说：“我完全是你的。”

这一点只有聂赫留朵夫才明白。

“喂，开一下门吧。求求你啦。”他说些不理智的话。

她不做声，随后他听见手摸门扣的声音。门扣啪地一响，他钻进打开的门里。

他一下抓住她，她只穿一件又粗又硬的内衣，裸露着双臂，他抱起她就走。

“哎呀！您做什么呀？”她小声说。

可是，他不理睬她的话，抱着她向自己房间走去。

“哎呀，别这样，放开手。”她说，身子却紧紧依偎着他。

.....

等她浑身颤抖，默默不语，也不搭理他的话，从他那儿走开后，他来到台阶上，站在那儿竭力思索刚才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外边变得亮了一些；下面河上冰的喀喀声、丁冬声和吱吱声更响了，而且在原有的这些响声之上，更增添了潺潺的流水声。浓雾开始下沉，缺月从雾幕后面浮出，阴郁地照亮了一团漆黑而可怖的什么东西。

“这将意味着什么：我得到的是莫大的幸福，还是极大的不幸？”他问自己。“这种事情是常有的，人人都这样。”他对自己说，然后睡觉

去了。

十八

第二天，衣着华美、性情快活的申博克到姑姑家来找聂赫留朵夫，并以他的文雅、殷勤、快活、慷慨和对聂赫留朵夫的友爱博得她们的赞赏。他的慷慨虽然很讨姑姑们的欢心，但做得有些过分，不免让她们感到疑惑。来了几个瞎眼的乞丐，他掏了一个卢布。给仆人们发赏钱，出手就是十五卢布。索菲娅姑姑的小狮子狗秀泽特卡在他眼前把爪子碰破，流了血，他主动替它包扎，毫不犹豫地撕开自己的花边麻纱手绢（索菲娅姑姑知道，这样的手绢至少要十五卢布一打），给秀泽特卡做绷带。姑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也不会想到，这位申博克欠下了二十万卢布的债，这笔债——他知道——永远还不清，所以多二十五卢布或少二十五卢布，对他来说已不算什么。

申博克只住了一天，第二天夜里就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了。他们不能再待下去，因为去部队报到的期限已到。

在姑姑家度过的这最后一天里，当昨晚的光景还历历在目的时候，聂赫留朵夫的心里出现两种情感，相持不下：一种是肉体的爱所留下的热

辣辣的、性感的回味，尽管这种爱远不是期望的那样，但达到目的的满足感还是令人回味；另一种是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卑劣的事，这件卑劣的事应当加以纠正，纠正的目的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自己。

聂赫留朵夫当时正处于疯狂的利己主义状态之中，他只想到自己——想到的是，如果别人知道了他对她所做的事，会不会指责他，指责到什么程度，而不是想到她现在心情怎么样，她今后会有什么后果。

他想到，申博克猜出他和卡秋莎的关系，这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怪不得你忽然对姑姑们这么恋恋不舍，”申博克看见卡秋莎后，对他说，“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也不想走啦，真迷人啊！”

他还想到，尽管眼下还没有尝够同她相爱的滋味就离去，不免有些可惜，但必须离开的好处却是，可以一刀斩断这种难以继续维持的关系。他又想到，应当给她一些钱，不是为她着想，不是因为她可能需要这些钱，而是因为人们通常都这么做，如果他享用了她，而不为此付钱，那么人家会以为他是个不诚实的人。于是他给了她一些钱，钱的数目，他认为从他和她的地位来说，是适当的。

临走那天，他吃过午饭，就在门廊里等她。她一看见他，脸刷地红了，想从他身旁走过去，眼睛向他示意女仆房的门开着，可是他把她拦住了。

“我想向你告别”他说，手里揉着一个装有一张一百卢布钞票的信封。“这是我……”

她猜到是什么，皱起眉头，摇动着脑袋，推开他的手。

“不，拿着吧。”他喃喃地说，把信封塞进她怀里，接着像被火烫了一样，紧锁眉头，嘴里哼哼着，跑向自己的房间。

随后，他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想起刚才的情景，就浑身抽搐，甚至跳起来，而且好像肉体感到疼痛似的，大声呻吟。

“这有什么办法呢？一直都是这样嘛。申博克和家庭女教师是这样，他自己说过的。格里沙叔叔是这样。父亲也是这样，他住在乡下的时候，跟一个农家女生了一个私生子，叫米金卡，现在还活着呢。既然大家都这么做，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他这样安慰自己，可是怎么也没有得到安慰。这件事的回忆烧灼着他的良心。

在心灵的深处、最隐秘的深处，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十分卑鄙、下流、残忍，对这一行为的认识，使他不仅无权指责他人，而且不敢正视他人的眼睛，更不要说像以前那样，认为自己是个出

众的、高尚的、慷慨的青年了。而他必须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才能继续精神饱满地、愉快地生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不去想这件事。他就是这么做的。

他投身的那种生活——新的地方、同伴、战争——起了作用。这种生活过得越久，他忘记得越多，最后真的完全忘记了。

只有一次，那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希望见到她，顺路去了姑姑家，这才知道卡秋莎已经不在那里，她在他走后不久就离开她们去生孩子，孩子在什么地方生了下来，姑姑们听说她完全变坏了——他心里非常难过。按时间推算，她生的那个孩子很可能是他的孩子，但也可能不是他的。两位姑姑说，她变坏了，变成了一个荡妇，跟她母亲一模一样。姑姑们的这些议论令他感到高兴，因为这仿佛替他开脱了罪责。开始他还想寻找她和孩子，可是后来，因为想起这件事他的内心深处就感到特别痛苦和羞愧，他不再为寻找她们付出必要的努力，而且更彻底地忘记了自己的罪恶，根本不去想它了。

然而，眼前这场惊人的巧遇让他想起了一切，并逼迫他承认自己毫无怜悯之心、冷酷、卑鄙，正是这些东西使他得以在良心上背负着这样的罪孽，居然心安理得地生活了十年的时间。不过，他并不想承认这一切，他现在考虑的只是千

万不要让人知道这件事，她或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件事讲出来，不要让他人在人前出丑。

十九

聂赫留朵夫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出法庭，来到陪审员议事室。他坐在窗前，听着周围的谈话，不停地吸着烟。

那个快活的商人，显然真心赞成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消遣方式。

“喂，老兄，玩得够开心的呀，有西伯利亚人的气派。眼光挺不错，看上这么一个小妞儿。”

首席陪审员在发表议论，说本案的关键是鉴定。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在和那个犹太裔店员开玩笑，他们为一句什么话哈哈大笑起来。聂赫留朵夫对别人的问话，回答极为简短，他只希望别人不要打扰他。

法警迈着歪歪斜斜的步子，又来请陪审员们回法庭，聂赫留朵夫顿时感到十分惊慌，仿佛他不是去参加审讯，而是被押上法庭受审。他在内心深处已感到自己是个恶棍，应该没脸见人才是，然而他积习难改，照旧大模大样地走上高台，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跷起二郎腿，手里玩弄着夹鼻眼镜。

被告们刚才被带出去了，这时刚刚被押回来。

大厅里多了几副新面孔——证人，聂赫留朵夫注意到，玛丝洛娃几次盯着一个周身绸缎丝绒、衣着非常华丽的胖女人，好像看不够似的。那女人坐在栏杆前第一排，头上戴着饰有大蝴蝶结的高顶女帽，一直裸露到肘部的手臂上挎着一个精致的手包。他后来才知道，她是玛丝洛娃所在的那个场所的老板。

开始讯问证人：姓名、宗教信仰等等。接着，对双方证人讯问过后，照例问：是否需要宣誓，于是那位上了年纪的司祭又艰难地挪动着双腿走了过来，又像先前那样正了正胸前绸法衣上的十字架，又带着那种安详和相信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有益的大事的神情，带领证人和鉴定人宣誓。宣誓完毕，证人们被带出去，只留下妓院老鸨基塔耶娃。她被问起她所知道的有关本案的情况。基塔耶娃做出笑脸，每说一句话，戴着高顶帽子的脑袋就上下摇动一下，带着德国口音详细而流畅地讲了起来。

先是她认识的那个楼层招待西蒙到她那儿找她，要为一个西伯利亚富商物色个姑娘。她让柳包芙去了。过了一会儿，柳包芙和那个商人一起回来了。

“商人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基塔耶娃微笑

着说，“到了我们这儿继续喝，还请姑娘们一块儿喝；就因为他身上的钱不够了，所以才让这个柳包芙到他房间去，他对她更喜欢。”说完，她看了一眼女被告。

聂赫留朵夫感到，玛丝洛娃听了这话笑了笑，这种笑让他觉得厌恶。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说不清的嫌憎，其中也夹杂着怜悯。

“那您对玛丝洛娃有什么看法？”法庭指定担任玛丝洛娃辩护人的见习法官红着脸，胆怯地问。

“非常好，”基塔耶娃回答，“姑娘有教养，长得漂亮。她在一个上等人家受过教育，会读法文。她有时候多喝那么一点点，可是从来不放肆。完全是个好姑娘。”

卡秋莎看着老鸨，后来忽然把眼睛转向陪审员，并把目光停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严厉起来。那双严厉的眼睛中有一只是斜视。这两只视线奇怪的眼睛，对着聂赫留朵夫瞧了很久很久，聂赫留朵夫虽然心中恐慌，却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那双眼白雪亮的斜视的眼睛上移开。他不由得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夜晚，冰层断裂，浓雾弥漫，尤其是凌晨升起的变了模样的缺月，照耀着一团漆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这双似瞧非瞧他的黑眼睛，使他联想起那团漆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

“她认出来啦！”他想。于是，聂赫留朵夫的身子缩成一团，似乎在等待着打击。然而，她没有认出来。她静静地叹了口气，又去看庭长。聂赫留朵夫也叹了口气。“唉，快点吧。”他想。他此刻体验到一种心情，类似于打猎中不得不弄死一只受伤的鸟时体验到的心情：又嫌恶，又怜惜，又遗憾。没被弄死的鸟在猎袋中不住地扑腾：又讨厌，又可怜，真想快点把它弄死，然后快点忘掉。

如今，聂赫留朵夫听法庭讯问证人时，体验到的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情。

二十

然而，仿佛有意与他作对似的，案子审了很长时间：先是逐个讯问证人和鉴定人，接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一本正经地提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提请陪审员察看物证，其中包括一枚大号梅花钻戒，显然是戴在极粗的食指上的，还有一个滤器，经化验上面有毒。这两件物证盖有火漆印，贴着标签。

陪审员们正要去看物证，副检察官这时又欠起身子，要求在察看物证之前先宣读验尸报告。

庭长本想尽快结案，以便赶去会他的瑞士女人，却无法拒绝这一要求，只好表示同意，尽管

他清楚地知道，宣读验尸报告除了惹人厌烦和推迟午饭时间，别无其他结果，而副检察官之所以要求宣读验尸报告，无非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权提出这个要求。书记官取出验尸报告，又用他那分不清舌尖音和卷舌音的口齿，沮丧地念起来：

“外部检验结果为：

“（一）费拉蓬特·斯梅里科夫身長二俄尺十二俄寸。”

“真是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商人不无担心地凑到聂赫留朵夫耳朵上小声说。

“（二）从外表看，年龄约在四十岁。

“（三）尸体外形肿胀。

“（四）皮肤呈淡绿色，并出现黑色尸斑。

“（五）尸体表皮有大小不一的水泡，并有数处皮肤脱落，状如悬垂的大块碎布。

“（六）头发深褐色，浓密，一经触动，极易脱落。

“（七）眼球露于眼眶之外，角膜浑浊。

“（八）鼻孔、双耳和口腔有泡沫状脓液流出，口唇微张。

“（九）面部和胸部肿胀，致使颈部几乎无法看到。”

等等，等等。

就这样，四页公文纸上写了整整二十七条，描述了这个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的可怕的、高

大的、肥胖的以及浮肿并正在腐烂的尸体的外部检验的所有细节。聂赫留朵夫听着对尸体的这种描述，原先体验到的那种说不清的嫌憎心情，越发强烈了。卡秋莎的生活，从尸体鼻孔里流出的脓液，从眼眶里露出来的眼球，他对她做出的行为——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属于同一类的东西，他正在被这些东西从四面八方所包围，并被它们所吞食。等到外部检验报告终于宣读完毕，庭长深深地舒了口气，抬起头来，满心希望宣读就此结束。可是书记官立即读起内部检验报告来。

庭长又低下头，一只手托住脑袋，闭上眼睛。坐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商人强忍睡意，身子偶尔摇晃一下。被告们像他们身后的宪兵们一样，坐在那里纹丝不动。

“内部检验结果为：

“（一）头皮极易脱离头盖骨，未发现任何瘀血迹象。

“（二）头盖骨中等厚度，完整无损。

“（三）脑膜坚硬，有两处不大的色素改变，长约四英寸，脑膜本身呈淡白色。”等等，等等，以下还有十三条。

然后是见证人的姓名和签字，然后是医生的结论，从中可以看出，解剖时发现并已记录在案时胃部改变及肠与肾内的局部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有权作出结论，斯梅里科夫的死亡是因中

毒所致，毒药是和酒一起进入他的胃里的。根据胃部和肠子部位存在的改变，判断进入胃里的是什么毒药，是困难的；但毒药和酒一起进入胃里，却可以肯定，因为在斯梅里科夫的胃里发现了大量的酒液。

“看来，他喝得真不少。”刚刚睡醒的商人又小声说。

宣读这份记录，用去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并未让副检察官感到满足。当宣读结束时，庭长对他说：

“我看，内脏检验报告就不用念了。”

“我还是请求宣读这份检验报告。”副检察官稍稍侧转身子，眼睛却不看庭长，严厉地说，那口气让人感到，要求宣读报告是他的权利，他决不放弃这个权利，不承认他的这个权利将成为他上诉的理由。

那位留着大胡子、眼睛和善而下垂、正闹胃炎的法官，感到自己体力不支，对庭长说：

“念它有什么用？只会浪费时间。新扫帚扫地不是扫得更干净，而是扫更长时间。”

戴金丝眼镜的法官什么话也没说，阴郁而坚决地望着前方，无论对妻子还是对生活，已不抱什么希望。

宣读报告开始了。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本人受医务署委

托，依照第六三八号指令，”书记官语气坚决，提高嗓门，仿佛想驱散所有在场人的睡意似的，又念了起来，“并有副医务检察官在场，对下列内脏器官进行了检验：

“（一）右肺和心脏（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二）胃里的内容物（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三）胃（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四）肝、脾、胃（盛于三磅玻璃瓶内）。

“（五）肠（盛于六磅陶罐内）。”

宣读刚刚开始，庭长俯身对一个法官低声说些什么，然后又俯身对另一个法官说些什么，得到他们肯定的答复之后，就在此处打断了宣读。

“法庭认为没有必要宣读这份报告。”他说。

书记官停止宣读，收拾起文件。副检察官生气地记着什么。

“陪审员先生们可以察看物证了。”庭长说。

首席陪审员和另外几位陪审员抬起身子，双手做着各自习惯的动作或姿势，走到桌旁，依次察看戒指、玻璃瓶和滤器。那个商人甚至用自己的手指试了试戒指。

“嘿，好粗的手指头，”他走回自己的座位，说。“像根粗黄瓜。”他补充一句，想像着被毒死

的商人是个大力士，并显然为自己的这一想像感到开心。

二十一

等物证察看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想尽快了结此案，于是没有休息，直接请公诉人发言，希望他也是人，也想吸烟和吃饭，希望他能体恤他们。可是，这位副检察官既不体恤自己，也不体恤他人。副检察官天生愚蠢，此外不幸的是，他中学毕业时得过金质奖章，大学时的一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文章得过奖金，因此总是那么目空一切，自鸣得意（他在勾引女人方面的成绩更助长了这一作风），结果变得越发愚蠢。现在庭长请他发言，他慢慢站起身，展现出他那穿着绣有花纹制服的优美身材，双手按在写字台上，微微低下头，向大厅扫了一眼，目光避开被告，开口讲起来。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所审的这个案子，”他开始发表刚才在宣读验尸报告时准备好的演讲，“是一件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是一件典型的犯罪案件。”

一个副检察官的演讲，照他看来，应当具有社会意义，就像那些已经成名的律师们发表过的演讲一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女

裁缝、厨娘和西蒙的姐姐，此外还有一个马车夫，但这没有多大关系。那些名流们开始的时候往往也是这样。副检察官的行事准则是永远保持自己的最高职业水平，也就是说深入探索犯罪心理的秘密，揭露社会的毒瘤。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面前的这桩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典型的世纪末罪行，它具有，譬如说，具有可悲的腐败现象的种种特征，当前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人正受到这种腐败现象的控制，他们无法忍受，譬如说，无法忍受它强烈的刺激……”

副检察官讲了很长时间，一方面，竭力回忆他已经想好的那些深奥的东西，另一方面，主要是一刻也不停顿，让他的演讲在一小时零一刻钟的时间里，像流水一样，滔滔不绝。只有一次，他停顿下来，咽了好长一阵子唾沫，但他立即止住，用更加漂亮的口才，弥补刚才的损失。他讲话时一会儿用柔和的、奉承的语气，两脚倒换着站立的重心，双眼瞧着陪审员，一会儿用低沉的、正经的口吻，眼睛不离开他的笔记本，一会儿又用洪亮的、谴责的口吻，眼睛忽而望着旁听者，忽而望着陪审员。他的演讲引用了当时他那一圈子最为流行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仍被看作科学上的最新成就。譬如有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12]的理论、塔

尔德【13】的理论、进化论、生存竞争论、催眠术、暗示术、夏科【14】的理论、颓废论。

商人斯梅里科夫，按副检察官的定义，是强壮而淳朴类型的俄罗斯人，心肠宽厚，由于轻信他人和慷慨大方，落入一伙无耻之徒的手里，成了受害者。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返祖现象的产物，是受尽摧残的人，缺乏教养，缺乏原则，甚至缺乏宗教信仰。叶菲米娅是他的情妇，是遗传的牺牲品。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个性退化的所有特征。而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是玛丝洛娃，她是颓废精神最下作的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说，眼睛却不瞧着她，“受过教育——我们刚刚在法庭上听到了鴉母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她还懂法语，她，这个也许带有犯罪胚胎的孤儿，是在一个有知识的贵族家庭受到教育的，本应当靠诚实的劳动来生活；但她抛弃自己的恩人，沉湎于情欲，为满足情欲而进了妓院，在妓院里她比别的姑娘走红，因为她有文化，而更主要的，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你们刚才从她的鴉母嘴里听到的，是因为她会用一种神秘的东西操纵嫖客，这种神秘的东西最近已被科学，尤其是被夏科学派研究出来，定名为暗示法。她正是凭借这一方法控制了那位俄罗斯壮士，那位善良、轻信而富有的嫖

客，利用他对她的信任，先窃取他的钱财，然后残酷地将他害死。”

“瞧，他简直是胡说八道。”庭长侧身对那位严厉的法官笑嘻嘻地说。

“十足的蠢货。”严厉的法官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时副检察官继续说道，姿态优雅地扭动着细腰，“这些人的命运掌握在你们的手里，而且社会的命运也部分地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你们的判决将对社会发生影响。你们要深入考虑这种罪行的危害性，要考虑这些病态的，比如说像玛丝洛娃之类的人物对社会的威胁，要保护社会免受其传染，要保护这个社会上的纯洁、健康的人免受其传染，免遭经常性的毁灭。”

副检察官似乎对即将作出的判决的重大意义感到灰心，同时显然又对自己的演讲感到极为欣赏，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的演讲，如果去掉那些华丽的词藻，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玛丝洛娃把商人迷惑住了，骗取了他的信任，拿了钥匙去他的房间取钱，本想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但被西蒙和叶菲米娅撞见，只好和他们平分。这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痕迹，她又随同商人来到旅馆，并在那里将他毒死。

副检察官讲话以后，律师席上站起一个中年

人，身穿燕尾服，胸前露着宽大的半圆形硬衬，口齿伶俐地为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三百卢布请来的辩护律师。他替他们两人开脱，把全部罪责推在玛丝洛娃身上。

他反驳玛丝洛娃所说的她取钱时博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场的供词，坚持认为一个被控犯有毒死人命的案犯，她的供词毫无价值。至于那二千五百卢布，律师说是这两个勤劳而正直的人能够挣出来的，他们有时一天可以从旅客手里得到三至五卢布的赏钱。至于商人的钱，是被玛丝洛娃偷去的，并转交给什么人或者甚至丢失了，因为她的精神状态不正常。毒死商人是玛丝洛娃独自一个人干的。

他因此请求陪审员认定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没有犯偷盗罪；假使认定他们犯有偷盗罪，那么不要认定他们参与毒死人命和参与预谋。

律师结束发言时故意挖苦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学的宏论，虽然能阐明遗传学方面的科学问题，但对本案并不适用，因为博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

副检察官十分恼火，仿佛狗咬人一般发出短促的唔唔声，在纸上记了些什么，并以轻蔑而惊讶的神情耸了耸肩膀。

接着，玛丝洛娃的辩护人站起来，怯声怯气，结结巴巴地进行辩护。他不否认玛丝洛娃参

与偷盗之事，仅仅坚持她没有毒死斯梅里科夫的意图，给他下药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施展一下自己的口才，简略讲起玛丝洛娃是受一个男人的引诱而变坏的，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独自承担堕落的全部重负。不过，他在心理学方面的离题发挥并不成功，以致大家听了都为他感到害羞。当他语无伦次地谈起男人的残忍和女人的软弱时，庭长有意替他解围，请他注意贴近案情。

这位辩护人发言之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针对第一个辩护人的话，为自己的遗传学观点进行辩护。在他看来，即使博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会因此失去效力，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所充分证实，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遗传推断犯罪，而且可以通过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个辩护人在辩护词中推测，说什么玛丝洛娃变坏是由一个想像的（他特别恶毒地说出“想像的”一词）引诱者造成的，可是种种事实恰恰表明，她才是一个引诱者，许多男人受到她的引诱，在她手里成为牺牲品。他说完这些话，得意洋洋地坐下。

随后，法庭要被告们自我辩护。

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反反复复地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西蒙只是翻来覆去地重复

说：

“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我没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也没说。当庭长对她说，她有权利为自己辩护，她仅仅抬起眼睛看了看他，又扫了在场所有人一眼，仿佛一头被围捕的野兽似的，接着立即垂下眼睛，大声抽噎地哭起来。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突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问道。这种声音是压抑着的痛哭声。

聂赫留朵夫还不明白他目前处境的全部实质，他把勉强忍住的痛苦和夺眶而出的泪水看作自己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它们，他戴上夹鼻眼镜，然后掏出手绢，擤起鼻涕。

如果法庭上所有的人知道了他的行径，他定会丢尽脸面，这一恐惧压倒了他心里曾有过的思想斗争。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这种恐惧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来得强烈。

二十二

被告们作了最后的陈诉，各有关方面对需要提交审议的问题的提交方式商量了好长一段时间，所有的问题最终得以确定，庭长这才开始作总结。

他在叙述案情之前，先用亲切愉快的口气向陪审员们解释了很久，什么抢劫就是抢劫，偷窃就是偷窃，从上锁的地方盗窃就是从上锁的地方盗窃，从没上锁的地方盗窃就是从没上锁的地方盗窃。他在解释这些道理的时候，特别频繁地瞧着聂赫留朵夫，似乎特别想要他明白这些重要情况，希望他领会以后，好向同事们解释清楚。然后，等他认为陪审员们已经充分懂得了这些道理，他开始发挥另一个道理：杀人是一种致人于死亡的行为，因此毒死人也是杀人。当他认为这一道理也已被陪审员们所理解之后，又向他们解释说，如果偷盗和杀人是同时发生的，那么偷盗和杀人同为犯罪要素。

尽管他自己本想快点脱身，那个瑞士女人已经在等他，可是他做这项工作已养成习惯，一讲起来，无论如何也收不住嘴，因此详细地开导陪审员们说，假如他们发现被告有罪，有权认定他们有罪；假如发现他们无罪，有权认定他们无罪；假如发现他们犯有这种罪而没有犯另一种罪，有权认定他们犯有这种罪而没有犯另一种罪。然后，他又对他们解释说，虽然他们享有这项权利，但必须合理地使用它。他还想对他们解释说，假如他们对提交给他们审议的问题给予肯定的答复，那就表示他们通过答复对问题中提出的全部内容给予了认定，假如他们对问题中提出

的全部内容不予认定，那就应当声明不予认定。可是，他一看表，发现差五分就到三点了，于是决定马上转入案情叙述。

“本案的情况如下。”他讲了起来，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好几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庭长讲话时，坐在他两侧的法官带着沉思的样子听着，偶尔看看表，认为他的讲话虽然很好，即完全合乎规范，只是有些过长。副检察官，以及所有的法庭工作人员和在场的人也都有这样的看法。庭长结束了总结发言。

一切似乎都已经讲过了。可是庭长却怎么也不愿意放弃他的发言权——他听着自己生动有力的语调感到无比的愉快，觉得有必要就赋予陪审员们的权利的重要性再说几句，说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行使这项权利，不可滥用，还要说他们已经宣过誓，他们是社会的良心，陪审员议事室里的秘密是神圣不可外泄的，等等，等等。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丝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瞧着他，生怕漏掉一个词似的，所以聂赫留朵夫不必担心和她的目光相遇，一直不停地看着她。他的心里产生了这样一种常有的现象：心爱的人久别重逢，她的容貌在分离期间发生的外部变化，起初令他感到吃惊，随后渐渐地又变得和多年前一模一样，那些外部变化消失不见了，于是在他

的心目中出现的只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绝无仅有的精神的人的主要风貌。

聂赫留朵夫的心里发生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不错，尽管她穿着囚服，身体发胖，胸脯增高，尽管她的脸的下半部分变宽，额头和额角出现皱纹，眼睛浮肿，但她确实是卡秋莎，是当年在复活节的清晨用她那双充满生之欢乐的深情的眼睛天真地从下往上看着他，看着她心爱的人的那个卡秋莎。

“多么惊人的巧合！真想不到，偏偏这件案子有我参加陪审，让我在十年没见到她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在被告席上看见她！这一切将如何收场呢？快一点吧，唉，快点结束吧！”

他对自己心里萌生的忏悔心情，仍旧不肯屈服。他觉得这不过是件偶然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不致破坏他的生活。他感到自己好像一只在屋子里表现恶劣的小狗，被主人揪住后脖子，把它的鼻子按在它干坏事的地方。小狗嗷嗷叫着，往后倒退，想尽量离闯祸的地方远一点，好把它忘掉；可是铁石心肠的主人却不肯放过它。聂赫留朵夫同样感觉到自己干了坏事，同样感觉到主人那只强有力的手，不过他还没有明白他所干的那件事的后果，也不承认有那么一个主人。他还是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是他一手造成的。可是，那只无形的铁手紧紧抓住他，他已经预感到

自己将无法脱身。他依然装成勇敢无畏的样子，习惯地跷起二郎腿，漫不经心地玩弄着夹鼻眼镜，神气十足地坐在第一排第二把椅子上。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已感到，不仅他的这一行为，而且他的闲逸的、放荡的、残忍和自满的全部生活都是那么残忍、卑鄙和下流。十二年来，一直有一道可怕的帷幕，魔幻般地遮挡着他的双眼，使他看不见自己的这桩罪行和此后的整个生活，如今这道帷幕开始晃动，他已经可以偶尔朝帷幕后面看上几眼了。

二十三

庭长终于结束发言，动作优雅地拿起那张问题表，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站起来，因为可以离开而心中欢喜，同时又好像因为什么事害羞似的，两手不知如何是好，一个接一个地向议事室走去。他们身后的门刚一关上，一名宪兵便来到门口，从刀鞘里抽出军刀放在肩上，站在门的旁边。法官们起身离开。被告们也被押出去。

陪审员们走进议事室的第一件事，像先前一样，就是掏出香烟吸起来。刚才他们在法庭里坐在自己座位上或多或少体验到的自己处境的那种虚伪和做作的感觉，当他们一进议事室并吸起香

烟之后，便已不复存在。他们如释重负，纷纷在议事室里坐下，立即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那姑娘没罪，是一时糊涂，”那个心肠宽厚的商人说，“应当从轻发落。”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要受自己个人印象的影响。”

“庭长的总结做得不错。”上校说。

“是不错！我差点儿没睡着了。”

“关键是，假如玛丝洛娃没有和那两个楼层招待串通一气，他们就不会知道那笔钱。”长相像犹太人的职员说。

“那您的意思是说，钱是她偷的啦？”一位陪审员问。

“我怎么也不相信，”心肠宽厚的商人扯着嗓子说，“这事儿准是那个红眼睛妖婆干的。”

“都不是好东西。”上校说。

“她说她没进房间嘛。”

“您太相信她了。我才不信那娘儿们的鬼话。”

“您光是不相信，这是不够的。”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还有戒指呢？”

“她不是说过了吗，”商人又扯着嗓子叫起来，“那个商人脾气暴躁，加上多喝了酒，把她

打了一顿。后来，不用说，又心疼了。拿去吧，他说，别哭啦。那个家伙，我刚才听见，身高两俄尺十二俄寸，体重有八普特呢！”

“这些都无关紧要，”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打断他的话，“问题在于：这件事是她教唆和策划的呢，还是那两个招待？”

“不可能光是两个招待干的。钥匙在她手里。”

这种七嘴八舌的议论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请坐到桌子这边来讨论。请吧。”他说完，坐到主席的位子上。

“这些姑娘都不是好东西。”店员说，为了证明玛丝洛娃是主犯，他讲了一个像她那样的姑娘在街心花园偷走他朋友的表的事。

上校乘此机会讲起一件更为惊人的偷窃银茶炊的事。

“诸位先生，现在请大家按所提交的问题来讨论。”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着桌子，说。

大家静了下来。这些问题是这样的：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克拉皮夫纳县博尔基村人，现年三十三岁，是否犯有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蓄谋杀害商人斯梅里科夫，抢劫其钱财，串通他人在其白兰地酒中放入毒药，致使斯梅里科夫死亡，并盗

窃其现金约二千五百卢布及钻石戒指一枚？

（二）叶菲米娅·伊万诺娃·博奇科娃，小市民，现年四十三岁，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中所列之罪行？

（三）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玛丝洛娃，小市民，现年二十七岁，是否犯有第一个问题中所列之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娅·博奇科娃未犯第一个问题中所列之罪行，是否犯有下述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毛里塔尼亚”旅馆当班时，从住在该旅馆的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内上着锁的皮箱里盗窃现金二千五百卢布，并随身带去偷配的钥匙，以便打开那只皮箱？

首席陪审员把第一个问题念了一遍。

“怎么样，诸位先生？”

这个问题很快有了答案。大家同意作出的答复是：“有罪”——认定他参与了毒害人命和盗窃。不同意认定卡尔津金有罪的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劳动组合成员，他对所有问题的答复都是被告无罪。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没有搞明白，便向他解释，从各个方面看，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毫无疑问是有罪的，可是劳动组合的这位老头儿回答说，他明白这一点，不过最好还是应当宽大为怀。“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说，依旧坚持自

己的观点。

对于有关博奇科娃的第二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解释，作出的答复是：“无罪”——因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她参与了投毒，这一点她的律师特别强调过。

那个商人一心想替玛丝洛娃开脱罪责，坚持说博奇科娃是主谋。许多陪审员同意他的说法，但首席陪审员却想严格按法律办事，反复强调说，认定她参与投毒，证据不足。经过一番争论，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获得胜利。

对于有关博奇科娃的第四个问题，作出的答复是：“有罪”——并根据劳动组合的老头的要求，加了一句：“但应从宽发落”。

有关玛丝洛娃的第三个问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认为她既犯有毒害人命罪，又犯有盗窃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支持商人的人有上校、店员和劳动组合的老头——其他的人似乎犹豫不决，不过首席陪审员的意见逐渐占据上风，尤其是因为所有的陪审员已疲惫不堪，情愿附和那种有希望很快取得统一的意见，以便可以脱身。

根据法庭审讯的全部情况，根据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的了解，他确信玛丝洛娃既没犯毒害人命罪，也没犯盗窃罪，起初他相信大家定会认清这一点；但后来他看到，由于商人那拙劣的辩

护，这一辩护显然建筑在他从肉体上对玛丝洛娃的喜爱之上，他自己对此并不隐讳，还由于庭长正是抓住这一点进行反击，而更主要的是由于陪审员们的疲惫，因此大家的意见渐渐倾向于判决她有罪，他想反驳，但他害怕替玛丝洛娃说话——他仿佛觉得大家马上就要知道他和玛丝洛娃的关系了。然而他又感到，这事不能就此了结，应当起来反驳才对。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刚要开口讲话，不想此前一直沉默不语的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显然被首席陪审员那盛气凌人的口吻所激怒，突然对他进行反驳，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正想说的话。

“对不起。”他说，“您说钱是她偷的，因为钥匙在她手里。难道那两个楼层招待不会在她走后用配好的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附和说。

“她不可能拿那笔钱，因为就她的情况来说，她没地方放那笔钱。”

“我也这么想。”商人表示支持。

“很可能是她去了趟旅馆，那两个招待就起了歹念，他们利用了这个机会，事后把一切都推在她身上。”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话时情绪十分激动。这种激动的情绪传染给了首席陪审员，他也变得激动起来，特别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相反意见，可是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他的观点，认为玛丝洛娃没有参与盗窃现金和戒指，戒指是商人送给他的。当谈到她是否参与毒害人命时，那个热心替她辩护的商人说，应当认定她无罪，因为她没有必要将他毒死。首席陪审员却说，不能认定她无罪，因为她本人招认药粉是她放的。

“是她放的，但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她放鸦片也能致人死命的。”喜欢打岔的上校说，于是讲起他内弟的妻子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有医生，抢救及时，她早就没命了。上校讲得那么生动，那么自信，神态那么庄重，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打断他。只有那个店员，受到这个例子的感染，决定打断他，以便讲述自己的故事。

“有的人对鸦片就能适应，”他讲了起来，“一次可以喝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可是上校不容别人打断自己，继续不停地讲述鸦片给他内弟的妻子造成的后果。

“瞧，诸位先生，已经四点多啦。”一个陪审员说。

“到底怎么办呢，诸位先生，”首席陪审员说，“我们认定她有罪，但没有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行不行？”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对自己的胜利感到满意，

就同意了。

“不过，可要从宽发落。”商人补充了一句。

大家表示同意。只有劳动组合的老头仍坚持己见，要求作出这样的答复：“无罪”。

“结论是一样的，”首席陪审员解释说，“没有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因此，也就是无罪。”

“就这么办，再加上从宽发落：这就没什么遗漏的了。”商人快活地说。

大家全都疲惫不堪，又争论得头昏脑涨，谁也没想到在答案中添加一句：有罪，但未蓄意杀人。

聂赫留朵夫的心情十分紧张，也没有发觉这一点。答案就这样记录下来，并送交法庭。

拉伯雷^[15]写过一位律师，有人请他打官司，他引证各式各样的法典，念了二十页毫不相干的拉丁文法律条款之后，建议双方当事人掷骰子：猜单双数。如果是双数，原告有理，如果是单数，被告有理。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作出这个，而不是另一个决定，并非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个决定，而是因为，第一，作总结时喜欢长篇大论的庭长，这次偏偏忘掉了他平常总要反复交代的那句话，即他们答复问题时，要说：“有罪，但没有蓄意杀人”；第二，上校讲述他内弟妻子的事占用了太

多的时间，而且很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心情太紧张，竟没有注意到遗漏了没有蓄意杀人这一补充说明，以为有了“没有蓄意抢劫”的说明，便不致被判罪；第四，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当时不在议事室，当首席陪审员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正巧出去了，而更主要的是大家已感到疲乏，想早点脱身，因此同意了那个决定，这样一来，事情就可以快点了结了。

陪审员们摇了摇铃。站在门外的宪兵，把握在手中的出鞘的军刀收入鞘里，闪到一旁。法官们就座后，陪审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来。

首席陪审员神情庄重地拿着那张表。他走到庭长面前，把表交给他。庭长看完表，显然大为惊讶，双手一摊，同其他法官商量起来。庭长感到惊讶的是，陪审员们提出了第一个附加条件：“没有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附加条件：“没有蓄意杀人”。那么，根据陪审员们的决定，结论只能是，玛丝洛娃没有盗窃，没有抢劫，同时却毫无目的地毒死了一个人。

“瞧，他们作出了多么愚蠢的决议。”他对左边的法官说。“这样她就要去服苦役，可她是无罪的。”

“怎么能说无罪呢？”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真的无罪。依我看，可以动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款规定，如果法庭

认为定罪不当，可以取消陪审员的决定。)

“您觉得怎么样？”庭长对那位心肠宽厚的法官说。

心肠宽厚的法官没有立即回答，他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编号，把数字相加——不能被三除尽。他在占算，如果可以除尽，他就同意，可是，尽管没能除尽，但他心地善良，还是同意了。

“我也认为应当这么办。”他说。

“那您呢？”他问那位满脸怒容的法官。

“我坚决反对，”他语气强硬地回答。“报纸已经在议论纷纷，说陪审员常替罪犯开脱；如果法官也开脱罪犯，那人家又会怎么说呢。我坚决反对。”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但毫无办法。”他把问题表交给首席陪审员宣读。

大家站了起来，首席陪审员不住地倒换着两脚，咳嗽一声，把问题和答案读了一遍。所有的法院职员：书记官，律师，甚至副检察官，无一例外地露出惊讶的神色。

被告们坐在那里没有反应，显然不明白答案的含义。等到大家又坐下来，庭长问副检察官，他认为应对被告处以哪种刑罚。

副检察官正为有关玛丝洛娃的意外成功感到

欣喜，并将这一成功归于自己出色的辩才，这时他不知在哪儿查找了一下，欠身说：

“我认为，应当按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一千四百五十三条第四款、一千六百五十九条、一千四百五十四条，分别对西蒙·卡尔津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判刑。”

上述这些刑罚是法律所能允许的最重的制裁。

“暂时休庭，法官商议判决。”庭长说完，站了起来。

大家跟着他站起来，带着办了一件好事的轻松愉快的心情，走出大厅或在大厅里来回走动。

“老兄，咱们干了件丢人的蠢事。”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这时首席陪审员正对他说着什么。“我们这是让她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一次他一点也没有发觉这位教师令人不快的不拘礼貌的态度。

“那还用说，”他说。“我们在答案中没有写上：‘有罪，但没有蓄意杀人’。书记官刚才告诉我：副检察官要判她十五年苦役。”

“我们就是这样认定的。”首席陪审员说。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又开始争论，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她也就不可能蓄意杀人，这是不言而喻

的。

“刚才离开议事室之前，我可是把答案念了一遍的，”首席陪审员为自己辩白。“谁也没有反对。”

“我那时出去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没注意？”

“我万万没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好个没想到。”

“可以再更改。”聂赫留朵夫说。

“唉，不行，现在无可挽回了。”

聂赫留朵夫看了那三名被告一眼。他们，这几个命运已被决定的人，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栏杆的后面和士兵的前面。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笑。聂赫留朵夫的心里出现了一种卑劣的念头。这之前，他料想她会无罪释放，并留在这个城市里，他感到为难，不知如何对待她才好；和她的关系，不论怎样都是尴尬的。而苦役和西伯利亚却一下消除了和她发生任何关系的可能：没被打死的鸟再也不会再在猎袋里扑腾，再也不会令人想起它了。

二十四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猜测是正确的。

庭长从会议室回来，拿起一张纸，念道：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院刑事庭奉皇帝陛下圣谕，遵照各位陪审员先生的认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七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判处：农民西蒙·卡尔津金，现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现年二十七岁，剥夺公民权，流放服苦役；另据刑事法典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两人的刑期分别为，卡尔津金八年，玛丝洛娃四年。小市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现年四十三岁，剥夺一切个人权利，没收财产，另据刑事法典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处以三年有期徒刑。本案诉讼费用由犯人平均负担，如犯人无力负担，则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均予变卖，戒指追回，酒瓶销毁。”

卡尔津金仍旧挺直身子站立，两手贴着裤线，手指叉开，腮帮子不住地颤动。博奇科娃似乎显得格外平静。玛丝洛娃听到判决，脸涨得通红。

“我没罪，没罪！”突然她对着整个大厅叫喊起来。“冤枉啊。我没罪。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实话。”她往凳上一坐，放声痛哭。

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已经走了出去，她还坐在那儿哭，宪兵只好去拉她的袖子。

“不行，不能这样就完了。”聂赫留朵夫自言

自语地说，完全忘掉了自己刚才的卑劣念头，而且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急忙向走廊跑去，想再看她一眼。门口挤满了正往外走的陪审员和律师，又说又笑，因案子结束而感到满意，所以他在那儿耽搁了几分钟。等他来到走廊上，她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追上去，顾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赶上并超过她，方才站住。她已经停止哭泣，只是一阵阵地抽噎，不时用头巾角擦着红一块白一块的脸，从他身旁走过，根本就没瞧他。等她过去之后，他急忙转身往回走，想见见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了。

聂赫留朵夫一直追到门房，才赶上他。

“庭长先生，”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说，这时庭长已经穿好浅色大衣，伸手接过看门人递过来的镶着银头的手杖。“我能和您谈谈刚才判决的案子吗？我是陪审员。”

“当然，那还用说，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非常荣幸，我们以前见过面，”庭长说完，握住他的手，同时高兴地回想起和聂赫留朵夫见面的那个晚上，他的舞跳得那么优美和轻快，比所有的年轻人都出色。“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有关玛丝洛娃的答案出了点误会。她没有犯毒死人的罪。可是却判她服苦役。”聂赫留朵夫脸色忧郁地说。

“法庭是根据你们作出的答复判决的，”庭长

边说，边向大门口挪动，“尽管法庭也觉得答复与案情不符。”

他这才想起，他本来打算向陪审员们交代，如果他们作出的答复是“有罪”，而没有否定蓄意杀人，那就是肯定蓄意杀人，但他因急于结案，结果没有说。

“不错，难道这个过失不能纠正吗？”

“上诉的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应当请教一下律师。”庭长说，把帽子稍稍歪戴到头上，继续向大门移动。

“真是糟透了。”

“您要知道，玛丝洛娃的面前有两条路，”庭长说，显然想尽量对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亲切和恭敬一些，接着理了理大衣领子上的络腮胡子，轻轻挽住他的手臂，向大门口走去，同时问道：“您也走吗？”

“是的。”聂赫留朵夫说，赶忙穿好大衣，和他走出去。

他们来到令人愉悦的灿烂的阳光下，由于马路上车轮辘辘作响，不得不大声讲话。

“您瞧，情况是有些奇怪，”庭长提高嗓门，继续说，“因为这个玛丝洛娃，她的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几乎是无罪释放，坐一段时间的牢，还可以减去已监禁的日子，甚至仅仅是拘留而已；要么是服苦役——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假如你

们加上一句：‘但没有蓄意杀人’，她也就无罪释放了。”

“我不可饶恕地忽略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说。

“问题就在这里。”庭长笑着说，看了看表。离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剩下三刻钟了。

“现在，您要是愿意，可以找找律师。必须找一个上诉的理由。这总是可以找到的。去贵族大街，”他对马车夫说，“三十戈比，多一个戈比也不给。”

“请上车吧，老爷。”

“请原谅。如有什么事要我效劳，请到贵族大街德沃尔尼科夫楼找我，地名好记。”

他亲切地鞠一躬，坐上车走了。

二十五

同庭长的谈话以及清新的空气，使聂赫留朵夫心里感到轻松一些。他想，刚才的这种感受，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不习惯的环境中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而被他过分夸大了。

“真是离奇而惊人的巧合！一定要尽最大所能减轻她的遭遇，要早点去办。马上就办。对，先在法院里打听一下，法纳林或米基申住在哪儿。”他想起了两个著名的律师。

聂赫留朵夫回到法院，脱掉大衣，向楼上走去。在一楼走廊上，他遇见了法纳林。他拦住他，说有事向他请教。法纳林认得他，也知道他的名字，于是表示非常愿意为他效劳。

“虽然我很累了……不过，时间要是不长，就把您的事告诉我吧——请到这边来。”

法纳林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一个房间，看样子像是哪位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在桌旁坐下。

“请问，是什么事？”

“首先我请您，”聂赫留朵夫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过问这个案子。”

“那是自然的。是什么……”

“我今天是陪审员，我们把一个女人判了苦役——她是无辜的。这事使我很难过。”

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竟然脸红起来，说不下去了。

法纳林瞥了他一眼，又垂下眼睛听着。

“嗯。”他只应了一声。

“我们把一个无罪的女人判了罪，我想对这个案子提出上诉，把案子上告到最高法院。”

“是参议院。”法纳林纠正他。

“所以我请您承办这件事。”

聂赫留朵夫想尽快说出最难出口的话，因此立即接着说：

“至于这个案子的酬劳和各项开支，无论多

少，全部由我负担。”他红着脸说。

“哦，这个好商量。”律师说，对缺乏经验的聂赫留朵夫报以宽厚的微笑。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聂赫留朵夫讲了一遍。

“好吧，明天我就办，查一查案情。后天，不，星期四晚上六点请来找我，我给您答复。这样好吗？那我们走吧，我在这儿还有事情要查一下。”

聂赫留朵夫向他告辞，走了出来。

和律师的谈话，以及他已经采取行动为玛丝洛娃辩护，越发使他心里感到轻松。他来到街上。天气好极了。他快活地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马车夫们纷纷请他坐车，但他还是愿意步行。有关玛丝洛娃，有关他对她做的那件事的种种思绪和回忆，顿时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起来。他又感到心情沮丧，周围的一切变得阴暗无光。“不，这事以后再考虑吧，”他对自己说，“先不管它，丢掉这些烦恼，去散散心。”

他记起了科察金家请他吃饭的事，看了一下表。时间还不晚，他能赶得上去吃饭。一辆有轨马车叮当响着从旁边驶过。他紧跑几步，跳上马车。到了广场，他下了车，另雇了一辆高级的马车，十分钟后，已经来到科察金家的宅门前。

二十六

“请进，公爵大人，正等您呢，”科察金府上那个殷勤的胖看门人说，拉开装着英国铰键、开关不出声响的橡木大门。“已经开饭，吩咐过，您一到就请入席。”

看门人走到楼梯口，拉了拉通往楼上的铃。

“有客人吗？”聂赫留朵夫一边脱大衣，一边问。

“有科洛索夫先生，还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剩下的都是家里人。”看门人回答。

一个身穿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的漂亮侍仆从楼梯上往下看了看。

“请，公爵大人。”他说。“主人吩咐，请您上楼。”

聂赫留朵夫走上楼梯，穿过熟悉的宽敞富丽的客厅，来到餐厅。餐厅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只有母亲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除外，她从来不离开自己的房间。餐桌上首坐的是老科察金；他左边坐着医生，右边是客人伊万·伊万诺维奇·科洛索夫，以前当过省里的首席贵族，目前担任银行董事，是和科察金志同道合的自由主义者；左边再往下是米西小妹妹的家庭女教师雷德尔小姐和四岁的小女孩本人；右边她们对面的位置，坐着米西的弟弟，科察金家的独子，六

年级学生彼佳，一家人就是因为等他考试而留在城里的，他旁边是给他辅导功课的大学生；左边再往下是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一个信奉斯拉夫主义的四十岁老姑娘；她的对面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也许叫米沙·捷列金，是米西的表哥，餐桌下首坐着米西本人，她旁边摆着一副没动过的餐具。

“啊，太好啦。请坐，我们刚开始吃鱼，”老科察金费力地用假牙小心咀嚼着说，抬起布满血丝、看不见眼皮的眼睛望着聂赫留朵夫。“斯捷潘。”他嘴里塞满食物，转身叫一个神态高傲的胖侍仆，用眼睛示意那副没动过的餐具。

聂赫留朵夫虽然和老科察金很熟，多次在吃饭的时候见过他，可是今天不知怎么搞的，他那张红脸，那两片在背心里掖着的餐巾上面津津有味地翕动的嘴唇，那肥胖的脖子，尤其是那粗壮的将军式的身材，令人感到十分不快。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想起了他所知道的此人的暴行，他当省长的時候，天晓得为了什么——因为他有钱有势，不需要以此去邀功请赏——常常把人鞭打一顿，甚至把人绞死。

“马上就来，公爵大人。”斯捷潘说完，从摆满银制高脚盘的餐柜里取出一把大汤匙，又向留着络腮胡子的那个漂亮的侍仆点点头，这个侍仆立即动手把米西旁边那副没动过的餐具摆好，餐

具上面原来盖着一块浆过的、精心折叠的餐巾，露出绣着的家徽。

聂赫留朵夫绕餐桌走了一圈，同大家一一握手。他走到他们跟前时，除了老科察金和女士们以外，大家都站了起来。尽管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从来没有讲过话，他还是绕着桌子同他们握手，这事在他今天看来，特别让人觉得不快和可笑。他为自己迟到表示过歉意，便想坐在米西和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之间的空位子上，可是老科察金对他说，即使不喝白酒，也要到那张摆满龙虾、鱼子酱、干酪和咸青鱼的桌子那儿先吃一点。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他会那么饿，刚咬一口干酪面包，就止不住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喂，怎么样，黑白颠倒了吗？”科洛索夫以讽刺的口吻引用顽固派报纸抨击陪审制度的话说。“把有罪的判成无罪，无罪的判成有罪，是不是？”

“黑白颠倒……黑白颠倒……”科察金老公爵笑着重复说，他一向对这位自由派同志和朋友的才智与学识极为钦佩。

聂赫留朵夫不顾失礼与否，没有理睬科洛索夫，只管坐下喝刚端上来的冒着热气的汤，嘴里还在不停地咀嚼。

“让他先吃吧。”米西笑吟吟地说，这个代词“他”表示着她和他之间的亲密关系。

科洛索夫这时口若悬河地大声讲起那篇令人气愤的反对陪审制度文章的内容。公爵家的侄子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附和他的意见，也讲起这家报纸的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米西像平常一样，衣着雅致而讲究，讲究但不扎眼。

“您是不是累坏了，也饿坏了。”她等聂赫留朵夫嚼完咽下后，说。

“不，不那么累，也不那么饿。您怎么样？去看画展了吗？”他问。

“没有，我们改日子了。我们在萨拉玛托夫家打网球【16】来着。说真的，克鲁克斯先生打得好极了。”

聂赫留朵夫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散散心，每次他置身于这所房子中总会感到心情愉快，不仅仅因为这里的豪华气势引起他心中的愉快感觉，而且还因为近乎奉承的亲热气氛在无形之中包围着他。而今天呢，说来奇怪，这所房子里的一切都使他心生厌恶——一切，从看门人、宽阔的楼梯、鲜花、仆役、餐桌上的摆设到米西本人，她今天给他一种不可爱、不自然的印象。他讨厌科洛索夫那种自以为是、陈腐无味的自由派论调，讨厌老科察金那公牛般的、自命不凡而又性欲旺盛的身躯，讨厌斯拉夫主义者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那满口的法文字眼，讨厌家庭女教

师和补习教师那拘谨的面孔，尤其讨厌那个代词“他”……聂赫留朵夫对米西的态度往往左右摇摆不定：有时他似乎是在眯缝着眼睛看她或者在月光下看她，看到的全是她的美好之处：他觉得她又清雅，又美丽，又聪明，又真诚……有时他又似乎是在明亮的阳光底下，突然看到，而且不能不看到她身上的缺陷。今天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一天。他今天看到她脸上的道道皱纹，看到而且知道她蓬松的头发是做出来的，看到她的尖胳膊肘，尤其是看到她大拇指上的宽指甲，简直和她父亲的一模一样。

“玩那东西一点意思也没有，”科洛索夫对网球发表议论说，“我们小时候玩的棒球有趣多了。”

“不，那是您没玩过。网球极其有趣儿。”米西反驳说，她说的“极其”这个词，聂赫留朵夫听了感到特别造作。

于是，一场争论开始了，参加的还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只有家庭女教师、补习教师和孩子们没有出声，显然不感兴趣。

“总是吵嘴！”老科察金哈哈大笑着说，取下掖在背心里的餐巾，从桌旁站起来，弄得椅子直响，一名侍仆立即把椅子挪开。其余的人也跟着他站起来，走到放着漱口杯并倒满芬芳的温水的

小桌旁，漱了一下口，继续那场谁也不感兴趣的谈话。

“您说是吗？”米西对聂赫留朵夫说，想要他支持她关于人的性格再也没有比在运动中表现得更清楚的见解。她发现他脸上有一种沉思的、而且让她看来似乎愤愤不平的表情，她害怕看到他脸上的这种表情，很想知道是什么事引起的。

“真的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聂赫留朵夫回答。

“我们去看妈妈，好吗？”米西问。

“好，好。”他说着掏出香烟，但他的口气表明，他并不想去。

她不做声，用疑问的目光看着他，于是他心里产生了一种惭愧的感觉。“既然来到人家的家里，总不能让人家扫兴吧。”他暗自想，便又尽力做出殷勤的样子说，如果公爵夫人肯见他，他是很乐意去的。

“那当然，妈妈肯定会高兴的。您可以在那儿吸烟，伊万·伊万诺维奇也在那儿。”

这家的女主人，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长期卧病在床。她躺着会客已经有八年了，身上戴着各式花边织物和条形饰物，周围装点着天鹅绒、镀金摆设、象牙制品、青铜制品、漆器和鲜花。她从不出门，只会见她所谓的“亲近的朋友”，也就是所有她认为在某些方面出类拔萃

的人。聂赫留朵夫属于这类被会见的朋友之列，因为他被看作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又因为他母亲是这家的老朋友，还因为如果米西能嫁给他，是一件让人欢喜的好事。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的后面。米西走在聂赫留朵夫的前边，一进大客厅，她果断地停住脚步，双手扶住涂金木椅的靠背，两眼看着他。

米西很想出嫁，而聂赫留朵夫是个不错的人选。况且，他挺讨她喜欢，她已经习惯于认为，他将属于她（不是她属于他，而是他属于她），她还用精神病人常见的那种虽无意识，但却十分固执的狡猾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此刻同他说话，为的便是探听他的心事。

“我知道，您遇到了什么事。”她说。“您有什么事？”

他想起自己在法庭上的巧遇，皱起眉头，脸红了起来。

“是的，是遇见了一件事儿。”他说，并不想隐瞒，“一件奇怪的、不同寻常的重要事儿。”

“到底是什么事儿？您不能告诉我吗？”

“现在不行。请原谅，我不能说。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他说，脸红得更厉害了。

“您对我都不能说？”她脸上的肌肉颤动了一下，手扶着的椅子也随着动了动。

“不，不能。”他回答，同时觉得这样回答她，也等于在回答自己，承认自己确实遇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好吧，那我们走。”

她把头一甩，仿佛要甩掉那些不必要的想法似的，迈起比平常更快的步子向前走去。

他感觉到，她不自然地咬紧嘴唇，以便忍住眼泪。令他惭愧和痛苦的是，他伤了她的心，但他又知道，自己稍一软弱，便会毁掉自己，也就是说，束缚住自己。他现在最害怕这一点，于是默默地跟她走进公爵夫人的房间。

二十七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公爵夫人刚刚用完午饭，一顿非常精致、非常富有营养的午饭，这样的饭她总是单独一个人享用，以免别人看到她的这一缺乏诗意的生理机能。她的卧榻式沙发旁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咖啡。她正在吸一种细长的香烟。公爵夫人身材瘦削、颀长，是个依然显得年轻的黑发女人，睫毛长长的，眼睛又大又黑。

关于她和医生的关系，有些难听的传闻。以前聂赫留朵夫忘记了这一点，可是今天他不仅想了起来，而且还在她的沙发榻旁看见了那个两撇

胡子抹着亮油的医生，他感到极其恶心。

科洛索夫坐在公爵夫人旁边的矮沙发椅上，正在搅和小桌上的咖啡。小桌上还有一杯甜酒。

米西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进母亲的房间，但没有留下来。

“等妈妈累了，轰你们走，你们就到我那儿去吧。”她对科洛索夫和聂赫留朵夫说，那语气仿佛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接着开心地微微一笑，悄无声息地踩着厚厚的地毯走出房间。

“阿，您好，我的朋友，请坐下给我们讲一讲。”公爵夫人说，脸上带着一种完全可以乱真的假笑，露出两排工艺精湛、完全跟真牙一样的漂亮的、长长的假牙。“我听说，您刚从法院来，心情非常不好。我想，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做这种工作是很痛苦的。”她用法语说道。

“对，是这么回事儿，”聂赫留朵夫说，“常常会感到没有……感到没有权利去审判……”

“说得太对啦！”她叫起来，仿佛被他见解的正确性震惊似的，她平常总是这样巧妙地恭维和她谈话的人。

“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很感兴趣，”她补充说。“要不是我有病，我早到您府上去了。”

“我完全把它丢在一边了。”聂赫留朵夫冷淡地回答，她的虚伪的恭维今天在他看来就像她那

刻意掩饰的老态一样明显。他再也没有心情做出殷勤的样子。

“这可不应该！您知道，列宾[【17】](#)亲口对我说，他很有才气。”她对科洛索夫说。

“她这样撒谎也不害羞。”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想。

公爵夫人确信聂赫留朵夫心绪不佳，无法拉他加入愉快而高深的谈话，于是便转身问科洛索夫对一出新戏的看法，那口气仿佛科洛索夫的看法能消除一切疑问，他的每一句话都将永垂史册。科洛索夫把这出戏指摘一番，并乘机发表一通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公爵夫人对他精辟的艺术见解表示惊叹，心里还想为剧作者辩护几句，但立即改口服输，只说了些折中的意见。聂赫留朵夫看着和听着，可是看到和听到的满不是一回事儿。

聂赫留朵夫时而听公爵夫人说话，时而听科洛索夫说话，他看到，第一，公爵夫人也罢，科洛索夫也罢，双方对这出戏都不感兴趣，彼此也不感兴趣，他们所以要说话，不过是为了满足饭后活动一下舌头和喉头肌肉的生理要求而已；第二，科洛索夫喝过伏特加、葡萄酒、甜酒，有了几分醉意，但不像平时难得喝酒的农民那样酩酊大醉，而是像喝惯了葡萄酒的人常有的那种微醺。他身体不摇不晃，口中也不胡说八道，但却

处在一种不正常的、亢奋的自我满足状态；第三，聂赫留朵夫看到，公爵夫人谈话时常常心神不安地瞧着窗外，那儿有一缕阳光斜射进来，渐渐照到她身上，会把她的老态格外分明地照出来。

“这话很对。”她对科洛索夫的一个什么见解评论说，同时按了一下沙发榻旁边墙上的电铃按钮。

这时，医生站起来，像家里人一样，什么话也没说，便走了出去。公爵夫人一边目送他离去，一边继续谈话。

“菲利浦，请把这个窗帘放下来。”她用眼示意窗上的帘子，对应铃声而来的那个模样漂亮的侍仆说。

“不，不管您怎么说，它总有点神秘的地方吧，没有神秘就不会有诗歌。”她说，斜着一只黑眼睛生气地注视着放窗帘的侍仆的动作。

“没有诗意的神秘主义是迷信，没有神秘主义的诗歌，就变成散文啦。”她忧郁地微笑着说，目光并不离开放窗帘的侍仆。

“菲利浦，不是放那个窗帘，是大窗户上的。”公爵夫人痛苦地说，显然心疼自己为说这几句话而付出的力气，接着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立即举起戴满宝石戒指的手，把那支冒着烟的、气味好闻的细长香烟放到嘴边。

胸部宽阔、肌肉发达的美男子菲利浦，仿佛道歉似的轻轻鞠了一躬，又轻轻地在地毯上迈动他那两条强壮的、腿肚子隆起的双腿，顺从地、一声不吭地走到另一个窗户前，仔细地看公爵夫人，动手拉窗帘，不让一丝阳光落到她身上。但他做得还是不对，于是又一次深感痛苦的公爵夫人不得不中断她关于神秘主义的谈话，去纠正这个不可理喻的、无情地折磨她的菲利浦。菲利浦的眼睛刹那间有火星闪了一下。

“鬼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他心里没准这么想。”聂赫留朵夫一面观看这出闹剧，一面想。可是，美男子和大力士菲利浦马上掩盖住自己不耐烦的举动，又顺从地按这个慵懒、无力、虚伪的公爵夫人的指令去做了。

“当然啦，达尔文的学说中有很大的真理成分，”科洛索夫说，手脚伸开，懒洋洋地靠在矮沙发椅上，睡眼迷离地望着公爵夫人，“不过，他走过了头。是这样的。”

“您相信遗传吗？”公爵夫人问聂赫留朵夫，他一直沉默不语让她感到难受。

“遗传？”聂赫留朵夫反问道。“不，不相信。”他说，这时他正在被一些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他头脑里的古怪形象所吸引。他想像大力士、美男子菲利浦变成了一个模特儿，他旁边是科洛索夫，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肚子像个西瓜，脑袋

上没有一根头发，两只胳膊没有肌肉，像两节枯藤。他还模模糊糊地想像公爵夫人现在被丝绸和天鹅绒遮盖着的肩膀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不过这一想像太让人害怕，他尽力把它丢开了。

公爵夫人用目光上下打量他。

“米西可在等您呢，”她说。“到她那儿去吧，她要给您弹一首舒曼【18】的新曲子……妙极了。”

“她什么也不想弹。她这是在有意撒谎。”聂赫留朵夫站起来想，握了握公爵夫人那白净的、瘦骨嶙峋的、戴满宝石戒指的手。

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在客厅里遇见他，马上搭讪着跟他说话。

“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差事把您累得够呛。”她像平常一样用法语说道。

“是的，请您原谅，我这会儿心情不好，不想让别人也跟着不痛快。”聂赫留朵夫说。

“您为什么心情不好呀？”

“我不能说为什么，请原谅。”他一边说，一边找自己的帽子。

“您该记得，您说过，一个人应当永远说实话，您那时对我们大家说了些那么残忍的实话。为什么您现在就不愿意说了呢？你还记得吧，米西？”卡捷琳娜转身对刚进来的米西说。

“那是因为在说着玩儿，”聂赫留朵夫严肃地

回答。“说着玩儿的时候可以。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太坏，我是说我太坏，至少我不能说实话。”

“您不必改口，最好说说，我们坏在什么地方”，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说着俏皮话，仿佛没有看见聂赫留朵夫的严肃表情。

“没有什么比承认自己心情不好更糟的了，”米西说。“我从来不承认自己心情不好，因此心情总是很好。怎么样，到我房间去。我们想办法消除您的坏情绪。”

聂赫留朵夫体验到这么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是一匹被人抚摩着的马，要被戴上笼头，牵去套车。可是，他今天不高兴拉车。他抱歉地说他要回家，便起身告辞。米西握住他的手，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

“记住，对您重要的事，对您的朋友也同样重要。”她说。“明天还来吗？”

“不一定。”聂赫留朵夫说，心里感到直害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替自己，还是替她害羞，他涨红了脸，赶忙走了出去。

“怎么回事？我太感兴趣啦。”等聂赫留朵夫离开后，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说。“我一定要搞清楚。准是一件有关体面的事：我们这位亲爱的米佳[\[19\]](#)，他委屈得很呢。”

“怕是一件下流的桃色事件呢。”米西本想这

么说，但是没有说出口，两眼望着前面，脸色黯然无光，跟刚才看着他的时候截然不同，她甚至对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也难以说出这句难听的俏皮话，只是说：

“我们大家也常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

“难道连他也欺骗我吗，”她想。“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他可就太卑鄙啦。”

如果要米西解释她所说的“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是什么意思，她一定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然而她又分明知道，他不仅在她心里勾起希望，而且几乎应允了她。这并非说有过明确的表态，而是有过那些眼神、微笑、暗示和默许。不过，她依然认为他是属于她的，真要失去他，那对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二十八

“可耻而又可恶，可恶而又可耻。”聂赫留朵夫沿着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心中暗自想道。刚才和米西谈话时体验到的沉重感觉，还没有消失。他觉得，从形式上说，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他在她面前并无过错：他没有对她说过任何可以约束自己的话，也没有向她求婚，而从实质上说，他觉得自己和她已经联系在一起，并曾应允过她，然而今天他却真真切切地感到，不能和

她结婚。“可耻而又可恶，可恶而又可耻。”他对自己重复说，不单指他和米西的关系，也指一切事情。“一切都可恶而又可耻。”他走上自家门前的台阶时，又对自己重复说。

“晚饭不吃了，”他对跟着他走进餐厅的科尔涅伊说。餐厅里已经摆好餐具和茶。“您去吧。”

“是。”科尔涅伊说，但没有走，而是动手收拾餐桌上的东西。聂赫留朵夫看着科尔涅伊，觉得他令人讨厌。他希望所有的人让他安静一会儿，可是他觉得大家似乎有意跟他作对，偏偏缠住他不放。科尔涅伊拿着餐具走后，聂赫留朵夫刚要到茶炊那儿倒茶，突然听见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脚步声，他急忙走进客厅，随手关上门，免得看见她。这个房间——客厅——是三个月前他母亲去世的地方。现在，走进这个装有反光镜的两盏灯照亮的房间——其中一盏在他父亲的画像旁，另一盏在他母亲的画像旁，他想起了他同母亲最后一段时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他觉得是不自然的，令人厌恶的。这也是可耻而又可恶的。他想起来，在她患病的后期，他简直盼望着她死掉。他对自己说，盼望她死的目的是为了让她摆脱痛苦，而实际上他盼望她死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摆脱，不去看她痛苦的样子。

他想在自己心里唤起对她的美好回忆，看了一眼她的画像，那是花五千卢布请一位著名画家

画的。她在画像上穿着黑色天鹅绒连衣裙，裸露着胸脯。画家显然特别卖力地描绘了乳房、乳壕以及美得耀眼的肩膀和脖子。这简直太可耻而又可恶了。把母亲画成半裸的美女，这本身便带有某种极其恶劣和侮辱性的成分。尤为恶劣的是，三个月前这个女人恰恰躺在这个房间里，干瘪得如同一具木乃伊，而且还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不仅充满了整个房间，而且充满了整座房子，怎么也无法消除。他觉得似乎现在还能闻到那股气味。他又想起来，她在临死的前一天，用她那瘦骨嶙峋的发黑的手抓住他的结实而白净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别怪我，米佳，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的话，”随即她那双因痛苦失去神采的双眼里涌出了泪水。“多么可恶！”他看了一眼那有着大理石光泽的双肩和双臂、带着得意的笑容的半裸女人，又一次对自己说道。画像上裸露的胸脯令他想起了另一个年轻的女人，几天前他看见她也是这样袒胸露臂。她就是米西。她找借口让他晚上去她家，为的是向他展示她穿着舞服的样子，这件舞服是她赴舞会穿的。他带着厌恶的心情回忆起她漂亮的肩膀和手臂。还有那个粗鲁的、好色的父亲以及他过去的经历和残暴，还有名声可疑的爱说俏皮话的母亲。这一切都令人厌恶，同时又很可耻。可耻而又可恶，可恶而又可耻。

“不行，不行，”他想，“必须摆脱这一切，摆脱和科察金一家、和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和遗产、和其他的一切的虚伪关系……对，要去自由地呼吸。去国外——去罗马，画我的画……”他想起了他对自己才能的怀疑。“那也没关系，反正能自由呼吸就行。先去君士坦丁堡，再去罗马，只要能快点躲开陪审工作。还得把这个案子和律师谈好。”

于是，他的头脑中立刻异常清楚地浮现出那个乌黑的眼睛有些斜视的女犯人的身影。当被告们作最后一次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啊！他急忙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烟，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于是，他和她一起度过的时光一幕幕地在他的脑海中呈现出来。他想起他和她的最后一次相会，想起当时支配着他的肉欲，想起欲望满足之后的失望。他想起那束着天蓝色腰带的白连衣裙，想起那次晨课。“我是爱过她，那天夜里我真心地爱她，那是一种美好而纯洁的爱，我以前就爱她了，还有我第一次去姑姑家写论文的时候是多么爱她呀！”他回忆起自己当年的样子。他那时充满了朝气和青春活力，生活也很充实，于是他感到非常悲哀。

当年他的情况和现在相比，两者间的差别之大，比起教堂里的那个卡秋莎和今天上午受审的这个陪商人纵酒的妓女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有过

之而无不及。当年他是个生气勃勃的、自由的人，面前有着辉煌的前程——如今他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了愚蠢、空虚、无益、渺小的生活之网，看不到任何出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想寻找出路。他想起他曾以自己的率直而自豪，曾为自己立下永远讲真话的准则，并且真的很诚实，可如今他却完全生活在虚伪之中——一种可怕的虚伪，被他周围的人看作真实的那种虚伪。这种虚伪里面没有，或者至少他看不出有什么出路。他深深地陷在里面，习以为常，自得逍遥。



怎么处理和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的关系以及

和她丈夫的关系，才能在他和他的孩子们面前问心无愧？怎样才能毫不虚伪地了结和米西的关系？怎样解决他认为的土地私有制不合理和继承母亲的遗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怎样弥补对卡秋莎犯下的罪过？这事不能丢下不管。“我不能把我爱过的女人扔到一边，不能只满足于花钱请律师，帮她洗去不白之冤，不能用钱赎罪，不能像当年那样，以为给了她钱，该做的就全做了。”

于是他清楚地想起当时他在走廊里追上她，把钱一塞，就跑开的情景。“唉，那笔钱！”他像当年那样，带着恐惧和厌恶的心情回想起这一场面。“哎呀，呀！多么可恶啊！”他又像当年那样，出声地说。“只有恶棍、无赖才做得出这种事来！我，我就是这样的恶棍，这样的无赖！”他说出声来。“难道真的是，”他停住脚步，“难道我真的是，真的是无赖吗？不是无赖又是什么呢？”他回答自己说。“仅仅这一件事吗？”他继续揭露自己。“你和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的关系，和她丈夫的关系，难道不可恶，不下流吗？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借口钱是母亲遗留的，就享用你认为的不合理的财富。还有你的游手好闲的、丑恶的全部生活。而这一切的最高成就，就是你对卡秋莎的所作所为。恶棍，无赖！他们（人们）爱怎么指责我就指责好了，我可以欺骗他们，但我不能欺骗自己。”

于是他忽然明白了，近来他感到的对人们，尤其是眼下对公爵、公爵夫人，对米西，对科尔涅伊的厌恶，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厌恶。真是怪事一桩：这种自认卑鄙的心情当中，既有痛苦，也有快乐和欣慰。

聂赫留朵夫的生活中，不止一次有过他称之为“灵魂扫除”的事情发生。他所谓的灵魂扫除，指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在经过一大段时间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内心生活迟缓，有时甚至停滞，便着手清除堆集在灵魂中的所有可以造成这种停滞的污垢。

每次这样的醒悟之后，聂赫留朵夫总要为自己定下一些行为准则，并决心要遵循到底：记日记，开始新的生活，希望这种生活永远不会改变——他对自己说，这叫做翻开新的一页【20】。然而，每一次他都被尘世的诱惑所降伏，不知不觉地再次堕落，而且往往比以前陷得更深。

他这样自我清扫和振作精神，已经有过多次；第一次发生在他去姑姑家消夏的时候。这是一次最有生气、最为兴奋的醒悟。它的效力也持续得最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掉文职，担任军职，甘愿为国捐躯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醒悟。不过，他的灵魂中又很快积满了污垢。后来，他退役去国外学习绘画的时候，又有过一次这样的醒悟。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进行清扫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这样肮脏过，他良心所要求的生活与他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这样悬殊过，于是他看到这一差距，不由得心惊胆寒起来。

差距如此之大，肮脏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致在开始的时候，他对能否进行清扫，感到绝望。“你已经尝试过自我完善和更好地做人，可是毫无结果，”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呢？不光是你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的——生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嘛。”这个声音说。然而，一个自由的、精神的人，一个真实的、强大的、永恒精神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苏醒了。他不能不相信他。不论他实际的样子和他希望成为的样子之间的差距多么巨大，对一个已经苏醒的精神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也要打破束缚住我手脚的这种虚伪，我要承认一切，说真话，做实事，”他口气坚决地对自己出声说。“我要对米西说真话，告诉她我是个放荡的人，不能同她结婚，只是白白地打搅了她；告诉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首席陪审员的妻子）。不过，对她没什么好说的，那就告诉她丈夫，我是个无赖，欺骗了他，对遗产的处理也要合乎真理。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不起她，我要尽一切

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对，我要去见她，请求她宽恕我。对，我要请求她宽恕，像孩子求大人那样求她。”他停住脚步。“如果需要的话，就和她结婚。”

他站下来，像小时候那样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抬起眼睛仰望着上方，对什么人说：

“主啊，帮帮我，教教我吧，来到我心中吧，清除掉我身上所有的污垢吧！”

他祈祷，请求上帝帮助他，来到他心中，清除他身上的污垢，他的请求立即得到了满足。他心中原有过的上帝在他的意识里苏醒了。他感觉到自己就是他，因而不仅感觉到自由、勇气和生的快乐，而且也感觉到善的强大力量。凡是人所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情，他觉得如今他也能做到。

他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好的泪水和坏的泪水；好的泪水是为在他身上沉睡了这么多年的精神的人的苏醒而流出的眼泪，而坏的泪水则是自我怜爱和被自己的美德所感动的眼泪。

他觉得浑身发热。他走到一扇卸掉外窗的窗户跟前，打开窗子。窗外是花园。这是一个无风的、静谧的月夜，街上响起一阵车辆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沉寂。紧挨着窗户，有一棵光秃秃的高大杨树，树枝的影子纵横交错，清晰地洒落在

一块打扫干净的小空场上，左边是板棚的屋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白晃晃的。正前方，许多树的枝丫相互交织在一起，透过这些枝丫可以看到围墙的黑色影子。聂赫留朵夫望着被月光照亮的花园、屋顶和杨树的影子，呼吸着清冽的新鲜空气。

“太好啦！太好啦，我的上帝，太好啦！”他对自己心灵里的变化感叹道。

二十九

玛丝洛娃直到晚上六点钟，才回到牢房。她在石头路上不习惯地走了十五俄里路，十分疲惫，两脚疼痛，出乎意料的重判对她的打击很大，此外她还饿得不行。

还在第一次休庭的时候，法警在她旁边吃面包和煮鸡蛋，她嘴里就出现了口水，感到肚子饿了，但她认为向他们讨要，未免有失体统。此后又过了三个小时，她反倒不想吃东西了，只是觉得浑身无力。她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听到了她意料不到的判决。起初，她以为听错了，无法立即相信她听到的东西，更无法把自己同苦役犯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可是，当她看到法官和陪审员们脸上那副若无其事、一本正经的样子，显然把这一消息当作极其平常的事，她不觉大为气愤，

冲着整个法庭大叫无罪。可是，当她看到她的喊叫也被当作平常的、意料中的事，而且也不能改变局面时，她放声哭了起来，感到只好屈从强加在她头上的这一残酷的、令她惊讶的不公正判决。而尤其令她惊讶的是，对她作出这么残酷判决的竟是那些总那么亲热地打量她的年轻的、还不算老的男人。她看见，只有一个人——副检察官——的心情与别人不同。先前她坐在候审室里等候开庭的时候，以及后来休庭的时候，她看到这些男人们个个假装有什么事似的，在门口走来走去，或者干脆走进候审室，为的只是看上她几眼。谁知这些男人们却平白无故地判她服苦役，尽管她并没有犯被指控的那些罪。她哭了起来，而后又停止哭泣，呆呆地坐在候审室里，等着被押解回去。她现在只想一件事：吸烟。当博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宣判后被押进候审室时，她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博奇科娃见到玛丝洛娃开口就骂，叫她苦役犯。

“怎么样，你赢啦？没事儿啦？这回你多半逃不过去了，贱货。你这是罪有应得。当了苦役犯，你可就卖不成俏喽。”

玛丝洛娃双手插在囚袍的袖筒里，低着头坐着，眼睛盯着面前两步远处的踩得很脏的地板，仅仅说道：

“我没惹您，您也别招我。我可是没惹

您。”她一连重复了几遍，然后不再吭声了。直到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被押走，一个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她才多少有了点儿精神。

“你是玛丝洛娃？”他问。“拿着吧，是一位太太给你的。”他说着把钱递给她。

“哪个太太？”

“拿去就是了，还要我跟你聊天吗？”

这钱是妓院老鸨基塔耶娃送的。她离开法院的时候，问民事执行吏，能不能给玛丝洛娃一点钱。民事执行吏说，可以。于是在得到许可后，她从白胖的手上摘下带着三只纽扣的麂皮手套，从绸裙的后褶里掏出一个新式钱包，里面装着相当厚的一叠息票^[21]，是她从妓院收入的证券上刚刚剪下来的。她从中拿出一张两卢布五十戈比的息票，另外加上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交给了执行吏。他叫来一名法警，当着这位女施主的面，把钱递给法警。

“请您一定交给她。”基塔耶娃对法警说。

法警因为对他的这种不信任而感到愤怒，所以才那样生气地对待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见到钱很高兴，因为这钱可以满足她现在惟一想要的东西。

“要是弄支烟抽抽就好了。”她想，于是她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抽烟这一愿望上。她太想抽烟了，当办公室里的烟雾飘出门外，走廊上可以闻

到烟味的时候，她贪婪地用鼻子吸了起来。可是，她还得继续长时间等下去，因为负责派人押送她回去的书记官把被告们忘了，只顾和一名律师谈论一篇查禁的文章，甚至和他发生争论。几个年轻和年老的男人在审判结束后也不放过前来看她一眼的机会，在那儿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但她现在却无心理会他们。

四点钟过后，她终于被打发上路。押解人员——下诺夫戈罗德人和楚瓦卡什人——从后门把她带出法院。还在法院的门厅里，她就交给他们二十戈比，请他们给她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香烟。楚瓦卡什人接过钱说：

“好吧，我们会买的。”他真的买了香烟和面包，并把找头给了她。

路上不准抽烟，玛丝洛娃只得带着依旧没有满足的抽烟的欲望走回监狱。当她被押到大门口的时候，正巧从火车上押来一百多名男犯。她在过道里碰上了他们。

这些犯人——留着胡子的、刮掉胡子的、年老的、年轻的、俄罗斯族的、其他民族的、还有一些剃掉半边头发的，脚上的铁镣哗啷作响，把过道弄得全是尘土、脚步声、说话声和刺鼻的汗味。这些犯人走过玛丝洛娃的身旁时，贪婪地上下打量她，有几个人脸上淫相毕露，故意走到她跟前碰她的身体。

“嘿，这妞儿，真漂亮。”一个犯人说。

“小娘子，你好啊。”另一个犯人挤着眼睛说。

一个黑脸的犯人，后脑勺剃得发青，刮光的脸上留着小胡子，脚上拖着哗啷作响的铁镣，磕磕绊绊地跳到她跟前，一把搂住她。

“难道连老相好也不认得啦？别装蒜了！”当她把他推开时，他齜着牙，瞪着发亮的眼睛喊道。

“你这浑蛋，干什么？”从后面走过来的副监狱长喊道。

那个犯人身子一缩，急忙跳开。副监狱长又对玛丝洛娃训斥起来。

“你为什么在这儿？”

玛丝洛娃想说她刚从法院押回来，可是她太累了，懒得说话。

“是从法院里来，长官。”年纪大些的押解兵从人群后面走过来，把手举到帽檐上说。

“噢，那就把她交给看守长。简直是胡闹！”

“是，长官。”

“索科洛夫！接犯人。”副监狱长喊道。

看守长走过来，生气地用拳头打了玛丝洛娃的肩膀一下，又冲她点下头，把她带到女监的走廊上。在那里她全身上下被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到什么东西（那包香烟塞在了面包里），又被关

进她早晨出来的那间牢房里。

三十

关押玛丝洛娃的牢房是个长方形的房间，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扇窗子，靠墙是一座突出的灰泥剥落的炉子，还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床，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方。门对面的墙中央，挂着一个发黑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枝蜡烛，下面吊着一束落满灰尘的蜡菊。门的左边有一处地板颜色黑暗，上面放着一只臭烘烘的木桶。刚刚点过名，女犯们已被锁在牢房里准备睡觉。

这间牢房里一共关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天色还很亮，只有两个女人躺在板床上：一个用囚袍蒙住头的，是因为没有身份证被捕的傻子，几乎总是躺着睡觉；另一个是肺癆病人，因盗窃罪在此服刑。这个女人没有睡，而是躺在那儿，头下枕着囚袍，两眼大睁着，强忍住咳嗽，压下一口涌上喉咙、痒得难受的黏痰。其他的犯人没戴头巾，披散着头发，只穿一件粗布衬衣，有的坐在床上缝东西，有的站在窗前看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三个缝东西的女犯当中，有一个就是早晨送玛丝洛娃的那个老太婆科拉布列娃。这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满脸忧郁，眉头紧锁，皱

纹很多，下巴底下的肉皮松弛，像是挂着一个口袋，淡褐色的头发编成短小的辫子，两鬓已经花白，腮上有一颗长着毛的疣子。这个老太婆因用斧子砍死丈夫而被判刑。她杀死他，是因为他对她的女儿纠缠不休。她是这间牢房里的头头，而且还贩卖私酒。她戴着眼镜缝东西，那双干惯活的大手像农妇们那样拿着针，用三个手指头捏着，针尖对着自己。她旁边坐着一个样子温和、喜欢唠叨的女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鼻子往上翘着，眼睛又小又黑，也在用帆布缝口袋。她是铁路看守人的妻子，被判处三个月的监禁，因为她没有出来举着旗子接火车，火车恰巧出了事儿。第三个缝东西的女人叫费多西娅——同伴们叫她费尼奇卡，是个极为年轻的可爱女人，皮肤白皙，面颊绯红，长着一双孩子般清亮的蓝眼睛，两条淡褐色的长辫子盘在不大的头上。她因下毒杀夫未遂罪而被关押。她被嫁出门时，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婚后立即试图毒死丈夫。在她保释出狱，听候审讯的八个月里，她不仅同丈夫和好，而且爱上了他，等到法院开庭时，她和丈夫已经好得如胶似漆了。尽管丈夫和公公，尤其是喜欢上她的婆婆，在法庭上竭尽全力为她辩解，她还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工。这个善良、快活、爱笑的费多西娅是玛丝洛娃的邻床，她不仅喜欢上了玛丝洛娃，而且认为自己有义务

关心她，为她做事。另外两个女人坐在床上闲着没事儿，一个四十岁左右，面色苍白消瘦，从前想必很漂亮，如今却变得消瘦而苍白。她手里抱着个孩子，露出又白又长的乳房给他喂奶。她犯的罪行是这样的，从他们村里带走一名新兵，农民们认为是非法抓人，大家拦住警察分局局长，把新兵夺了下来。这个女人是非法被抓的小伙子的姑妈，她第一个抓住新兵骑的马的缰绳。另一个坐在床上闲着没事儿的，是一个身材不高、满脸皱纹、相貌和善的老太婆，头发已经斑白，背也驼了。这个老太婆坐在紧挨着炉子的床上，做出样子要捉一个从她旁边嘻嘻笑着跑过去的短头发、大肚子的四岁男孩。男孩只穿一件小衬衫，在她旁边跑来跑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嘿，抓不到我！”这个老太婆和儿子一起被控犯有纵火罪，她对坐牢满不在乎，只是为同时入狱的儿子担心，但她更担心的还是她的老头儿，她害怕她不在家老头儿会长一身虱子，因为儿媳妇跑掉了，没人给他洗澡。

除了这七个女人之外，还有四个女人站在打开的窗户前，抓着铁栅栏，用手势和喊叫同走过院子的男犯，也就是卡秋莎刚才在大门口碰见的那些男犯搭话。这几个女人当中，有一个因盗窃罪在服刑的女人，生得高大笨重，浑身的肉直往下坠，头发火红，白里泛黄的脸、手和从敞开的

衣领里露出的粗脖子上长满了雀斑。她用嘶哑的嗓音对着窗外大声喊着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她旁边站着一个高矮跟十岁的女孩差不多的女犯，肤色黝黑，身材极不匀称，上身很长，两腿却十分短小。她的脸色发红，布满斑点，两只黑眼睛相距很远，嘴唇又厚又短，遮盖不住往前突出的白牙。她看着院子发生的事情，不时发出尖细的笑声。这个女犯因为爱穿衣打扮，大家叫她霍罗莎芙卡【22】，她是因偷窃和纵火罪而被判罪的。在她们两人的后边，站着一个因窝藏赃物而被判罪的大肚子孕妇，穿着一件非常肮脏的灰色衬衣，骨瘦如柴的样子，十分可怜。这个女人沉默不语，但对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却一直报以赞许和谄媚的微笑。站在窗前的第四个女犯因贩卖私酒而服刑，是一个身材矮壮的乡下女人，眼睛暴凸，面相倒还和善。这个女人是和老太婆玩耍的那个男孩的母亲，她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因为没人照看，也跟她一起坐牢。她和其他的女犯一样，也朝窗外看，但手里却不停地织着袜子，而且对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们说的话，不赞同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她的女儿，披散着浅色头发的七岁女孩，穿着一件小衬衫，站在头发火红的那个女人身旁，瘦瘦的小手抓着她的裙子，眼珠一动也不动地用心听着男女囚犯们的对骂，嘴里小声重复着，仿佛要记熟似的。第十二个女犯是教

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自己的私生子扔到井里淹死了。这是一个身材修长、体态优美的姑娘，不长的浅褐色粗辫子里散落出许多零乱的头发，暴凸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她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穿着肮脏的灰色衬衣，光着双脚在牢房的空地上走来走去，每次走到墙跟前，转身的动作迅速而又突然。

三十一

当铁锁哐当一响，玛丝洛娃被带进牢房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朝她转过身来。甚至连诵经士的女儿也一下停住脚步，扬起眉毛，瞧了瞧进来的人，但她什么也没说，立即迈着坚定的大步又走了起来。科拉布列娃把针插在粗麻布上，从眼镜上方疑问地注视着玛丝洛娃。

“哎呀呀！回来啦。我还以为你会无罪释放呢。”她用沙哑低沉的、几乎像男人一样的嗓门说。“看样子，他们要流放你啦。”

她摘下眼镜，把活计放在身边的板床上。

“好闺女，我和大婶刚才还说，没准儿会一下子就放了呢。我们说，这是常有的事儿。还会给点儿钱呢，那就得碰运气啦，”铁路看守人的妻子立刻用唱歌一般的声音说起来。“唉，真没想到。看样子，我们是猜错了。好闺女，看样子

这是上帝安排的呀，”她不停嘴地说了一套亲切而动听的话。

“真的判刑了吗？”费多西娅一边问，一边用孩子般清亮的蓝眼睛同情而温柔地望着玛丝洛娃，她那快活而年轻的脸整个变了样，仿佛要哭出来似的。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有回答，默默地走向靠边第二张、紧挨着科拉布列娃的自己的床位，在床板上坐了下来。

“我想，你还没吃东西吧。”费多西娅说完，站起来，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上，开始脱衣服：脱下满是灰尘的囚袍，解下髻曲的黑发上的头巾，又坐了下来。

在床铺另一头和男孩玩耍的老太婆也走过来，站在玛丝洛娃的对面。

“啧啧，啧啧！”她边怜悯地摇着头，边喷着舌头。

男孩也跟着老太婆走过来，睁大眼睛，上嘴唇撅得老高，紧紧盯着玛丝洛娃带来的面包。经历了今天的遭遇之后，玛丝洛娃看见这一张张同情的脸，禁不住想哭一场，她的嘴唇开始颤动。但她竭力忍着，在老太婆和小男孩走过来之前，一直忍着没哭。等到她听见老太婆那善意的、充满同情的啧啧声，特别是看见小男孩把严肃的目

光从面包移到她身上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她的脸整个颤动起来，放声痛哭。

“我说过，得找一个有真本事的律师。”科拉布列娃说。“怎么，判你流放吗？”她问。

玛丝洛娃想回答，可又说不出话来，只是哭着从面包里掏出那包香烟，烟盒上画着一个梳着高耸的发型、袒露着一块三角形胸脯、脸蛋红扑扑的女人。她把烟递给科拉布列娃。科拉布列娃看了一眼上面的画，不赞成地摇了摇头，主要是不赞成玛丝洛娃这样乱花钱。她取出一支烟，对着灯点着，自己吸了一口，然后塞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没有停止哭泣，贪婪地一口接一口地把烟吸进去，又吐出来。

“服苦役。”她哽咽着说。

“他们就不怕上帝吗，恶霸，可恶的吸血鬼。”科拉布列娃说。“无缘无故地判了人家姑娘的罪。”

这时候，还在窗前的那些女人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小女孩也笑了，她那尖细的童音同三个女人沙哑刺耳的笑声合在一起。院子里一个男犯冲她们做了个什么动作，惹得窗前的这几名观众大笑起来。

“呸，这个剃了毛的公狗！耍什么把戏。”头发火红的女人说，摇晃着肥胖的身体，脸紧紧贴在铁栅栏上，嘴里叫嚷着不三不四的话。

“这个母夜叉！有什么好笑的！”科拉布列娃冲着头发火红的女人摇着头说。然后又转向玛丝洛娃：“判了好几年吗？”

“四年。”玛丝洛娃说，眼泪一下涌了出来，有一滴泪水落在了香烟上。

玛丝洛娃生气地把烟揉成一团，扔到一边，又拿起了第二支。

铁路看守人的妻子虽然不吸烟，却立即捡起烟头，把它捋直，嘴里仍说个不停。

“好闺女，看来真是的，”她说，“真理让骗猪给吃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科拉布列娃大婶说：会放了你的，我说呢，不会放的，我说闺女呀，我这心里可感觉出来啦，他们准会折磨你的，结果没错吧。”她说，满意地听着自己说话的声音。

这时，男犯们已全从院子里走了过去，那几个和他们搭话的女人离开窗子，也走到玛丝洛娃跟前。第一个走过来的是领着女儿的鼓眼睛的私酒贩子。

“怎么判得这么重呀？”她问，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继续飞快地织着袜子。

“判得这么重，那是因为没有钱。要是有钱的话，请个有本事的人，恐怕就无罪释放啦，”科拉布列娃说。“那个人，他叫什么来着，头发又乱又长，鼻子老大个儿——那个人，我的

好太太，他能从水里捞出干东西来。要是请他就好了。”

“怎么请呀，”霍罗莎芙卡坐到她们旁边，齙着牙说，“那个人少了一千卢布才不理你呢。”

“是啊，看来你就是这个苦命，”犯纵火罪的老太婆插嘴说。“我容易么：人家把我的儿媳妇夺去了，儿子还被关进来喂虱子，我都一把年纪了也被关进来，”她又讲起说过百遍的遭遇。“不是坐牢，就是要饭，看来这是谁都躲不过去的。不去要饭，那就得坐牢。”

“他们多半都是一路货色，”贩私酒的女人说完，看了看小女孩的脑袋，把袜子放在身旁，拉过女孩夹在两腿当中，手指麻利地在她脑袋上找了起来。““为什么卖私酒？”“不卖拿什么养活孩子？””她一边说，一边继续做着她干惯了的事儿。

私酒贩子的话让玛丝洛娃想到了酒。

“最好来点儿酒。”她对科拉布列娃说，用衬衣袖擦去眼泪，只是偶尔还抽噎两声。

“要喝酒？行啊，喝吧。”科拉布列娃说。

三十二

玛丝洛娃从面包里掏出钱，把一张息票递给科拉布列娃。科拉布列娃接过息票，看了看，她

虽然不识字，却相信什么都知道的霍罗莎芙卡的话，这张息票值两卢布五十戈比，于是爬到通风口，去拿藏在那儿的一瓶酒。女犯们——玛丝洛娃的邻床除外——看到这一情况，纷纷回到自己的床位上。玛丝洛娃这时抖了抖头巾和囚袍上的灰尘，爬到床上，吃起面包来。

“我给你留着茶呢，没准儿都凉了。”费多西娅说，从墙上的搁架上取下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茶壶和茶杯。

茶水完全凉了，而且白铁味比茶味更重，但玛丝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吃那面包。

“费纳什卡，给。”她叫了一声，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盯着她嘴看的男孩。

科拉布列娃这时把那瓶酒和一个杯子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请科拉布列娃和霍罗莎芙卡一起喝。这三个女犯是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而且有什么东西都共享用。

几分钟过后，玛丝洛娃变得活跃了，绘声绘色地讲起法庭上的情况，滑稽地模仿副检察官的样子，还讲起法庭上最令她吃惊的事。她说，法庭上所有的人显然都喜欢看她，为此还特意屡次三番地到候审室来走走。

“连押解兵都说：‘这是来看你的。’走进来一个人，说找什么文件或是什么东西，可我看得出来，他不是找文件，而是想用眼睛把我吃

掉。”她说，笑了笑，仿佛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都是些会演戏的家伙。”

“就是这么回事儿。”铁路看守人的妻子附和着说，于是她那唱歌般的声音立即滔滔不绝地响了起来。“这就像苍蝇见了糖。干别的事他们不行，可是干这种事他们来劲儿着呢。他们这帮男人不给饭吃都行……”

“在这儿也一样，”玛丝洛娃打断她。“在这儿我也碰上了这种事。我刚被押回来，正巧有一群人也从火车站押来。他们死乞白赖地缠着我，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脱身才好。多亏副监狱长把他们赶走了。有一个人死缠着我不放，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挣脱开。”

“那人长得什么样？”霍罗莎芙卡问。

“黑黑的，留着小胡子。”

“肯定是他。”

“他是谁？”

“谢格洛夫。就是刚刚走过去的那个人。”

“这个谢格洛夫是什么人？”

“连谢格洛夫都不知道！谢格洛夫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跑过两次。现在又被抓回来了，他还会跑的。连看守们都怕他呢。”霍罗莎芙卡说，她常给男犯们传递纸条，因此对监狱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肯定是会逃走的。”

“是会逃走的，就是不把我们带上，”科拉布

列娃说。“你最好还是讲一讲，”她转向玛丝洛娃，“上诉的事律师跟你说了些什么，是不是马上就要上诉？”

玛丝洛娃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头发火红的女人把两只生满雀斑的手插进又乱又密的火红头发里，用指甲搔着脑袋，走到正在喝酒的贵族前面。

“卡秋莎，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她说了起来。“头一件事，你得写个呈子：对判决不满意，然后交给副检察官。”

“有你什么事？”科拉布列娃用生气的低嗓门对她说。“你闻到酒味了，是不是——用不着你多嘴。你不说，人家也知道怎么办，不用你操心。”

“又没跟你说话，你管不着。”

“馋酒了是不是？想喝就直说。”

“好啦，给她点儿吧。”玛丝洛娃说，她有东西一向喜欢分给大家。

“我给她点儿厉害尝尝……”

“嘿，来吧！”头发火红的女人说着，朝科拉布列娃靠过去。“我才不怕你呢。”

“你这罪犯！”

“你才是呢！”

“骚货！”

“我是骚货？你是苦役犯，杀人犯！”头发火

红的女人大声叫嚷起来。

“走开，说你呢。”科拉布列娃阴沉着脸说。

可是头发火红的女人却越靠越近，科拉布列娃朝她那袒露着的胖胸脯推了一把。头发火红的女人好像就等她这一下似的，突然一只手飞快地揪住科拉布列娃的头发，另一只手想给她一个耳光，但被科拉布列娃抓住了。玛丝洛娃和霍罗莎芙卡拉住头发火红的女人的手，竭力要把她拽开，可是她的手揪着科拉布列娃的辫子不放。她极快地把头发松了一下，以便把头发缠到拳头上。科拉布列娃歪斜着脑袋，一只手捶打她的身体，同时用牙齿咬她的胳膊。女人们围着两个打架的人，又劝又叫。甚至那个得肺病的女人也走过来，一边咳嗽，一边观看两个扭打在一起的女人。孩子们相互紧靠着，吓得直哭。女看守听见吵闹声，和一名男看守走进来。两个打架的女人被拉开了。科拉布列娃解开灰白色的辫子，把被揪下的几绺头发择了出来，而那个头发火红的女人用手按住黄胸脯上撕碎的衬衫——两人叫喊着解释原因和诉说委屈。

“我全知道，都是酒闹的；我明天就告诉监狱长，他会收拾你们的。我闻到了——有酒味，”女看守说。“老实点儿，把东西收起来，要不没你们的好处——没功夫给你们评理。回到自己床上，保持安静。”

可是，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安静下来。两个女人还在不停地对骂，都说是对方先起的头，是对方的不是。最后，男女看守走了，这两个女人才慢慢静下来，准备睡觉。老太婆到圣像前去做祷告。

“俩苦役犯跑一块来了。”头发火红的女人突然从床位的另一头用沙哑的嗓子说，话语之间夹杂着稀奇古怪的脏字儿。

“小心别找不自在。”科拉布列娃立即回敬一句，同时也带上毫不逊色的脏字儿。于是，两人都都不做声了。

“要不是拦着我的话，我早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啦……”头发火红的女人又开口了，科拉布列娃马上又不甘示弱地给予回敬。

接下来是一段较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又是对骂。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完全安静下来。

大家都躺下了，有些人已发出鼾声，只有一向喜欢长时间祷告的老太婆依旧在圣像前深深地鞠躬，还有诵经士的女儿，女看守刚一离开，就从床上下来，又在牢房里走来走去。

玛丝洛娃也没有睡，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她是个苦役犯——已经有人两次这样称呼她：一次是博奇科娃，另一次是头发火红的女人——她一时还难以适应这种称呼。科拉布列娃本来背对着她躺着，这时翻过身来。

“我怎么也想不到，”玛丝洛娃小声说。“人家干了坏事——一点儿事也没有，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倒要受罪。”

“别难过，姑娘。西伯利亚照样有人活着。你到那儿不会没有活路的。”科拉布列娃安慰她。

“我知道，不会没有活路，可这也太气人啦。我的命不该这么苦啊，我都过惯好日子啦。”

“听天由命吧，”科拉布列娃叹着气说，“人是拗不过天命的。”

“我知道，大婶儿，可我心里难受呀。”
她们有一阵子不说话了。

“你听见了吗？是那个骚货。”科拉布列娃说，要玛丝洛娃注意床那头传来的奇怪的声音。

这声音是头发火红的女人压低的哭声。她哭她刚才挨了骂，挨了打，她那么想喝酒，却不让她喝。她还哭她这一辈子除了遭人打骂、嘲笑、侮辱以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她想寻求一点安慰，回忆起自己对工人费吉卡的初恋，可是一想起这次初恋，她又想起它结束时的情形。它是这样结束的：那个费吉卡喝醉了酒，为了取乐，拿白矾抹在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接着和同伴们看着她疼得浑身抽搐，高兴得哈哈大笑。她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十分可怜，于是哭了起来，以为

别人不会听到。她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地哭，一边吸溜鼻子，一边吞咽苦咸的泪水。

“她够可怜的。”玛丝洛娃说。

“是够可怜的，可别招人讨厌呀。”

三十三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件什么事，甚至在他还没有想起是什么事之前，他已经知道这是一件重要的，同时也是一件不坏的事。“卡秋莎，法庭。”是的，不能再说谎了，要讲真话。说来真是巧得惊人，今天早晨首席贵族的夫人玛丽娅的信，也就是他盼望已久的那封信，终于来了，这封信现在对他特别重要。她给了他充分的自由，并祝愿他在今后的婚姻中幸福美满。

“婚姻！”他嘲讽地说，“我现在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意思！”

他想起自己昨天打算把一切都告诉她丈夫，向他诚恳悔过，并准备作出一切可能的补偿。可是，今天早上他感到事情并不像昨天想的那样轻松。“既然他不知道，又何必让他变成一个不幸的人呢？如果他问起来，那好，我就告诉他。可是，怎么能故意去告诉他呢？不，这没有必要。”

今天早上，他还感到对米西实话实说，同样不容易。这怎么能讲出口呢——它会被当作一种侮辱。这事就像世上有的事一样，只可暗示，不便明说。有一点他今天早上是决定了的：不去他们家，如果他们问起来，就实话实说。

不过，在对卡秋莎的关系上，却没有什么不便明说的。

“我要去监狱告诉她，请她原谅我。如果有必要，是的，如果有必要，就和她结婚。”他想着。

这一为了道德上的满足而不顾一切同她结婚的想法，今天早晨特别令他感动。

他好久没有这样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一天了。他以自己也没有料到的坚决态度立即对走进来的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宣布，他不再需要这套住房和她的服侍了。他们之间曾有过默契，他租用这套宽敞昂贵住房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婚。因而退房便有着特殊的含义。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惊讶地看了看他。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非常感谢您对我的种种照顾，可是我现在不需要这么大的住房和任何仆人了。如果您还愿意帮助我，那就请您费心清理一下东西，暂时把它们收起来，就像妈妈在世时常做的那样。娜塔莎来了，她会处理的。”（娜塔莎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摇了摇头。

“怎么清理呀？这都是要用的呀。”她说。

“不，不用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用不着啦，”聂赫留朵夫针对她摇头所表示的意思，回答说，“请告诉科尔涅伊，我多付他两个月的工钱，以后就不用他了。”

“您不必这么做，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她说，“就算您要到国外去，住处也还是要有的。”

“您想错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我不去国外：要去的话，也是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突然脸红了起来。

“是的，应该告诉她，”他想，“没什么好隐瞒的，应该把这一切告诉所有的人。”

“昨天我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大事。您还记得玛丽娅姑姑家的卡秋莎吗？”

“当然记得啦，我还教过她做针线活儿呢。”

“唉，昨天法庭上审的就是这个卡秋莎，我正好担任陪审员。”

“哎呀，我的上帝，多可怜呀！”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说，“判她什么罪？”

“杀人罪，这一切都是我惹出来的。”

“怎么能是您惹出来的呢？您说这话太奇怪啦。”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说，她那双老眼里闪烁着调笑的火星。

她知道卡秋莎的那件事。

“是的，我是这一切的祸首。这事改变了我的所有计划。”

“这事怎么能让您有什么变化呢？”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忍住笑，说。

“那是因为我害得她走上了这条路，我就应该尽我的力量帮助她。”

“这是您的一片好心，不过您在这上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这种事大家都有的，要是理智一点儿，这一切都会变得淡漠，都会忘掉的，日子还不是照样过，”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严肃认真地说，“您用不着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我以前就听说她走上了邪路，那这又是谁的错呢？”

“是我的错儿。所以我想去补救。”

“算啦，这是很难补救的。”

“这是我的事。要是您担心自己的话，妈妈在世时希望……”

“我倒没有担心自己什么。老夫人对我恩深义重，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愿望。丽莎一直在叫我（丽莎是她已出嫁的侄女），等不需要我了，我就去她那儿。只是您不必把这事放在心上，大家都有这种事的。”

“不，我可不这么想。我还是请您帮我把房子退掉，把东西收拾一下。请别生我的气。我非常，非常感激您为我做的一切。”

真是怪事：自从聂赫留朵夫认识到自己卑鄙并且憎恨自己，他已不再憎恨别人；相反，他觉得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和科尔涅伊既可亲又可敬。他想在科尔涅伊面前忏悔自己的罪过，可是科尔涅伊恭敬的神情中带有几分威严，他只得作罢。

聂赫留朵夫去法院的路上，走的还是那些街道，坐的还是那辆马车，但他惊讶地感到，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

和米西结婚一事，昨天在他看来还是那么称心如意，现在他却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昨天他还十分自负，以为米西嫁给他无疑将会幸福；现在他却感到自己不仅不配同她结婚，而且也不配同她亲近。“如果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那她决不会同我来往的。我还责备她不该向那位先生卖弄风情呢。啊，不行，就算她现在嫁给我，可是我知道那个女人关在本地的监狱里，明天或后天就会被押去服苦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我不会幸福，而且良心也会不安的。那个被我毁了的女人就要去服苦役，而我却要在这儿接受人家的祝贺，还要带着年轻的妻子出门拜客。或者同首席贵族，也就是被我和他妻子无耻欺骗的那个人，一起在会议上统计赞成和反对地方自治会监督学校决议的票数等等，会后再去同他的妻子幽会（多么卑鄙呀！）；或者继续画那幅显然永远

也完不成的画，因为我根本就不应该去做这种蠢事，现在更不能去做这种事了。”他对自己说，由于感觉到内心发生变化而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

“首先去见律师。”他想，“听听他的意见，然后……然后去监狱看她，看昨天那个女犯，把一切全都告诉她。”

他刚一想像他怎样同她见面，怎样向她倾诉一切，怎样向她悔过，怎样告诉她，为了赎罪，他什么都可以做，可以和她结婚——一种特别兴奋的情感便充满了他的身心，泪水慢慢地涌上了他的眼睛。

三十四

聂赫留朵夫来到法院，在走廊里碰见昨天那个民事执行吏，向他打听已判决的犯人关在什么地方，要见他们须经什么人批准。民事执行吏告诉他，犯人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正式公布判决之前，会见犯人须经检察官批准。

“等审讯结束后，我来告诉您，陪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来。等审讯结束吧。现在请您到法庭上去吧。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谢过这个今天让他感到特别可怜的执行吏，向陪审员议事室走去。

他刚走近这个房间，陪审员们恰好从里面出来，准备上法庭。商人还像昨天一样快活、一样吃饱喝足，他见到聂赫留朵夫，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热。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不拘礼节和哈哈大笑，今天也没有引起聂赫留朵夫的反感。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他同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告诉所有的陪审员。“说真的，”他想，“昨天审判的时候我应当站起来，当众宣布自己的罪过。”可是，等他和陪审员们一起走进法庭，昨天那套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啰”，又是三位衣领绣花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肃静，陪审员在高背椅上就座，宪兵，沙皇像，司祭——这时他感到，即便他应该那样做，昨天他也不能破坏这种庄严的气氛。

开审前的准备工作也同昨天一样（只是免掉了陪审员的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讲话）。

今天审理的是一桩撬锁盗窃案。在两名手持鞘军刀保护下的被告，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身材瘦削，两肩很窄，脸色灰白，没有血色，穿着一件灰色囚袍。他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皱着眉头打量进来的每个人。这个小伙子被控和一个同伙撬开板棚的锁，从里面偷走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旧长条地毯。起诉书上说，警察在路上拦住他和扛着地毯的同伙。小伙子和同伙马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两人被关入监狱。那

个同伙是个钳工，已在狱中死掉，所以受审的只有小伙子一个人。几块旧条毯放在物证桌上。

审讯的过程和昨天完全相同，证据，罪证，证人，证人宣誓，审问，鉴定人，交叉讯问，一项不少。作为证人的警察在回答庭长、公诉人、律师的问题时，总是干巴巴的几个词语：“是，大人。”“不知道。”——接着又是“是……”不过，尽管他身上有当兵人的那种傻头傻脑和呆板机械的特点，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可怜那个小伙子，很不情愿地讲了他抓人的经过。

另一个证人是受害的房主，旧条毯的拥有者，显然是个肝火旺盛的小老头儿。当问起他是否承认条毯是他的时，他不情愿地承认是他的；当副检察官盘问他打算拿这些条毯做什么用时，他是否很需要这些东西，他生气了，回答说：

“这些破地毯，去它的吧，我根本就用不着。要是早知道惹出这么多麻烦，不要说我，就是倒贴一张红票子，要不两张红票子我也愿意，只要不拉我来受审。我坐马车就花了五个多卢布。再说我身体又不好。我有疝气，还有风湿病。”

证人们是这么说的，被告本人也全部招认了，并且像一只被擒获的小野兽似的，茫然地四下张望着，断断续续地讲了事情的经过。

案情已经清清楚楚，可是副检察官仍像昨天

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了一些微妙的问题，定要使狡猾的罪犯露出马脚。

他在发言中证明，盗窃是在住人的房屋里发生的，而且是撬锁行窃，因而小伙子应当受到最重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却证明，盗窃不是在住人的房屋里发生的，因此罪行虽然无可否认，但罪犯并不像副检察官所说的那样，对社会构成重大危害。

庭长还像昨天那样装成一副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样子，向陪审员们详细解释和说明他们已经知道、而且不能不知道的一些问题。还像昨天那样，中间有几次休庭，大家还像昨天那样吸烟；民事执行吏还是那样高喊“开庭啰”，两名宪兵还是那样克制着睡意，手拿出鞘的军刀坐在那儿，威吓犯人。

从审讯中可以得知，这个小伙子曾被他父亲送到一家卷烟厂做学徒，并在那里干了五年。今年厂主和工人们发生了纠纷，他被厂主解雇，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在城里闲逛，把仅有的一点儿钱拿去换了酒。他在小酒馆里遇见了那个比他失业更早、喝酒更凶的钳工，于是一天夜里，两人喝醉酒，撬开锁，随便拿了东西就走。他们被抓住了。他们全都招认了。他们被关进监狱，那个钳工在候审期间死了。这个小伙子现在作为必须

同社会隔绝的危险分子受到审讯。

“这个危险分子，同昨天那个女犯的遭遇是一样的。”聂赫留朵夫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心里想。“他们是危险分子，我们就不危险吗？”

……我就是个放荡子、好色之徒、骗子，所有我们这些人，那些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但不鄙视我，反而尊敬我，我们这些人就不危险吗？就算这个小伙子是法庭上在座的所有人对社会最危险的人，那么按常理说，当他被抓住后，应当怎么办呢？

“这很明显，这个小伙子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坏蛋，而是一个最普通的——这点大家都已看到——人，他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他处在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想不再出现小伙子这样的人，需要尽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我们又是在干什么呢？我们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逍遥法外，却只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在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把他送进监狱，让他处在终日无所事事或者有害身体和毫无意义的劳动条件之下，让他结交那些和他一样在生活中没有出路和迷失方向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同那些最堕落的人一起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

“我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灭产生

这种人的环境，反而鼓励制造这种人的那些机构。这些机构是人所尽知的：这就是工厂、工场、作坊、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但消灭这类机构，而且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加以鼓励和调整。

“我们照这个样子培养出来的人不是一个而是数百万个，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么一个，于是就自以为办了件大事，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已把他从莫斯科省押往伊尔库茨克省了。”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各种腔调，看着他们自信的样子，心里异常激动和清醒地想。“这样装模作样要花费多少精力呀。”

聂赫留朵夫继续想，一面打量着这个大厅、这些画像、灯光、椅子、军服、厚墙和窗户，一面想到这座建筑物的庞大和更加庞大的政治制度，想到不仅在这里，而且在整个俄国到处都是由官吏、文书、看守、差役组成的大军，因表演这种谁也不需要闹剧而领取薪金。“假如我们把这种劲头的百分之一用来帮助那些无人过问的人，那些现在被我们仅仅看作保证我们安适生活必不可少的劳动着的人们，那情况准会是另一种样子。当初他因为家里贫困被从乡下送到城市里来的时候，”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那充满病态和惊恐的脸，想，“要是有人可怜他，拉他一

把就好了；或者他已进了城，在工厂里做完十二个小时的活儿之后，被年龄大些的伙伴拉去小酒馆的时候，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瓦尼亚，那可不好。’——小伙子就不会去了，就不会晕头转向，也就什么坏事也不会做了。

“可是，当他在城里过着野兽般的学徒生活，为了不生虱子剃光了头，替师傅们跑前跑后买东西的那段时间里，并没有一个人可怜过他；恰恰相反，自从他进城以来，他从师傅和伙伴们那里听到的全是谁能骗人，谁能喝酒，谁能骂人，谁能打架，谁能搞女人，谁就是好汉。

“等到有害健康的工作、酗酒、放荡损坏了他的身体，伤害了他的心灵，等到他像在梦里一样，昏头昏脑，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闲逛，一时糊涂溜进人家的板棚，从里面偷走谁也不要的条毯，我们这些衣食富足、有钱又有文化的人，不仅不去想办法消除导致小伙子落到他目前这种地步的原因，反而想以惩罚这个小伙子来纠正他的过错。

“太可怕啦！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残酷还是荒谬，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好像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聂赫留朵夫的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着这些问题，已经无心听眼前的审讯。这些问题让他吃惊不小。他感到惊讶的是，自己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这一切，别人怎么也没有发现呢。

三十五

当法庭刚一宣布休庭，聂赫留朵夫便站起身，走到走廊里，打算不再回法庭了。爱拿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他决不继续参与这种可怕而可耻的勾当了。

聂赫留朵夫打听清楚检察官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前去找他。听差不肯放他进去，说检察官现在正忙。可是，聂赫留朵夫不听他那套，走进房门，对迎上来的一位官员说，请他向检察官通报一下，他是陪审员，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见检察官。公爵的头衔和讲究的衣着帮了聂赫留朵夫的忙。那个官员通报了检察官，于是让聂赫留朵夫进去。检察官站着接待他，显然对聂赫留朵夫执意要见他感到不满。

“您有什么事？”检察官严厉地问。

“我是陪审员，姓聂赫留朵夫，我要见被告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迅速而坚决地说，脸红了起来，心里感到他正在做一件将对他的生活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事情。

检察官个子不高，面色黝黑，变白的头发剪得很短，灵活的眼睛闪闪发亮，突出的下巴上是经过修理的浓密的胡子。

“玛丝洛娃？当然，我知道。她被控犯有投毒杀人罪，”检察官不慌不忙地说。“您到底为什么要见她？”然后，仿佛想缓和一下口气似的，又补充说：“要是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想见她，我是不会批准您的要求的。”

“我要见她，是因为我有一件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事。”聂赫留朵夫面红耳赤地说。

“是这样。”检察官说完，抬起眼睛，仔细地瞧着聂赫留朵夫。“她的案子审了没有？”

“昨天她受过审，被极为不公正地判了四年苦役。她是无罪的。”

“是这样。如果她昨天才被判刑，”检察官说，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玛丝洛娃无罪的话丝毫不加理睬，“那么在正式公布判决之前，她还应该关押在拘留所里。那边只有在规定的日期才准许探视。我建议您去那儿问问。”

“可我要尽快见到她。”聂赫留朵夫下颌颤抖地说，感到关键时刻已经来临。

“您究竟因为什么要见她呢？”检察官有些不安地扬起眉毛问。

“因为她无罪，却被判处去服苦役。造成这一切的罪人就是我。”聂赫留朵夫声音颤抖地说，同时感到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检察官问。

“因为是我勾引了她，才害得她落到眼下这

种地步。假如不是我把她害成这个样子，她也不会受到这种指控。”

“我还是看不出，这和探监有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我想跟着她走，而且……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他一讲起这事，又像往常那样，泪水涌上了眼睛。

“是吗？原来是这样啊！”检察官说。“这真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您好像是克拉斯诺佩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吧？”检察官问，仿佛记起他以前听说过眼前这位宣布如此奇怪决定的聂赫留朵夫的名字。

“对不起，我以为这和我要求没有关系。”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气愤地回答。

“当然没有关系，”检察官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毫不在意地说，“不过您的愿望非常离奇，超出常规……”

“那又怎么样，我能不能得到许可？”

“许可吗？好吧，我马上给您开一张许可证。请稍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旁，坐下写起来。

“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站着没动。

检察官写完许可证，把它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还要声明，”聂赫留朵夫说，“我不能继续

参加审讯了。”

“这您知道，需要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

“理由就是我认为所有的审判不仅无益，而且也不道德。”

“是这样，”检察官说，脸上依旧带着那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明，这类声明他并不陌生，是一种他早就知道的奇谈怪论。“是这样，不过您想必明白，我作为检察官，对您的意见不敢苟同。因此我建议您将此事向法庭申明，法庭会解决您的问题，会认定您的理由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如果是后者的话，你要交罚金。请向法庭去说明吧。”

“我已经声明过了，哪儿也不去了。”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

“祝您好运。”检察官说完，低下头，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位古怪的来访者。

“谁到您这儿来过？”一位法官在聂赫留朵夫出去后走进检察官的办公室，问道。

“聂赫留朵夫，您知道吗，此公在克拉斯诺佩尔斯克县自治会上就提出过各种奇谈怪论。您瞧，他是陪审员，被告当中有一个妇女或是姑娘被判服苦役，他说他勾引过她，现在要和她结婚。”

“这决不可能！”

“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说话时激动得有

点儿奇怪。”

“如今的年轻人啊，都有那么点儿不正常。”

“可他已不算很年轻啦。”

“唉，老兄，你们那位著名的伊万申科夫让人烦透了。他真会折腾人：说起来没完没了。”

“这种人干脆就不该让他们说下去，要不然真成了十足的妨碍审案的捣乱分子……”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检察官那儿径直乘车去了拘留所。可是，那地方根本就没有玛丝洛娃这个人。所长对聂赫留朵夫解释说，她准是还在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聂赫留朵夫又到那儿去了。

玛丝洛娃果真在那里。检察官忘记了，大约六个月以前，发生过一件显然被宪兵们极度夸大了的政治案件，拘留所里的所有地方都关满了大学生、医生、工人、高等女校的学生和女医士。

监狱距拘留所非常远，聂赫留朵夫到达监狱时已是傍晚时分。他想走近那座阴森森的巨大建筑物的门口，可是哨兵不放他过去，仅仅按了一下门铃。一个看守随着铃声走出来。聂赫留朵夫出示了许可证，但看守说不经过监狱长的准许不能放他进去。聂赫留朵夫去找监狱长。还在楼梯上，聂赫留朵夫就听见房间里有钢琴弹奏雄壮的

乐曲的声音。一只眼睛包着纱布的侍女气冲冲地给他开了门，钢琴声仿佛从房间里冲出来似的，震得他耳朵嗡嗡直响。这是一首令人生厌的李斯特【23】狂想曲，弹得很精彩，只是弹到一个地方却弹不下去了。一弹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重新弹起。聂赫留朵夫问包着纱布的侍女，监狱长不在家。

侍女说，不在家。

“很快能回来吗？”

狂想曲又一次停了下来，接着又重复弹起那个妖邪的地方之前的部分，琴声动听而响亮。

“我去问问。”

侍女去了。

狂想曲刚刚从头响起，还不到那个妖邪的地方突然中断，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告诉他，不在家，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做客去了，干吗总有人来缠着他。”屋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狂想曲又响了起来，可是又停了下来，接着响起椅子挪动的声音。显然是发了火的弹钢琴的女人，想亲自训斥这个讨厌的不速之客。

“爸爸不在。”一个头发蓬松、脸色苍白、忧郁的眼睛带着发青的眼圈、模样可怜的姑娘走出来，生气地说。看见来人是个身穿漂亮大衣的年轻人，她的态度缓和下来。“请进……您有什么

事吗？”

“我想探视狱中的一个女犯。”

“是政治犯吗？”

“不，不是政治犯。我有检察官开的许可证。”

“噢，我不清楚，爸爸不在。您请进来吧，”她又一次在前厅里邀请他。“要不您去找副监狱长，他现在在办公室呢，和他谈谈看。您贵姓？”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回答她的问话，走了出去。

他身后的门还没来得及关上，先前那种活泼愉快的琴声再次响起，与弹奏的地点和刻苦练琴姑娘的可怜模样，极不协调。在院子里，聂赫留朵夫遇见一位小胡子翘着而且抹过油的年轻军官，问他副监狱长在什么地方。这人原来正是副监狱长。他拿过许可证，看了看说，许可证是去拘留所的，他不能放他进监狱。况且时间也太晚了……

“请明天再来吧。明天十点钟人人都可以探视；您那时候来，监狱长本人会在家的。您明天可以在公共探视室见犯人，如果监狱长准许，也可以在办公室。”

这天的探视怎么也没有办成，聂赫留朵夫只好回家。明天就可以见到她的想法让聂赫留朵夫

激动不已，他走在街上已不再去想法庭上的情形，而只是回忆他同检察官和副监狱长的谈话。他想办法探视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检察官，并去拘留所和监狱看她，这一切让他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家里，他立即取出很久没有动过的日记，翻看了几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两年没记日记了，以为不会再回到这种小把戏上来。然而这并非小把戏，而是一种同自我，即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的真正的、神圣的自我的交谈。这个我一直在沉睡，因此我无人可以交谈。四月二十八日，我担任陪审员的法庭上发生的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把他惊醒。我在被告席上看到了她，那个被我勾引过的卡秋莎，她身上穿着囚服。由于一种奇怪的误会，也由于我的过错，她被判服苦役。我刚刚找过检察官，去过监狱。没有让我进去见她，但我决心尽一切力量去见她，向她忏悔，甚至同她结婚，以赎我的罪过。主啊，帮帮我吧！我感到十分舒畅，心中很快乐。”

三十七

这一夜，玛丝洛娃久久不能入睡，睁大眼睛躺在那儿，望着房门，房门不时被来回走过的教堂执事的妻子身影遮住，听着头发火红女人的鼾声，想着心事。

她想，到了库页岛，无论如何也不能嫁给苦役犯，而要想办法另外嫁人——嫁个当官的，嫁个文书，至少也要嫁个看守或者副看守什么的。他们都是好色的家伙。“千万可别瘦了啊。要不就完啦。”于是她想起辩护人怎样看她，庭长怎样看她，法庭上遇见她和故意在她身旁走来走去的人怎样看她。她想起别尔塔到监狱看她时说，她在基塔耶娃妓院里喜欢的那个大学生去过妓院，问起她，对她十分同情。她想起头发火红的女人打架的事，很是可怜她；想起多给她一个面包的面包铺老板。她想起许多人，惟独没有想起聂赫留朵夫。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尤其是对聂赫留朵夫的爱，她从来没有想起过。这太令人痛苦啦。这些回忆早已深深地封存在她心底的一个什么地方了。甚至做梦也从来没有梦见过聂赫留朵夫。今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主要不是因为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是军人，没有大胡子，只是唇上有小胡子，鬈曲的头发虽然短，但很浓密，现在他却留着大胡子，显得有些苍老，而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他。在那个可怕而漆黑的夜晚，他从军中回来，没有顺路去姑姑家，她便把自己同他的所有往事，全都抛诸脑后了。

在那个夜晚之前，当她还以为他会来的时候，她不仅没有觉得肚子里的孩子是累赘，而且常常对他在肚子里轻微的、有时甚至是剧烈的活

动感到格外欣喜。然而自那个夜晚之后，一切都变了。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只能成为一种负担。



姑姑们一直在等聂赫留朵夫，要他顺路来一趟，可是他打电报说不能来，因为要如期赶往彼得堡。卡秋莎知道了这一情况，决定去火车站见他。火车经过的时间是夜里两点。卡秋莎伺候两位老小姐睡下，悄悄劝说厨娘的小女儿玛什卡陪她，穿上旧靴子，戴好头巾，撩起衣襟，朝车站跑去。

这是一个黑暗的、风雨交加的秋夜。温暖的、雨点很大的大雨时下时停。田野上看不到脚下的路，树林里黑得像炉膛，卡秋莎虽然对这条路很熟悉，但在树林里还是迷失了方向，等她走到那个火车只停三分钟的小站，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她没能像她希望的那样提前赶到车站。卡秋莎跑到站台上，一下子从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的灯光分外明亮。两个没穿上装的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软椅上打牌。靠窗的小桌上点着几支滴油的粗蜡烛。他穿着紧身马裤和白衬衫，坐在软椅的扶手上，胳膊支着椅背，不知在笑什么。她一认出他，就用冻僵的手敲了敲窗子。可就在这个时候，第三遍铃声响了，火车缓缓启动，先是往后一退，然后车厢一节碰着一节依次向前移动。一个玩牌的军官站起来，手里拿着纸牌，向窗外张望。她又敲了一次，并把脸贴在玻璃上。这时，她面前的这节车厢猛地一抖，开动了。她跟着车厢往前走，眼睛望着窗

子。那个军官想打开窗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聂赫留朵夫站起身，推开那个军官，自己开窗子。火车加大了速度。她快步紧跟不舍，但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就在窗子打开的那一刻，列车员把她推开，跳上火车。卡秋莎落在后面，但还是不停地沿着湿漉漉的站台往前奔跑；站台到头了，她勉强收住脚步，没有摔倒，又从台阶跑下地面。她接着往前跑，但头等车厢已经很远了。二等车厢从她身旁驶过，跟着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驶过，但她还在不停地跑。等到尾部挂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驶过去，她已跑过水塔，四周没有遮拦，风朝她猛扑过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连衣裙紧紧裹住她的双腿。头巾被风刮走了，但她还在奔跑。

“阿姨，卡秋莎阿姨！”玛什卡喊着，吃力地追过来。“头巾掉啦！”

“他在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喝酒说笑，我却在这儿，在泥地上，在黑暗中，在雨里和风里——站着哭。”卡秋莎想，停住脚步，把头向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

“他走啦！”她叫起来。

小女孩害怕了，搂住她那湿漉漉的身体。

“阿姨，我们回家吧。”

“等会儿火车过来——往车底下一跳，就完事儿了。”卡秋莎想，没有回答小女孩的话。

她决定这么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人在激动过后乍一平静下来往往总会这样，他，那个孩子——她肚子里的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先一撞，接着慢慢伸了个懒腰，又开始用一种又细、又软、又尖的东西顶撞起来。于是，一分钟以前还那样折磨她，那样让她觉得无法活下去的想法，对他的全部怨恨和不惜一死向他报复的念头——这一切突然间统统消失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系好头巾，匆匆向家中走去。

她满身泥水、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就是从这一天起，她精神上开始起了转变，结果她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经历了这个可怕的夜晚之后，她不再相信善。她以前相信善，而且相信别人也相信善，可是从那个夜晚起，她确信谁也不相信善，人人嘴上说上帝和善，不过是为了骗人而已。她爱过他，他也爱过她——这点她知道——他把她玩够了，把她的感情作弄够了，就把她抛弃了。他还是她知道的人中最好的一个呢。其他的人就更坏了。他那两位姑姑，那两位虔诚的老太太，看到她不能像以前那样伺候她们，就把她赶出了家门。所有她接触过的人——女人们尽力利用她挣钱，男人们，从年老的警察局长到监狱的看守，个个都把她当作享乐的工具。不论是谁，世上最紧要的东西，莫过于享乐，就是那种人人都追求的享乐。在她过起自由生活的第二

年，和她同居的那个老作家，越发让她相信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这——他将它称作诗歌和美学——才是全部幸福的所在。

人人活着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享乐，什么上帝呀，善呀，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如果心里出现疑问，为什么世道这么坏，人人相互坑害，人人受苦受难，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想它。如果感到烦闷，就抽抽烟，或者喝喝酒，或者最好去找男人们谈情说爱，这种烦闷也就一扫而光了。

三十八

第二天，星期日，早晨五点钟，女监走廊里照例响起哨声，早已睡不着的科拉布列娃叫醒玛丝洛娃。

“我成了苦役犯。”玛丝洛娃恐怖地想，揉了揉眼睛，不由自主地吸进清晨污秽的空气，还想再睡一会儿，重返无意识领域，可是恐惧的习惯驱走了睡意，于是她爬起来，盘上腿坐好，朝四下打量着。女人们已经起床，只有孩子们还在睡觉。生着鼓眼睛的卖私酒女人怕把孩子们弄醒，小心翼翼地 from 他们身下抽出囚袍。犯造反罪的女人在炉子旁晾当尿布用的衣服，她的孩子在蓝眼睛的费多西娅怀里拼命啼哭，费多西娅摇晃着

他，曼声细气地唱着催眠曲。患肺癆的女人双手揪住胸口，脸憋得通红，使劲咳嗽，咳嗽间歇时的喘气，几乎响得像叫喊一样。头发火红的女人醒来后，仰面躺在床上，弯曲着两条肥腿，开心地大声讲她做的梦。犯纵火罪的老太婆又站在圣像前，一边念叨着昨晚那套词，一边画十字和鞠着躬。诵经士的女儿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睡眠惺忪的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霍罗沙芙卡用手指卷她那抹过油的粗硬的黑发。

走廊里传来肥大的棉鞋啪嗒走路的声音，铁锁哗啦响了一下，走进两个倒便桶的男犯，穿着短上衣和高出脚踝一大截的灰色裤子，满脸阴郁和怒气，用扁担抬起臭烘烘的便桶，转身走出牢房。女人们来到走廊上的水龙头旁洗脸。头发火红的女人在水龙头那儿和隔壁牢房的一个女人争吵起来。又骂，又叫，又闹……

“想蹲单人禁闭室了是不是！”男看守叫道，使劲拍了头发火红女人肥胖的光脊梁一巴掌，声音响得整个走廊都能听见。“闭上你的嘴。”

“瞧，老头来劲儿啦。”头发火红的女人说，把这一巴掌当成了亲热。

“喂，快点儿！快去做礼拜。”

玛丝洛娃还没有梳好头，监狱长带着跟班来了。“点名啦！”看守喊了一声。

另一个牢房里走出另外一些女犯，大家在走

廊里站成两排，后排的女犯必须把双手放在前排女犯的肩上。所有的犯人清点了一遍。

点过名，来了一个女看守，把女犯们领向教堂。玛丝洛娃和费多西娅排在队伍的中间，从所有牢房里走出来的女犯组成的这支队伍，大约有一百多人。她们全都包着白头巾，穿着白色衣裙，只有很少几个人穿着自己的花衣服。这是带着孩子跟随丈夫去流放的妻子。整个楼梯被这支队伍塞得满满的。只听得见穿着肥大的棉鞋走路的轻轻脚步声，说话声，偶尔还有笑声。在拐弯的地方，玛丝洛娃看见走在前面的自己的仇人博奇科娃那张恶狠狠的脸，把她指给费多西娅。女犯们下楼梯后，不再说话，画着十字，弓着腰，走进大门敞开、空无一人的、金碧辉煌的教堂。她们的位置在右边，她们你推我揉、挤挤插插地在那儿排好队。跟在女人们后面进来的是身穿灰色囚服的解送犯、监犯和村社判决的流放犯，他们大声咳嗽，磕头碰脑地站到教堂的左边和中间。上方的敞廊上，已经站着一些先带进来的犯人——一边是剃光半拉脑袋、脚镣哗啦作响的苦役犯，另一边是头发没剃也没戴脚镣的未决犯。

这座监狱教堂是一位富商花费数万卢布翻建和装修的，从里到外色彩鲜艳，金光夺目。

教堂里没有人说话，只听见擤鼻涕、咳嗽和

婴儿的啼叫声，偶尔也能听见脚镣的撞击声。站在中间的男犯忽然向两边闪开，相互紧挤着让出当中的一条路，监狱长顺着这条路走过去，站到教堂中央所有犯人的前面。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礼拜的仪式是这个样子的：司祭穿着样子特别、古怪而又极不方便的锦缎法衣，在碟子上把面包切成小块码好，然后把它们放进一个盛着葡萄酒的杯子里，同时嘴里念叨着各种名字和祷词。诵经士这时也不停地念祷词，然后又和犯人组成的唱诗班轮流唱各式各样的斯拉夫祷词，这些祷词本身就不好懂，加上念和唱得都很快，越发让人难懂了。祷词的内容主要是祈望皇帝及其皇室福寿安康。这种祷词不知跪着念过多少次了，和其他祷词一起念过，单独也念过。此外，诵经士念了几行《使徒行传》，声音怪异做作，让人什么也没听懂，司祭念的是《马可福音》中的一段事，倒十分清楚明白，内容是讲基督复活后，在升天和坐到圣父右首之前，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灵，驱除她身上的七个魔鬼，然后向十一个门徒显灵，吩咐他们向普天下的人传布福音，还声明说，凡是不相信的人必将灭亡，凡是相信并且受洗的人必将得救，还将会

驱除魔鬼，把手放在人身上就能治好他们的病，还能说许多新的语言，能拿蛇，如果喝下毒药，也不会死去，依旧健康如初。

礼拜的实质，据认为是司祭切开并放在葡萄酒里的面包块，经过手的某种动作和祈祷，会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液。这种手的动作是这个样子的：司祭平稳地，尽管他身上那口袋般的锦缎法衣妨碍着他，高举起双手，就这样举着，然后跪下来，吻圣坛和圣坛上面的东西。不过最主要的动作是司祭两手拿起一块餐巾，平稳而从容地在碟子和金杯上面来回舞动。据认为，面包和葡萄酒就是在这时候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液的，因此礼拜的这一部分才搞得特别隆重。

“尽情赞颂至圣、至洁、至善的圣母吧。”司祭完事之后从隔板后面大声叫道，于是唱诗班庄严地唱起来，极力歌颂生下基督却没有失去童贞的处女马利亚，她因此得到比司智天使更多的名耀，比六翼天使更多的光荣。这之后，面包变成身体和血液的事便已完成了，接着司祭揭去碟子上的餐巾，把中间的那块面包切成四份，先在葡萄酒里泡一下，然后放入口中。据认为，他吃了上帝身上的一块肉，喝了上帝身上的一口血。这之后，司祭拉开帷幔，打开中央的门，拿起镀金的杯子，从门里走出来，邀请愿意的人也来吃泡在杯里上帝的身体和血液。

愿意吃的人是几个孩子。

司祭先问了孩子们的名字，然后用茶匙小心翼翼地从杯子里往外舀浸过酒的面包，按顺序深深地送入他们的嘴里，诵经士立即给孩子们擦嘴，同时用快活的声音唱什么孩子们吃了上帝的肉，喝了上帝的血。这之后，司祭把杯子端到隔板后面，在那儿喝干了杯里的血并吃光了上帝的肉，仔细舔净唇上的小胡子、嘴巴和杯子，心情极为愉快地迈着有力的步子从隔板后面走出来，小牛皮制成的靴子的薄后跟发出嘎吱吱的响声。

基督教礼拜的主要仪式到此结束了。可是司祭想安慰这些不幸的囚犯，又在通常的仪式之外增加了一项特殊的仪式。这项特殊的仪式是这个样子的：司祭站在被十支蜡烛照亮的、已被他吃掉的那个上帝的铁铸包金圣像（脸和双臂是黑色的）面前，用怪异的假嗓似唱非唱地说出下面一段话：

“至善至美的耶稣啊，使徒的荣耀，我的耶稣啊，殉道者将你赞扬，万能的主，耶稣啊，拯救我吧，我的救主耶稣啊，我的至美的耶稣，拯救向你求助的人吧，救主耶稣，宽恕我吧，从祈祷中诞生的耶稣，宽恕所有的人吧，耶稣，宽恕你的圣徒，所有的先知吧，我的救主耶稣啊，赐给天堂的快乐，爱人类的耶稣啊！”

他在这里停顿了一下，换了口气，画了一个

十字，跪下去叩了个头，大家也跟着这样做了一遍。监狱长、看守们、囚犯们跪了下去，上面敞廊上脚镣的响声尤其频繁。

“天使的创造者和力量的主宰啊，”他继续说，“奇妙的耶稣，天使们的惊喜，万能的耶稣啊，祖先们的救主，至亲至爱的耶稣啊，族长们的赞颂，无限光荣的耶稣啊，历代帝王的保障，至善的耶稣啊，先知们的源泉，至美的耶稣啊，殉道者的堡垒，至为祥和的耶稣啊，修士们的喜悦，至为慈悲的耶稣啊，神父们的快乐，至为仁爱的耶稣啊，持斋人的毅力，至为亲切的耶稣啊，圣徒们的欢乐，至为高洁的耶稣啊，童贞者的信念，万世不朽的耶稣啊，罪人的救星，耶稣啊，上帝的儿子，宽恕我吧，”他终于要住嘴了，但仍越来越尖利地重复着“耶稣”这个词，并用一只手撩起绸衬里的法衣，一条腿跪在地上叩头，这时唱诗班唱起最后那句话：“耶稣啊，上帝的儿子，宽恕我吧。”囚犯们跪下又爬起来，甩着没剃掉的半边头发，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哗啦作响。

这项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先是一套赞美词，结尾总是“宽恕我吧”，然后又是一套新的赞美词，结尾又变成“阿利路亚”。囚犯们画十字，行礼，跪在地上。起初他们每赞美一次便跪拜一次，后来隔一次跪拜一次，有时甚至隔两次跪拜

一次，等到所有的赞美词结束了，司祭轻松地舒口气，合上《圣经》，走到隔板后面，这时大家感到非常高兴。最后还剩下一项活动，那就是司祭从大桌子上拿起平放在上面的角上镶有圆形珐琅饰物的镀金十字架，举着它走到教堂中央。监狱长首先走到司祭跟前，吻了一下十字架，然后是副监狱长，然后是看守，最后是囚犯们推推搡搡、骂骂咧咧地走了过去。司祭一边和监狱长说话，一边把十字架和自己的手放在走到他跟前的囚犯们的嘴上，有时甚至是鼻子上，囚犯们尽力去吻十字架和司祭的手。专为安慰和教育误入迷途的兄弟们的礼拜，就这样结束了。

四十

在场的这些人，从司祭和监狱长到玛丝洛娃，谁也没有想到，司祭无数次声音尖利地重复并用各种古怪的字眼称颂的耶稣本人，恰恰禁止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不仅禁止以导师自居的司祭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连篇废话和利用面包及酒所做的亵渎神明的法术，而且极其明确地禁止一些人称另一些人为导师，禁止在教堂里祈祷，只允许个人单独祈祷，禁止修建教堂，并说要来毁掉教堂，还说不应当在教堂里，而应当在心灵和真理中祈祷；主要的则是不仅禁止对人进行审判，

监禁，折磨，侮辱和惩罚，就像这里所发生的那样，而且还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并说他是来释放囚犯的。

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这里以基督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恰恰是对基督本人最大的亵渎和嘲弄。谁也没有想到，司祭举着让人们亲吻的边角镶有圆形珐琅饰物的镀金十字架，却是基督受难的绞刑架的形状，他正是因为禁止如今在这里以他的名义所做的这样的事才被送上那个绞架的。谁也没有想到，那些想像着以面包和酒的形式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的司祭们，的确是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过并非以面包和酒的形式，而是另一种形式，那就是他们不仅蛊惑那些被基督视为同自己一样的“弱小者”，而且还剥夺他们的最大幸福，使他们遭受最残酷的折磨，不让人们知道基督带来的福音。

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他做的一切，因为他从小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认为这是惟一的真正宗教，从前的信徒信奉它，现在的教会和俗世的长官们也信奉它。他相信的并非面包会变成肉体，并非说那么多话会对灵魂有益或者真的吃了上帝身上的肉——这是无法相信的——他相信的是，应当信奉这种宗教。他对这一宗教信仰深信不疑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主持本教圣礼的十八年中的收入，维持了家庭的生活，供儿子读中学，供女

儿上神学校。诵经士对宗教也深信不疑，而且笃信的程度更甚于司祭，因为他完全忘记了这种宗教教义的实质，只知道圣餐酒、追荐亡灵、诵经、普通祈祷和带赞美词的祈祷，这一切都有一定的价格，真正的基督徒是乐意付钱的，因此他在喊叫“宽恕吧，宽恕吧”，唱和念规定的经文时，总是十分坦然地相信这一切是必要的，就像人们卖木柴、面粉和土豆一样。监狱长和看守们，虽然从来不知道，从来也搞不清这种宗教的教义是什么，教堂里进行的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却相信必须要信奉这种宗教，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信奉它。此外，尽管有些模糊（他们怎么也解释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却感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那残酷的职务作辩护。假如没有这种信仰，他们不仅很难，而且也许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地全力折磨犯人。监狱长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假如不是从这种信仰里找到支持，根本无法照这样生活下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唱到“那些司智天使”的时候，他站得笔直，一动也不动，努力行礼和画十字，尽力让自己感动，等到给孩子们授圣餐时，他走上前去，亲手抱起一个领圣餐的孩子，把他举了起来。

在犯人当中，除去不多几个人清楚地看到这是一种用来愚弄信徒的骗局并对它暗自嘲笑以外，绝大部分人相信，包金的圣像、蜡烛、金

杯、法衣、十字架、反复念个不停的“至善至美的耶稣”和“宽恕吧”这样难懂的话，里面蕴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凭借它可以在今世和来世获得很大的好处。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曾多次尝试借助于祈祷、祷告、蜡烛来求得今世的好处，结果并未得到——他们的祈祷落空了——但每个人仍旧坚信，这一失败是偶然的，既然这套规章制度受到有学问的人和都主教的赞许，总还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对今世无用，对来世也会用得着的。

玛丝洛娃的信仰也是这个样子的。她和别人一样，在做礼拜的时候体验到一种恭敬和厌烦混杂在一起的感觉。她起初站在隔板后面的人群中央，除了同牢的女伴，谁也看不见；等到领圣餐的人向前挪动，她和费多西娅挪到前边，她才看见监狱长，还看见监狱长身后的看守中间有一个长着浅褐色头发和淡白色胡子的农民——那是费多西娅的丈夫，正目不转睛地瞧着妻子。玛丝洛娃趁着唱赞美诗的功夫，上下打量他，并同费多西娅小声说话，只是当大家画十字和跪拜时，她才跟着他们做起来。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一清早走出家门。巷子里还有一

个乡下人赶着车怪腔怪调地叫喊：“牛奶，牛奶，牛奶哟！”

昨夜下了第一场温暖的春雨。凡是没有修建马路的地方，忽然长出嫩绿的青草；花园里的桦树上布满绿色的绒毛，稠李和杨树伸出清香的长叶。住房和商店里，人们卸下套窗擦洗。在聂赫留朵夫经过的旧货市场上，摆成一行的货棚旁密密麻麻的人群挤来挤去，一些衣服破烂的人腋下夹着皮靴，肩上搭着熨平的长裤和背心，来回不停地走动。

小饭馆附近挤满了歇班的人，男的穿着干净的紧腰长外衣和擦得锃亮的皮靴，女的头上戴着色彩鲜艳的绸头巾，身上穿着缀满玻璃珠的大衣。警察佩带系着黄带子的手枪站在岗位上，窥伺着可以帮他们消除烦闷的骚动。在林阴道上和刚刚变绿的草坪上，孩子们和狗跑着玩耍，快活的保姆们坐在长椅上聊天。

大街的左侧见不到阳光，还很阴冷潮湿，中间的路面却已干透，沉重的载货马车从街上隆隆驶过，过往的轻便马车发出吱吱的声音，公共马车也叮当响个不停。四面八方传来当当的、嗡嗡的钟声，音调各不相同，震得空气在颤抖，召唤着人们去参加类似眼下在监狱里进行的那样的礼拜。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们纷纷向各自的教区走去。

马车没有把聂赫留朵夫送到监狱，而是在通往监狱的路口停下。

几个男人和女人，手里大多拿着包袱，站在这个距监狱大约百步远的路口。右边有几所不高的木头房子，左边是一座两层的楼房，门口挂着牌子。监狱那巨大的石头建筑就在前面，探监的人却不准进去。一个持枪的哨兵走来走去，谁想从他身旁绕过，他就向谁厉声吆喝。

右边木屋的小门旁边，一名身穿镶丝绦制服的看守坐在哨兵对面的长凳上，手里拿着记事本。探监的人们走到他跟前，报上想见的人的姓名，他一一记录下来。聂赫留朵夫也走到他前面，报上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的姓名。穿丝绦制服的看守记了下来。

“为什么还不让人进去？”聂赫留朵夫问。

“正在做礼拜。等会儿礼拜做完了，就放人进去。”

聂赫留朵夫回到等候探监的人群中。从人群里出来一个人，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皱巴巴的帽子，赤脚穿一双破鞋，脸上有几道红色的疤痕，向监狱的方向走去。

“你往哪儿钻？”手持步枪的哨兵冲他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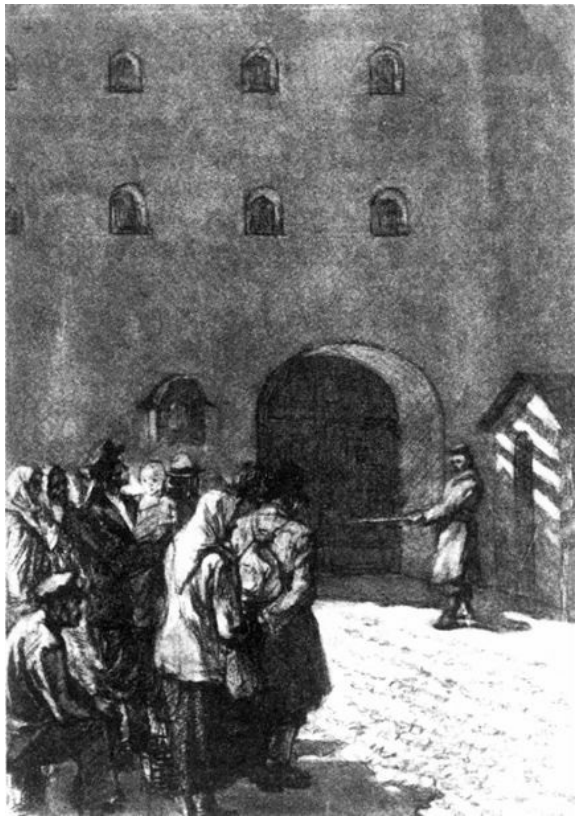
“你喊什么？”穿破衣服的人对哨兵的喊叫满不在乎，回嘴说了一句，走了回来。“不叫进——我等着就是啦。用得着大喊大叫吗，像个将

军似的。”

人群里发出赞许的笑声。探监的人大半穿得不好，甚至破破烂烂，但也有一些男女外表很体面。聂赫留朵夫旁边站着一个衣着讲究的胖男人，面色红润，胡子刮得精光，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显然是内衣。聂赫留朵夫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这儿。拿包袱的那个人回答说，他每个星期天都来这里。他们交谈起来。他是一家银行的看门人；他来探望因伪造证件而受审的弟弟。这位好心肠的人把自己的身世一股脑全告诉了聂赫留朵夫，正想询问聂赫留朵夫的情况，这时一匹肥硕的良种黑马拉着一辆胶轮轻便敞篷马车过来了，车上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戴面纱的女人，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大学生双手抱着一个大包袱。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他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转交他带来的施舍品——白面包。

“我这是按未婚妻的愿望来施舍的。这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父母要我们拿来给犯人。”

“我第一次来，不知道，不过我想应该问一问那个人。”聂赫留朵夫说，指指右边坐着的那个拿本子的穿制服看守。



聂赫留朵夫正和大学生说话的当口，中间带小窗子的监狱大铁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一个看守，手拿记事本的看守立即宣布探监开始。哨兵退到一旁，所有探监的人好像害怕迟到似的，快步，有人甚至小跑，向监狱的大门涌去。大门的一侧站着一个看守，探监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时，他高声叫着统计人数：“十六，十七……”监狱里面，还有一个看守，用手拍打着每个走进第二道门的人，同样在点数，以便放人出来核对人数时，不让一个探监的人留在监狱里，也不让一个犯人混出来。这个点数的人没看走进来的是谁，用手在聂赫留朵夫的背上拍了一下，看守的这一拍起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受了侮辱，但他立刻想起他到这儿来的身份，于是他为自己的这种不满和受辱的感觉不好意思起来。

大门里面首先是一个拱顶的大房子，窗子不大，装有铁栅栏。在这间称作聚会室的房间里，聂赫留朵夫非常意外地看见壁龛上有一幅很大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画。

“这是为什么？”他想，在他的概念里基督的形象总是和被解放的人，而不是和被囚禁的人联系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慢慢地走着，让那些急于探监的人走到前面去，心里的感觉十分复杂，既对关在

这里的恶人感到恐惧，又对也关在这里的像昨天的小伙子和卡秋莎那样无辜的人感到怜悯，还对他即将面临的探视感到胆怯和激动。走出第一个房间时，看守在另一头说了句什么话。可是聂赫留朵夫全神贯注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没留意他说什么，继续朝大多数探监者走的方向走去，也就是去男监，而不是他要去的女监。

让过那些急于探视的人，聂赫留朵夫最后一个走进指定的会面的房间。当他推开门，走进这个房间，首先令他吃惊的，是数百人的声音汇成的一种震耳欲聋的嘈杂声。直到走近像苍蝇叮在糖上那样紧贴在把房间隔成两半的铁丝网上的人们，聂赫留朵夫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后墙上有几扇窗子的房间，不是被一道，而是被两道铁丝网隔成两半，铁丝网从天花板一直通到地面。几名看守在两道铁丝之间走来走去。铁丝网的那边是囚犯，这边是探监的人。双方隔着两道铁丝网，距离有三俄尺远，因此不要说转送什么东西，就是看清对方的脸，尤其是眼睛近视的人，也是不可能的。讲话也很困难，必须拼命喊叫，对方才能听见。两边的人把脸紧紧贴在铁丝网上：有妻子，有丈夫，有父亲，有母亲，有孩子，大家尽力要看清对方的脸，说出要说的话。不过，由于每个人都想让对方听见自己说的话，旁边的人也是一样，于是他们的声音相互干扰，

所以每个人都极力大声喊叫，想压过旁边人的声音。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形成了竞相喊叫的嘈杂声，让刚刚走进房间的聂赫留朵夫大吃一惊。想要分辨出他们说的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凭脸上的表情，才能判断说的是什么，以及说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离聂赫留朵夫不远有个戴头巾的老太婆，脸紧贴在铁丝网上，下巴颤抖着，对一个面色苍白、剃光半边头发的年轻人喊着什么。那个犯人扬起眉毛，紧皱额头，用心听她讲话。老太婆旁边是个穿紧腰上衣的年轻人，两手放在耳后，摇着头，听一个长相和他差不多、脸色憔悴的白胡子男犯说话。再远一点，站着一个衣服破烂的人，挥动着一只胳膊，不停地喊叫和笑。他旁边的地板上坐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头上包着上等羊毛头巾，放声大哭，显然是第一次看见对面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囚衣，剃光半边头发，戴着脚镣。这个女人的上方，是和聂赫留朵夫说过话的那个银行看门人，正使足力气朝对面一个目光炯炯的秃头犯人喊叫。当聂赫留朵夫明白他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说话时，不禁对居然能发明和实行这种方法的那些人十分愤慨。令他吃惊的是，这种可怕的处境，这种对人的感情的捉弄，竟没人感到屈辱。不论士兵，还是监狱长，不论探监的人，还是犯人，都对此不加理会，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一般。

聂赫留朵夫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大约五分钟光景，体验到了一种奇怪的忧郁，一种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和与整个世界不协调的奇怪认识；一种类似于晕船的道德上的恶心感觉，紧紧抓住了他。

四十二

“还是办该办的事吧。”他鼓励自己说。“怎么办呢？”

他用眼睛寻找当官的，看见一个佩戴军官肩章、留小胡子、身材瘦小的人在人群后面走来走去，就对他说：

“请您告诉我，先生，”他强作谦恭地说，“女犯关在什么地方，在哪儿能和她们见面？”

“您是要去女监吗？”

“是的，我想见一名女犯。”聂赫留朵夫依然强作谦恭地回答。

“刚才在聚会室您要是说去女监就好了。您要见谁呢？”

“我要见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

“她是政治犯吗？”副监狱长问。

“不是，她只不过是……”

“她怎么，判决了吗？”

“是的，前天判的。”聂赫留朵夫恭顺地回答，害怕无意中破坏了这位似乎对他有所同情的

监狱长的情绪。

“要去女监，请到这边来，”监狱长说，显然从聂赫留朵夫的外表断定他是个值得注意的人。“西多罗夫，”他对一个挂着奖章的小胡子士官说，“带这位先生去女监。”

“是，长官。”

这时，铁丝网那边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

这一切让聂赫留朵夫感到奇怪，而更奇怪的是，他不得不感激监狱长和看守长，感激那些在这座房子里从事种种惨无人道的行径的人，不得不领他们的情。

看守把聂赫留朵夫从男监探视室领到走廊上，随即打开对面的门，领他进了探视女犯的房间。

这个房间和男探视室一样，也被两道铁丝网隔成三部分，不过面积要小得多，里面探监的人和女犯人也比较少，但喊叫声和嘈杂声同男探视室里毫无两样。两道铁网之间也同样有当官的来回走动。这儿的当官的是个女看守，身穿镶着蓝边的制服，袖口上缀着丝绦，也像男看守那样系着宽腰带。铁丝网两边，也像男探视室一样，挤满了人：这边是穿着不同服装的城里人，那边是穿着白色囚服或自己衣服的女犯。整个铁丝网的两边，挤挤插插的全是人。有的踮着脚站着，以

便从别人的头顶上面说话更清楚一些，有的坐在地板上同对方交谈。

所有的女犯人当中，喊叫声和外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头发蓬乱、身材瘦削的茨冈女犯，头巾已从髻曲的头发上滑了下来，站在铁丝网那边的柱子旁边，几乎是房间正中央的地方，飞快地打着手势，对一个身穿蓝色常礼服、腰带束得又低又紧的茨冈男人喊着什么。茨冈男人旁边，有一个士兵蹲在地上，同一个女犯讲话。再过去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长着一副浅色大胡子，脚上穿着树皮鞋，紧贴着铁丝网站着，脸涨得通红，显然强忍住眼泪。同他说话的是一个模样可爱、头发浅黄的女犯，正用一双清澈的蓝眼睛望着他。这是费多西娅和她的丈夫。他们旁边站着一个衣服破烂的男人，在和一个披头散发的宽脸女人讲话；再往后是两个女人，一个男人，然后还是一个女人；他们每人的面前都有一名女犯。这些女犯当中没有玛丝洛娃。但在女犯人们的后边，还站着一个女人，聂赫留朵夫立即明白了，那就是她，同时立即感到心跳加快，呼吸停止。关键的时刻到了。他走到铁丝网前，认出是她。她站在蓝眼睛的费多西娅身后，笑着听她讲话。她不像前天那样穿着囚袍，而是穿了一件白色上衣，腰部束得很紧，胸部高高隆起。髻曲的黑发从头巾里露了出来，像在法庭上一样。

“事情就要解决了，”他想。“我怎么称呼她呢？她自己没准会过来吧？”

可是，她并没有走过来。她在等克拉拉，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男人是找她的。

“您找谁？”在两道铁丝网中间来回走动的女看守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道。

“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吃力地说。

“玛丝洛娃，有人找你！”女看守喊了一声。

四十三

玛丝洛娃转身看了一眼，抬起头，挺直胸脯，带着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那种顺从的神情，走到铁丝网跟前，挤进两个女犯中间，用惊讶而疑问的目光盯着聂赫留朵夫，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她从他身上的衣服看出他是个有钱的人，微微笑了笑。

“您找我？”她说，那张长着斜视眼睛的笑脸凑到铁丝网上。

“我想见见……”聂赫留朵夫不知道该说“您”还是“你”，最终决定说“您”。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常高。“我想见见您……我……”

“你别跟我耍嘴皮子。”穿破烂衣服的人在他旁边喊道。“拿了还是没拿？”

“跟你说，人都快死了，还想怎么样？”另一边有人喊道。

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在说什么，可是他说话时脸上的表情，突然让她想起了他。但她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不过，她脸上的笑容一下消失了，眉头也痛苦地皱起来。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喊道，眼睛眯缝着，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来……”

“是的，我在做应当做的事，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想。他一想到这里，泪水便涌上眼睛，流进喉咙，他用手指抓住铁丝网，说不出话，竭力忍住不哭出声来。

“我说：你为什么去管闲事……”这边有人喊道。

“我对天发誓，一点儿都不知道。”一个女犯在那边喊道。

玛丝洛娃看到他激动时的样子，认出他来了。

“您好像是……我不大敢认。”她喊道，眼睛不看她，那张一下涨红的脸变得越发阴沉起来。

“我是来求你原谅的。”他大声喊叫，仿佛背书一样没有任何语调。

这句话一喊出口，他感到害羞，四下望了望。但他马上想到，如果他感到害羞，那再好不

过，因为他理应有这样的羞耻之心。于是，他接着大声说：

“请原谅我，我非常对不起……”他又一次喊道。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那双斜视的眼睛紧紧盯着他。

他说不下去了，离开铁丝网，竭力控制住撞击着他胸膛的哭声。

那位派人把聂赫留朵夫领到女监来的副监狱长，显然对他发生了兴趣，也来到女监，看见聂赫留朵夫不在铁丝网前面，问他为什么不跟他要见的女犯谈话。聂赫留朵夫擤了擤鼻涕，振作了一下精神，尽力显出平静的样子，回答说：

“隔着铁丝网没法说话，什么也听不见。”

监狱长略作思考。

“那好办，可以把她暂时带到这儿来。”

“玛丽娅·卡尔洛娃！”他对女看守说。“把玛丝洛娃带出来。”

一分钟过后，玛丝洛娃从侧门走出来。她迈着轻盈的步子，一直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站住，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漆黑的头发依然如前天那样，卷成圈圈，从头巾里显露出来，带着病态的、苍白发肿的脸，可爱而又十分平静；那双乌黑发亮、有些斜视的眼睛，在浮肿的眼皮下显得格外有神。

“可以在这儿说话。”监狱长说完，走开了。

聂赫留朵夫向靠墙放着的一条长凳走去。

玛丝洛娃疑惑地望了副监狱长一眼，然后像是惊讶似的耸耸肩膀，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在他旁边坐下，理好裙子。

“我知道，您很难原谅我，”聂赫留朵夫开口说，但又停了停，觉得眼泪妨碍说话，“不过，过去的事既然已经不可挽回，我现在会尽我的力量做一切能做的事。您说吧……”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她不回答他的话，径直问道，同时那双斜视的眼睛似看非看地瞧着他。

“我的上帝呀！帮帮我吧。教教我应当怎么做才好！”聂赫留朵夫看着她那张现在变得难看的脸，暗自说道。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他说，“我是陪审员。您没认出我来？”

“没有，没认出来。我没功夫认。再说，我也没看。”她说。

“不是有个孩子吗？”他问，感到自己的脸一下红了。

“谢天谢地，当时就死了。”她简短而愤恨地回答，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

“怎么回事，因为什么？”

“我自己也病了，差点没死掉。”她说，没有

抬起眼睛。

“姑姑她们怎么就放您走了呢？”

“谁家还留一个怀孩子的女佣呀？刚发现，就把我赶出来了。说它干吗——什么都不记得，全忘了。那事早完了。”

“不，没完。我不能丢下不管。哪怕是现在，我也要赎我的罪。”

“有什么好赎的；以前的事那是以前的事，再说都过去了。”她说完之后，他怎么也没料到，她突然看了他一眼，并且令人生厌而又充满诱惑和哀怨地笑了笑。

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有想到会看见他，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和这种地方，因此在最初的那一刻，他的出现使她震惊，并使她回想起她从来不曾想过的往事。她在最初的那一刻模模糊糊地想起爱她并为她所爱的那个可爱青年给她打开的那个新鲜而美好的感情和思想世界，随后又想起他那不可理解的残忍，以及跟在那奇妙的幸福之后而来的种种屈辱和苦难。她心里感到很难过。可是，由于她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她现在的做法又和从前一样：把这些回忆从头脑里赶走，竭力用放荡生活的迷雾把它们遮盖住；她现在正是这么做的。在最初的那一刻，她把眼下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同她一度曾经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可是后来她觉得这样太令人伤心，她不再把

他和那个青年联系在一起。现在这位衣着整洁、保养得很好、胡子上洒过香水的先生，对她来说不是她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是这样一些男人中的一个，那些男人当他们需要的时候，玩弄像她这样的女人，而像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尽量利用他们为自己获得好处。所以她才向他诱惑地一笑。她沉默片刻，心里盘算着利用他得到些什么东西。

“那事早过去了。”她说。“这不，现在判我去服苦役呢。”

她说完这句话，嘴唇哆嗦起来。

“我知道，我相信您没有罪。”聂赫留朵夫说。

“当然没罪。我可不是小偷，也不是强盗。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一切全靠律师，”她继续说。“大家说，得上诉。只是听说要花很多钱……”

“对，一定上诉，”聂赫留朵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

“别舍不得花钱，找个好律师。”她说。

“我会全力去办的。”

接着是一阵沉默。

她又一次像刚才那样笑了笑。

“我想跟您要……一点儿钱，要是您愿意的话。不多，十卢布，多了不要。”她突然说。

“行，行。”聂赫留朵夫尴尬地说，伸手掏钱包。

她飞快地看一眼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监狱长。

“别当他的面，等他走开再给，要不他会拿走的。”

等监狱长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掏出钱包，但还没来得及把十卢布的钞票交给她，监狱长又转过来脸对着他们。他把钞票攥在手里。

“这女人真跟死人差不多了。”他心里想，望着那张曾经十分可爱，如今已遭玷污的浮肿的脸，以及那双正盯着他攥钱的手和监狱长闪现出轻佻神情斜视的黑眼睛。他心里一下犹豫起来。

昨天夜里诱惑他的那个魔鬼又在他的心里说话了，又像往常一样竭尽全力不让他考虑该做什么，而只让他考虑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怎么做才会有益无害。

“‘你做什么对这个女人都是白费力气，’那个声音说，‘只会给自己找麻烦，断送你的声誉，妨碍你成为对别人有益的人。是不是把身上的钱全给她，就便分手，从此一刀两断？’”他想。

这时，他感到自己的心灵里面，眼下正酝酿着一场极为重大的变化，他的内心仿佛在一架摇摆不定的天平上活动，只要稍加一点力气，便向这边或那边偏斜。于是他用了一点力气，向昨天

他在自己的心灵里感觉到的上帝求援，上帝立即在他心里应声回答。他决定现在把所有的话都对她说出来。

“卡秋莎！我来求你原谅，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不是原谅了我，还是以后什么时候能原谅我。”他说，忽然改称起“你”来。

她没有听他说话，而是一会儿看看他的手，一会儿看看监狱长。等到监狱长转过身去，她赶紧伸出手，抓住钞票，塞在腰带底下。

“您说的话真奇怪。”她说，他似乎觉得她在鄙视地冷笑。

聂赫留朵夫感到她身上存在着一种毫不掩饰的敌视他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她得以维护她目前的状态，并阻碍他深入了解她的内心。

然而，奇怪的是，这不仅没有使他退缩，反而变成一种新的特殊动力，驱使他更进一步去接近她。他感到他应当唤醒她的灵魂，又感到这是非常难办的；不过，正因为这事难办，才引起了他的责任感。他现在对她的这种感情，不掺杂任何私心，这是他以前不论对她，还是对别的什么人，从来没有过的：他不希望从她身上捞取一点好处，只希望她不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希望她能醒悟，恢复她原来的样子。

“卡秋莎，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我可是了解你的，记得你在帕诺沃的时候……”

“提那些旧事干吗？”她冷淡地说。

“我回忆这些事，是想改正过错，赎我的罪，卡秋莎。”他说，本来想告诉她要和她结婚的事，可是他遇见她的目光，从中读出某种可怕的、粗野的、冷漠的东西，便住口说不下去了。

这时候，探视的人们开始往外走。监狱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探监的时间结束了。玛丝洛娃站起来，顺从地等着放她回牢房。

“再见，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可是，您看，现在没法说。”聂赫留朵夫说完，伸出手。“我还会来的。”

“好像话都说完了……”她伸出手，但是没有握。

“不，我尽力找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再和您见面，到时候我有非常重要的话要对您说。”聂赫留朵夫说。

“好吧，您来吧。”她说，笑了笑，那是一种想博得男人欢心的微笑。

“您对我来说，比妹妹还亲。”聂赫留朵夫说。

“真奇怪。”她又说，摇着头走进铁丝网的另一边。

聂赫留朵夫预料在第一次见面时，卡秋莎见到他，知道他为她出力的打算和他的忏悔，一定会高兴和感动，也一定又会变成卡秋莎，然而，令他寒心的是，他看见卡秋莎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玛丝洛娃。这使他感到既惊讶又寒心。

最最使他感到寒心的是，玛丝洛娃不仅不以她的身份为耻——并非她的犯人身份（这一点她深以为耻），而是她的妓女身份——反而似乎洋洋得意，甚至以此为荣。不过，除此之外，也没有另外的选择。任何一个人，只要从事一项活动，必然会认为这项活动是重要而高尚的。因此，一个人不论他的地位如何，一定会对整个人生形成一种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他的活动对他来说就将意味着是重要而高尚的。

通常人们总以为，小偷、凶手、奸细、妓女会承认自己的职业不好，会为此感到羞耻。事实恰恰相反。凡是因命运和自己的罪过而落入某种地位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不道德，他们总会对整个生活形成一种观点，有了这种观念，他们便觉得自己的地位是高尚而正当的。为了维护这种观念，他们本能地依附于那些承认他们已形成的生活和他们在此生活中所处位置的观念的人。如果听到小偷夸耀机敏，妓女夸耀淫荡，凶手夸耀残忍，我们肯定要大吃一惊。我们之所以会吃惊，无非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圈子 and 环境过

于狭小，而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不在他们的圈子之内。不过，如果富翁夸耀财富，也就是掠夺，军事长官夸耀胜利，也就是屠杀，统治者夸耀强大，也就是暴虐，难道这还不是一回事吗？我们看不出这些人歪曲了生活的概念，看不出他们为替自己的地位辩护而颠倒了善与恶的关系，无非是因为这些歪曲观念的人们的圈子过于庞大，而我们自己也身在其中的缘故罢了。

玛丝洛娃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也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她是一个被判苦役的妓女，虽然如此，她却在自己的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常常自我欣赏，甚至还在人前炫耀自己的身份。

这种世界观就是，所有的男人，不论年老的、年轻的、中学生、将军、有文化的、没文化的，无一例外地把同漂亮女人的性交往当作他们的最高享乐，因此所有的男人尽管表面上在忙着别的事情，实际上心里却只想着这一件事。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而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人。她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这十年当中，她无论在什么地方，到处都看见，所有的男人，从聂赫留朵夫和老警察局长到监狱里的看守，人人都需要她；她还没有看见也没有发现不需要她的男人。因此，整个世界在她

看来无非是好色之徒聚会的一个场所，他们从四面八方窥伺她，想尽一切办法——欺骗、暴力、收买、诡计——来占有她。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理解生活的，依据对生活的这种理解，她非但不是微不足道的人，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玛丝洛娃十分珍惜对生活的这种看法，把它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不能不珍惜它，因为一旦改变对生活的这种看法，她就会丧失这种看法所给予的她在人群中的意义。为了不致丧失自己在生活中的意义，她本能地依附于那个由持有同她一样生活态度的人所组成的圈子。当她感觉到聂赫留朵夫想把她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她作出了反抗，因为她预见到，在那个世界里她将失去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带给她的自信和自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她根本不去回想她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以及她和聂赫留朵夫的初恋。这些回忆与她现在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因而已从她的记忆里彻底抹去，或者说也可以说原封不动地埋藏在她记忆里的某个地方，紧紧锁起来，封起来，就像蜜蜂把那些糟蹋全部劳动成果的螟虫（幼虫）封起来，不留一点儿出口一样。所以，现在的聂赫留朵夫对她说来，已不是当初她真心爱过的那个人，而仅仅是一个可以利用，也应当利用的阔老爷，她同他的关系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

“不，我没把最要紧的话说出来，”聂赫留朵夫一边随着人群往出口走，一边想。“我没告诉她，我要跟她结婚。尽管没说，可是我要这样做。”他想。

站在门口的看守，放人出去时，又从里外两侧伸手清点人数，以免有人留在牢房里，也怕有犯人混出去。这一次，他们拍他的背，他不仅没有感到屈辱，而且甚至没有留意。

四十五

聂赫留朵夫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外在生活：退掉这所大宅子，解雇仆人，搬到旅馆去住。可是，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理由充足地说，入冬以前变动住处没有任何道理；夏天没人租这所房子，再说总得有个地方住和存放家具杂物。这样一来，聂赫留朵夫想改变自己外在生活（他想过大学生那样简朴的生活）的努力便落空了。一切不仅还是老样子，而且家里更起劲地忙活开了：把各式各样的毛料衣服和皮毛衣服一一挂出来晾，拍打灰尘，干这些活儿的有管院子的，有他的下手，有厨娘，还有科尔涅伊。先拿出一些不知谁的礼服和没人穿过的古怪的皮毛衣服，晾在绳子上；然后开始往外搬地毯和家具，管院子的和他的下手挽起袖子，露出结实有力的胳膊，有

节奏地用力拍打这些东西，樟脑的气味一下充满了所有的房间。当聂赫留朵夫从院子里走过或从窗子里往外看的时候，他十分惊讶，怎么这么多东西，这些东西简直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的惟一用途，”聂赫留朵夫想，“就是给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科尔涅伊、管院子的、他的下手和厨娘提供一个活动身体的机会。”

“玛丝洛娃的事还没有解决，现在用不着改变生活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想，“再说，这也很难办到。等她被释放，或者被流放，我也跟她一起去，那时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了。”

在法纳林律师约定的日子，聂赫留朵夫来到他那里。他走进律师那所富丽堂皇的私宅，里面摆放着高大的植物，窗上挂着精美的窗帘，摆设之奢华，说明主人发了横财，也就是不义之财，这样的排场只有暴发户家里才会有。在会客室，聂赫留朵夫看到许多等着按次序接见的人，像是在医生那里等候看病一样，一个个无精打采地坐在几张桌子旁边，翻阅供他们消遣的画报。律师的助手坐在一张斜面高写字桌旁，认出聂赫留朵夫后，走上来说他打招呼，说马上去禀报主人。可是，没等他走到办公室的门口，门一下开了，传来洪亮而热烈的说话声，说话的是一个年纪不轻的矮胖男人，脸色发红，小胡子浓密，穿着一件簇新的外套，另一个是法纳林本人。两人的脸

上露出那么一种表情，凡是刚刚做完一件有利可图而又不太正当的事的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表情。

“是您自己的过错，老兄。”法纳林笑着说。

“我倒是想进天堂，但罪孽深重，进不去呀。”

“好，好，我们知道。”

两个人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啊，公爵，请进。”法纳林看见聂赫留朵夫后说，又对要离开的那个商人点下头，接着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他那间严守办公风格的办公室。“请吸烟。”律师说完，正对着聂赫留朵夫坐下，竭力忍住因刚才那桩成功的交易而露出的微笑。

“谢谢，我是来谈玛丝洛娃的案子的。”

“好的，好的，这就谈。哎，这些大财主都不是好东西！”他说。“您看见刚才那家伙了吧？他有一千二百万资产。还说什么想进天堂。哼，只要他能从您身上捞出二十五卢布的票子——就是用牙也要咬到手。”

“他说‘进天堂’，你说‘二十五卢布的票子’。”聂赫留朵夫想，心里对这个放肆的人生出一种难以遏止的厌恶，他说话的语气分明想表示他和他，和聂赫留朵夫是属于一个阵营的人，而来的这些当事人和其他的人是属于与他们不同的

另一个阵营。

“他真把我烦透了——简直是个大浑蛋。可松口气了，”律师说，仿佛在为他没有谈正事辩解似的。“好啦，谈谈您这案子，我仔细查看了案卷，就像屠格涅夫说的那样，‘我不赞成它的内容’[【24】](#)，也就是说那个律师非常糟糕，所有的上诉理由都让他给放弃了。”

“那您有什么办法？”

“等一下。告诉他，”他对进来的助手说，“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办；要是可以，就接着办，要是不行，就算了。”

“他是不会同意的。”

“那就算了。”律师说，他的脸色顿时由快乐温和变得阴郁恼怒起来。

“有人说律师光拿钱不办事，”他说，脸上又露出先前那种令人愉快的神情。“我救了一个遭到错误指控的破产的债务人，现在他们都来缠着我。可是每个这样的案子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要知道，我们正像一位作家说的，把自己的肉一片一片地留在墨水瓶里了。好吧，现在谈谈您的案子，或者说您感兴趣的那件案子，”他继续说，“情况糟透了，没有充足的上诉理由，不过试试还是可以的，您看我写好了这样一个状子。”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念了起来，把那些

枯燥的公文套话很快地念过去，特别生动有力地念其他的部分：

“谨呈刑事案上诉厅，等等，等等，上诉的理由，等等，等等。该案经某某、某某判决，某某玛丝洛娃被认定犯有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罪，依照刑法第一四五四条，判处服苦役，等等。”

他停了一下；尽管他早已习以为常，显然仍旧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己的杰作。

“‘这项判决是由严重破坏诉讼程序和失误造成的，’”他继续生动有力地念道，“‘理应予以撤销。第一，审讯过程中，斯梅里科夫内脏检验报告刚开始宣读，即被庭长所打断。’——这是第一点。”

“可那是公诉人要求宣读的呀。”聂赫留朵夫惊讶地说。

“都是一回事，辩护人也有理由要求宣读。”

“可是要知道，宣读那份报告完全没有任何必要。”

“这总是一条理由嘛。下边还有：‘第二，玛丝洛娃的辩护人，’”他继续念道，“‘在发言时想要说明玛丝洛娃的品性，并已触及到她堕落的内在原因，却被庭长所阻止，理由是辩护人的这些话与本案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而根据参议院屡次之训示，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查明被告的性格和总的道德面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至

少可以正确解决罪责归咎于谁的问题，’——这是第二点。”他看了看聂赫留朵夫，说。

“不过，他讲得非常不好，让人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聂赫留朵夫更加惊讶地说。

“那小子是个十足的笨蛋，当然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来，”法纳林笑着说，“不过这仍然是一条理由。好，下面还有。‘第三，庭长在总结发言时违背《刑事诉讼法》第八〇一条第一款的明确规定，没有向陪审员们解释犯罪的概念包括哪些法律要素，没有向他们说明，即使他们认为玛丝洛娃对斯梅里科夫下毒的情况属实，仍有权根据她没有杀人的意图而认定她的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可以裁定她没有犯刑事罪，而只是犯有过错——过失，其结果出乎玛丝洛娃的意料之外，商人死于非命。’这是主要的一点。”

“这一点我们自己也能明白。这是我们的错误。”

“最后，第四，”律师继续念道，“陪审人员对法庭所提出的关于玛丝洛娃犯罪问题的答复，本身具有明显的矛盾。玛丝洛娃被控因图财而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图财是杀人的惟一动机，陪审员在其答复中否定玛丝洛娃有抢劫的目的和参与盗窃财物，由此可见，他们的用意是否定被告有杀人动机，只是由于庭长总结发言时不完善所引起的误解，才没有在其答复中用适当的

形式表明这一点，因此，对于陪审员的这一答复，可以援用《刑事诉讼法》第八一六条和第八〇八条，即庭长应向陪审员解释他们所犯的错误，退回答复，重新讨论，重新对被告的犯罪问题作出答复。”法纳林念到这里停住了。

“那么，庭长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我也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法纳林笑着说。

“参政院会因此纠正这个错误吗？”

“这要看到时候由哪些老废物主持审理了。”

“怎么是老废物？”

“是养老院里的老废物。就是这么回事。底下是这样写的：‘法庭无权根据这样的裁决对玛丝洛娃判刑，’”他继续很快地念道，“‘对其援用

《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是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粗暴而严重的践踏。根据上述理由，我荣幸地呈请某某、某某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九〇九条、第九一〇条、第九一二条第二款和第九二八条等等规定，撤销原判，并将本案移交该法院另庭审理。’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一切。坦白地说，成功的希望是很小的。不过，这要看参政院主持审理的是些什么人。如果有关系，您不妨去活动一下。”

“我倒是认识人。”

“那就抓紧点儿，要不然他们全都去治痔

疮，那就得等三个月……还有，万一上诉失败，还可以向皇上告御状。这也要靠幕后活动。在这方面我也可以效劳，不是指幕后活动，我的意思是说写状子。”

“谢谢您，那么酬金……”

“我的助手会给您一份誊清的状态，他会告诉您的。”

“我还想问问您：检察官给了我一张到监狱探视那个人的许可证，可是监狱里的人对我说，如果在规定的日期和地点以外探视，还需要经过省长批准。是需要这样吗？”

“我想，是的。不过，眼下省长不在，由副省长主事。可是这个人是个十足的浑蛋，您找他恐怕也没用。”

“是马斯连尼科夫吗？”

“是他。”

“我认识他。”聂赫留朵夫说完，站起身，准备离开。

这时，房间里飞快地跑进来一个身材矮小、奇丑无比、鼻子朝上翘着、骨瘦如柴、面色枯黄的女人——律师的妻子，显然她并没有因为自己丑陋而灰心泄气。她不仅打扮得异常怪异——不知怎么的，她身上既有绸缎，又有丝绒，既有鲜黄的颜色，又有绿色——而且她那稀疏的头发也是卷过的。她得意洋洋地跑进接待室，陪她进来

的是一个面带笑容的高个子男人，脸色如土，穿着缎子领的礼服，系着一条白色领带。这是一位作家，聂赫留朵夫知道他。

“阿纳托里，”她推开门说，“到我那儿去一下。谢苗·伊万诺维奇答应朗读他的诗，你可一定得朗读迦尔洵【25】的作品。”

聂赫留朵夫打算离开，可是律师的妻子和丈夫悄悄说了几句话，立刻转过身来对他说：

“对不起，公爵，我认得您，我想用不着介绍了——请光临我们的文学早会吧。非常有意思。阿纳托里的朗诵简直好极了。”

“您瞧，我的各种各样的事有多少呀。”阿纳托里摊开双手，笑着说，同时用手指着妻子，表示无法抗拒这么富有魅力的女人的旨意。

聂赫留朵夫带着忧郁而严肃的神情，极为谦恭地感谢律师妻子的盛情邀请，借口没有时间回绝了，然后走进接待室。

“真是装腔作势的家伙！”等他走出去，律师的妻子评价道。

在接待室里，律师的助手把抄写好的状子交给聂赫留朵夫，对酬金的问题回答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定的是一千卢布，同时还解释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本来不办这类案子，是看在他的面上才接的。

“状子的署名怎么办呢，应当写谁的名

字？”聂赫留朵夫问。

“可以写被告本人的名字，如果不方便，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可以接受她的委托，自己出面。”

“不用了，我去一趟，让她签名吧。”聂赫留朵夫说，对有机会在规定的日期之前见到她感到高兴。

四十六

一到规定的时间，监狱的各个走廊里就响起看守们的哨声；金属的撞击声响个不停，走廊的门和牢房的门纷纷打开，光脚板和棉鞋后跟啪嗒啪嗒地走动起来，倒便桶的男犯走过走廊，弄得到处都是难闻的臭气；男女犯人们洗过脸，穿好衣服，来到走廊上点名，点完名就去打开水冲茶。

这天喝茶的时候，各个牢房都在热烈地议论两个男犯将要在今天受笞刑的事。这两个男犯中，有一个店员瓦西里耶夫，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因醋劲儿发作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同牢房的犯人们很喜欢他，因为他性情快活，慷慨大方，对监狱的长官们态度强硬。他懂得法律，要求依法办事。长官们因此不喜欢他。三个星期以前，有个看守殴打一个倒便桶的男犯，因为这个

犯人把粪水溅到他的新制服上了。瓦西里耶夫出头为倒便桶的犯人辩护，说没有一条法律允许殴打犯人。“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法律。”那个看守说完，痛骂了瓦西里耶夫一顿。瓦西里耶夫也不甘示弱地回敬他。看守想打他，可是瓦西里耶夫抓住了他的手，有两三分钟的光景，然后把他的身子扭转过去，推出了门外。看守告到上边，监狱长于是下令把瓦西里耶夫关进单人禁闭室。

这排单人禁闭室是些黑暗的小屋，门从外面上着锁。又黑又冷的禁闭室里，既没有床铺，也没有桌子和椅子，被关进来的人只能在肮脏的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老鼠从他们身上蹿过来蹿过去，或者就在他们身上跑来跑去，里面的老鼠非常多，胆子也特别大，在这黑暗的禁闭室里简直连一块面包也别想保住。它们从犯人的手里抢吃面包，如果犯人不动弹，甚至去攻击他们。瓦西里耶夫说，他不去禁闭室，因为他没有过错。看守们用力拽他。他开始抗争，有两个犯人帮他摆脱了看守们。看守们聚拢过来，其中还有一个以力气大而出名的彼得罗夫。犯人们败下阵来，通通被关进禁闭室。省长立刻接到报告，说是发生了类似暴动的事件。监狱方面接到公文，命令对两个主犯——瓦西里耶夫和流浪汉聂波姆尼亚希——各用树条抽打三十下。

笞刑将在女监探视室执行。

从昨天晚上起，监狱里的所有犯人就己经知道了这件事，各个牢房里热烈地谈论着即将执行的刑罚。

科拉布列娃、霍罗莎芙卡、费多西娅和玛丝洛娃坐在她们的那个角落里，已经喝过酒，个个脸色通红，精神兴奋。玛丝洛娃现在常有酒喝，而且还慷慨地款待伙伴们，她们喝着茶，也谈论着这件事。

“他怎么可能是捣乱呢，”科拉布列娃一边用她那满嘴坚实的牙齿咬下一小块糖，一边说着瓦西里耶夫的事。“他只不过是替同伴打抱不平。因为现在不许打人了嘛。”

“听说这小伙子人不错。”费多西娅补充说，她没戴头巾，梳着两条长辫子，坐在床对面的一块劈柴上，床上放着一把茶壶。

“卡秋莎，最好告诉他。”铁路看守人的妻子对玛丝洛娃说，这个“他”指的是聂赫留朵夫。

“我一定告诉他。他为了我什么事都会做的。”玛丝洛娃笑着把头一甩，回答说。

“可那要等他来了才行呀，听说他们马上就要折磨他去了。”费多西娅说。“太可怕啦。”她又叹着气补充说。

“有一次，我在乡里看见打一个男人。公公叫我去找乡长，我到了那儿，一看，他呀……”铁路看守人的妻子讲起那个很长的故

事。

铁路看守人的妻子的故事被楼上走廊里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打断。

女人们安静下来，仔细听着。

“抓人来了，这些魔鬼，”霍罗莎芙卡说。“他们现在要用鞭子狠劲儿打他啦。看守们可恨透他了，因为他从来不肯向他们低头。”

楼上的响声停了下来，铁路看守人的妻子接着讲她的故事，讲她在乡里看见那儿的板棚里鞭打一个庄稼汉，她害怕极了，五脏六腑都要吓出来了。霍罗莎芙卡讲起谢格洛夫挨了鞭子，却连声也不吭的事。随后，费多西娅把茶具收走，科拉布列娃和铁路看守人的妻子做起针线活儿，而玛丝洛娃却抱着双膝坐在板床上，心情十分烦闷。她刚想躺下睡觉，女看守喊她到办公室见探视她的人。

“一定要说说我们的事儿，”当玛丝洛娃对着水银剥落一半的镜子整理头巾时，梅尼绍娃老婆子对她说，“不是我们放的火，是那个坏蛋自己放的，有个工人看见了；他不会昧着良心瞎说的。你对他说，让他把米特里叫来。米特里会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他；要不这算哪门子事呀，把我们关在牢里，连新鲜空气都呼吸不到，那个坏蛋倒坐在酒馆里和别人的老婆逍遥自在。”

“这叫什么法律！”科拉布列娃肯定地说。

“我说，一定说，”玛丝洛娃回答。“要不再喝点酒，壮壮胆儿，”她用一只眼睛挤了一下，补充说。

科拉布列娃给她倒了半杯酒。玛丝洛娃喝完酒，擦了擦嘴，心情十分愉快地重复着刚刚说过的话：“壮壮胆儿”，摇晃着脑袋，笑咪咪地跟在女看守后边顺着走廊走去。

四十七

聂赫留朵夫早已在门廊里等候了。

他一到监狱，先在大门口按了按门铃，然后把检察官开的许可证交给值班的看守。

“您找谁？”

“探视女犯玛丝洛娃。”

“现在不行：监狱长正忙呢。”

“在办公室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在这儿，在探视室。”看守回答，聂赫留朵夫觉得他的神情有些慌乱。

“难道今天是探视日吗？”

“不，有件特别的事。”他说。

“怎么才能见到他？”

“过会儿等他出来，您自己说吧。您先等一会儿。”

这时，司务长从侧门走出来，身上的丝绦闪

闪发光，油亮的脸上喜气洋洋，小胡子上满是烟味，厉声对看守说道：

“怎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啦？……带到办公室去……”

“我听说监狱长在这儿。”聂赫留朵夫说，对司务长脸上明显的不安神情感到奇怪。

这时，里面的门打开了，彼得罗夫情绪激动，满头大汗地走出来。

“这回该记住了。”他对司务长说。

司务长用目光指了指聂赫留朵夫，彼得罗夫不再做声，皱起眉头，从后门走了。

“谁该记住了？他们为什么都这样慌慌张张的？为什么司务长对他使眼色？”聂赫留朵夫想。

“不能在这个地方等，请到办公室去吧。”司务长又对聂赫留朵夫说。聂赫留朵夫刚想走，监狱长忽然从后门走了出来，神情比他的下属更加慌张。他不住地叹气。一看到聂赫留朵夫，他转身对那个看守说：

“费多托夫，把五号女牢的玛丝洛娃带到办公室来。”他说。

“请。”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他们顺着陡直的楼梯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扇窗子，放着一张写字桌和几把椅子。监狱长坐下来。

“烦人的差事，真烦人。”他一边对聂赫留朵

夫说，一边取出一支很粗的香烟。

“您的样子像是累了。”聂赫留朵夫说。

“是这份差事让我干累了，烦透了。你想减轻他们的命运吧，结果适得其反；我真想一走了事：烦人，太烦人的差事。”

聂赫留朵夫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使监狱长感到特别棘手，不过今天他发现监狱长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能勾起人的悲哀、沮丧和绝望的情绪。

“是的，我看这差事是够烦人的，”他说。“您又何必干这份差事呢？”

“我没有家产，得养家糊口啊。”

“您既然觉得很难……”

“不过，我还是要对您说，如果能尽力给他们带来一些好处的话，我还是可以减轻他们的命运。要是别人处在我的位置上，决不会这么做的。要知道，这谈何容易：两千多号人，又是些什么人呢。要懂得如何对付他们才行。他们也是人，要可怜他们。可是也不能放纵他们。”

监狱长讲起前不久发生的男犯打架的事，结果闹出人命来了。

看守领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打断了他的讲述。

聂赫留朵夫看见她走到门口，她还没有看见监狱长。她的脸红红的。她步子轻快地跟在看守后边，不住地笑着，摇晃着脑袋。一看到监狱

长，她满脸惊恐地盯着他看了看，但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轻快而高兴地把身子转向聂赫留朵夫。

“您好。”她拉长声音说，笑着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这次跟上次大不一样了。

“我带来上诉状让您签字。”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今天见到他时的轻松活泼的样子多少有些吃惊。“律师写好了上诉状，要签上名字，然后我们就送到彼得堡去。”

“那有什么，签个名也行啊。干什么都行。”她眯缝着一只眼睛，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纸，走到桌子旁。

“可以在这儿签名吗？”聂赫留朵夫问监狱长。

“到这儿来，坐下。”监狱长说，“给你笔。你识字吗？”

“以前学过。”她说完，笑着整了整裙子和上衣的袖子，坐在桌子旁边，用她那只小巧有力的手笨拙地拿起笔，又笑了笑，望着聂赫留朵夫。

他告诉她怎么签，签到什么地方。

她拿着笔用心蘸了蘸墨水，抖了抖，写下自己的名字。

“不用写别的啦？”她问，一会儿看看聂赫留朵夫，一会儿看看监狱长，一会把笔插进墨水瓶里，一会儿拿出来放在纸上。

“我有些话要对您说。”聂赫留朵夫从她手里拿过笔，说。

“那好，您说吧，”她说，忽然好像想起什么心事或者想睡觉似的，脸色变得沉闷起来。

监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于是只剩下聂赫留朵夫和她两个人了。

四十八

带玛丝洛娃来的那个看守，坐在离桌子稍远一点儿的窗台上。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关键的时刻来临了。他不住地责备自己，上回第一次见面时没有告诉她主要的东西——也就是他打算同她结婚，现在下定决心要告诉她这一点。她坐在桌子的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她对面的另一边。房间里十分明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从近距离这么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脸——眼角和唇边的细碎皱纹和浮肿的眼皮。他感到比以前更加可怜她了。

他把胳膊支在桌子上，这样说话那个坐在窗台上、留着花白络腮胡子、样子像犹太人的看守听不见，而只有她一个人能听见。他说：“如果这个状子不管用，那我们就去告御状。凡是能做的事，我们都要做到。”

“要是当初有个好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可我那个辩护人简直是个笨蛋。他只会

对我说奉承话，”她说着笑了起来。“要是那时候大家知道您认识我，情况就不一样啰。可是现在呢？都把我当成女贼啦。”

“她今天多奇怪呀。”聂赫留朵夫想，刚要开口说出心里的话，她又说了起来。

“我有这么一件事。我们那儿有个老太婆，您听我说，大家都对她的事感到吃惊。这么好的老太婆，平白无故让人家来坐牢，不光她坐牢，儿子也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罪，可是有人告他们放火，所以就坐牢了。您知道吗，她听说我认识您，”玛丝洛娃一边说，一边转动着脑袋，眼睛望着聂赫留朵夫，“就对我说：‘告诉他，让他把我儿子叫出来，他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的。’她儿子姓梅尼绍夫。怎么样，能办吗？您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太婆；现在很清楚，他们是冤枉的。亲爱的，您去想想办法吧。”她说完，瞧了瞧他，垂下眼睛笑了。

“好的，我去办，看看是怎么回事，”聂赫留朵夫说，对她那随便的举止越发感到惊讶。“不过我想跟您谈谈我自己的事。您记得我上次对您说的话吗？”他说。

“您说了好多话。您上次说什么来着？”她说，仍旧笑个不停，脑袋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

“我说我是求您原谅我的。”他说。

“怎么老是原谅原谅的，这根本用不着……您最好……”

“我说我想赎我的罪，”他继续说，“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要用行动赎罪。我决定和您结婚。”

她的脸上突然露出惊恐的神情。她那双斜视的眼睛停住不动了，似看非看地望着他。

“这又是为的什么呀？”她愤愤地皱着眉头说。

“我觉得，我应该在上帝面前这么做。”

“怎么又把什么上帝找出来了？您说的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呀。上帝？什么上帝？您当初能记得上帝就好啦。”她说完这些话，还想说什么，但又止住了。

聂赫留朵夫这才闻到她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味，于是明白了她激动的原因。

“您安静一点儿。”他说。

“我用不着安静。你以为我喝醉啦？我就是喝醉了，也知道我在说什么，”她忽然很快地说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我是个苦役犯，是……而您是老爷，公爵，用不着来找我，免得弄一身脏。去找你的那些公爵小姐好啦，我的价钱就是一张十卢布的红票子。”

“不管你说得多么尖刻，你也体会不到我心里的感觉，”聂赫留朵夫浑身颤抖着小声说，“你想像不出，我感到在你面前犯下了多大的罪过！

”

.....

“我感到犯下了多大的罪过.....”她愤愤地模仿他的话。“那时候你可没有感到，却塞给我一百卢布。那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现在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现在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重复说，“我说到做到。”

“我说，你做不到！”她说完，大声笑了起来。

“卡秋莎！”他说，摸了摸她的手。

“你从我这儿走开。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在这儿待着，”她叫起来，脸气得变了形，同时从他手里往外抽自己的手。“你想利用我来救你自己，”她继续说，急于把心中的怨恨全部吐出来。“你今世拿我寻欢作乐，来世还要利用我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的眼镜，讨厌你那又肥又丑的脸。走开，你给我走开！”她猛地跳起来，喊道。

看守走到他们跟前：“你闹什么！怎么能这样.....”

“您别管她，劳驾啦。”聂赫留朵夫说。

“不许她这么放肆。”看守说。

“不必啦，请您再等一会儿吧。”聂赫留朵夫说。

看守又走到窗户那边。

玛丝洛娃也坐下了，垂下眼睛，两只小手交叉着手指紧紧握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站在她旁边，不知怎么办才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要和我结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宁可上吊！这就是我要说的。”

“我反正总要为你出力的。”

“那是您的事。我可不需要您做什么。我现在对您说清楚，”她说。“我那会儿怎么不死了啊？”她补充了一句，接着伤心地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下去了：她的眼泪感染了他。

她抬起眼睛望了望他，好像有点儿惊讶，于是用头巾去擦脸上的泪水。

看守这时又走过来，提醒说，时间到了。玛丝洛娃站起身来。

“您现在很激动。要是可以的话，我明天再来。您好好想想。”聂赫留朵夫说。

她没有回答，也没有看他，跟着看守走了出去。

“嘿，姑娘，你现在好啦。”当玛丝洛娃回到牢房后，科拉布列娃对她说。“看来，他可真爱上你啦；趁他常来找你，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的人什么事都能办到。”

“这可是真的，”铁路看守人的妻子用唱歌般的嗓音说。“穷人结婚，连那夜都显得短呀，富人只要想干什么，就准能干成。好姑娘，我们那儿有一个体面人，就是这样……”

“怎么样，我的事儿你说了吗？”老太婆问。

可是，玛丝洛娃没有回答这些同伴们的话，径自往床上一躺，那双斜视的眼睛呆呆地盯着墙角，一直躺到晚上。她心里进行着痛苦的思想活动。聂赫留朵夫对她所说的那番话，把她引回了她受尽折磨的那个世界，那个她无法理解、仇恨并已离开的世界。她如今失去了以往那种昏头涨脑的生活，可是要带着对过去的清晰记忆去生活，又太过于痛苦。晚上，她买了酒，和同伴们一起喝了个够。

四十九

“是啊，没想到竟会这样。竟会这样。”聂赫留朵夫一边走出监狱，一边想，只是现在他才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全部罪孽。如果不是他试图赎罪，弥补所犯的罪过，他也许永远也意识不到他罪恶深重；此外，她也意识不到他对她的严重伤害。直到现在，这一切才那么可怕地暴露无遗。他现在看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对这个女人心灵的摧残，她也看到，并且也明白了他对她的这

种摧残。以前聂赫留朵夫一直十分得意地欣赏自己，欣赏自己的忏悔；现在他心里剩下的只是恐惧。丢下她不管——他感到现在他不能这么做，可是他又无法想像，他和她的关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聂赫留朵夫刚到大门口，一个挂满十字勋章和奖章、带着一脸令人讨厌媚相的看守走了过来，神秘地递给他一封信。

“这是一个女人给大人的信……”他说着，把那封装在信封里的信交给聂赫留朵夫。

“什么样的女人？”

“您看了就知道了。是一个女犯，政治犯。我在那边供职。所以她就托我了。虽然这事犯禁，可是出于人道……”看守不自然地说。

聂赫留朵夫感到奇怪，一个专管政治犯的看守怎么能在监狱里面，而且几乎是当着众人的面传递信件；他当时还不知道此人既是看守又是密探，接过信，边走边看起来。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流利，不用旧体字母，内容如下：

“得知您对一个刑事犯很关心，常到监狱来看她，因此我想同您见上一面。请您提出和我见面的要求。如果他们准许您的要求，我将向您提供许多重要情况，这些情况对您要保护的人，还有我们的小组，都很重要。向您致谢的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是偏远的下诺夫戈罗德省的一位女教师。聂赫留朵夫曾和同伴们到那里猎过熊。这位女教师请求聂赫留朵夫给她一些钱，以便去上学深造。聂赫留朵夫如数给了她钱，就把她忘了。现在她竟成了政治犯，关在监狱里，大概是在监狱里听说了他的事，所以才提出帮忙的。那个时候，一切多么容易，多么简单啊。如今却是那么困难，那么复杂。聂赫留朵夫生动而愉快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以及他和薇拉认识的经过。这事发生在谢肉节之前，离铁路六十俄里远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打猎非常顺利，打死了两头熊。他们正在吃饭，准备动身回去，这时他们借宿的那家农舍的主人过来说，教堂助祭的女儿来了，想见见聂赫留朵夫公爵。

“长得好看吧？”有人问。

“喂，别胡闹！”聂赫留朵夫说，脸上露出严肃的神情，从饭桌旁站起身，擦擦嘴，心中奇怪助祭的女儿为什么要见他，于是向主人房里走去。

房里有一个姑娘，头戴毡帽，身穿小皮袄，体格健壮，脸盘儿消瘦，不大漂亮，只有那双眼睛和高挑的眉毛倒还中看。

“好啦，薇拉·叶甫列莫夫娜，你跟他说吧”，房东老太婆说，“这就是公爵。我走啦。”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聂赫留朵夫说。

“我……我……您看，您有钱，您把钱花在一些小事上，打猎上，我知道，”姑娘极为腼腆地说，“我只想一件事——想成为一个对人们有用处的人，可是我什么也不能做，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那双眼睛真挚而善良，脸上露出的既坚毅又胆怯的表情十分感人，使得聂赫留朵夫像以往常有的那样，一下处在她的位置上，明白了她的心思，并可怜起她来。

“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是教师，很想上学进修，可是进不去。不是不让进，人家让我进的，不过需要花钱。请您借给我钱，等我毕了业就还您。我想，有钱人打熊，给庄稼人喝酒，这都不好。为什么他们不做点好事呢？我只要八十卢布就够了。您要是不乐意，我也无所谓。”她生气地说。

“恰恰相反，我十分感谢您给我机会……我这就去拿。”聂赫留朵夫说。

他走到门道里，正好撞见一个同伴在那儿偷听他们谈话。他不理睬同伴们的取笑，从皮夹子拿了钱，给她送去。

“请收下，收下，不用谢。我应当谢谢您才是。”

聂赫留朵夫现在回忆起这一切，心里感到愉快；他还愉快地回忆起一个军官想把这件事搞成

恶作剧，他差点同他吵起来，另一个同伴支持他，结果他们的交情更亲密了，还有那次打猎多么顺利，多么令人高兴，在他们连夜赶回火车站的路上，他的心情多么畅快。雪橇一对对地排成串，悄无声息地在林间小路上滑行，两旁的树木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中间不时夹杂着枝条上压满厚实雪饼的枞树。黑暗中，红光一闪，有谁点燃了一支气味好闻的香烟。猎人奥西普在没膝深的雪中，从这辆雪橇跑向那辆雪橇，爬上雪橇就讲，麋鹿这时候正在深雪中活动，啃白杨树的树皮，还有熊这时候正躺在密林中的洞穴里，噗噗地往洞口外面喷热气。

聂赫留朵夫回想起这一切，尤其是回想起那种感觉到自己健康、强壮和无忧无虑时的幸福心情。胸膛鼓起，把皮袄绷得紧紧的，大口呼吸着寒冷的空气，脸上落满车轭碰下来的树枝上的积雪，身子觉得暖和，脸觉得冰凉，心里没有忧虑，没有愧疚，没有恐惧，没有欲望。那是多么畅快呀！可是现在呢？我的天，这一切是多么痛苦，多么困难！……

薇拉显然是个革命者，现在因为从事革命活动坐了牢。应当见一见她，尤其是她答应出主意改善玛丝洛娃的处境。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醒后回想起昨天发生的种种事情，不由得害怕起来。

不过，尽管心中害怕，他却下了比以前更大的决心，一定把开了头的事情做下去。

他怀着这种责任感走出家门，去找马斯连尼科夫——请求准许他探视玛丝洛娃，还有梅尼绍娃母子俩，也就是玛丝洛娃托他照应的那两个犯人。此外，他要求见见薇拉，她对玛丝洛娃的事也许能有帮助。

聂赫留朵夫早就认识马斯连尼科夫，那时他们在一个团服役。马斯连尼科夫任团里的军需官。他是个极为和善、尽忠职守的军官，除去这个团和皇室以外，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如今聂赫留朵夫正赶上他荣任行政长官，已把团换作省和省政府了。他娶了一个有钱而又精明的女人，逼着他从军职改为文职。

她时而嘲笑他，时而又把他当作驯养的小动物一样宠爱。聂赫留朵夫去年冬天去过他们家一次，可是他觉得这对夫妇十分乏味，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马斯连尼科夫看到聂赫留朵夫，满脸露出微笑。他的脸还是那么红那么胖，身材还是那么高大臃肿，衣服还是像在军队里那么讲究。那时他总是穿着一尘不染、款式新颖、紧裹着肩膀和胸

膛的军装或制服；现在穿的是最时髦的文职制服，还是那么紧地裹着他肥胖的身体和挺得鼓鼓的宽胸膛。今天他身上穿着文官制服。尽管他们年龄悬殊（马斯连尼科夫已近四十岁），彼此依旧以“你”相称。

“啊，你来了，太谢谢啦。我们去我妻子那儿吧。我正好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待会儿还有个会。省长外出了。省里的事由我管。”他说，掩饰不住得意的神色。

“我找你有件事。”

“什么事？”马斯连尼科夫仿佛有些警觉似的，突然用惊恐而略带严厉的语气说。

“监狱里有一个我很关心的人（马斯连尼科夫听到监狱这个词，脸色变得更为严厉），我想去探视，不是在公共探监室，而是在办公室，并且不限定日子，要勤一些。他们告诉我，这事由你决定。”

“当然，我亲爱的朋友，我随时准备给你办，”马斯连尼科夫双手拍了拍他的膝盖说，似乎想缓和一下自己的威严气势，“这可以办，不过你知道，我只是片刻为王啊。”

“那你可以给我许可证，让我见她啦？”

“是个女人？”

“是的。”

“那她犯的什么事？”

“犯的是毒死人罪。可她是被错判的。”

“是啊，你看，这就是公正审判，他们弄不出别的东西来，”他不知怎么说了句法语。“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的坚定信念，”他补充说，把一年来从顽固的保守派报纸上读到的以不同形式出现的观点说了出来。“我知道，你是自由派。”

“我不知道我是自由派还是别的什么。”聂赫留朵夫笑着说，心中总是奇怪，怎么大家都把他列入某个什么派，还称他是自由主义者，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主张在给一个人定罪的时候，先要让人家把话说完，法庭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拷打和虐待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判刑的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由派，不过我知道，现在的审判制度，不管多糟，也还是比以前的好。”

“你找谁做律师？”

“我找的是法纳林。”

“哎呀，法纳林！”马斯连尼科夫皱着眉头说，想起去年一次在法庭上，这位法纳林询问他这个证人时，以极为恭敬的态度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不断引起众人的笑声。“我劝你不要同他打交道。法纳林是个名声很坏的家伙。”

“我还有事求你，”聂赫留朵夫没有回答他，又说。“很早以前我认识一个姑娘，是个教师。她是个非常可怜的人，现在也在坐牢，她想

见我。你能不能再开一张探视她的许可证？”

马斯连尼科夫微微歪着头，沉思起来。

“是政治犯吗？”

“是的，我听说是政治犯。”

“知道吗，只有亲属才准许和政治犯见面，不过，我可以给你开张特别许可证。我知道你不会滥用的……你要保护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薇拉？她长得漂亮吗？”

“丑得很。”

马斯连尼科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走到桌前，在一张印有头衔的纸上写道：“特此准许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在监狱办公室会见在押犯小市民玛丝洛娃以及女医士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写完后，他用花体签上名字。

“你准会看到，那里是什么样的秩序。那儿的秩序很难维持，因为人太多，特别是解犯太多。不过，我还是要严加管理，我喜欢这种工作。你会看到——他们在那儿非常好，他们也很满意。只是要善于对待他们。比如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不服从管教。换了别人，准会把这事看作暴动，弄出许多不幸来。可是在我们这里，一切都顺利解决了。需要一方面关心他们，另一方面严加管理，”他说，从雪白、浆硬、扣着金纽扣的衬衣袖子里伸出戴着绿松石戒指的白胖拳头，“要做到恩威并施。”

“哦，我对此一窍不通，”聂赫留朵夫说，“我到那儿去过两次，我心里感到非常难受。”

“你听我说，你应当去见见帕谢克公爵夫人，”马斯连尼科夫谈得上瘾，继续说，“她把全部心血都花在这上面了。她做了许多善事。多亏了她，同时可以不客气地说，也多亏了我，一切才变了样，变得以前那种可怕的现象不再存在，他们在那儿简直好极了。你就会看到的。至于法纳林，我和他没有私交，而且就我的社会地位来说，我和他也悬殊太大，不过他确实是个不讲道德的人，他竟然在法庭上说那样的话，那样的话……”

“好啦，谢谢。”聂赫留朵夫接过许可证说，没有听完他的话，就向这位过去的同事告辞了。

“那你不去了我妻子那儿啦？”

“不啦，请原谅，现在我没有时间。”

“那她一定会怪我的。”马斯连尼科夫说，把老同事送到楼梯的第一个平台上，不是头等重要而是次等重要的客人，他总是送到这里为止，他把聂赫留朵夫也列入次等重要的客人那一类中去了。“不，你还是去见见她吧，哪怕一分钟也行。”

可是聂赫留朵夫仍旧不肯去，当仆役和门房跑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递上大衣和手杖，拉开有警察站岗的大门时，他说现在实在没有功夫。

“好吧，那星期四可一定要来。那天是她的会客日。我告诉她！”马斯连尼科夫从楼梯上向他喊道。

五十一

这一天，聂赫留朵夫径直从马斯连尼科夫家乘马车赶到监狱，朝他已经熟悉的监狱长家走去。还像上次一样，又听到那架质地低劣的钢琴的声音，不过现在弹的不是狂想曲，而是克莱曼蒂【26】的练习曲，依旧弹得异常有力而清晰，速度也很快。一只眼睛包着纱布的侍女打开门说，上尉在家，接着把聂赫留朵夫领到小会客室，里面有一张长沙发、一张桌子和一盏大灯，灯摆放在一块毛线织成的方巾上，粉红色的纸灯罩有半边被烤焦了。监狱长脸色痛苦而忧郁地走出来。

“请坐，您有什么事？”他边说，边扣制服中间的纽扣。

“我刚刚去了副省长那儿，这是许可证，”聂赫留朵夫递上许可证，说。“我想见玛丝洛娃。”

“玛尔科娃？”监狱长因音乐太吵没有听清楚，反问道。

“玛丝洛娃。”

“噢，是的！噢，是的！”

监狱长站起来，走到门口，门外传来克莱曼

蒂的华彩经过句。

“玛露霞，你稍微等一下好吗。”他说，从他的语气里可以看出，这琴声成了他生活中的苦难，“什么都听不见啦。”

钢琴声停住了，传来不满意的脚步声，有人往门里张望了一下。监狱长仿佛因音乐的中止而感到十分轻松，点燃一支很粗的淡味香烟，并请聂赫留朵夫也吸一支。聂赫留朵夫谢绝了。

“我想见见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今天不便探视。”监狱长说。

“为什么？”

“是这样，要怪您自己，”监狱长微微笑着说。“公爵，请不要直接给她钱。如果您愿意，可以把钱交给我。这些钱还是属于她的。比如昨天吧，您大概给她钱了，她弄到了酒——这种陋习真是难以根除——今天喝得烂醉，发起酒疯来啦。”

“真的吗？”

“当然啦，我甚至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把她关到另一间牢房。她平时倒是个很温顺的女人，请您不要再给她钱了。这号人是……”

聂赫留朵夫清楚地想起昨天的情景，心里又害怕起来。

“那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可以见吗？”聂赫留朵夫沉默片刻，问。

“好吧，这可以，”监狱长说。“喂，你来干什么呀，”他对走进会客室的一个五六岁的女孩说，她正扭头看着聂赫留朵夫，向父亲跑来。“瞧着，别摔了。”监狱长说，笑眯眯地看着女孩儿眼睛不瞧路，脚在地毯上绊了一下，跑到父亲跟前。

“要是可以，那我就去见她了。”

“好的，可以。”监狱长说着，抱起一直看着聂赫留朵夫的女孩儿，站起来，又小心地把她放下，走进前厅。

监狱长接过包扎着眼睛的侍女递给他的大衣，还没来得及穿好走出门去，克莱曼蒂的华彩经过句又清晰地响了起来。

“她原来在音乐学院学琴，可是那儿太乱。她很有天分，”监狱长一边下楼，一边说。“想到音乐会上去演出。”

监狱长和聂赫留朵夫来到监狱。监狱长刚刚走近门口，那扇小门立即打开了。几名看守举手行礼，目送他过去。四个剃光半边头发的人，抬着装了什么东西的木桶，在过道上碰到他们，一看见监狱长，都缩起身子。其中一个人身子弯得特别厉害，两只黑色的眼睛闪着亮光，阴沉地皱紧了眉头。

“当然，有才能就应该培养，不能埋没，可是，住房太小，您看到的，真让人受不了。”监

狱长继续说他的话，丝毫也没有注意这几个犯人。他拖着疲惫的双腿，陪着聂赫留朵夫一起来到聚会室。

“您想见谁来着？”监狱长问。

“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她关在塔楼里。您得等一会儿。”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我能不能先见见梅尼绍夫家的人——母亲和儿子，被控犯有纵火罪。”

“儿子在二十一号牢房。这好办，可以把他们叫出来。”

“我能在梅尼绍夫的牢房里见见他吗？”

“您还是在聚会室里安静些。”

“不，我觉得里面有意思。”

“您可算找到有意思的事儿啦。”

这时，衣着讲究的副监狱长从侧门走出来。

“您把公爵领到梅尼绍夫的牢房。二十一号牢房，”监狱长对副监狱长说，“然后再把公爵领回办公室来。我去叫她。她叫什么来着？”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聂赫留朵夫说。

副监狱长是个青年军官，头发淡黄，小胡子上抹了染须液，浑身散发着花露水的香味。

“请吧，”他笑容可掬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您对我们监狱感兴趣吧？”

“是的，我对这个人也感兴趣，我听说他是

完全无罪落到这里的。”

副监狱长耸耸肩膀。“是的，这种事是有的。”他平静地说，恭敬地让客人先走进那臭烘烘的宽走廊。“有时候他们也会撒谎。请。”

各牢房的门已经打开，有几个犯人在走廊里。副监狱长一面朝看守们微微点着头，眼睛瞟着犯人们，他们有的贴墙溜回自己的牢房，有的站在门口，双手贴在裤缝上，像士兵那样目送长官，一面领着聂赫留朵夫穿过一条走廊，把他带进另一条装有铁门的走廊。

这条走廊比前一条更窄，更暗，也更臭。走廊两边的牢门都上着锁。门上有小孔，称作门眼，直径约半俄寸。走廊上除了一名满脸阴郁、皱纹丛生的老看守，没有一个人。

“梅尼绍夫在哪间牢房？”副监狱长问看守。

“左边第八间。”

五十二

“可以看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请吧。”副监狱长笑容可掬地说，然后向看守问起什么事来。聂赫留朵夫朝一个小孔里看了一眼：里面有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上身只穿着内衣，留着黑色的小胡子，很快地走来走去；听到门外有动静，他瞧了瞧，皱起眉头，继续走起

来。

聂赫留朵夫朝另一个小孔看了一眼：他的眼睛遇上一只正向孔外张望的惊恐的大眼睛；他急忙闪开。他又朝第三个小孔看了一眼，看见床上睡着一个身材十分矮小的人，蜷曲着身子，头上蒙着囚服。第四间牢房里坐着一个肤色苍白、脸盘儿很宽的人，低垂着头，胳膊肘支在膝盖上。这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了看。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双大眼睛里，流露出绝望的神情。他显然对从小孔向他张望的人不感兴趣。不论是谁在张望，他显然并不指望会有什么好事情。聂赫留朵夫心里感到恐惧；他不再向其他小孔张望，直接走到梅尼绍夫的第二十一号牢房。看守打开锁，推开牢门。一个肌肉发达的长脖子年轻人，长着一双和善的圆眼睛，留着小胡子，站在床前，一边急忙穿着囚袍，一边惊恐地看着进来的人。特别让聂赫留朵夫震惊的是那双和善的圆眼睛，困惑而惊恐地瞧瞧他，瞧瞧看守，瞧瞧副监狱长，然后又转过来瞧了瞧他。

“这位先生想了解一下你的案子。”

“非常感谢。”

“是的，有人对我说了您的案子，”聂赫留朵夫说着，走进牢房的深处，站在肮脏的铁栏杆窗前，“我想听听您本人是怎么说的。”

梅尼绍夫也走到窗前，立即讲了起来，开始

还不时胆怯地望望副监狱长，而后胆子越来越大；等到副监狱长走出牢房，去走廊里发什么指示，他的胆子完全放开了。这篇口述，从语言和风格来看，是极为淳朴善良的农村小伙子的口述，而从监狱里一个身穿丢脸囚服的犯人嘴里听到这样的口述，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惊奇。聂赫留朵夫一边听，一边打量着铺草垫的低矮的板床、装有粗铁栏杆的窗户、肮脏潮湿并且泥过墙缝的墙壁，以及这个穿着囚靴和囚服、受尽折磨的不幸的农民的可怜的脸和身体的样子，他心里感到越来越难受；他不愿相信这个善良的人讲述的一切是真的——想到仅仅是为了欺辱一个人，就无缘无故地把他抓起来，给他穿上囚服，将他关进这个可怕的地方，他心里感到恐惧。可是，又想到这个相貌忠厚的人讲述的这件真实的事也许是骗人的谎言，他心里感到更加恐惧。他说他婚后不久，一个酒店老板就夺走了他的老婆。他到处寻求法律的保护。酒店老板到处买通当官的，结果他总是无罪。有一次他把老婆硬拉回家，第二天她就跑了。于是他上门去要老婆。酒店老板说，他老婆不在（他进门时，明明看见她在的），让他走开。他没有走。酒店老板和一个伙计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里就着了火。他和母亲被指控放火，其实他没有放火，他当时在教父家里。

“你真的没有放火？”

“老爷，我想都没想过。一定是他，那个坏蛋，自己放的。听说他刚刚上了保险。硬说我和母亲去过他家，吓唬过他。去过那没错，我那次把他大骂了一顿，心里憋不住了。火可没放。起火的时候，也没在那儿。他故意说我和母亲那天去过。他为了得到保险金，自己放的火，硬把罪名安在我们头上。”

“真的是这样吗？”

“我可以对上帝起誓，老爷，是真的。您是我的亲爹！”他想跪下，聂赫留朵夫使劲拦住他。“救救我吧，要不我就白白完蛋啦。”他继续说。

突然，他的腮帮子抽搐起来，他哭了，接着卷起囚袍的袖口，用肮脏的衬衣袖子擦眼睛。

“完了吗？”副监狱长问。

“完了。您不要这么灰心；我们能做的一定做，”聂赫留朵夫说完，走了出来。梅尼绍夫站在门口，看守关门时，门撞在他身上。看守在外面锁门，梅尼绍夫一直从门上的小孔向外张望。

五十三

聂赫留朵夫沿着宽敞的走廊往回走（正是午饭时间，牢房的门都开着），走在穿着浅黄色囚

袍、宽大短裤和棉靴，乞求地望着他的犯人们中间，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既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疑惑，还对自己竟然平心静气地观察这一切而感到问心有愧。

在一条走廊里，有个人穿着棉靴啪嗒啪嗒地跑进一间牢房，接着从里面走出几个人，拦住聂赫留朵夫的路，向他鞠躬行礼。

“请您费心，老爷，不知道您的大名，请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都一样，您对哪个长官说说就行啦，”一个愤怒的声音说。“我们什么罪也没犯，都受一个多月的苦了。”

“怎么回事？为什么？”聂赫留朵夫问。

“就这样关进牢里。关了一个多月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的，这是因为，”副监狱长说，“因为没有身份证把这些人抓起来的，本来要遣送他们回原籍，可是那儿的监狱被火烧了，当地省政府和我们联系，要我们不要把他们送回去。我们已经把其他省的人都遣送回去了，就这些人还关押着呢。”

“怎么，就因为这点事？”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住，问。

这群人，有四十名左右，全都穿着囚服，围住了聂赫留朵夫和副监狱长。几个声音同时抢着说起来。副监狱长制止说：

“你们一个人说。”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仪表不俗的高个农民。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他们都是因为身份证遭到驱逐和被关进监狱的。其实身份证他们是有的，只是已经过期两个礼拜了。身份证过期是每年常有的事，从来没有处罚过，现在却把人抓起来，像罪犯一样关在这儿一个多月了。

“我们都是做泥瓦活儿的，大家一块伙着干。听说，省里的监狱烧了。可那又不能怪我们呀。请您发发慈悲吧。”

聂赫留朵夫听着，几乎没有听懂这个仪表不俗的老人说的是什么，因为他的整个注意力全都放在一只长着许多腿的黑色大虱子上，它正在这个仪表不俗的泥瓦匠腮上的胡子里爬来爬去。

“怎么会这样？难道就因为这个？”聂赫留朵夫对副监狱长说。

“是的，长官们疏忽了，应当把他们送回原籍。”副监狱长说。

副监狱长话音刚落，人群里又走出一个小个子，也穿着囚服，怪里怪气地撇着嘴，开始说他们无缘无故在这儿受折磨。

“连狗都不如……”他说。

“喂，喂，不要讲废话，住嘴，不然你知道……”

“我知道什么，”小个子不顾一切地说。“难道我们有什么罪吗？”

“住嘴！”长官喊了一声，小个子不说话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聂赫留朵夫一边对自己说，一边往外走，迎着从牢房里向往张望和对面走来的犯人的上百双眼睛，仿佛穿过行刑队的棒阵。

“难道真的这么关押无罪的人吗？”等到他们从走廊里出来，聂赫留朵夫说。

“请问又能怎么做呢？不过，刚才他们有不少话是胡说八道。要是听他们说——全都无罪了。”副监狱长说。

“可是这些人没有一点儿罪嘛。”

“这些人，就算是没罪吧。不过，老百姓是很容易变坏的。不严厉是不行的。有那么一些人胆大包天，必须加以提防。昨天就有两个人，不得不惩罚一顿。”

“怎么惩罚？”聂赫留朵夫问。

“按照命令用树条抽打……”

“可是体罚已经废除了呀。”

“被褫夺公权的人除外。对他们可以施行体罚。”

聂赫留朵夫想起昨天他在门廊里等候时见到的一切，于是明白了，体罚正是在那个时候进行的。于是他深深地陷入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好奇、苦闷、困惑和类似生理感觉的精神上的恶心相互混合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情感以前也曾有过，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地困扰着他。

他不再听副监狱长说话，也不再往周围张望，急急忙忙走出走廊，向办公室走去。监狱长刚才在走廊上忙于别的事，忘了去叫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他答应过去叫她。

“我马上派人去找她，您先坐一坐。”他说。

五十四

办公室共有两个房间。第一个房间有一个凸起的、泥灰剥落的大炉子和两扇肮脏的窗子，一个墙角竖着一根给犯人量身高的黑色尺子，另一个墙角挂着一幅很大的基督像——所有折磨人的地方都有这种常备物品，仿佛是对他教义的嘲弄。这个房间里站着几个看守。在另一个房间里，靠墙坐着二十来个男女，或者几个人凑成一堆，或是两个人凑成一对，小声交谈着。窗前放着一张写字桌。

监狱长坐在写字桌旁边，请聂赫留朵夫也坐

在那儿的一把椅子上。聂赫留朵夫坐下来，开始打量房间里的人。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个穿着短上装、相貌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站在一个不年轻的黑眉毛女人面前，打着手势，热烈地对她讲着什么。旁边坐着一个戴蓝眼镜的老人，拉着一个穿囚服的年轻女人的手，一动不动地听她说着什么事。一个上实科中学【27】的男孩，脸上带着惊恐呆滞的表情，目不转睛地瞧着老人。他们不远处的角落里，坐着一对恋人：女的是个十分年轻的姑娘，穿着时髦，浅黄色短发，模样可爱，洋溢着青春活力；男的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面目清秀，头发鬈曲得像波浪一样，身上穿的是杜仲胶的短上衣。他们坐在角落里喃喃私语，显然陶醉在爱情里。最靠近写字桌的地方，坐着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的白发女人，显然是位母亲。她睁大眼睛看着一个也穿杜仲胶上衣、像是害痨病的年轻人，想说什么，可是泪水哽住了她的喉咙：刚开口，就说不下去了。那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显然不知道如何是好，生气地折叠和揉搓那张纸。他们旁边坐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体态丰满，面色红润，眼睛向外突出，身上穿着灰色连衣裙，披着一件短披肩。她和正在哭泣的母亲并排坐着，温柔地抚摩着她的肩膀。这个姑娘处处都很美：那白皙而丰腴的手臂，那波浪型的短发，那轮廓

分明的鼻子和嘴唇；不过她脸上最富魅力的地方是那双善良真挚、又圆又大的褐色眼睛。聂赫留朵夫刚一走进来，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就从母亲的脸上移开，和他的目光相遇。可是她立即又扭过脸去，对母亲说起什么。在离这对恋人不太远的地方，坐着一个肤色黝黑的男人，头发蓬乱，脸色阴沉，正生气地对一个没有胡子、像阉割派教徒模样的探监者说话。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长旁边坐下，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一个脑袋剃得光光的小男孩岔开了他的注意力，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尖声尖气地问道：“您等谁呀？”

聂赫留朵夫对问话很感惊讶，可是等他看了一眼那个男孩，看见他那副严肃而懂事的表情和那双专注而活泼的眼睛，于是也严肃地回答说，等一个认识的女人。

“怎么，她是您妹妹？”男孩问。

“不，不是妹妹，”聂赫留朵夫惊奇地回答。“您和谁在这儿？”他问男孩。

“我和妈妈。她是政治犯。”男孩自豪地说。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把科利亚带走。”监狱长说，大概认为聂赫留朵夫和男孩的谈话是违法的。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就是引起聂赫留朵夫注意的那个眼睛又圆又大的漂亮姑娘，站起来，挺直

高挑的身子，迈着几乎像男人一样有力的大步，走到聂赫留朵夫和男孩跟前。

“他问您什么了，您是谁呀？”她问聂赫留朵夫，同时面含微笑，信任地望着他的眼睛，那坦率的神情似乎让人无可怀疑，她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所有的人都抱以这种坦率、亲切、友好的态度。“他什么都想知道。”她说完，对男孩笑了笑，笑得那么和蔼，那么可爱，以致男孩和聂赫留朵夫——两人情不自禁地对她也笑了笑。

“是的，他问我来找谁。”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不许和外人讲话。这您是知道的。”监狱长说。

“好的，好的。”她说，伸出她那白皙而丰腴的手拉住一直盯着她的科利亚的小手，回到害病青年的母亲身边。

“这是谁家的孩子？”聂赫留朵夫问监狱长。

“一个女政治犯的孩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监狱长多少有点儿得意地说，仿佛在展示他们监狱的奇迹。

“真的吗？”

“真的，马上就要跟母亲上西伯利亚了。”

“那个姑娘呢？”

“我无法奉告，”监狱长耸耸肩膀说。“这就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五十五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从后门走进来，个子瘦小，面色发黄，剪着短发，步子摇摇晃晃，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善良。

“哦，您来啦，谢谢，”她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吧？我们坐下吧。”

“没想到您弄成这个样子。”

“噢，我很好！好得，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说，像往常一样用她那双又圆又大又善良的眼睛惊惶地瞧着聂赫留朵夫，同时转动着从肮脏破旧的衣领里露出的青筋毕露的黄瘦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起她怎么落到这种田地。回答他的问话时，她兴致勃勃地讲起自己的事业。她的话里夹杂着一些外语词汇，如关于宣传、瓦解状态、团体、小组、分组等，她显然完全相信这些词汇大家都知道，可是聂赫留朵夫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她不停地讲着，显然完全相信他很有兴趣，也很乐于知道民意党【28】运动的所有秘密。聂赫留朵夫却看着她那可怜的脖子和那稀疏蓬乱的头发，心中感到惊讶，她为什么做这种事，讲这种事呢。他可怜她，但这和他可怜农民梅尼绍夫完全不同，梅尼绍夫是在没有犯任何罪的情况下被关进臭气熏天的监狱里的。她最让人感到可怜的

是她脑子里的那套明显的糊涂思想。她显然自以为是个英雄，准备为事业的成功而牺牲生命，其实她未必能说得清楚，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它的成功又是什么。

薇拉想对聂赫留朵夫说的是这样一件事。她的一个姓舒斯托娃的同伴，据她说甚至还不属于他们的小组，五个月前同她一起被捕，并被关入彼得保罗要塞，原因是她在她家搜出了交她保存的书籍和文件。薇拉认为自己对舒斯托娃被囚禁一事负有部分责任，因此恳求交际广泛的聂赫留朵夫想方设法让她出狱。薇拉求聂赫留朵夫办的另一件事，是替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古尔凯维奇走走关系，准许他和父母见面，并准许他得到他做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书籍。

聂赫留朵夫答应等他到彼得堡后，尽一切努力去办。

薇拉讲了自己的经历，说她助产学校毕业后，接近了民意党人，同他们一起工作。开始一切很顺利，他们写传单，到工厂搞宣传，可是后来一个重要人物被捕，搜出了文件，于是开始捉拿所有的人。

“我也被捕了，这就要被流放……”她讲完了自己的经历。“不过，这没什么。我感觉好极了，心情十分平静。”她说完，惨然一笑。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眼睛又圆又鼓的漂亮姑

娘。薇拉说，她是一位将军的女儿，早就参加了革命党，因为主动承担枪击宪兵的罪责而入狱。她住在一个秘密的寓所里，那里有一台印刷机。一天夜里，警察来搜查，寓所里的人决定自卫。他们熄了灯，动手销毁罪证。警察冲进来，于是一个秘密工作者开了枪，把一个宪兵击成致命重伤。等到审问是谁开的枪，她说是她开的枪，尽管她从来没有摸过枪，连一只蜘蛛也没有打死过。结果罪名就这样落在她的头上。现在她要去服苦役。

“一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赞叹地说。

她想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玛丝洛娃的。她对监狱里的一切了如指掌，知道玛丝洛娃的身世和聂赫留朵夫同她的关系，劝他去活动一下，把她转到政治犯牢房，或者至少调到医院当看护，现在那儿的病人特别多，需要女工作人员。聂赫留朵夫感谢她的建议，说要尽力照她的话去做。

五十六

他们的谈话被监狱长打断，他站起来宣布，探视时间结束，应当走了。聂赫留朵夫起身和薇拉告别，然后走到门口站住，观察眼前的一切。

“先生们，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监狱长说，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监狱长的话反而使房间里的犯人和探监者变得更加活跃了，谁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有些人站起来，接着说。有些人依旧坐着说个不停。有些人开始告别和哭泣。最令人感动的是母亲和害痨病的儿子。年轻人一直在摆弄那张纸，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费了极大的力气，不使自己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母亲一听让告辞，伏在他的肩上痛哭，鼻子不住地抽噎。眼睛圆鼓鼓的那个姑娘——聂赫留朵夫不由自主地注视着她——站在痛哭的母亲面前，安慰着她。戴蓝眼镜的老人，拉着女儿的手站在那儿，对女儿说的话连连点头。那对年轻的恋人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相互对视。

“瞧，只有他们两个人高高兴兴。”穿短上衣的青年指着这对恋人说，他这时站在聂赫留朵夫旁边，像他一样，也在观察正在告辞的人们。

这对恋人——穿杜仲胶上衣的年轻人和浅黄色头发、招人喜欢的姑娘——觉察到聂赫留朵夫和那个青年的目光，伸直相互拉着的双手，身子向后一仰，笑着转了起来。

“今天晚上他们在这儿，在监狱里结婚，她要跟他去西伯利亚。”青年说。

“他怎么回事儿？”

“苦役犯。他们两个快快活活也好，要不然这儿的气氛太让人难受了。”穿短上衣的青年听

着害癆病的年轻人母亲的哭声，补充说。

“先生们！请吧！请吧！可别逼我来采取严厉措施呀，”监狱长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请吧，快点，请吧！”他有气无力地说。“这是怎么啦？时间早就到了。这样可不行。我再说最后一遍，”他无精打采地重复说，一会儿点燃那支马里兰香烟，一会儿又把它掐灭。

显然，可以让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作恶而又不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的理由，不论多么巧妙，多么悠久，多么习以为常，监狱长不能不意识到，他是造成这个房间里的痛苦场面的祸首之一；他的心情显然因此而极为沉重。

终于，犯人和探监的人开始散去：犯人往里，探监的人往外。男犯们——两个穿杜仲胶上衣的，一个害癆病的，一个头发蓬乱脸色发黑的，走了；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带着监狱里出生的小男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开始往外走。戴蓝眼镜的老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聂赫留朵夫跟在他后面。

“是啊，这是些非常的办法，”喜欢说话的年轻人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下楼梯，仿佛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谈话。“多亏上尉是个好心人，不死守规章制度。痛痛快快谈一谈，大家心里也好受些。”

“难道其他监狱不是这样探监吗？”

“咳！根本不可能，不仅要隔开，而且是隔着铁栅栏。”

聂赫留朵夫和梅登采夫——爱说话的年轻人这样自称——一边谈话，一边走进门廊，这时一脸倦色的监狱长走到他们跟前。

“您想见玛丝洛娃的话，请明天再来吧。”他说，显然有意对聂赫留朵夫表示殷勤。

“太好了。”聂赫留朵夫说完，急忙走了出去。

梅尼绍夫没有犯罪却遭受折磨，显然是可怕的——可怕的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是他看到无缘无故折磨他的那些人的残忍而产生出的困惑，产生出的对善和上帝的不相信；可怕的是那数百名人没有丝毫罪过，仅仅因为身份证写得不太对劲，就受尽屈辱和痛苦；可怕的是那些头脑昏聩的看守，整天折磨自己的同胞，却反而相信他们是在做有益而重要的事。然而，最让他感到可怕的是，这位年老体衰、心地善良的监狱长必须去拆散母子和父女——也就是那些跟他本人和他的子女们一样的人。

“这是为什么？”聂赫留朵夫问，这时又感到那种极度的精神上的恶心转变成生理上的恶心，这种感觉他每次到监狱里来，都能感到，但一直找不出问题的答案。

五十七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去找律师，把梅尼绍夫的案子告诉了他，请他担任辩护。律师听完，说要看一看案卷，如果真像聂赫留朵夫说的那样，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么他会分文不取地担任辩护。聂赫留朵夫顺便讲了那一百三十人因误会而被关押的事，并问律师这事该由谁负责，是谁的过错。律师沉吟不语，显然想找出准确的答复。

“谁的过错？谁的也不是，”他毫不含糊地说。“您找检察官——他会说，是省长的错，您去找省长——他会说，是检察官的错。谁都没有错。”

“我马上去马斯连尼科夫那儿，对他说。”

“哼，这没用，”律师笑着反驳。“他是个——他不是您的亲戚或朋友吧？——他是个，恕我直言，是个笨蛋，同时又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聂赫留朵夫想起马斯连尼科夫讲的有关这位律师的那些话，什么也没有说，起身告辞，坐上马车去找马斯连尼科夫。

聂赫留朵夫有两件事需要马斯连尼科夫帮忙：一件事是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另一件事是关于那一百三十名没有身份证而被无辜关押在监狱里的人。尽管向一个他不尊敬的人求情让他感到十分苦恼，但这是达到目的的惟一方法，他又

不得不去做。

聂赫留朵夫乘车驶近马斯连尼科夫的家，看见大门旁边停着几辆马车：四轮轻便马车，四轮弹簧马车和四轮轿式马车，于是想起今天正巧是马斯连尼科夫妻子的会客日，他曾约请他这天到他家。聂赫留朵夫的马车来到门口时，台阶前刚好停着一辆轿式马车，一个帽子上带有帽徽、身披短披肩的仆人正扶着一位太太从台阶上上马车。她提起长裙的下摆，露出鞋里又黑又细的脚踝。他从停在那儿的马车中认出了科察金家的掀起活动篷的四轮马车。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马车夫毕恭毕敬地摘下帽子，向这位特别熟悉的老爷致意。没等聂赫留朵夫向门房问及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在什么地方，他本人已出现在铺着地毯的楼梯上，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这位客人他不是送到楼台上，而是一直送到楼下。这位非常重要的军界客人一边下楼，一边用法语讲本市举办的为孤儿院募捐的摸彩会，并发表意见说，这是太太们可以从事的一项有益的活动：“她们既能得到快乐，又能募集到钱。”

“让她们去快乐吧！上帝会保佑她们的……啊，聂赫留朵夫，您好！怎么好久没见到您啦？”他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快去向女主人致意吧。科察金家的人也在呢。还有纳丁·布克斯海夫登。全城的美人都来了，”他说完，微微耸着

穿军装的肩膀伸过去，让他那个身穿镶金绦制服的威风的听差给他穿上军大衣。“再见，老兄！”他又和马斯连尼科夫握了握手。

“好，我们上去吧，我太高兴啦！”马斯连尼科夫兴奋地说，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尽管他身体肥胖，还是很快地把聂赫留朵夫拉上楼去。

马斯连尼科夫心里特别高兴和兴奋，原因是那位重要人物对他给予了关注。马斯连尼科夫曾在近卫军中与皇室关系密切的那个团供职，他与皇室交往本应习以为常，可是，看得出来，不断重复的交往只是在加重他自感卑贱的心理，每一次来自皇室成员的这种关注，都会让马斯连尼科夫欣喜若狂，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狗得到主人的抚摸、拍打和搔耳朵以后所感受到的那样。它摇动尾巴，蜷缩成一团，扭来扭去，贴紧耳朵，发疯般地转圈儿。马斯连尼科夫恨不得也这样做。他没有发现聂赫留朵夫脸上的严肃表情，也没有听他说什么，硬把他拉向客厅，聂赫留朵夫无法推辞，只好跟他走。

“有事儿待会儿再说；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切照办，”马斯连尼科夫说，领着聂赫留朵夫穿过大厅。“去向将军夫人通报，就说聂赫留朵夫公爵到，”他边走边对仆人说。仆人溜小跑，赶到他们前头去通报。“有事儿只要吩咐一声就行。可是你一定要去见见我妻子。上次我没有把

你带去，就挨了一顿骂。”

等他们走进客厅，仆人已经通报过了。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自称为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已在沙发旁边，从围着她的那些女帽和脑袋中间，笑容满面地向聂赫留朵夫点头致意。客厅另一端的桌子旁边，几位太太坐着喝茶，身边站着几个男人——军人和文官。男男女女叽叽嘎嘎的说话声不断从那边传来。

“到底来啦！您怎么不愿意和我们来往了？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您了吗？”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用这样的话迎接客人，是想表示她和聂赫留朵夫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实这种关系根本就不存在。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是别利亚耶夫斯卡娅夫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切尔诺夫。请坐近点儿。”

“米西，请到我们这桌来……茶会给您送过来的……还有您……”她对正和米西说话的军官说，显然忘了他的名字，“请到这儿来。公爵。您用茶吗？”

“我才不这么，不这么想呢：她根本就不爱他。”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她只爱小馅饼。”

“您总喜欢说些无聊的笑话。”另一个戴着高帽子，身上的绸缎、金饰和宝石闪闪发光的太

太，笑着插嘴说。

“这种维夫饼干美极了，容易消化。请再上一点儿。”

“怎么，您很快就要走吗？”

“是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来的。”

“多么美好的春天呀，现在乡下多好啊！”

米西戴着帽子，穿一件深色条纹连衣裙，紧紧裹着她那纤细的腰肢，没有一丝皱褶，仿佛她就是穿着这件连衣裙生下来似的，显得十分美丽。她看到聂赫留朵夫，脸一下红了。

“我以为您已经走了呢。”她对他说。

“差一点走了。”聂赫留朵夫说。“有事耽搁了。我到这儿来也是有事。”

“您有空儿去看看妈妈吧。她很想见见您。”她说，知道自己在撒谎，而且也知道他明白这一点，于是脸更红了。

“恐怕来不及了。”聂赫留朵夫忧郁地回答，竭力装作没有发现她脸红的样子。

米西生气地皱起眉头，耸了耸肩膀，把身子转向那个文雅的军官。他从她手上接过空茶杯，英勇地把茶杯放到另一张桌子上，尽管军刀勾住了圈椅。

“您也应该为孤儿院捐点儿款。”

“我没说不捐呀，不过我想把自己的慷慨留

到摸彩会上。到时候我可要大显身手啦。”

“好，等着瞧！”响起明显假装的嘲笑声。

会客日十分成功，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感到心满意足。

“米西对我说，您在忙监狱里的事。我很理解这一点，”她对聂赫留朵夫说。“米卡（这是她的胖丈夫，马斯连尼科夫）可能有别的缺点，可是您知道，他的心肠多么善良。所有这些不幸的犯人，都是他的孩子。他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他多么善良……”

她停住了，找不出足以形容她丈夫善良的字眼儿，而实际上，抽打犯人的命令正是她这位丈夫发出的。她立即笑着转过身去，招呼刚进来的一个扎着紫色花结、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聂赫留朵夫说了些该说的话，而且是不失礼节的那种毫无内容的话，然后站起来，走到马斯连尼科夫跟前。

“那么，请原谅，能听我说点事儿吗？”

“啊，好的！什么事？我们到这儿来吧。”

他们走进一间日式小书房，挨着窗子坐下来。

五十八

“好吧，我听候吩咐。要抽烟吗？先等等，

“我们别把这儿弄脏了，”他说着，拿过来一只烟缸。“什么事？”

“我有两件事麻烦你。”

“原来是这样。”

马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郁和沉闷了。那种狗被主人搔过耳朵后所表现出来的兴奋神情，消失得踪迹全无。客厅里传来说话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绝不，绝不相信。”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客厅的另一头讲什么事，不停地重复说着：“沃龙佐娃伯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还有一个方向传来的只是一片嘈杂的说笑声。马斯连尼科夫倾听着客厅里发生的事，同时也听着聂赫留朵夫说话。



“我说的还是那个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噢，那个被冤枉的女人。知道，知道。”

“我想请你把她调到医院当女佣。我听说，这是可以办的。”

马斯连尼科夫闭住嘴巴。沉思起来。

“未必可以，”他说。“不过，我去商议一下，明天用电报通知你。”

“我听说，那儿的病人很多，需要女工。”

“是吗，是吗。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回音的。”

“谢谢！”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响起一阵哄堂大笑，笑声甚至毫不故作。

“这全是维克多搞的，”马斯连尼科夫笑着说，“他要是来了劲头，俏皮得要命。”

“还有，”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证过期了。他们在那儿关了一个月了。”

于是他详细说了他们被关押的原因。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马斯连尼科夫问，脸上忽然露出不安和不满的神色。

“我去看一个被告，那些人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请求……”

“你看的是哪个被告？”

“是个农民，无辜受到指控，我已为他请好

律师。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难道这些人什么罪也没犯，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证过期就被关进牢房，而且还……”

“这是检察官的事，”马斯连尼科夫恼火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这就是你所谓的快速而又公正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的责任是视察监狱，检查关押的犯人是否合法。他们什么都不干：就知道打牌。”

“那你就不管了吗？”聂赫留朵夫阴郁地问，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推给检察官。

“不，我要管。我这就去查。”

“对她来说，这更糟。她是个多灾多难的人啊。”客厅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显然对她所说的话毫无兴趣。

“那更好，这个我也要。”客厅的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开玩笑的声音和一个女人开玩笑的笑声，她不肯把一件什么东西给他。

“不，不，绝对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好吧，这些事我全都办，”马斯连尼科夫重复说，同时用戴着绿松石戒指的白净的手捻灭香烟，“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走到客厅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狱里有人受到体罚。这是真的吗？”

马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啊，你说那件事？不，老兄，真不该让你去，你什么事都管。走吧，走吧，安娜叫我们哪，”他说完，挽起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又露出激动的表情，就像刚才那位重要人物关注过他以后那样，只不过此刻的激动不是由于高兴，而是因为惊慌。

聂赫留朵夫抽回自己的胳膊，没向任何人告辞，也不说话，脸色阴郁地穿过客厅、大厅和那些连忙站起来的仆人，走到前厅和大街上。

“他怎么啦？你怎么得罪他啦？”安娜问丈夫。

“这是法国人的作风。”有人说。

“这哪里是法国人的作风，这是祖鲁人【29】的作风。”

“不错，他向来如此。”

有人起身告辞，有人刚刚来到，唧唧喳喳的谈话照常进行：人们把聂赫留朵夫的这件事当作今天聚会的一个好话题。

拜访马斯连尼科夫的第二天，聂赫留朵夫收到他的信，信是用遒劲的笔体写在一张带有官衔的光滑的厚纸上，并用火漆印封着，信上说，他已去函给医生谈及玛丝洛娃调往医院一事，他的愿望大概可以实现。信的署名是“热爱你的老同事马斯连尼科夫”，而“马斯连尼科夫”的姓氏下面甩出一笔极其漂亮的粗大花道。

“混账！”聂赫留朵夫忍不住说道，特别是从“同事”这个词中感到马斯连尼科夫对他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意味，也就是说，尽管他担任着道德上最肮脏、最无耻的职务，仍自以为是个重要人物，而且还认为称他为自己的同事，即便不是奉承的话，那么至少也可以表明自己并未因地位显赫而目中无人。

五十九

有一种极为普遍、极为流行的迷信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品性，人分为善良的人，凶恶的人，聪明的人，蠢笨的人，刚毅的人，消沉的人，等等。人是不可能这样一成不变的。我们谈论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聪明的时候多于蠢笨，刚毅的时候多于消沉，或者正好相反；可是如果我们谈论一个人，说他是善良的人或者聪明的人，而谈论另一个人，说他是凶恶的人或者蠢笨的人，那就与实际情况大不相符了。我们往往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对的。人好比河：所有河里的水都是一样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出现两样，但每一条河却有的地方狭窄，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平缓，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冰凉，有的地方浑浊，有的地方温暖。人也同样如此。每

一个人的身上都具有人的所有品性的胚胎，有时表现出这样一些品性，有时表现出那样一些品性，而且常常变得完全不像自己，其实他始终还是他自己。在有些人身上，这种变化往往特别剧烈。聂赫留朵夫恰恰属于这类人。他身上发生的这种变化，既有生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眼下他身上发生的正是这种变化。

他在庭审结束和第一次探望玛丝洛娃之后所体验到的那种重获新生的庄严感和愉悦感，已经完全消失，如今代替它的是最近这次探监后所留下的恐惧，甚至对她的厌恶。他决心不再抛弃她，如果她愿意，也不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定；可是他又感到这是件十分痛苦和烦恼的事。

拜访马斯连尼科夫的第二天，他又去监狱见她。

监狱长准许他们见面，但地点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公室，而是在女监探视室。监狱长尽管心地善良，但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却有点儿冷淡；显然，和马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招来了要对这位探监者多加防范的命令。

“见面是可以的，”他说，“只是关于钱的事，请按我上次的要求……至于调她去医院，大人已有公文，这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不过，她本人不想去，说：‘我才不稀罕去给那些讨厌鬼倒尿盆呢……’您瞧，公爵，真不识抬举。”他补充

说。

聂赫留朵夫没有回答，只是要求让他去见她。监狱长派一个看守带他去，聂赫留朵夫跟着他走进空荡荡的女监探视室。

玛丝洛娃已经到了，她从铁栅栏后面静静地、胆怯地走出来。她走近聂赫留朵夫，眼睛不去看他，静静地说：

“请原谅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前天我说了不好听的话。”

“不是我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没能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别再管我的事了。”她补充说，用极为斜视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于是聂赫留朵夫又从她的目光里读到了紧张而怨恨的神情。

“到底为什么不要我管您的事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觉得那目光里依旧充满了怨恨。

“就是这样，”她说。“您别再管我了，我跟你明说吧。我不能。您把那个想法丢掉吧，”她嘴唇颤抖地说，接着沉默了片刻。“这是真话。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感到，在她表示拒绝的言辞里有一种对他的仇恨和无法原谅的屈辱，但也有某种

另外的——好的和重要的东西。她虽然再次表示拒绝，但态度却极为平和，这一下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中的所有疑虑，又把他带回先前那种严肃、激昂和感动的状态之中。

“卡秋莎，我原来说过的话是不会变的，”他特别严肃地说。“我请求你嫁给我。要是你不愿意，暂时不愿意也没关系，我会像以前那样，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发配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那是您的事儿，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她说，嘴唇又颤抖起来。

他也不再说话，觉得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要去乡下，然后去彼得堡，”他终于缓过劲来，说。“我要为您的，为我们的事，去活动活动，但愿上帝保佑，能撤销原判。”

“就是不撤销，也没关系。我就是不为这事儿，为别的事也该……”她说，他看见她用力忍住眼泪。“好啦，您见到梅尼绍夫了吗？”她突然问，为的是掩饰自己的激动。“他们没有犯罪，对吧？”

“我想，是的。”

“多么好的一个老太太呀。”她说。

他把从梅尼绍夫那里了解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然后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还有医院的事，”她用那斜视的眼睛看了他一下，忽然说，“要是您想要我去，我就去，酒我也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看了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这很好。”他仅仅说出这么一句话，就和她告辞了。

“是的，是的，她完全是另一个人啦。”聂赫留朵夫想，在先前的疑虑消除之后他体验到了一种全新的、从未有过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情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这次见面以后，玛丝洛娃回到臭烘烘的牢房，脱掉囚袍，坐到自己的床铺上，双手往膝盖上一放。牢房里只有几个人：弗拉基米尔省的痨病女人和她吃奶的孩子，梅尼绍娃老婆子，道口工的老婆和她的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被诊断得了精神病，送进了医院。其余的女犯洗衣服去了。老婆子躺在床上睡觉；孩子们在走廊里，牢房的门大开着。手里抱着孩子的弗拉基米尔省的女人和手里飞快地织着袜子的道口工的老婆，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喂，怎么样，见面了吗？”她们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床铺上，晃悠着两条够不到地板的腿。

“你哭什么呀？”道口工的老婆说。“最要紧的是别灰心。哎，卡秋莎！说呀！”她说，双手飞快地织着袜子。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

“咱们屋的人洗衣服去了。听说今天的施舍品有一大堆呢。都说送来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省的女人说。

“菲纳什卡！”道口工的老婆冲门外叫起来。“这个淘气鬼，跑哪儿去了。”

她抽出一根编织针，插在线团和袜子上，走到走廊上。

这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女人的说话声，接着同牢房的几个女人光脚穿着棉鞋走进来，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白面包，有的还拿着两个。费多西娅立即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怎么啦，是不是不大顺利？”费多西娅一边问，一边用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亲热地瞧着玛丝洛娃。“这是给咱们喝茶吃的。”她说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

“怎么啦，是不是结婚的事，他变卦啦？”科拉布列娃说。

“没有，他没变卦，是我不愿意，”玛丝洛娃说。“我把这意思告诉他了。”

“你真是个傻瓜！”科拉布列娃粗门大嗓地说。

“这不新鲜，既然不能住在一起，那结婚还图什么？”费多西娅说。

“难道你丈夫不也是跟你一块儿走吗。”道口工的老婆说。

“这不新鲜，我们是合法的，”费多西娅说。“既然不能住在一起，他干吗要正式结婚呢？”

“真是个傻瓜！干吗？他要是娶了她，就能给她大笔钱呀。”

“他说：‘你发配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玛丝洛娃说。“他想跟着去，就去，不想跟着去，就别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去彼得堡活动去了。那儿的大臣全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靠他。”

“当然啦！”科拉布列娃忽然表示同意，双手不停地整理自己的袋子，显然在想别的事。“怎么样，我们来点儿酒喝？”

“我不喝，”玛丝洛娃回答。“你们自己喝吧。”

注 释

[1] 帝俄时代官方发放的妓女执照。

[2] 指列氏温度，相当于摄氏三十七点五度。

[3] 原文为法文。以后叙事中出现的法文，皆用楷体标出，不另加注。

【4】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社会有机论的创始人之一。

【5】 原文为英文。

【6】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7】 法国十四世纪哲学家比里当写过一篇故事：把一头驴子放在两捆同样的干草或水桶的中间，它不知如何是好，无法选择，结果饿死或渴死了。

【8】 宗教派别。十八世纪末出现于俄国，宣扬用阉割的方法摆脱肉欲，拯救灵魂。

【9】 沙皇像。

【10】 指守法镜，顶上有双头鹰的三棱镜，帝俄官厅中的陈设物，贴有彼得大帝敕令守法的谕旨，作为守法的象征。

【11】 在这种游戏中，被迫的两个人分别从后面跑出，待会合后，相互抓紧手，就算胜利。

【12】 龙勃罗梭（1835—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认为有一种人生理上有天生特征，生来具有犯罪倾向。

【13】 塔尔德（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刑法学家，有社会心理学和法律哲学方面的著作。

【14】 夏科（1825—1893），法国神经病学及心理疗法的创始人之一。

【15】 拉伯雷（1494—1553），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

【16】 原文为英文。

【17】 列宾（1844—1930），俄国著名画家。

【18】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

【19】 聂赫留朵夫的名字德米特里的爱称。

【20】 原文为英文。

【21】 在帝俄时代，附印在有奖证券上的息票可以当现钱使用。

【22】 这个名字含有“美人儿”的意思。

【23】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

【24】 引自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

【25】 迦尔洵（1855—1888），俄国作家。

【26】 克莱曼蒂（1752—1832），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他的钢琴练习曲是当时初学钢琴者的必修课。

【27】 这种学校主要教授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绘画，而不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

【28】 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于一八七九年成立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秘密团体。

【29】 非洲东南部的一个民族。

第二部

一

再过两个星期，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由参议院审理，因此聂赫留朵夫打算在此之前赶往彼得堡，以便在参议院万一败诉的情况下，好按写状子律师的主意，向皇上告御状。如果上诉毫无结果，照律师的看法，对此应当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的理由很不充分，那么玛丝洛娃他们那批苦役犯可能在六月初出发，为了作好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的准备，聂赫留朵夫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所以他现在需要去趟乡下，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首先去的是库兹明，最近的一处黑土地的大田产，他的主要收入就是来自那里。他童年和少年时期曾在这座庄园里生活过，成年后又在那里住过两次，还有一次奉母亲之命送一个当总管的德国人去那里，并和他一起检查经营情况，因而早就熟悉田庄的状况和农民与账房，也就是与地主的关系。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说得好听点儿，是一种完全的依附关系，说得难听点儿，是农民受账房的奴役。这不是一八六一年已经废除的那种奴役，即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

役，而主要是所有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的共同奴役，有时也例外地受生活在农民中间的一些人的奴役。聂赫留朵夫知道这一点，而且也不能不知道，因为庄园的经营就是建筑在这种奴役之上，而他又曾协助料理过这种经营。不过，聂赫留朵夫不仅仅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是不合理的、残酷的，而且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时他信奉和宣扬亨利·乔治^[1]的学说，并根据这一学说，把父亲留下的土地分给农民，认为在当今时代拥有土地，就像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是一种罪恶。不错，自从他在军中服务，养成每年花费近两万卢布的习惯以来，所有他的这些观点已不再对他的生活具有约束力，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他不仅从来不问自己对遗产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而且还竭力不去想这个问题。可是，母亲的去世，遗产的继承以及财产，也就是土地的管理，使他又一次面对如何看待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月以前的话，聂赫留朵夫准会对自己说，要改变现行的制度，他无能为力，再说管理庄园的人又不是他——于是他住在远离庄园的地方，收取从那里汇来的钱，就会多少有些心安理得了。现在他却下了决心，尽管就要去西伯利亚，尽管同监狱方面的复杂而麻烦的关系需要用钱，他还是不能让庄园维持现状，一定要加以改变，宁可让自己

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不高的价钱分租给农民，使他们可以完全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不止一次将地主和农奴主的情况进行比较，认为不雇工耕种而把土地租给农民，相当于农奴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租制。这样虽然不能解决问题，却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这是由更为粗暴的压迫方式向不太粗暴的压迫方式的一种过渡。他打算就这么办。

聂赫留朵夫到达库兹明的时候，已近中午。因为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力求简朴，他没有发电报，而是从火车站雇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车夫是个年轻人，穿着土布长外套，腰身很长，下面打褶的地方束着皮带，按赶车人的习惯侧身坐在驭座上，十分乐意和坐车的老爷聊天，因为当他们讲话时，那匹累得喘不过气来的、瘸腿的白色辕马和那匹患气肿病的拉套的瘦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它们总是希望这个样子的。

车夫讲起库兹明庄园的管家，因为他不知道车上拉的正是庄园的主人。聂赫留朵夫有意不说破这一点。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人呀，”在城里住过并读过一些小说的车夫说。他侧身对着乘客坐着，一会儿握着长鞭柄的下半节，一会儿握着上半节，

显然想炫耀自己的文化修养，“他置了一辆三匹草黄马的马车，带着太太一出门，那派头别提有多大啦！”他继续说。“冬天过圣诞节，那座大房子里有圣诞树，我也是送客人去时看见的；还挂着小灯泡呢。全省都找不出第二家！他捞的钱呀，多得吓死人！他能不捞吗，他掌着大权呢。听说，他买了一份好田产。”

聂赫留朵夫想，不论那个德国人怎样经营他的田庄，怎样从中渔利，他全都无所谓。不过，这个长腰身的车夫说的话，还是让他心中不快。他欣赏着眼前这美好的一天，天上有不时遮住太阳的浓云，春播作物地上到处有农民忙着翻耕燕麦地，浓绿的草木上空有高高飞起的百灵鸟，树林里除去晚发芽的橡树，有披着新绿的其他树木，草地上有牛群和马，田野上有耕地的农民的身影——还有，不，不，他似乎想起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当他问自己：是什么呢？——这才想起是车夫讲的德国人在库兹明庄园作威作福的那件事。

聂赫留朵夫来到库兹明庄园后，立即着手处理事务，这种不快的感觉被忘掉了。

查看账目，找管家谈话，他天真地列举农民地少并被老爷的地所包围的种种好处，这一切更坚定了聂赫留朵夫的决心，停止经营自己的土地，把它全部分给农民。他从账目和与管家的谈

话中知道，情况还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最好的耕地由庄园的雇工用改良农具耕种，其余三分之一雇佣农民耕种，每俄亩的工钱是五卢布，这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个卢布，必须把那俄亩地犁三遍，耙三遍，播上种子，秋后还要收割，打捆，或者收割后直接送到打谷场，这就是说雇佣农民完成这些工作比雇佣廉价的零工每俄亩至少可以节省五卢布。农民从账房支取所有东西，都按最贵的价格，从工钱中扣除。他们使用草场、树林和土豆秧子，也要折成工钱，因此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欠账房的债。还有，远离庄园的土地雇佣农民耕种，每俄亩的收益，比按地价百分之五的利计算，要多四倍。

这些情况，聂赫留朵夫尽管以前也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十分新鲜，令他惊讶的是，他和所有处在他这种地位的那些人，怎么能够对这一不正常的现象视若无睹呢。管家找出许多理由，什么把土地交给农民，所有的农具就白白遭受损失，连原价的四分之一也卖不出来，什么农民会毁坏土地，像这样交出土地聂赫留朵夫会吃大亏，这些理由反而使聂赫留朵夫确信，他把土地交给农民，让自己失去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这次回来一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播种的庄稼，卖掉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这些事可以在他离开后由管家去办。现在要

做的是请管家明天召集库兹明庄园周围三个村子的农民来开会，他要向他们宣布自己的打算，并商定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带着坚决抵制了管家的理由和甘愿为农民作出牺牲的愉快心情，走出账房。他一面思考眼前要办的这件事，一面在房子周围闲走，走过今年已经荒芜的花圃（管家房前另辟了一个花圃），走过长满蒲公英的网球场^[2]，走过椴树林中的小路，以前他常在这条小路上散步和吸雪茄烟，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做客时，还在这儿同他调过情。聂赫留朵夫大致想了想明天要对农民们说的话，就去找管家，喝茶时又和他商量了一遍清理田产的问题，对这方面的事情完全放心之后，走进这座大宅子里为他准备好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平时是接待客人用的。

房间不大，清洁整齐，墙上挂着一幅威尼斯风景油画，两个窗子之间镶着一面镜子，摆放着一张干净的弹簧床和一张小桌，桌上有盛水的玻璃瓶、火柴和灭烛器。镜子旁边的大桌子上是他那只打开的皮箱，里面露出他的化妆用具盒和随身带的书籍：一本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一本英文书，都是关于同一类内容的。他想在这次下乡期间，抽空阅读这几本书，可是现在没有时间了。他打算上床休息，以便明天早

点儿起来，准备和农民们谈话。

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把古旧的红木雕花圈椅，他记得这把椅子是放在母亲卧室里的，一看见它，聂赫留朵夫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感情。他突然留恋起这座快要坍塌的房子，留恋起那个荒芜的花园，那片快被砍光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农具棚、机器和牛马，这一切虽然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置办和维持这份家业是多么不容易。以前他总以为，放弃这一切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如今他又觉得心里舍不得，舍不得这些土地和一半的收入，这笔收入也许是他目前非常需要的。于是，各种想法立即起来为他效力，最终的结论是，把土地交给农民并毁掉自己的产业，是不明智和不可取的。

“我不该占有土地。如果不占有土地，也就不必维持这份产业。再说，我现在要去西伯利亚，所以不论是房子还是产业，对我都用不着，”一个声音说。“这么说倒也不错，”另一个声音说，“可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如果你结了婚，就会有孩子。你接受的是一座完好的庄园，就应当完好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是负有责任的。交出去，毁掉这一切，是很容易的事，再想置办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首先，你应当考虑好自己的生活，对今后该怎么办要作出决定，再根据这一点来处理自己的财

产。你的决心是否很坚决呢？其次，你这么做到是真的凭自己的良心，还是做样子给人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同时不得不承认，别人对他的议论，是会影响到他的决心的。他想得越多，问题出现得越多，而且也越来越难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想法，他躺在干净的床上，想睡觉，以便明天能有个清醒的头脑，好解决今天这些让他理不出头绪的问题。可是他很久睡不着；青蛙的呱呱叫声伴随着新鲜空气和月光涌入敞开的窗子，夹杂着从远处公园里传来的夜莺清脆婉转的鸣唱，其中有一只就在窗前盛开的丁香花丛里。听着蛙叫和莺鸣，聂赫留朵夫不禁想起了监狱长女儿的琴声；想起监狱长，他又想起玛丝洛娃，想起她颤抖着嘴唇，说“您别再管我啦”时的样子，简直像呱呱叫时的青蛙一般。然后是那个德国管家下去捉青蛙。应当拦住他，可是他不仅下去了，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责备起他来：“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让步，”聂赫留朵夫想，一下惊醒，问自己：“我这么做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不知道，不过对我也无所谓。无所谓。该睡了。”于是，他也下到管家和玛丝洛娃去的那个地方，然后那儿的一切就结束了。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九点钟醒来。伺候老爷的年轻账房管事，听见他的动静，给他送来从没擦过这么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泉水，报告说，农民们快到齐了。聂赫留朵夫从床上一跃而起，头脑清醒过来。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和毁掉家业的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想起那种感觉，反而让他惊讶不已。他现在对眼下马上要办的事，心中感到高兴，同时也不由得感到自豪。从他房间的窗户，可以看见长满蒲公英的网球场【3】，农民们按管家的吩咐在那儿集合。青蛙昨晚呱呱地叫个不停，是不无道理的。今天是个阴雨天。从早晨起，下起了温暖的细雨，没有风，树叶、树枝和青草上面挂满了小小的水珠。窗外飘来草木的芳香，还有渴望雨水的泥土的气息。聂赫留朵夫穿衣服的时候，几次向窗外张望，观看农民们到网球场集合。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地走来，见了面相互脱帽致意，拄着拐杖，站成圆圈。管家是个肌肉发达、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穿一件绿色立领、纽扣很大的短上衣，走过来对聂赫留朵夫说，人到齐了，不过他们可以等一等——先请聂赫留朵夫喝点儿咖啡或茶，都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去见他们吧。”聂赫留朵夫说，想到要和农民谈话，竟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心中感到胆怯和害羞起来。

他是去实现农民们的愿望，这样的愿望他们连想都不敢想——把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租给他们，也就是说，他是去向他们施恩行善，可是他心里却不知怎么有点羞愧的感觉。等到他走到农民们的面前，他们纷纷脱帽行礼，露出一个个黄发的、鬃发的、秃顶的、白发的脑袋，他一时发窘，半天没说出话来。毛毛细雨还在不停地下，小小的雨珠儿洒满了农民们的头发、胡子和衣服的绒毛。农民们看着老爷，等着听他要对他们说什么，可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这种尴尬的沉默是由沉着而自信的德国管家打破的，他自以为很了解俄罗斯农民，并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个身强力壮、吃得膘肥体胖的人，也和聂赫留朵夫一样，同瘦脸上皱纹密布、尖瘦的肩胛骨从衣服底下鼓出来的农民，形成鲜明的对照。

“公爵想为你们办件好事——把土地交给你们，只是你们不配。”管家说。

“我们怎么不配，瓦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给你干活儿？我们对过世的女主人非常感激，愿她早升天国，我们对公爵少爷也很感激，他没把我们丢下不管。”一个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就是为这事才召集你们来的，要是你们乐意的话，我想把所有的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们不做声，好像没有听懂或者不相信似的。

“把土地交给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一个穿紧腰长上衣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让你们出不高的租金使用土地。”

“这可是一件好事。”一个老头儿说。

“只是租金要付得起才行。”另一个人说。

“给土地还能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靠土地吃饭！”

“您也省点儿事儿，光收钱就行啦，要不麻烦事儿才多呢！”一些人说。

“麻烦事儿都是你们搞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儿，能守规矩的话……”

“这我们可办不到，瓦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瘦老头儿说。“你说，我为什么把马放到庄稼地里，谁放啦：我一天到晚抡镰刀，干一天活就像干一年似的，夜里打了个盹儿，马就跑到你的燕麦地去了，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要是守规矩不就没事儿啦。”

“你说得倒轻巧——规矩，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一个黑头发、脸上长满胡子的高个儿中年人反驳说。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圈起来嘛。”

“那你给木料呀，”后面有一个长相难看、个子矮小的农民插嘴说。“我夏天就想圈，可是你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的虱子。这就叫圈起来。”

“他说的这是怎么回事？”聂赫留朵夫问管家。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管家用德语说。“每年都在树林里偷树，都被人逮住。你要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管家说。

“难道我们没尊重你？”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重你，因为我们在你手里；你可以随便摆布我们。”

“行啦，老兄，没人能欺负你们；只要你们不欺负别人就行了。”

“是啊，没人能欺负！夏天你打了我一个耳光，打了也没事儿。跟有钱人没法讲理，这是明摆着的。”

“你要是守法不就好了吗。”

显然，这是在进行一场舌战，参战双方并不十分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一方因害怕强忍着自己的愤怒，另一方却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和权力。聂赫留朵夫听了心里很难受，竭力使大家转回正事：商定租金和付款期限。

“土地的事到底怎么着？你们乐意不乐意？

要是把地全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报了个价钱。像往常一样，尽管聂赫留朵夫说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地租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还起价来。聂赫留朵夫本以为他定的价钱会被农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可是他却并没有看出他们有什么满意的表示。聂赫留朵夫只是从这一点上才断定他出的价钱对他们是有利的，那就是谈到由谁来承租土地——是由全体村民，还是由一部分人承租的时候，农民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想把体弱的和交租有困难的人排挤在外，另一些人是那些遭排挤的农民。最后多亏管家出力，才把价钱和交款的期限确定下来，于是农民们热闹地议论着走向山下的村子，而聂赫留朵夫也和管家去账房拟定租约。

一切按聂赫留朵夫所希望和预期的那样安排妥当：农民们得到了土地，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聂赫留朵夫来说收入还是富富有余，何况出售树林已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卖掉农具还会有另一笔收入。一切似乎很圆满，可是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儿惭愧。他发现，尽管有些农民对他说了感激的话，但他们并不满足，而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变成他损失很多，却没有能满足农民们的期望。

第二天，签订了土地租约。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的簇拥下，怀着事情没办完似的不愉快的心情，坐上了管家的三驾马车，也就是从车站来的车夫所说的那辆阔气的马车，同那些困惑和不满意地摇着头的农民们告了别，向车站驶去。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他不满意的究竟是什么，他不知道，不过他总觉得有点儿忧伤，有点儿惭愧。

三

聂赫留朵夫离开库兹明，前往他从姑姑们名下继承的庄园——那是他和卡秋莎相识的地方。他也想照库兹明的样子，处理这个庄园的土地；此外，还想尽可能地打听一下卡秋莎和那个孩子的事：他真的死了？怎么死的？他到达帕诺沃的时候恰好是清晨，马车一进院子，首先让他吃惊的是，所有的房屋，特别是正房，显露出一副荒凉颓败的景象。原本绿色的铁皮屋顶，久不油漆，已经锈得发红，几块铁皮向上翻卷，好像是暴风雨掀起的；正房四周的护墙板，有些已被人撬走，撬的是那些钉子生锈、容易撬动的地方。两个门廊——前门廊和他特别熟悉的后门廊，已经朽烂坍塌，只剩梁架；几个窗子缺了玻璃，钉上了木板，原来管家住的厢房，还有厨房和马

厩，都已破旧不堪，颜色灰暗。惟独那座花园没见荒芜，草木繁茂，眼下正是竞相开放的时候；从围墙外边可以看见盛开的樱桃花、苹果花和李子花，宛如朵朵白云。那道丁香篱笆也像十四年前一样开花了，那一年聂赫留朵夫和十八岁的卡秋莎在丁香丛里玩捉人游戏，摔了一跤，被荨麻刺破了手掌。索菲娅姑姑在屋旁栽的那棵落叶松，当时小的像根橛子，如今长成适合作材的大树了，枝条上披挂着黄绿色的、像柔软的绒毛一样的松针。河水溢出两岸，在下坡处的磨坊里发出哗哗的响声。河对岸的草地上，农民们的各种颜色的牛马混杂在一起，正在吃草。管家是个没毕业的神学校学生，微笑着在院子里迎接聂赫留朵夫，又微笑着请他进账房，同样微笑着走到间壁后面，仿佛用这种微笑预示着某种特别的东西似的。间壁后面传来悄悄的说话声，转眼又沉默了。车夫拿到赏钱，赶车离开院子，铃声叮当响过之后，四周变得又十分安静。随后，窗外有一个穿绣花上衣、耳朵上戴着绒毛球、赤着双脚的姑娘跑了过去，姑娘后面又跑过一个男人，厚靴子上的铁钉踩在坚硬的小道上，叮叮作响。

聂赫留朵夫在窗前坐下，望着花园，听着外面的声音。春天的清新空气和新耕土地的气息飘进开着的小窗，轻轻吹动他汗津津的额头上的头发和满是刀痕的窗台上的信纸。河上传来女人们

啪啦啪啦的捣衣声，声音此起彼落，在阳光照射下的河湾上飘荡。磨坊那边可以听见均匀的流水下落的声音。一只苍蝇惊恐而响亮地嗡嗡叫着，从他耳边飞过。

聂赫留朵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当他还年轻、心地也还纯洁的时候，曾在这里听过河上这种均匀的磨坊流水中的捣衣声，春风也是这样吹拂着他汗津津的额头上的头发和满是刀痕的窗台上的纸张，一只苍蝇也是这样惊恐地从他耳边飞过。他不仅仅想起自己当年十八岁时的情景，而且也感到自己还像当年那样，朝气蓬勃，纯洁无瑕，拥有无限美好的前程，可是他又知道，这一切只有梦中才会有，现实中已不存在，于是他又感到无比惆怅起来。

“您什么时候用饭？”管家微笑着问。

“随您的便，我不饿。我去村里走走。”

“您是不是到房子里面看看，里面我收拾得整整齐齐。请您看一看，如果房子的外观……”

“不，过会儿吧，请先告诉我，你们这里有一个叫玛特廖娜·哈林娜的女人吗？”

这是玛丝洛娃的姨妈。

“当然有，就住在村子里，我可真拿她没办法。她卖私酒。我知道的，训过她，骂过她，可是去告她，又于心不忍：一个老婆子，又有孙儿孙女。”管家说，脸上依旧带着那样的微笑，表

示他既想讨主人喜欢，又相信聂赫留朵夫也像他一样看待问题。

“她住在什么地方？我想去找她。”

“住在村那头，倒数第三家。左边有一所砖房，砖房后面就是她的小屋。最好还是我陪您去吧。”管家高兴地笑着说。

“不啦，谢谢您，我找得到，请您通知农民们一下，要他们来开个会：我要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打算也像在库兹明那样，在这儿和农民们把问题妥当解决，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今天晚上。

四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遇见那个耳朵上挂着小绒球穿花围裙的农家姑娘，飞快地迈着两只光着脚的粗腿，沿着长满车前草和独行草的牧场上一条踩得硬邦邦的小路跑来。她走在回家的路上，左手在胸前飞快地横着摆动，右手在肚子上紧紧按着一只红色的公鸡。那只摆晃着红鸡冠的公鸡，似乎显得极为安详，只是转动着眼珠，一只黑腿一上一下地伸缩，爪子抓住姑娘的围裙不放。当姑娘快到老爷跟前时，她先放慢脚步，由跑步改为慢走，等到她来到他面前，停住了脚步，把头向后一仰，再向前对他鞠了一躬，直到

他走过去，她才抱着公鸡离开。聂赫留朵夫走到坡下水井旁，又遇见一个驼背的老婆子，穿着肮脏的粗布衬衫，挑着沉甸甸的两桶水。老婆子小心翼翼地放下水桶，也像姑娘那样，把头向后一仰，再向前对他鞠躬行礼。

水井过后，就是村子。天气晴闷，刚刚十点钟就已经热得让人难受，飘浮的云彩偶尔才能把太阳遮住。整条街上弥漫着一股浓烈、刺鼻而又不太难闻的牲口粪味，一部分是从几辆沿着压得光亮的路上山的大车上飘来的，主要的是从各家院子里刨开的粪堆里传出的，聂赫留朵夫刚好走在这些院子敞开的门前。几个跟在大车后面上山的农民，光着脚，穿着溅满粪汁的衣裤，不时回头张望，看着这位戴灰色礼帽、缎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高大肥胖的老爷，手里拿着一根光滑的曲节手杖，沿着村子往坡上走，每走一步，手杖亮闪闪的镶头就点一下地面。从地里回来的农民们，坐在颠簸的空车驭座上，惊讶地看着这位走在他们街上的不平常的人，纷纷摘帽行礼；女人们走到门外的台阶上，相互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走过。

聂赫留朵夫经过第四家的门口时，一辆大车嘎吱嘎吱地从大门里出来，把他挡住，车上装着牲口粪，堆得很高，拍得很实，顶上铺着一块供人坐的粗席。一个六岁的男孩跟在大车后边，激

动地等着坐车。一个年轻的农民，脚上穿着树皮鞋，大步赶车出门。有匹长腿青马驹从门里窜出来，看见聂赫留朵夫，吓了一跳，身子贴到大车上，车轮碰痛了腿，又一下窜到拉着沉重大车出门的母马前面，母马有点担心地轻轻嘶叫起来。后边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精壮的瘦老头儿牵着，老头儿也光着脚，穿着条纹裤子和肮脏的长衬衫，腰部的尖骶骨十分突出。



等到几匹马上了撒满灰色的、仿佛烧焦似的粪块的大路，老头儿转回身，向聂赫留朵夫鞠了

一躬。

“你是我们小姐的侄子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子。”

“欢迎。怎么，来看我们？”老头儿很爱说话，问。

“对，对。怎么样，你们过得好吗？”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叫什么日子呀！我们过得糟透了。”爱说话的老头儿仿佛愉快地拉长声音说。

“为什么这样糟？”聂赫留朵夫一边走进大门，一边说。

“这叫什么日子呀！过得糟透了。”老头儿说完，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大门，来到棚子底下一块铲净了牲口粪便的空地上。

聂赫留朵夫也来到棚子底下。

“瞧，我家一共十二口人。”老头儿用手指着两个女人说，她们手握粪叉，站在还没有清走的粪堆旁，头巾滑在一边，满头是汗，裙摆掖在腰里，露出半截溅满粪汁的腿肚子。

“每个月都得买六普特粮食，钱从哪儿来呀？”

“自己打的粮食不够吃？”

“自己打的？”老头儿冷笑着说。“我的地只够养活三口人，今年总共收了八垛粮食，还吃不到圣诞节呢。”

“那你们怎么办呀？”

“我们是这么办的：把一个孩子送去做工，又从您府上借了点儿钱。还不到大斋节就全用光了，税还没交上呢。”

“税是多少？”

“我这户每季交十七卢布。唉，千万可别过这种日子啦，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应付！”

“可以进你们家里看看吗？”聂赫留朵夫说着，离开铲净的地方，踩着还没有翻过和已经用叉子翻过的气味浓烈的棕黄色牲口粪，往院子里走去。

“有什么不可以的，请进。”老头儿说，光着的两脚加快了速度，脚指头缝里直往外冒粪水，赶到聂赫留朵夫前头，给他打开屋门。

那两个女人理好头巾，放下裙摆，好奇而又害怕地看着这位衣着整洁、袖口钉着金纽扣的老爷进了他们的家门。

屋里跑出两个穿粗布衬衫的小姑娘。聂赫留朵夫弯下腰，摘掉帽子，走进门道和散发着食物的酸腐味道、放着两架织布机的又脏又窄的屋子。屋里有一个老太婆站在炉子旁，卷着袖子，露出两条干瘦的黑胳膊。

“瞧，东家老爷看我们来了。”老头儿说。

“哎呀，快请进来。”老太婆放下卷着的袖子，亲热地说。

“我想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说。

“对付着过呗，这不，你都看见了。房子就快倒了，说不定砸死人呢。可老头子说，这就不错啦。瞧，我们就这么过日子，可自在啦，”老太婆神经质地摇着脑袋，利落地说。“我得准备开饭了。给干活儿的人喂饱肚子。”

“你们午饭吃什么呀？”

“吃什么？我们的饭菜可好啦。第一道菜是面包加克瓦斯，第二道是克瓦斯加面包。”老太婆说，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

“别，别开玩笑，让我看看你们今天吃什么。”

“吃什么？”老头儿笑着说。“我们吃饭不讲究。老婆子，让他看看吧。”

老太婆摇了摇头。

“想看我们庄稼人吃的饭？老爷，我看你真是爱刨根问底的人。什么事都想知道。我说啦，面包加克瓦斯，还有汤，羊角芹是昨天娘儿们送来的；瞧，这就是汤，那儿是土豆。”

“没别的啦？”

“还能有什么，汤里再加点牛奶。”老太婆说完，笑着望望门外。

门是开着的，过道里站满了人；男孩、女孩、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们挤在门口，看这位古

怪的老爷观察农民们的饭菜。老太婆显然因为自己会和老爷周旋而感到十分得意。

“真的，老爷，我们过得糟透了，糟透了，没法说呀，”老头儿说。“你们跑来做什么！”他对站在门口的人喊道。

“好啦，再见吧。”聂赫留朵夫说，心里觉得尴尬和羞愧，为什么这样，自己也不知道。

“多谢你来看我们。”老头儿说。

过道里的人互相挤了挤，给他让路，他来到大街上，往上坡走去。两个光脚的男孩跟着他从过道里走出来：一个稍大点儿，穿一件脏得分不出颜色的白衬衫，另一个穿一件瘦小的、褪了色的粉红衬衫。聂赫留朵夫看了他们一眼。

“你现在去哪儿呀？”穿白衬衫的男孩说。

“去玛特廖娜·哈林娜家，”他说。“你们认识吗？”

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知怎的笑起来，大点儿的男孩表情严肃地反问道：

“哪一个玛特廖娜？岁数大的那个？”

“对，岁数大的。”

“噢——噢，”他拉长声音说。“那是谢苗尼哈，她在村头。我们领你去。走，费吉卡，带他去。”

“那马呢？”

“没事儿！”

费吉卡同意了，于是他们三人往村子上方走去。

五

聂赫留朵夫感到和孩子们在一起，比和大人们在一起轻松得多，一路上跟他们聊天。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再笑，讲起话来有条有理，像个大人似的。

“那，你们这儿谁家最穷啊？”聂赫留朵夫问。

“谁家穷？米哈伊尔家穷，谢苗·马卡罗夫家穷，还有玛尔法家更穷。”

“还有阿尼西娅呢，她家最穷。阿尼西娅家连牛也没有，还要饭呢。”小费吉卡说。

“她家是没有牛，可是他们总共才三口人，玛尔法家有五口人。”大点儿的男孩反驳说。

“那她还是寡妇呢。”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坚持自己对阿尼西娅的看法。

“你说阿尼西娅是寡妇，玛尔法也一样是寡妇，”大男孩继续说。“反正丈夫不在家。”

“丈夫哪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在监狱里喂虱子呢。”大男孩用了一句大人们常用的话。

“夏天他从东家老爷的树林里砍了两棵小桦

树，把他关进牢里了，”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赶紧说。“现在有五个月了，老婆要饭，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有病的老太婆，”他有条有理地说。

“她住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

“瞧，就是这家。”男孩说着，用手指了指一座房子，房前有一个很小的淡黄色头发的男孩，长着一双罗圈腿，摇摇晃晃地站在聂赫留朵夫要走的那条路上。

“瓦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哪儿去啦？”一个身穿肮脏的、像是沾满炉灰的灰色衬衣的女人，从屋里跑出来，大声叫着，一脸惊恐地冲到聂赫留朵夫面前，抱起孩子就往屋里走，仿佛害怕聂赫留朵夫会对她的孩子下毒手似的。

这就是那个女人，她的丈夫因砍了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小桦树而坐牢。

“那玛特廖娜呢，她家也穷吗？”等他们走近玛特廖娜家时，聂赫留朵夫问。

“她可不穷：她卖酒。”穿粉红衬衫的瘦男孩果断地回答。

到了玛特廖娜门前，聂赫留朵夫把孩子们打发走，然后进入过道，接着进入屋子。玛特廖娜老婆子的小屋有六俄尺长，炉子后面的床上容不下一个伸直身子的高个子的人。“就是在这张床上。”聂赫留朵夫想，“玛丝洛娃生下了孩子，后

来又生了病。”整个小屋几乎被一架织布机占得满满当当，聂赫留朵夫脑袋碰着门框进屋的时候，老太婆和大孙女刚刚收拾完织布机。还有两个孙子紧跟着老爷，飞也似的跑进屋子，双手抓着门框，在门口站住。

“你找谁？”老太婆因织布机出了毛病，情绪很坏，生气地问。此外，她贩卖私酒，怕见任何生人。

“我是地主。我想和您谈谈。”

老太婆沉默不语，仔细打量着他，然后突然整个变了张脸。

“哎呀，是你，亲爱的，我真糊涂，没认出来：我以为是个什么过路人呢，”她用装出的亲热口气说。“哎呀，我的好少爷……”

“我们谈话，最好没有旁人在场。”聂赫留朵夫说着，望望敞开的门，门口站着几个孩子，孩子背后站着一个抱娃娃的瘦女人，娃娃戴着碎布缝的小圆帽，十分虚弱，病得脸色惨白，却一直在笑。

“看什么看，我让你们知道点儿厉害，把拐杖给我拿来！”老太婆对站在门口的人叫道。“把门关上，听见没有！”

孩子们走开了，抱娃娃的女人把门关上。

“我心想：是谁来了？原来是老爷你呀，我的好人，可爱的美男子！”老太婆说。“你怎么到

这儿来啦，也不嫌脏。哎呀，你这金贵的人呀！坐这儿来，公爵老爷，就坐这个矮柜上吧，”她一边说，一边用围裙擦矮柜。“我还认为是哪个鬼来了呢，原来公爵你呀，我的好老爷，恩人，我们的衣食父母。请原谅我这个老糊涂，我真是瞎眼啦。”

聂赫留朵夫坐下，老太婆站在他面前，右手支着腮帮子，左手托着右手的尖胳膊肘，用唱歌一样的声音说：

“老爷，你见老啦；那会儿你像草那么嫩，现在变成什么样啦！看得出，操心事也不少。”

“我是打听一件事：你还记得卡秋莎·玛丝洛娃吗？”

“卡捷琳娜吧？怎么不记得，她是我外甥女嘛……怎么不记得；我为她流过多少眼泪，眼泪呀。那件事我全知道。我的老爷，谁在上帝面前没有罪过，在皇上面前没犯过法？年轻人嘛，喝点茶咖啡什么的，就让魔鬼迷住了，魔鬼也是很厉害的嘛。有什么办法呀！你又没丢下她不管，还赏了她：一下子给了一百卢布呢。可她干的又是什么呀。没有一点儿头脑。要是她能听我的话，她会过得不错的。她虽说是我的外甥女，我也要直说：她是个放荡的姑娘。我后来给她找了个多么好的差事：她不听话，还骂东家。我们这等人难道可以骂老爷？这可好，人家把她辞了。

后来在林务官家里也能干的嘛，可她又不愿意。”

“我想问问那孩子。她是在你家生的吧？孩子在哪儿？”

“我的老爷，我那会儿可是把孩子安排得好好地。我按规矩给那个男婴洗了礼，把他送进了育婴堂。母亲快要死了，能让小宝贝受罪吗。要是别人呀，准丢下孩子不管，不给他吃的，他一下就得死掉；可是我想：怎么能这样呢，还是操点儿心，送育婴堂吧。正好有几个钱，就找人送走了。”

“有编号吗？”

“编号是有，可孩子当时就死了。她说，孩子刚送到，他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村的那个女人。她是干这行当的。她叫玛拉尼娅，现在死啦。真是个聪明的女人——可会干啦！人家把孩子给她送来，她收下，养在家里，喂着。我的老爷，她喂着，是等多凑几个再送。等凑到三四个，马上就送走。她想了个聪明的法子：做了个大摇篮，像个双人床似的，横竖都能放孩子。还装着把手。她放进四个孩子，脑袋在两头，脚对着脚，免得碰着，这样一下能送走四个。她把奶嘴塞进他们嘴里，那些小宝贝们吸着就不出声了。”

“那后来呢？”

“后来，卡捷琳娜的孩子就让她送走了。

噢，好像在她家养了两个星期。他还长了一身疖子呢。”

“孩子长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好看极了，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看的孩子了。和你一模一样。”老太婆的一只老眼眨了一下，补充说。

“他为什么那样弱？是喂得不好吧？”

“那叫什么喂！不过是装样子。这不是明摆着的事，不是自己的孩子。只要能活着送到就行。她说，那孩子刚送到莫斯科，就断气了。她连证明都带回来了——手续一样不差。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关于他的孩子，聂赫留朵夫仅仅打听到了这些。

六

聂赫留朵夫又在小屋门框和过道门框上磕了一下脑袋，才走到大街上。穿烟白色衬衫和粉红色衬衫的那两个男孩在等他。还有几个新来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几个抱孩子的女人也在等，其中就有刚才那个瘦女人，毫不费劲地抱着那个脸上没有血色、头戴碎布缝的圆帽的娃娃。娃娃的

像小老头似的脸上，还在不停地怪笑，同时也不停地摆动使劲扭曲着大拇指。聂赫留朵夫知道，这是一种痛苦的笑。他问，这个女人是谁。

“这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阿尼西娅。”大点儿的男孩说。

聂赫留朵夫转向阿尼西娅。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他问。“靠什么生活呀？”

“过得怎么样？要饭呗。”阿尼西娅说完，哭起来。

长得像小老头的娃娃，扭动着蚯蚓一样的细腿，脸上堆满了笑。

聂赫留朵夫掏出钱包，给了那女人十个卢布。他还没走出两步，另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追上他，接着是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是一个女人。她们向他诉说自己的贫困，要求帮帮她们。聂赫留朵夫把他钱包里所有的六十卢布零钱全都给了出去，然后心情十分阴郁地回到家里，也就是管家的厢房。管家微笑着迎接聂赫留朵夫，通报说，农民们晚上来开会。聂赫留朵夫谢过他，没进房间，沿着撒满白色苹果花瓣、长着青草的小路向花园走去，思索着刚才他看到的一切。

厢房周围起初静悄悄的，可是后来聂赫留朵夫听见管家厢房里有两个女人愤怒的争吵声，偶尔还夹杂着那位老是一脸笑模样的管家平静的声

音。聂赫留朵夫留心听起来。

“我都快完了，你还往我脖子上加套儿？”一个愤怒的女人的声音说。

“那牛刚跑进去嘛，”另一个声音说。“还给我，我说。你干吗折磨那头牛，害得孩子们没奶吃。”

“交罚款，要不就干活儿抵。”管家平静的声音说。

聂赫留朵夫走出花园，来到门前的台阶旁，那儿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一个显然怀着身孕。管家两手插在帆布大衣的口袋里，站在台阶上。看见老爷来了，两个女人不说话，整理起头上滑落的头巾；管家把手从口袋里抽出，笑了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管家说，农民们故意把自己的小牛甚至奶牛放到老爷的草场上。现在这两个女人家的奶牛在草场上被逮住，赶到这里来了。管家要那两个女人每头牛交罚金三十戈比，或者干两天活儿作抵偿。女人们坚持说，第一，她们的牛不是故意进去的；第二，她们没钱；第三，她们就是答应干活儿，也先得把牛立即放了，它们从早上起就在后院牲口棚里圈着，没吃一口草料，正可怜地叫唤呢。

“我提醒多少次了，”微笑着的管家一边说，一边看聂赫留朵夫，仿佛要他做见证似的，“要

是你们赶着牲口回去吃饭，注意看好牲口。”

“我刚跑开去看孩子，它们就走掉了。”

“你是在看牲口，就不能离开。”

“那谁喂孩子？你又不能给他喂奶。”

“要是真的把草场糟蹋了，我们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才刚刚跑进去呀。”另一个女人说。

“整个草场都给糟蹋了，”管家对聂赫留朵夫说。“如果不处罚，一点干草都收不到。”

“喂，别冤枉人，”怀孕的女人说。“我家的牲口可从来没有被逮住的事。”

“这次就逮住了，交钱吧，要不就干活儿。”

“好吧，干活儿，把牛放了，别叫它挨饿！”她愤怒地喊道。“这还日夜不得闲呢。婆婆有病。丈夫是酒鬼。我一个人忙里忙外，都快累死了。你还要让我干活儿，说这话也不怕噎死你。”

聂赫留朵夫要管家把牛放掉，然后又去花园继续思索，可是现在却没什么好思索的了。现在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清清楚楚，不过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么清楚的事情，人们怎么看不出来，他自己怎么也长期看不出来。

“农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对死亡已经麻木不仁，而且形成了一种适应这种死亡的生活方式——任凭儿童夭折，女人们从事力所不及的劳动，所有的人，尤其是老人，食品缺乏。他们渐

渐落入这么一种状况，既看不到它的可怕，也不对它有什么抱怨。所以，我们就认为他们这种状况是自然的，理所应该的。”如今，这一道理对他来说，像青天白日一样清楚，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惟一用来养家糊口的土地被地主们占去，而这一原因他们是有所认识，也常常提出来的。此外，他十分清楚，儿童和老年人大批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喝，他们之所以没有牛奶，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放牲口，也没有土地收获粮食和干草。他十分清楚，农民的全部灾难，或者至少说，农民灾难的主要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养活他们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靠农民的劳动来生活的人手里。农民极其需要土地，没有土地就会成批死去，可是这些陷入极度贫困的人们耕种土地，收获的粮食却被用来销往国外和供土地拥有者们购买礼帽、手杖、马车、铜器等等。这个道理现在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就好比关在栅栏里的马，当它吃完脚下的草，又不能到有草的土地上去觅食，就会消瘦和饿死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不能，也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下去。应当找出一个可以消除这种现象的方法，或者至少自己不要参与制造这种现象。“我一定要找出这样的方法，”他一边在附近的桦树林中的小道上徘徊，一边想。“我们常常在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关

和报纸上讨论农民贫困的原因和改善他们生活的方法，惟独没有谈到这种无可怀疑的、准能改善农民生活的方法，那就是停止占有他们必需的土地。”于是，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的基本理论和自己对它的迷恋，心中暗暗奇怪，怎么会忘得一干二净。“土地好比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不应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应成为买卖的对象。人人都有权享用土地和土地给人们提供的好处。”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想起自己在库兹明处置土地的方法，就感到羞愧。他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明明知道个人无权占有土地，却又认定自己拥有这种权利，他把土地的一部分收益送给农民，可是内心深处又知道，他对这份收益没有享用的权利。现在，他决不再干这种事，而且还要改变他在库兹明实行的方法。他在自己的头脑里拟定一个方案，把土地交给农民，但要支付租金，租金可以看作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拿出这笔钱的目的，是用于交税和公益事业。这不是单一税^[4]，而是现行制度下最接近单一税的可行办法。不过主要的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等他回到房里，管家特别高兴地微笑着请他去吃午饭，并表示担心妻子在耳朵上戴绒球的姑娘的帮助下，菜做得没拿准火候。

桌上铺着一块粗桌布，放着一块绣花毛巾代替餐巾。桌上还摆着一个断了把手的撒克逊古瓷

汤盆，盛着土豆鸡汤，那只黑爪子一上一下伸缩不停的公鸡已被宰杀，甚至切成碎块，许多地方还带着鸡毛。吃过鸡汤，下一道菜仍旧是那只带着炸焦的毛的公鸡，还有加了大量奶油和糖的煎奶渣饼。饭菜的味道虽然很差，聂赫留朵夫却没有留意吃的是什麼：他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从村子里带回的烦恼一下子得到了解决。

每当耳朵上戴绒球的姑娘怯生生地上菜的时候，管家的妻子总要在门外张望，而管家本人却越来越开心地笑着，为妻子的手艺感到自豪。

饭后，聂赫留朵夫尽力让管家坐下。为了检验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同时也为了向某个什么人倾诉让他如此着迷的问题，他对管家讲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那个方案，并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管家微笑着，装作他早就想过此事，现在很愿意听的样子，其实他根本什么也没听懂，这倒不是因为聂赫留朵夫讲得不清楚，而是因为这一方案意味着聂赫留朵夫将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可是管家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人人都在损人利己，所以当聂赫留朵夫说土地的全部收入应当成为农民的公积金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儿听不懂了。

“我懂了。就是说，您要从公积金中收取利息吧？”他眉开眼笑地说。

“啊，不是。您要知道，土地不能成为个人

的私有财产。”

“这倒没错！”

“还有土地所提供的一切，都属于大家所有。”

“那您不就没有收入了吗？”管家收起笑容，问。

“我正准备放弃呢。”

管家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又微笑起来。现在他明白了。他明白了，聂赫留朵夫是个头脑不太健全的人，于是立即在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中，为自己寻找有利的东西，一心想把这个方案看作可以从中渔利的手段。

当他最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他深感失望，不再对方案发生兴趣，只是为了讨好东家，才继续不停地微笑。聂赫留朵夫看到管家不能理解他，就放他走了，自己在布满刀痕和墨迹的桌子旁坐下，动手起草他的方案。

太阳已经落到刚刚长出新叶的椴树后面，蚊子成群结队地飞入房间，叮咬聂赫留朵夫。他刚打完草稿，就听到村子里传来牲口的叫声、嘎吱的开门声和来开会的农民们的说话声。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叫农民们到账房来，他自己到村子里农民们集合的那个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匆匆喝完管家端来的一杯茶，抬腿向村子里走去。

七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嘈杂，可是聂赫留朵夫一到，人们立即安静下来，农民们像在库兹明那样，纷纷摘掉帽子。这个地方的农民，比库兹明的农民要愚昧得多；村姑和村妇们耳朵上戴着绒球，男人们几乎个个穿皮鞋、土布衬衫和长上衣。有些人打着赤脚，只穿衬衫，像是刚干完活儿回来。

聂赫留朵夫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讲起话来。他向农民们宣布，他打算把土地全交给他们。农民们默不作声，脸上的表情没起任何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赫留朵夫红着脸说，“土地不应该由不种地的人占有，每个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是理所应当的嘛。这话对极了，”响起农民们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继续说，土地的收入应该由大家平分，所以他建议他们收下土地，并按他们自己定的价格付钱，这笔钱当作公积金，仍归他们使用。又响起称赞和同意的声音，不过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变得越来越严肃了，原来看着老爷的那一双双眼睛垂了下来，仿佛不想表示他们已看穿他的诡计和谁也不会上他的当来使他难堪似的。

聂赫留朵夫讲得相当清楚，农民们不是傻瓜，可是他们却没有听懂，而且也无法听懂他说的话，那原因和管家半天没有搞懂他的意思是一样的。他们确信，维护个人的利益是每个人的本性。对于地主，他们早就从祖祖辈辈积攒的经验中知道，地主永远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地主今天把他们召集起来，提出一个什么新的章程，显然是为了更狡猾地欺骗他们。

“怎么样，你们想交多少土地税？”聂赫留朵夫问。

“怎么要我们交税。我们交不了。地是您的，权利也是您的。”人群中有人回答。

“不是的，这些钱归你们使用，用在村社的公益事业上。”

“我们可变不了。村社是村社，钱是钱。”

“你们要明白，”跟着聂赫留朵夫来的管家想把事情解释清楚，微笑着说，“公爵把地交给你们，要你出钱，这些钱还算你们的资金，用在村社的事情上。”

“我们非常明白，”一个没牙的老头儿没有抬起眼睛，生气地说。“这和银行差不多，只是我们得按期交钱。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本来就够难的了，再这样非破产不可。”

“这么做没有必要。我们最好还照老办

法。”几个不满、甚至不客气的声音说。

等到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一份契约，他在上面签字，他们也要签字的时候，农民们反对得更起劲了。

“签字做什么？我们以前怎么干活儿，以后还怎么干活儿。这一套有什么用？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粗人。”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事儿让人不习惯。以前怎么办，以后还怎么办好啦。只要不让我们出种子就行。”几个声音说。

所谓不出种子，指的是按现行的规矩，在收成对半分的田地上播种，种子由农民出，现在他们要求种子由地主老爷们出。

“这么说，你们是拒绝啦，不想要土地了？”聂赫留朵夫对一个年纪不老、满面红光的赤脚农民说。这个人穿一件破旧的长衣，弯着左手，非常端正地托着一顶烂帽子，就像士兵听到命令，摘下帽子，托在手中一样。

“是，老爷。”这个显然还没有摆脱军人习惯影响的农民说。

“这么说，你们的地够用啦？”聂赫留朵夫说。

“不够，老爷，”退伍老兵装出愉快的样子回答，使劲儿托着胸前那顶烂帽子，好像要送给随便哪个愿意戴它的人似的。

“好啦，你们还是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吧。”顿感意外的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又把自己的建议重复了一遍。

“我们没什么好想的：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没牙的老头儿阴沉着脸，生气地说。

“我明天还在这儿待一天。你们要是改变主意，那就来个人告诉我。”

农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聂赫留朵夫一无所获，转身向账房走去。

“公爵，您听我说，”等他们回到家里，管家说，“您同他们是谈不到一块儿的；那是一些顽固不化的人。只要一开会，他们就固执己见，推都推不动。因为他们什么都怕。可是这些庄稼人，比如不同意您的意见的那个白头发和黑头发的，其实都是聪明的人。要是他们到账房来，一请他们坐下喝茶，”管家微笑着说，“他们谈起话来活像一位大臣，聪明极了，什么事都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在会上就完全变了个人，老是翻来覆去地说他认定的那一套……”

“那能不能叫几个这样最明白事理的农民到这儿来，”聂赫留朵夫说，“我跟他们详细解释一下。”

“这好办。”管家满面笑容地说。

“那就请您叫他们明天来吧。”

“这很好办，我让他们明天来。”管家说完，

又高兴地笑了。

“瞧，他有多猾！”一个胡子乱蓬蓬从没梳理过的黑脸农民，骑在一匹肥马上摇晃着身体对另一个农民说。这个农民又老又瘦，身穿破旧的长衣，骑马走在他旁边，马腿上的铁绊索叮当作响。

这两个农民在大路上让马吃夜草，也偷偷地把马放到老爷的树林中去。

“只要签个字，就把地白送给你。他们欺骗我们兄弟们的事还少吗。不，兄弟，办不到，我们现在也明白啦，”他补充说，接着招呼一匹走远的周岁马驹。“小马，小马！”他喊叫着，止住马，回头看了看，可是马驹不在后面，而是往侧面的草场去了。

“瞧这狗杂种，跑到老爷的草场上去了，”胡子乱蓬蓬的黑脸农民听到离群的马驹嘶鸣着在满是露水、散发着好闻的沼泽气息的草地上奔跑，踩得酸模发出嚓嚓的响声，说道。

“你听，草场上长满了草，到了休息日让娘儿们上对分制的田里除草，”穿破长衣的瘦子说，“要不会把镰刀弄坏的。”

“他说，签字吧，”胡子乱蓬蓬的农民继续评论东家老爷的话。“一签字，他准把你活活吞了。”

“这话不假。”年老的瘦子说。

他们不再说什么。只有马蹄踏在坚硬的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八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账房已收拾好供他过夜，里面有一张高大的床，铺着鸭绒褥子，摆着两只枕头和一条深红色的双人缎子被，绗得很密实，厚得无法叠起——显然是管家妻子的嫁妆。管家问聂赫留朵夫要不要吃点剩下的饭菜，得到否定的答复并对吃住条件不好表示歉意后，走了出去，把聂赫留朵夫一个人留在屋里。

农民们的拒绝丝毫没有让聂赫留朵夫感到窘迫。相反，尽管库兹明那里的农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再三道谢，而这里的农民对他表示不信任甚至敌意，但他心里却十分平静和快乐。账房里又闷又脏。聂赫留朵夫走到院子里，想去花园，可是他想起了那个夜晚、女仆房间的窗户和后门的廊子——于是感到不快，不愿再去踏上那些被犯罪的往事玷污过的地方。他又在台阶上坐下，呼吸着弥漫在温暖的空气中的桦树嫩叶的浓重的香气，久久注视着渐渐暗淡下来的花园，倾听着磨坊的流水声、夜莺的啼鸣和台阶旁边灌木丛中一只鸟的单调的叫声。管家窗子里的灯光熄灭了，

板棚后面的东方，刚升起的月亮闪耀着光芒，空中的闪电把长满青草、开满鲜花的花园和残破的房屋照得越来越亮，远处传来阵阵雷声，天空有三分之一被乌云遮住。夜莺和别的鸟儿停止了啼叫。从磨坊喧响的流水声中可以听见鸭子的嘎嘎叫声，稍后早醒的公鸡在村子里和管家的院子里，开始此起彼应地鸣叫，每逢闷热的雷雨夜，它们总是这样提早鸣叫。有句俗话说得好，公鸡叫得早，夜里没烦恼。这一夜对聂赫留朵夫来说，不仅仅没有烦恼。对他来说，这简直是快乐而幸福的一夜。当他还是一个纯洁的青年时在这里度过的那个美好的夏天，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于是他感到自己现在不仅和当年一样，而且和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刻相比，也毫不逊色。他不仅想起，而且感到自己依旧是当年那个十四岁的少年，依旧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给他揭示真理，依旧像孩子一样哭着伏在母亲的膝上同她告别，向她保证永远做一个善良的人，决不惹她伤心——还感到自己依旧像当年同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在一起时那样，决心永远互相支持，共创美好生活，竭力为所有的人谋求幸福。

这时，他又想起自己在库兹明受到诱惑，留恋房子、树林、牲畜、农具和土地，于是他问自己：他留恋吗？他甚至觉得奇怪，他怎么会有这种留恋之情。他想起今天所见到的一切：那个一

人带几个孩子的女人，丈夫因砍了他聂赫留朵夫树林中的小树而坐牢，还有那个坏女人玛特廖娜，居然认为或者至少说什么她们那种身份的女人，应当去给老爷们做情妇；想起她对孩子们做的事和把他们送往育婴堂的方法，还有那个一直在笑，戴着小圆帽，长得像个小老头，饿得快要死了的可怜孩子；想起那个怀孕的瘦弱女人，因为过分劳累没有看住她家那头饥肠辘辘的奶牛，被罚为他白白干活儿。于是他立即想起监狱，想起那些剃去一半头发的脑袋、牢房、污秽的空气、铁镣，以及与此形成对照的自己和京城、都市里所有贵族们的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一切是十分明显的，不容怀疑。

明亮的、接近圆了的月亮，从板棚后面升了起来，院子里铺上道道黑影，残破的房子的铁皮房顶闪闪发光。

沉默了一阵的夜莺，仿佛不愿意辜负这大好的月光似的，又在花园里啼啭起来。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在库兹明怎样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怎样解决他以后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还想起他陷在这些问题里面，怎么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每个问题都让人大伤脑筋。现在他又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奇怪的是一切竟那么简单。说它简单，是因为他现在不考虑他会有什么后果，甚至丝毫对此不感兴趣，他考虑的只是他

应当做什么。令人惊讶的是，应当为自己做什么，他怎么也搞不明白，而应当为别人做什么，他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他现在清楚地知道，应当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占有土地是丑恶的。他清楚地知道，不应当丢下卡秋莎不管，应当帮助她，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弥补自己对她犯下的罪过。他清楚地知道，应当研究、分析、弄清、弄懂审判和刑罚方面的所有问题，因为他感到自己从中发现了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一切是否能有结果——他不知道，不过他清楚地知道，不论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是第三点，他都必须去做。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才让他感到了快乐。

乌云渐渐逼近，现在看到的已不是远处闪电的反光，而是照亮整个院子、残破的房屋和断裂的门廊的闪电，雷声也已在头上响起。鸟全都安静了，树叶却沙沙响起来，风吹到聂赫留朵夫坐的台阶上，撩动他的头发。一粒雨点飞落下来，接着是第二粒，敲打着牛蒡叶子和铁皮屋顶；周围的一切都静了下来，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数到第三粒雨点，头顶正上方一声霹雳，接着空中隆隆响起雷声。

聂赫留朵夫走进房里。

“是啊，是啊，”他想。“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事情，所有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不理

解，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两个姑姑；为什么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死了，而我却活着？为什么有卡秋莎？为什么我神魂颠倒？为什么有那场战争？为什么我后来过起放荡生活？要理解这一切，理解作为一个主人的全部经营管理——我无能为力。不过，履行铭刻在我良心上的这个主人的意志——却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一点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清清楚楚地感到内心变得十分平静。”

小雨已经变作倾盆大雨，雨水从房顶上流下，哗哗地落入木桶；闪电偶尔才照亮院子和房屋。聂赫留朵夫回到屋里，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不无担心地想到臭虫，因为破旧而肮脏的墙纸让他怀疑到它们的存在。

“是的，要想着自己不是主人，而是仆人。”他想，为有这个想法而感到高兴。

他的担心应验了。他刚刚熄掉蜡烛，就有小虫爬上来咬他。

“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跳蚤，臭虫，不卫生……唉，没什么了不起的，既然应该忍受这一切——那就忍受吧。”可是，尽管有这样的愿望，他还是无法忍受，索性坐到敞开的窗旁，欣赏渐渐远去的乌云和重又露面的月亮。

接近凌晨的时候，聂赫留朵夫才睡着，因此第二天醒得很晚。

中午，七名被推选出来的农民，应管家的邀请，来到苹果园里的苹果树下。管家已让人在那儿的木桩上搭了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费了很大劲儿劝说农民们戴上帽子，坐到长凳上。尤其是那个老兵，今天裹着干净的包脚布，穿了一双干净的树皮鞋，特别固执地把破帽子托在胸前，那姿势就像“在葬礼上”一样。直到他们当中有一个老汉，相貌令人起敬，肩膀宽阔，留着米开朗琪罗的摩西^[5]那样髭曲的花白大胡子，晒黑的秃脑顶周围长着一圈浓密的灰白髭发，戴上他的大帽子，掩上新土布外衣的前襟，走到长凳前坐下，其他的人才学起他的样子。

等大家分别坐下后，聂赫留朵夫也在他们对面坐下，胳膊支在桌面的一张纸上，那是拟好的方案提纲，开始讲起这个方案来。

不知是因为农民的人数较少呢，还是因为他心里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反正这一次聂赫留朵夫没有感到丝毫慌乱。他说话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望着那个留着髭曲花白大胡子的宽肩膀老汉，看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不过，聂赫留朵夫却对他估计过高了。这位令人起敬的老汉，虽然不时赞成地点着他那漂亮的族长似的头，或者当别人表示反对时，皱着眉摇摇头，可是显然是在

别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转述了一遍聂赫留朵夫说的话之后，他才勉强弄明白。倒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老头更能听明白聂赫留朵夫的话。这个人身材矮小，瞎了一只眼睛，身穿打着补丁的黄色土布长衣，脚上是一双踏歪了的破皮靴，几乎没有胡子，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砌炉匠。他快速地动着眉毛，用心地听着，然后马上用自己的话把聂赫留朵夫说的话转述一遍。还有一个留着白胡子、机智的眼睛炯炯有神的矮壮老头，也能很快听明白，一有机会就插嘴说几句俏皮的玩笑话，讥讽聂赫留朵夫，显然是在卖弄自己的这份小聪明。那么，如果不是当兵当昏了头，不是毫无意义的士兵用语习惯使那个老兵反应迟钝的话，那个老兵本来也应该能听明白的。对这事的态度最认真的是一个说话嗓音低沉有力的高个子，鼻子很长，留有一撮山羊胡子，穿着干净的土布衣服和一双新树皮鞋。这个人听懂了所有的话，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开口说上两句。剩下的两个老头，一个是昨天开会时叫喊着反对聂赫留朵夫的没牙老汉，另一个老汉高身材，白头发，瘸腿，面相和善，干瘦的两脚紧裹着白净的包脚布，穿着桦树皮靴，他们两人几乎一直没有吭声，尽管同时也在用心地听。

聂赫留朵夫首先谈的是他对土地私有制的看法。

“依我看，”他说，“土地不能卖，也不能买，因为如果土地可以卖的话，那些有钱的人就可以把土地全都买走，到时候他们可以凭着土地使用权，随心所欲地拿走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你就是在土地上站一站，他们也要收钱，”他又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补充说。

“这个办法叫捆着翅膀飞。”白胡子老头眯缝着眼睛笑着说。

“这话说得对。”长鼻子老汉嗓音低沉有力地说。

“是。”老兵说。

“有个娘儿们给奶牛割了把草，就被抓去坐牢了。”面相和善的瘸腿老汉说。

“我们自己的地在五俄里以外，租地吧，又贵得要命，付了租钱，本儿都捞不回来，”没牙的老汉气愤地补充说，“我们像根绳子一样，让人家随便搓，还不如劳役制呢。”

“我和你们想的一样，”聂赫留朵夫说，“我认为占有土地是一种罪过。所以我就想把地交出来。”

“好啊，是件善事呢。”留摩西式髻曲大胡子的老汉说，显然以为聂赫留朵夫是想把土地租出去。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不想再占有土地了；现在得好好想想，这地怎么个分法。”

“你把地交给庄稼人，不就完了。”没牙的老汉生气地说。

聂赫留朵夫脸上一阵发烧，感到这句话有怀疑他诚意的意思。可是他立即恢复了常态，抓住这个话头，把他要说的话讲了出来。

“我是很乐意交的，”他说，“可是交给谁？怎么交？交给哪些庄稼人？为什么交给你们村社，而不是杰明村社？”（那是旁边的一个村子，分地很少。）

大家沉默不语。只有那个老兵开口说：

“是。”

“还有，”聂赫留朵夫说，“请你们告诉我，假如皇上说，把地主们的地拿过来，分给农民……”

“真有这事儿吗？”没牙的老汉问。

“不，皇上什么也没说。我不过是自己这么说；假如皇上说，把地主们的地拿过来，分给农民——你们会怎么办？”

“怎么办？把地按人头平分，庄稼人有份，老爷也有份。”砌炉匠一上一下地快速动着眉毛说。

“要不能怎么办？就是按人头分。”面相和善、裹着白净包脚布的瘸腿老汉表示赞成。

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它能令人人感到满意。

“怎么按人头分？”聂赫留朵夫问。“地主家的仆人也有份吗？”

“绝对不行。”老兵说，脸上竭力做出快活而又勇敢的样子。

可是，那个通情达理的高个子老汉不同意他的意见。

“要分，就大家平分。”他想了想，然后用低沉有力的嗓音回答说。

“不行，”聂赫留朵夫预先准备好了反驳的话，说。“要是按人头平分，那些自己不干活儿、不种地的人，那些老爷、听差、厨师、官吏、文书、所有的城里人，都能得到自己的一份，就会把它卖给富人们。土地又要集中到财主们的手里。而那些靠自己那份地生活的人，又会增人口，土地就要分散。财主们又会把那些缺地的人攥在手心里。”

“是。”老兵急忙表示赞成。

“禁止卖地，只能自己种。”砌炉匠生气地打断老兵的话，说。

聂赫留朵夫对此反驳说，很难监督谁在为自己种地，谁在给别人种地。

这时，通情达理的高个子老汉提出一个办法，大家按劳动组合的方式耕种。

“谁种地，谁就有收成。谁不种，谁就什么也分不到。”他用果断的低嗓门说。

对这种共产主义的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准备好了意见，于是他反驳说，要想这么做，需要大家都有犁，需要大家的马都一般大小，需要谁也不能比谁落后，或者需要一切东西——马、犁、脱粒机和所有的经营设施——都是公共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所有的人都得同意。

“我们老百姓一辈子也不同意。”没牙的老汉说。

“那可就有打不完的架啦。”眯缝着笑眼的白胡子老头说。“娘儿们准会把对方的眼珠子挖出来。”

“再有，地有好坏，怎么分呀？”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一些人能分到黑土地，另一些人就得分黏土地和砂土地呢？”

“那就把地划成小块，大家平分。”砌炉匠说。

聂赫留朵夫对此反驳说，现在讲的不是一个村社分地，而是各省的分地问题。既然土地白白分给农民，那凭什么一些人得到好地，另一些人得到坏地？

“是。”老兵说。

剩下的人沉默不语。

“所以说，这件事并不像想像的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这件事不只是我们在考虑，许多人都在考虑。比如说，有一个美国人，

叫乔治，他想出一个办法。我同意他的意见。”

“你是主人，你就分呗。你想怎么个分法？那是你的自由。”没牙的老汉说。

这一打岔让聂赫留朵夫感到难为情；可是他又满意地发现，不光他一个人对这次打岔不高兴。

“等一等，谢苗大叔，让他把话说完。”通情达理的农民用他那富有感染力的低音说。

这对聂赫留朵夫是个鼓励，于是他开始根据亨利·乔治的理论向他们解释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归上帝所有。”他讲了起来。

“就是嘛。这没错。”几个声音附和说。

“所有的土地，是大家共有的。人人对土地都有同等的使用权利。可是土地有好有坏。谁都想要好地。怎么做才能分得平均呢？应当这样，谁拿到好地，谁就按地价付钱给没有拿到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可是因为很难确定谁应该付给谁钱，还因为需要筹钱作公积金，所以应当这么办，拿到土地的人按地价付钱给村社，供各种用项。这样一来，大家就平等了。想得到土地——好地多付钱，坏地少付钱。不想要土地——不用出钱，公积金由要地的人交。”

“这就对了，”砌炉匠挑动着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付钱。”

“这个乔治脑瓜儿不错。”胡子髻曲的体面老汉说。

“可是价钱要出得起才行。”高个子老汉嗓音低沉地说，显然已预见到下一步将要出现的问题。

“价钱应当定得不能太贵，也不能太便宜……如果太贵的话，大家付不起，就会亏损，如果太便宜，大家就会互相买卖，拿土地做生意。我在你们这儿想办的正是这件事。”

“这才对，这才对嘛。就该这样。”农民们说。

“真是个好脑瓜儿，”胡子髻曲的宽肩膀老汉重复说。“好个乔治！想的主意挺不赖。”

“那我要是想要地，怎么样？”管家微笑着说。

“要是有富余的地，您拿去种就是了。”聂赫留朵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你不种地也饿不着。”眯缝着笑眼的老头说。

会议开到这儿结束了。

聂赫留朵夫又把自己的方案重复了一遍，不过没有要求现在作出答复，而是建议他们同村里的人商量一下，然后来给他一个答复。

农民们说，他们回去和大家商量，再作答复。他们告过别，心情激动地离开了。一路上，

他们高声说话的声音，久久响个不停，越去越远。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说话的声音仍在嗡嗡地响着，顺着河面从村子里传来。

第二天，农民们没去干活儿，讨论东家老爷的建议。全村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老爷的建议很划算，不会有什么危险；另一派却觉得这是个圈套，但问题在哪里，他们搞不明白，因此感到害怕。不过，到了第三天，大家终于同意了所提出的条件，前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全村的决定。促使老汉儿们下决心并打消他们认为老爷的建议有鬼的顾虑的，是一个老太婆说的一番话，她说老爷开始考虑他的灵魂了，他这么做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聂赫留朵夫在帕诺沃逗留期间，施舍了很大一笔钱，这对老太婆的话提供了证明。不过，聂赫留朵夫在这里施舍金钱，起因是他在这里第一次知道了农民的生活贫穷和困苦竟达到此等地步，内心极为震惊，尽管他也明白，施舍是不理智的举动，可是他不能不施舍，眼下他手里的钱特别多，因为收到了去年出售库兹明树林的钱，还有出售农具的定金。

听说老爷向要钱的人施舍，附近村子里成群的人，其中主要是女人，接连不断地来向他求助。他简直不知道怎么应付他们，按什么原则解决问题，钱该给谁，给多少。他觉得，他有很多

钱，不给那些要钱的人，而且显然是些穷人，是不可能的。可这么随便送钱给人，却也没有意义。摆脱目前这种局面的惟一办法，就是尽早离开。于是他抓紧时间准备起来。

在帕诺沃的最后一天，聂赫留朵夫去正房清理东西。清理东西时，他在姑姑那只老式的镶着狮头铜环的红木小柜的下层抽屉里找到许多书信，里面夹着一张合影：索菲娅姑姑、玛丽娅姑姑、大学时代的他和卡秋莎——纯洁、美丽、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姑娘。在房里的所有东西中，聂赫留朵夫只拿了书信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一切他全留给了磨坊主，磨坊主通过笑脸管家的介绍，以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下了房子，正准备把它拆掉，连同帕诺沃的全部家具一起运走。

现在想起在库兹明体验到的对失去家产的惋惜之情，聂赫留朵夫心里感到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情；现在他体验到的是一种无法遏止的解脱的喜悦和类似一个旅行者发现新大陆时的那种新鲜感。

十

这次回来，城市让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奇怪和陌生。他是在傍晚点灯时分，从车站回到自己住所的。各个房间里还充满着卫生球的气味，阿

格拉菲娜和科尔涅伊——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精疲力竭和一肚子怨气，甚至为收拾东西吵架，这些东西的用处仿佛只是为了晾晒和收藏。聂赫留朵夫的房间没被占用，但也没收拾，过道里放了许多箱子，进出十分不便，因此聂赫留朵夫这次回来，显然妨碍了因某种奇怪的惯性而在这所房子里进行着的事情。他以前曾经参与的这些事情，荒唐透顶，令人反感，让心中留下农村贫困印象的聂赫留朵夫感到，他得下决心第二天搬到旅馆去住，先叫阿格拉菲娜按她的意思收拾东西，等他姐姐来到之后，再由她最后处置屋里的所有物品。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离开这所房子，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随便找到一家简陋、肮脏的带家具的公寓，挑了两个房间，吩咐人把他从家里选好的东西搬过来，然后出去找律师。

外面很冷。雷雨过后，出现了春天常见的那种寒冷。天冷，风寒，聂赫留朵夫缩在薄大衣里瑟瑟发抖，不由得加快脚步，竭力想让身上暖和起来。

他还在回忆乡下的那些人：妇女、儿童、老人，以及他仿佛现在第一次看到的贫困和痛苦，尤其是那个老是在笑、模样像小老头、没有腿肚的细腿乱蹬的孩子——他禁不住拿他们和城里的人作比较。他路过肉铺、鱼铺和成衣铺时，看到

那么多衣帽整洁、肥头胖脑的小铺老板们露出饱食暖衣的样子，这样的人乡下可一个也没有，内心十分震惊——好像头一次看到似的。这些人显然坚信，他们千方百计地坑害那些不识货的人，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事。同样饱食暖衣的还有那些大屁股和背上钉着大纽扣的马车夫，那些帽子上镶着丝绦的看门人，那些系着围裙的髻发侍女，特别是那些后脑勺剃得精光、懒洋洋坐靠在轻便马车上、鄙夷而放肆地打量过往行人的神气的马车夫。他现在不自觉地认为这些人正是失去土地的乡下人，因为失去土地才得以进城的。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善于利用城市的条件，过上了老爷们那样的生活，并因此而感到心满意足；另一部分人在城里过得比乡下更糟，因而也更可怜。聂赫留朵夫感到，他在一个地下室窗口看见的正在做活儿的鞋匠，就是这样的可怜人；那些瘦弱、苍白、披头散发的洗衣女工，裸露着干瘦的胳膊在冒着肥皂水蒸气的窗口熨烫衣服，也是这样的可怜人。属于这种可怜人的，还有聂赫留朵夫碰见的两个油漆匠，系着围裙，光脚穿着破鞋，浑身上下沾满了油漆。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瘦弱的胳膊晒得发黑，手里提着油漆桶，不住地相互对骂。脸色疲惫而愤怒。那些坐在大板车上颠簸、黑黝黝的脸上沾满灰尘的运货马车夫，也是这样的脸色。那

些衣衫褴褛、面部浮肿、带着孩子在街头乞讨的男男女女，也是这样的脸色。聂赫留朵夫路过一家小饭馆，从敞开的窗子里看见的，也还是这样的脸色。穿白衣的堂倌在摆满酒瓶和茶具的脏桌子之间，摇晃着身子，来往穿梭，桌旁坐着的人满脸通红，神情呆滞，嘴里又叫又唱。有一个人坐在窗口，挑起眉毛，噘着嘴唇，眼睛望着前方，好像在使劲儿回想什么事似的。

“他们为什么在这儿呢？”聂赫留朵夫想，不由自主地吸着寒风吹到他脸上的灰尘和到处飘荡着的新鲜油漆的刺鼻气味。

在一条大街上，一队运铁制品的大车赶上他，车上的铁物在坑洼不平的路上发出可怕的响声，震得他耳朵和脑袋生痛。他加快脚步，想超过车队，这时忽然从铁物的轰鸣中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停了下来，看见前方不远处的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上坐着一个军人，油光的脸上留着两端梳理得往上翘的小胡子，亲热地向他招手微笑，露出异常白净的牙齿。

“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第一个感觉是高兴。

“啊！申博克。”他高兴地说，可是马上又明白，根本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这正是那个当年去过姑姑家的申博克。聂赫留朵夫很久没见过他的面，但是听说过他的事，

说他尽管一身债务，离开了团队却仍留在骑兵部队里，不知用什么法子始终在富人的圈子里混。他那满足而快乐的样子证实了这一点。

“碰上你，可是太好啦！要不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喂，老兄，你见老啦，”他说着，走下马车，舒展了一下肩膀。“我是从你走路的样子认出你的。怎么样，我们一块儿去吃饭？你们这儿哪家馆子不错？”

“我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聂赫留朵夫回答，琢磨着怎么才能摆脱朋友而又不得罪他。

“你到这儿做什么？”他问。

“有点儿事，老兄。监护方面的事。我现在是监护人。监管萨马诺夫的家业。知道吗，他是个大财主。他是个大笨蛋。可是有五万四千俄亩土地。”他说，语气里有一种特别的自豪，好像这些土地是他本人购置的。“家业乱得一塌糊涂。土地全在农民手里。他们一个钱也不交，欠款多达八万卢布。我用一年的时间改变了局面，给我的委托人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的收入。怎么样？”他自豪地问。

聂赫留朵夫记起听人说过，这个申博克是因为挥霍掉自己的家产，欠了还不清的债，才通过某种特殊的关系，当上了一个浪掷钱财的老财主的产业监护人，现在显然是靠此为生。

“怎么才能摆脱他而又不得罪他呢？”聂赫留

朵夫一边想，一边望着他那油光的胖脸和涂了发蜡的小胡子，听着他亲热地数说哪家饭馆好，吹嘘他在监护工作中的成绩。

“喂，我们到底去哪家馆子吃饭？”

“我实在没有时间。”聂赫留朵夫瞧瞧表，说。

“是这样。今天晚上赛马。你去吗？”

“不，我不去。”

“去吧。我的马已经没有啦。可是我一直赌格里申的马。记得吗？他有几匹好马。你可要来呀，我们一块吃晚饭。”

“晚饭也不行。”聂赫留朵夫笑着说。

“怎么回事儿？你现在去哪儿？要不要我送你。”

“我去找律师。他住在拐弯儿那儿。”聂赫留朵夫说。

“对啦，你在监狱里忙什么事吧？替坐牢的人说情？科察金家的人对我说了，”申博克笑着说。“他们已经走了。怎么回事儿？告诉我！”

“对，对，这都是真的，”聂赫留朵夫回答，“街上可不是谈这事的地方！”

“是的，是的，你一向都是个怪人。那你去不去看赛马？”

“不，我去不了，也不想去。你可别生气呀。”

“生气，怎么会！你现在住哪儿？”他问，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两只眼睛呆住，眉毛向上挑起。他显然是想回忆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在他脸上看到的完全是一种麻木的神情，和在小饭馆窗口看到的那个让他吃惊的扬着眉毛、噘着嘴唇的人的表情一模一样。

“天好冷啊！是吧？”

“是的，是的。”

“买的東西在你車上嗎？”他對車夫說。

“好吧，那再見啦；非常，非常高興見到你。”申博克說完，用力握握聂赫留朵夫的手，接着跳上馬車，戴白色麂皮新手套的肥手在油光的臉前揮了揮，習慣地露出異常白淨的牙齒笑了笑。

“難道我原來也是這個樣子？”聂赫留朵夫想，繼續往律師家走去。“是的，雖然不完全是這個樣子，但卻想成為這個樣子，還想這樣過一輩子。”

十一

律師沒按排队順序，提前接見了聂赫留朵夫，立即談起梅尼紹夫母子的案子。他已經讀過案卷，對這種毫無根據的指控感到憤慨。

“這個案子令人氣憤，”他說。“很有可能，火

是房主自己放的，为的是得到保险费，不过问题的关键之处，是梅尼绍夫母子的罪行完全没有得到证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是侦察员特别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的结果。这个案子只要不在县里，而在这里审理，我担保可以打赢，而且我不要任何报酬。好吧，再谈另一个案子，费多西娅给皇上的诉状写好了；如果您去彼得堡，请随身带去，亲自呈递，再托托人情。不然的话他们质问司法部，部里的人准会随便应付，把案子推出去，也就是驳回上诉，那可就完了。您尽量找到最高层。”

“找皇上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了起来。

“那是最最高层。最高层的意思是指上诉委员会的秘书或者主任。好吧，现在没事了吧？”

“不，瞧，还有宗教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如果他们写的是实情，这可真是奇事一件。我今天争取和他们见一面，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看，您成了漏斗和瓶口了，监狱里的冤屈都从您这儿流出来啦，”律师笑着说。“冤屈太多了，您管不过来。”

“不，这可是一件怪事，”聂赫留朵夫说，把这个案子的要点简略谈了一下：一个村子里的一些人聚在一起读福音书，当官的走过来，把他们

驱散。下一个星期天，他们又聚在一起，当官的派来警察，作了记录，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查官审问，副检察官写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被送上法庭受审。副检察官提起公诉，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于是他们被判处流放。“这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聂赫留朵夫说。“难道真有这样的事？”

“这事哪点儿让您奇怪呢？”

“处处都奇怪；您瞧，警察奉命行事，这我理解，可副检察官写起诉书，他毕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呀。”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所有的检察官和法官都是一些自由主义的新人。他们从前是这样的人，如今却完全不同了。他们已成为官僚，每月只关心二十号那一天。他们好去领薪水，还盼着加薪，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行事原则。他们随心所欲地控告人，审讯人，给人定罪。”

“一个人因为和别人一起读福音书，就被判处流放，难道真的有这样的法律吗？”

“只要能证明他们读福音书时，敢于不按要求向别人乱加解释，就等于在指责教会的解释，不仅可以流放到不太远的地方，而且还可以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按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判处终身流放。”

“这不可能。”

“我对您说吧。我总是对法官老爷们说，”律师继续说，“我看见他们，就对他们感激不尽，因为我没有坐牢，您没有坐牢，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这多亏他们大发慈悲。如要褫夺我们每个人的特权，发配去不太远的地方，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如果真是这样，一切全取决于检察官和有权使用法律的人的个人意愿，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快活得哈哈大笑。

“瞧您提的是些什么问题！喂，老兄，这可是哲学啦。不过，这个问题也可以谈的嘛。星期六请您来吧。您可以在我家见见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到时候我们聊聊这些一般性的问题。”律师话语中的“一般性的问题”这几个字是用讽刺的口吻讲出来的。“我妻子您是认识的。请到时来吧。”

“好，我尽量去。”聂赫留朵夫回答，心里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如果真要尽量的话，也只是晚上尽量不去律师家里去见那些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

聂赫留朵夫说如果法官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行使法律，法院也就失去意义的时候，律师报之以哈哈大笑，还有他说“哲学”和“一般性的问题”时的口吻，这一切向聂赫留朵夫表明，他同律师，

也许还有律师的朋友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同的，尽管他现在同申博克之类的老朋友们已有了距离，但他觉得他同律师和律师圈子里的人们的距离更大。

十二

到监狱的路很远，天已经不早了，所以聂赫留朵夫叫了一辆马车，朝监狱驶去。车夫是个中年人，长相聪明而和善，来到一条街上时，他转向聂赫留朵夫，指了指一座正在建筑中的楼房。

“瞧，这楼盖得多大。”他说，仿佛他也是这座楼房的发起者，并因此而感到骄傲。

的确，楼盖得很大，式样复杂、怪异。四周围着坚固的脚手架，用粗大的松树原木搭成，再用铁条固定，工地和街道之间有一道薄薄的板墙隔开。脚手架上，身上溅满灰浆的工人们，像蚂蚁一样来来往往：有的砌墙，有的凿石头，还有的把沉重的砖斗和泥灰桶提到架上，再把空斗和空桶放下去。

一个穿着讲究的胖先生，大概是建筑师，站在脚手架旁，指着上边的一处地方，对一个弗拉基米尔来的包工头说着什么，包工头恭恭敬敬地听着。装东西和没装东西的大车，从建筑师和包工头身旁的大门里，驶进驶出。

“那些干活儿的人，还有那些迫使他们干活儿的人，怎么全都相信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怎么能够当他们怀着身孕的妻子在家里做着繁重的家务，当他们那些戴碎布帽的孩子乱蹬着小腿快要饿死的时候，还要给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一个让他们家破人亡的人，修建这座愚蠢无用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楼房，心里想。

“是啊，真是一所荒唐的房子。”他把心里的想法说出了口。

“怎么是荒唐的？”车夫不无遗憾地说。“多亏有这房子，人们才有活儿干，哪儿来的荒唐呀。”

“要知道，干这种活儿没必要嘛。”

“既然盖，那就有必要，”车夫反驳说，“老百姓就有饭吃。”

聂赫留朵夫没有吭声，尤其是因为车轮隆隆作响，说话很困难。快到监狱时，车夫把车从石板路赶上平整的大路，说话已不再费力，他又和聂赫留朵夫谈起来。

“现在怎么有那么多老百姓往城里跑——多得吓人。”他说着，从驭座上转过身来，用手指着迎面走来的一群背着锯、斧子、短皮袄和口袋的乡下人，让聂赫留朵夫看。

“难道比去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今年到处都挤满了人，真不得了。雇

主拿人当刨花，扔来扔去。到处都满啦。”

“怎么会这样呢？”

“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去呀。”

“怎么会越来越多？他们为什么不待在乡下？”

“乡下没事可做。没有地呗。”

聂赫留朵夫体验到一个受伤的人被碰痛伤口时的感觉。他感到，别人总是故意碰他的痛处，而实际上，不过是因为只有痛处才会有痛的感觉罢了。

“难道真的到处都这个样子？”他想，于是详细地问车夫，他们村里有多少土地，他本人有多少土地，为什么要住在城里。

“我们那儿，老爷，每人只有一俄亩地。我家有三口人的地，”车夫很乐意说话。“我家里有父亲，一个弟弟，另一个弟弟当兵去了。他们种地，也没什么好种的。我那弟弟正想来莫斯科呢。”

“不能租地种吗？”

“现在到哪儿去租呀？原来那些地主老爷，把地挥霍了。商人们把所有的地全都弄到自己手里啦。从他们那儿，休想租地——他们自己干活儿。我们村里一个法国人有地，是从我们以前的老爷那里买的。他不肯租，谁也没办法。”

“什么样的法国人？”

“一个叫杜法尔的法国人，您也许听说过。他在一家大剧院给演员做假发。是个好行当，发大财啦。把我们女东家的地全买下了。他现在成了我们的主人。想怎么欺负我们就怎么欺负。谢天谢地，他人还不坏。只是他有一个俄国人当老婆——那是一条母狗，可别碰上她。她总是勒索老百姓。凶着呢。瞧，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大门口？我看是不让进啊。”

十三

想到不知今天玛丝洛娃会是什么样子，想到不论是在她身上，还是在监狱里的人们身上，都存在着他不了解的秘密，聂赫留朵夫不禁感到心里发慌和恐惧。他拉响大门上的铃，向走过来的看守打听玛丝洛娃的情况。看守去问了一下，说她在医院里。聂赫留朵夫往医院走去。医院的看门人是个和善的小老头，马上放他进去，问清他要找谁，领他去了儿科病房。

一个浑身散发着石碳酸气味的年轻医生，迎着聂赫留朵夫走进走廊，严厉地问他有什么事。这位医生处处宽待犯人，因而常常和监狱当局，甚至和主任医师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他担心聂赫留朵夫对他提出什么违法的要求，此外还想表示他对任何人都不做破例的事，所以故意装出生气

的样子。

“这里没有女犯，这里是儿童病房。”他说。

“我知道，可是这里有一个从监狱调来干杂活儿的助理护士。”

“是有，这儿有两个呢。您到底有什么事？”

“我跟其中一个叫玛丝洛娃的很熟，”聂赫留朵夫说，“想见见她：我就要去彼得堡为她的案子上诉。还想把这个交给她。这只是一张照片。”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行，这个可以，”医生语气缓和地说，转身让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婆子去叫做助理护士的女犯玛丝洛娃。“您要不要先坐会儿，要不去候诊室也行。”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趁医生态度好转的有利时机，向他打听医院是否对玛丝洛娃满意。

“还好，要是考虑到她以前的生活环境，她工作得就挺不错了，”医生说，“这不，她来了。”

从一扇门里走进那个当助理护士的老太婆，她身后是玛丝洛娃。她穿一件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是一块三角头巾，盖住头发。看见聂赫留朵夫，她脸上泛起红晕，似乎停住脚步犹豫了一下，接着又皱起眉头，垂下眼睛，快步踏着走廊上的长地毯向他走来。她走到聂赫留

朵夫面前，不想和他握手，后来还是伸出手，脸越发红了。自从那次他们谈话，她因为发脾气道歉之后，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见过她，猜想她现在仍和上次一样。可是，她今天完全变了个人，她脸上的表情有一种新的东西：矜持，腼腆，而且聂赫留朵夫感到还有对他的反感。他把刚才对医生说的话又对她说了一遍——他要去彼得堡，并把装着他从帕诺沃带来的那张照片的信封交给她。

“这是我在帕诺沃找到的，很早以前的照片，也许您会喜欢的。收下吧。”

她微微扬了扬黑黑的眉毛，用那双斜视的眼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仿佛在问这是做什么，然后默默地接过信封，塞进围裙。

“我在那儿见到您姨妈了。”聂赫留朵夫说。

“见到啦？”她冷淡地说。

“您在这儿还好吧？”聂赫留朵夫问。

“还行，不错。”她说。

“不太累吧？”

“不，还行。我还不大习惯。”

“我很替您高兴。总比那边好。”

“那边是哪儿？”她说，脸上泛起红晕。

“那边就是监狱里。”聂赫留朵夫急忙说。

“有什么好的呀？”她问。

“我想，这儿的人要好一些。不像那儿的人

那样。”

“那儿也有很多好人。”她说。

“梅尼绍夫母子的事我托过人了，希望他们能得到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但愿上帝保佑，那么好的一个老太婆。”她说，重复着自己对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我今天去彼得堡。您的案子很快就审理，我想，原判会被撤销的。”

“撤不撤销，现在都一样。”她说。

“为什么：现在？”

“没什么。”她说，用探询的目光匆匆瞥了他一眼。

聂赫留朵夫明白这句话和这一目光的含义，她想知道他是否还坚持自己的决定，或者是否接受了她的拒绝，改变了自己的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觉得全一样。”他说。“可是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还是不释放，确确实实都一样。我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照我说的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斜视的黑眼睛一会儿停在他的脸上，一会儿又停在他身旁的什么地方，她整个脸上闪现出快乐的神采。不过，她嘴上说的却和眼睛说的完全不同。

“您用不着说这种话。”她说。

“我说这话，是想让您明白。”

“这些话都说过了，不必再说啦。”她说，强压住心中的欢笑。

病房里不知怎么喧闹起来。可以听到孩子的哭声。

“好像在叫我呢。”她说，不安地回头望了望。

“好吧，再见啦。”他说。

她装作没有看见伸过来的手，转过身去没有握，竭力掩饰住内心的喜悦，沿着走廊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这是怎么啦？她想什么哪？她心情怎么样？她是想考验我，还是真的不肯原谅我？她不能把她的想法和感觉说出来，还是不想说？她心软了，还是在生气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怎么也无法回答。只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把他和她联结在一起，而且也把他和促成这种变化的上帝联结在一起。这种联结让他欣喜，也让他感动。

玛丝洛娃回到放置八张童床的病室，按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铺床单时腰弯得太低，脚下一滑，差点儿摔倒。一个脖子上扎着绷带、正在康复的男孩，看着她笑了起来，玛丝洛娃再也忍不住，往床上坐，放声大笑，笑得极具感染力，惹

得几个孩子跟着哈哈大笑。护士生气地对她喊道：

“笑什么？你以为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快去打饭。”

玛丝洛娃不再出声，拿了餐具，到打饭的地方去，临走和那个缠着绷带、被禁止笑的男孩对看了一眼，又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一整天，只要剩下她一个人，玛丝洛娃总要把照片从信封里抽出一截来欣赏；但到晚上下班以后，等她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才把照片从信封里完全抽出来，她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用抚爱的目光端详着这几个人的脸、服装、露台的台阶和灌木丛，他的脸、她的脸、两个姑姑的脸都是以这个灌木丛作背景的。她看着这张褪了色、显得有些发黄的照片，尤其是对她自己，对她那额上有一圈鬈发的年轻漂亮的脸蛋，怎么也欣赏不够。她看得出了神，没有发觉她同屋的助理护士走进来。

“这是什么？他给你的？”身体肥胖、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俯身看着照片说。“这个人真的是你？”

“不是我又能是谁？”玛丝洛娃望着同伴的脸，笑着说。

“这人是谁？是他吗？这个是他母亲？”

“是他姑姑。你真的认不出我了？”玛丝洛娃

问。

“怎么认得出来？一辈子也认不出来。整个模样儿全变了。我说，都有十几年了吧！”

“不是十几年，是一辈子。”玛丝洛娃说，心中的愉快感觉突然消失。脸色变得阴郁，两眉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皱纹。

“这有什么，那里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是很轻松。”玛丝洛娃闭上双眼，摇着头重复着她的话。“比服苦役还苦。”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四点。每天都这样。”

“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弃这种生活呢？”

“是想放弃，可是做不到。还说这个干什么！”玛丝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把照片扔进抽屉，强忍住怨恨的泪水，砰地把门一甩，跑到外面走廊上。刚才看照片时，她觉得自己还是照片上的那个样子，想像着当年她是多么幸福，现在和他在一起也会是多么幸福。同屋女伴的话却使她想起她现在的处境，也使她想起她以前在那里时的生活——想起那种生活的种种可怕，当时她对此已隐约有所感觉，却不愿认真地去考虑。只是到了现在，她才清楚地回忆起那些可怕的夜晚，特别是谢肉节的那个夜晚，她等一个答应替她赎身的大学生。她回忆起有一天，她穿着洒了

葡萄酒的红色袒胸连衣裙，蓬乱的头发上系着红色的蝴蝶结，疲惫不堪，浑身无力，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深夜两点来钟，才把客人们送走，然后趁跳舞间歇的时候，坐到那个为小提琴伴奏的脸上长满粉刺的干瘦女钢琴师身旁，向她诉说自己的痛苦生活，这个女钢琴师也说她的处境艰难，想改变一下环境，这时克拉拉走了过来，于是她们三个人立即决定放弃这种生活。她们以为今夜已经结束，正想走开，忽然前厅里又有喝醉的客人们吵吵嚷嚷起来。小提琴手拉起前奏曲，女钢琴师使劲在钢琴上敲响一支欢快的俄罗斯乐曲，为卡德里尔舞【6】的第一个舞式伴奏。一个满头是汗、嘴里喷着酒气、打着饱嗝的矮小男人，系着白领带，身穿白色燕尾服，搂住她的腰，跳到第二舞式时，他又把燕尾服脱掉，而另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燕尾服（他们是从一个舞会上过来的），搂住克拉拉的腰，他们不停地旋转，扭跳，喊叫，喝酒……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人的模样怎么能不变！这一切都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于是，她心里突然又像以前那样对他充满了怨恨，想骂他和责备他。她后悔今天错过了机会，没有再次告诉他，她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她不会上他的当，不会让他像以前占有她的肉体那样来占有她的精神，也不会让他把她变成他显示仁慈的对象。为了消除这种对自己痛

苦的怜悯和对他毫无用处的责备，她又想到了酒。如果她此刻是在监狱里的话，她一定守不住诺言，喝起酒来。可是在这里，她没有地方弄得到酒，除非去找医士，那个医士却让她感到害怕，因为他老是纠缠她。现在她讨厌和男人们打交道。她在走廊里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又回到屋里，不理睬同屋女伴的问话，独自为她不幸的身世哭了很久。

十四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有三件事要办：向参议院呈交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向上诉委员会递送费多西娅·比留科娃的案子；受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第三厅请求释放舒斯托娃，还要请求准许一位母亲和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面，薇拉在写给他的信中曾关照过这一点。后两件事，他当作一件事看待，并把它归入第三件事。另外，第四件事是宗教信徒们的案子，他们因诵读和解释福音书而被迫远离家人，流放高加索。他答应他们，更主要的还是答应自己，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查清这个案子。

自从上次拜访马斯连尼科夫，尤其是回过乡下之后，聂赫留朵夫不仅仅意识到，而且全身心地感觉到他对自己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的

憎恶，在这个圈子里，千百万人为了保证少数人的舒适安逸的生活而遭受的苦难，被想方设法掩盖起来，以致这个圈子里的人没有看到，也无法看到这些苦难，因此也同样无法看到他们这种生活的残酷和罪恶。聂赫留朵夫现在同这个圈子里的人交往时，已经不能不感到尴尬，而且不能不感到自我责备。不过，以往的生活习惯还在吸引他到这个圈子里去，亲朋好友的关系也在吸引他，而更主要的是为了他目前惟一关心的那件事：援救玛丝洛娃和所有他想援救的受折磨的人，他必须向这个圈子里的人寻求帮助，尽管那些人不仅得不到他的尊敬，而且还常常引起他的愤恨和轻蔑。

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住在姨妈恰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家中，她的丈夫以前当过大臣。他一下置身于与他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这让他感到不快，可是又别无选择。如果不住姨妈家，去住旅馆，那就意味着得罪她，而姨妈交际广泛，对他需要活动的事情极有用处。

“你知道，我听到了你的什么闲话了吗？真是怪事呀，”伯爵夫人见他来了，立即让他喝咖啡，说。“你都成了霍华德^[7]啦！帮助犯人。视察监狱。平反冤案。”

“啊不，我可没这么想。”

“没关系，这是好事。不过，好像这里面还

有件风流韵事。好吧，说一说。”

聂赫留朵夫把自己和玛丝洛娃的关系，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我记得，记得，可怜的艾伦【8】对我说过，那时你正住在那两个老太太家里：她们好像让你跟她们的养女结婚（伯爵夫人一向瞧不起聂赫留朵夫的两个姑姑）……原来是她？她现在还漂亮吗？”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姨妈是个健康、快活、精力充沛、很爱说话的六十岁女人。她身高体胖，唇上有一层黑毛。聂赫留朵夫很爱她，从小就习惯了受她充沛的精力和快活情绪的影响。

“不，姨妈，那事儿都过去啦。我只是想帮帮她，因为第一，她是冤枉的，我当陪审员也有责任，再说她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也是我造成的。我觉得应当尽我所能为她出点力。”

“可是我怎么听说，你想跟她结婚？”

“我是想过，可是她不想。”

伯爵夫人扬起眉头，垂下眼珠，惊讶地看着外甥不说话。突然她的脸色一变，露出满意的神情。

“瞧，她可比你聪明。唉，你这个傻瓜！你真的想和她结婚？”

“当然。”

“她当过那种人，你也想？”

“那就更该这样。因为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不，你简直是一个傻瓜，”姨妈忍住笑

说。“十足的傻瓜，不过，我就是喜欢你这点儿，喜欢你这种傻劲儿，”她反复说，显然特别喜欢这个词，在她眼里这个词能准确表达她外甥的精神和智力状态。“你听我说，这事儿也凑巧，”她继续说。“阿林办了一个出色的抹大拉收容所。我去过一次。她们真叫人恶心。我回来后全身上下洗了一遍。不过，阿林可是全心全意地在操办这事儿。我们把她，你那个女人，交给她们得啦。除了阿林，没有谁能让她们改好了。”

“可是她被判了苦役呀。我就是来想办法撤销原判的。这是我要求您的第一件事。”

“原来这样啊！她的案子归哪儿管？”

“参议院。”

“参议院？对了，我有个不错的表弟廖武什卡就在参议院。不过，他是在个什么傻瓜司——贵族铨叙司里。管用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天知道都是谁，要不就是德国人：盖呀，费呀，德呀，什么发音都有，要不就是什么伊万诺夫呀，谢苗诺夫呀，尼基京呀，还有什么伊万年科呀，西蒙年科呀，尼基坚科呀，五花八门。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好吧，反正我会对丈夫说的。他认识他们。他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我对他说。你把

事情跟他讲清楚，要不我说的话他什么都听不懂。不管我说什么，他总说什么都不懂。这都成他的习惯啦。大家都懂，就是他不懂。”

这时，一个穿长统袜的仆人用银托盘送来一封信。

“正巧是阿林的信。这下你可以听听基泽维特说什么啦。”

“谁是基泽维特？”

“基泽维特吗？你今天要是不出去，就会看到他是什么人。他讲起话来，能让最顽固不化的罪犯跪在地上，哭着忏悔。”

伯爵夫人狂热地信奉一种认为基督教的实质是相信赎罪的学说，尽管这让人感到奇怪，而且和她的性格丝毫不相称。她参加聚会，听人宣讲当时流行的这种学说，还把信徒召集到家里。虽然这种学说不仅否定所有的宗教仪式和圣像，而且还否定圣礼，但在伯爵夫人家中的各个房间里，甚至在她的床头，依旧挂着圣像，她照样履行教会规定的义务，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矛盾。

“要是你那个抹大拉能听他讲讲就好喽；她准会改过自新的，”伯爵夫人说。“你晚上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就能听到他讲话了。这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对这事儿不感兴趣，姨妈。”

“我告诉你，这很有趣。你一定要回来。好

啦，你说吧，还有什么事要我办？全说出来吧。”

“还有一件要塞的事。”

“要塞？好，我给你写封信，找克里格斯穆特男爵。这是个非常可敬的人。你也认识他的。他是你父亲的同事。他迷上招魂术了。不过，这也没什么。他是个好心人。你到那儿有什么事？”

“求他们准许一位母亲同关在那儿的儿子见面。可是我听说，这事不归克里格斯穆特管，归切尔维扬斯基管。”

“切尔维扬斯基这人我不喜欢，但他是玛丽艾特的丈夫。可以求求她。她会给我面子的。她挺可爱的。”

“还有一个女人的事要求您。她坐了几个月的牢，谁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不会吧，她自己一定知道因为什么。她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们，那些剪短发的罪犯，是罪有应得。”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罪有应得。可是她们在受罪。您是位基督徒，信奉福音书，可是这么缺少同情心……”

“这毫不相干。福音书是福音书，可恶是可恶。要是我明明不喜欢那些虚无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剪短发的虚无主义者，还要假装喜欢，那不

更糟啦。”

“您到底为什么不喜欢她们？”

“出了三月一日的事【10】，你还问为什么？”

“也不是她们所有的人都参与了三月一日的事。”

“反正都一样，为什么要管闲事。那可不是女人们干的事。”

“好吧，就说这位玛丽艾特，您不也认为她能管些分外的事。”聂赫留朵夫说。

“玛丽艾特？玛丽艾特是玛丽艾特。可是那个什么哈尔秋普金娜，天知道是个什么人，却想教训大家。”

“不是教训，只是想帮助老百姓。”

“没有她们，也知道该帮助谁，不帮助谁。”

“您要知道，老百姓十分贫困。我这不刚从乡下回来。农民卖命干活，还吃不饱肚子，我们却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难道这是应该的吗？”聂赫留朵夫想到姨妈心肠很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全说了出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想让我去干活儿，不吃饭？”

“不，我没想不让您吃饭，”聂赫留朵夫不由得笑着说，“我只是想让人人都干活儿，人人都有饭吃。”

姨妈又一次扬起眉头，垂下眼珠，好奇地盯

着他。

“我的好外甥，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她说。

“为什么？”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将军走进房间。这是恰尔斯卡娅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位退休的大臣。

“啊，德米特里，你好，”他说，把新刮的脸向他凑过去。“什么时候到的？”

他默默地吻了吻妻子的额头。

“嘿，他可真是个好样的，”伯爵夫人对丈夫说。“他让我到河边洗衣服，先让我吃土豆。他是个十足的傻瓜，不过他求你办事，你好歹给他办办吧。十足的笨蛋，”她又更正说。“你听说了吗：据说卡缅斯卡娅的情况很不妙，大家都替她的性命担忧呢，”她对丈夫说，“你最好去看她一下。”

“是啊，这太可怕啦。”丈夫说。

“好啦，你们去谈，我要写信了。”

聂赫留朵夫刚刚走进客厅旁边的那个房间，她又从客厅对他喊道：

“用给玛丽艾特写信吗？”

“写吧，姨妈。”

“那我留一块空白，你再把那个短发女人的事写上去，她会叫丈夫办的。他一定会办的。你别以为我是个恶人。她们非常可恶，你的那些被

保护人，可是我不希望她们遭殃。愿上帝保佑她们吧！你去吧。晚上一定待在家里。你就能听到他讲话了。我们还要祈祷。只要你不反对，这会对你大有好处的。我可知道，艾伦和你们一家人在这方面都很落后。好啦，再见。”

十五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是位退休的大臣，是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

这位伯爵从青年时代起就坚信，如同鸟儿天生要吃昆虫、要披羽毛、要在空中飞翔一样，他天生要吃名厨烹调的美味佳肴，要穿最舒适、最华贵的服装，要坐最舒适、最轻快的马车，所有这一切理所当然地要给他准备好。此外，伯爵还认为，他从国库领取的各种名目的钱越多，获得的包括钻石勋章在内的勋章越多，和皇亲国戚交往的机会越多，那就越好。所有其他的东西，在伯爵的眼里，都是微不足道和毫无趣味的，根本不能和他的这些基本信条相提并论。所有其他的东西，是好是坏，大可不必在意。正是凭着这种信念，伯爵在彼得堡生活和奋斗了四十年，在第四十一年的头上终于爬上了大臣的位子。

这位伯爵成功的秘诀是，第一，他能摸透公文和法律条文的含义，能起草让人看得懂的公

文，虽然文句不大通顺，却没有拼写上的错误；第二，他有一副体面的外表，一些场合可以摆出自高自大，甚至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样子，另一些场合却又可以做出低三下四、曲意奉承的姿态；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公务活动方面，他没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或准则，一旦需要，可以赞同任何人的意见，一旦需要，也可以反对任何人的意见。他这么做的时候，一心考虑的只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要让人看出明显的自我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本身是合乎道德还是违背道德，他的行为是对俄罗斯帝国或整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好处还是极大的坏处，他完全不放在心上。

在他当上大臣以后，不仅所有仰仗的人，而仰仗他和仰仗他的亲信是很多的——而且所有的局外人，甚至他自己，全都相信，他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治国之才。然而，一段时间过后，他毫无作为，政绩平平，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法则，一些同他一样能看懂和起草公文、外表体面和没有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下来，他只好退休。这时，大家才明白，他不是一个非常高明和目光远大的人，而只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点墨却又自命不凡的庸才，他的见解未必能超过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社论的水平。他同其他那些胸无点墨、自命不凡、把他排挤下来的官僚，实际上并无任何差别，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不过这丝毫

不能动摇他的信念，他依然认为他应该每年从国库领取大量的金钱和新的装饰物挂在他礼服的前襟上。这一信念表现得那么强烈，以致没人能忍心拒绝他的要求，于是他照常每年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作养老金，一部分算作酬劳费，因为他在最高国家机关里应了个名，又身兼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还年年得到他十分看重的新权利，把新的丝绦缝在肩上或长裤上，把新的绶带和珥琅星章戴在礼服上。因此，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在各方面的关系更加广阔了。

伯爵仿佛听办公室主任报告公务那样，听完了聂赫留朵夫的话，然后说为他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司沃尔夫参政官的。

“大家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他说。“他很感激我，一定会尽力办的。”

伯爵写的另一封信是给上诉委员会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的。聂赫留朵夫告诉他的费多西娅这个案子，他很感兴趣。当聂赫留朵夫说想写封信给皇后的时候，他说这件事的确很感人，等有机会他要到那边去说一说。不过，他不敢打保票。上诉还是公事公办的好。他想，如果有机会，如果召他去参加星期四的宫中小型聚会，他也许要谈谈这事儿。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

丽艾特的信，立即前往这几个地方。

他先去找玛丽艾特。当她还是一个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时，他就认识她，后来也知道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主要是听说他对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冷酷无情，折磨政治犯是他的拿手好戏。聂赫留朵夫又像往常一样，心里感到异常沉重，为了帮助受压迫者，他必须站在压迫者一边，仿佛承认他们的行为合法似的，向他们求情，请他们或多或少，哪怕对某几个人，节制一下他们习以为常、也许连自己也没有察觉的残酷行为。每逢遇到这类情况，他心里总会出现矛盾，既不满意自己，又犹豫不决：求不求情，最后还是决定去求情。要知道，他去求这个玛丽艾特和她的丈夫，是件让他感到尴尬、羞耻和不快的事，不过也许那个正在单身牢房里受罪的不幸女人会因此得到释放，她和她的亲人们会因此不再忍受折磨。此外，他感到向这些人求情不免有些虚伪，因为他已经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而他们却仍把他当自己人看待，他还感到，置身于这个圈子当中，他又走上了以前的老路，又不由自主地屈从于这个圈子里流行的轻浮和不道德的风气。他在姨妈家中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今天早晨，当他和她谈论最严肃的事情时，已经使用了戏谑的语气。

总之，久别的彼得堡给他的依旧是刺激肉体 and 麻痹精神的印象：一切都是那么清洁、舒适、方便，主要的是人们在道德上没有追求，因而日子过得轻轻松松。

漂亮、干净、谦恭的车夫，给他赶着马车，沿着一条冲洗干净的漂亮马路，从一个个漂亮、谦恭、干净的警察身旁走过，穿过一座座漂亮、干净的房屋，来到玛丽艾特住的那幢滨河宅子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蒙着眼罩的英国马。一个英国人模样的车夫坐在驭座上，络腮胡子盖住半截脸，身穿号衣，手执马鞭，露出一副高傲的神情。

穿着极其干净的制服的门房，打开通往前厅的大门。前厅里站着一个听差，身上的号衣更加干净，镶着丝绦，络腮胡子修剪得威武雄壮。另外还站着一个值班的勤务兵，穿着簇新的军服，佩带着军刀。

“将军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一样。夫人就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递上伯爵夫人的信，掏出名片，走到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旁，提笔刚刚写下“来访未晤，非常遗憾”，这时听差走到大门口，喊了声：“马车！”勤务兵立即双手紧贴裤缝，挺直身子立正，眼睛迎送着从楼梯上走下来

的身材纤小而步子快得跟她的身份极不相称的太太。

玛丽艾特头戴一顶插有羽毛的大帽子，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色斗篷，手上戴着崭新的黑色手套；她的脸上蒙着面纱。

看见聂赫留朵夫，她撩起面纱，露出一张十分可爱的脸，亮晶晶的大眼睛疑惑地看了看他。

“啊，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公爵！”她用愉快而动听的嗓音说。“我差点没认出来……”

“怎么，您竟然还记得我叫什么？”

“当然啦，我和妹妹当初还爱上您了呢。”她用法语说。“您的变化可真大呀。哎，可惜我要出去。要不，我们回屋去。”她说，停住脚步拿不定主意。

她看了一眼壁钟。

“不，不行。我得去卡缅斯卡娅家参加追荐仪式。她可伤心死啦。”

“这个卡缅斯卡娅怎么了？”

“难道您没听说？……她儿子在决斗中给打死了。是和波津打架。独生子呀。真可怕。母亲伤心死啦。”

“是的，我听说了。”

“不，我最好还是去，要不您明天来，今天晚上也行。”她说完，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大门口走去。

“今天晚上来不了。”他边回答，边跟她一起往门外走。“我是有事来求您的，”他说，眼睛望着那对走过来的棕红色的马。

“什么事？”

“这是姨妈为这事写的信，”聂赫留朵夫说着，递给她一个印有大花体姓氏字母的狭长信封。“您看了信就全知道了。”

“我知道：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以为，我在公事上能左右丈夫。她想错了。我什么也不能，而且也不想过问他的事。当然啦，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准备破一下例。到底是什么事？”她说，用一只戴黑手套的小手在口袋里仔细摸索着什么。

“有一个姑娘关在要塞里，可是她有病，和案子也没什么牵连。”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利季娅·舒斯托娃。信上有。”

“那好吧，我试试看，”她说完，轻盈地迈上那辆油漆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软皮座弹簧马车，撑开阳伞。听差坐到驭座上，示意车夫赶车。马车移动了，可是她立即用伞碰了碰车夫的后背，于是那两匹漂亮的细皮英国母马被嚼子勒得扬起漂亮的马头，停了下来，细长的马腿不住地上下倒动着。

“您要来呀，就是没事儿也请来呀，”她说

完，嫣然一笑，这一笑的魅力她是很清楚的，接着仿佛戏演完了似的，放下了幕布：放下了面纱。“好，走吧，”她又用伞碰了碰车夫。

聂赫留朵夫举起帽子。那两匹棕红色的纯种母马，喷着响鼻，马蹄嗒嗒地敲击着路面，马车飞快地跑起来，只是偶尔在不平的地方，新胶皮轱辘轻轻地跳动几下。

十六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和玛丽艾特的相视一笑，不禁对自己摇了摇头。

“眨眼的功夫，又陷进这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每当他不得不去奉承那些他并不尊敬的人时，总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为了不致走冤枉路，聂赫留朵夫盘算了一下先去哪个地方合适，最后决定先去参议院。他被领进办公厅，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到许许多多衣冠整洁、谦谦君子模样的官僚。

玛丝洛娃的上诉状已经收到，并已交给参政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他手里姨父的那封信正是写给这位沃尔夫的。官僚们把情况告诉了聂赫留朵夫。

“参议院本周有一次会，玛丝洛娃的案子未必能在这次会议上审理。如果能托托人，可能有

希望安排在这个星期，也就是星期三的那个会。”一个官僚说。

聂赫留朵夫刚才在参政院办公厅等候查询结果时，又听到关于决斗和年轻的卡缅斯基被打死的事。他在这里第一次知道了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馆里吃牡蛎，像往常一样，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缅斯基所在的那个团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卡缅斯基说他造谣。那个军官打了卡缅斯基。第二天，他们进行了决斗，卡缅斯基腹部中了一枪，两个小时后就死了。凶手和决斗双方的证人已经被捕，不过据说，他们虽然被关了禁闭，过两个星期就会放出来。

聂赫留朵夫从参政院出来，前往上诉委员会拜见那里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官僚沃罗比约夫男爵。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语气严厉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要见男爵是不可以的，今天他在皇上那儿，明天还要去禀报。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接着去见参政官沃尔夫。

沃尔夫刚刚吃过早饭，正像往常一样，吸着雪茄在房间里踱步，以帮助消化。他就这样接见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的确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他把这一品德看得高于一切，并从这个高度审视所有的人。他不能不对这一品德给予高度的重

视，因为正是凭借它的力量，他才飞黄腾达，如愿以偿，也就是说，通过婚姻，获得了财产，使他每年有一万八千卢布的收入，又通过自己的劳动，谋得参政官的职位。他不仅认为自己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而且认为自己是个具有骑士风度的人。他所谓的骑士风度，就是不暗中受贿。至于向国库申领各种各样的出差费、车马费、房租费，奴性十足地执行政府下达给他的任何指令，他并不认为有失骑士风度。数百名无辜的人，只因为热爱自己的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而遭到迫害、倾家荡产、流放和监禁，他对自己在担任波兰王国一个省的省长时所干的这些事，非但不认为有失骑士风度，反而认为那是高尚、英勇、爱国主义的一大功绩。他掠夺深爱他的妻子及妻妹财产的行为，他同样不认为有失骑士风度，相反，他认为这是对家庭生活作出的合理安排。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的没有个性的妻子、妻妹、女儿。妻妹的财产同样被他据为己有，他把她的地产卖掉，把钱存入自己的名下。女儿温顺、胆怯，长得不漂亮，过着一种孤独而沉闷的生活，近来从福音教派的教义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经常参加阿林和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聚会。

他的儿子本来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可是十五岁长出胡子后，开始喝酒，放荡，直到二十岁

时被撵出家门，因为他没有读完任何一个学校，乱交朋友，欠下债务，丢了老子的脸。父亲有一次替儿子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还了六百卢布的债，并对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他不思悔改，就把他赶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还放肆地对父亲说，他住在家里本来就是活受罪。于是，沃尔夫向儿子宣布，他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以后，沃尔夫装出没有儿子的样子，家里人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起儿子的事，沃尔夫因而有了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以最好的方式安排妥了自己的家庭生活。

沃尔夫脸上带着亲切而又有几分嘲讽的神情——这是他的特点：一种自以为比他人高贵的不由自主的表现，停止在书房里踱步，和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把信读了一遍。

“请坐，对不起。要是您不介意，我还得走走，”他说，双手插进上衣口袋，迈着轻缓的步子，沿着格调古雅的大书房的对角线，来回走起来。“很高兴认识您，当然，也很高兴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效劳，”他说着，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小心翼翼地 from 嘴上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是请求尽快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不得不去西伯利亚的话，那还是早点儿去的

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搭乘下诺夫哥罗德的头几班轮船，我知道，”沃尔夫面带宽容的微笑说，只要别人一对他开口讲话，他总能预先知道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前，看了一眼放在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是的，是的，玛丝洛娃。好，我和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星期三审理这个案子。”

“我能把这一情况打电报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这是为什么？不过，既然您愿意，也没什么。”

“上诉的理由也许不太充分，”聂赫留朵夫说，“可是我以为，从案卷本身也可以看出来，这一判决是由误会造成的。”

“是的，是的，这有可能，不过参议院不能根据实质来审理案子，”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口气严厉地说。“参议院只是监察法律的使用和解释是否得当。”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殊的事情。”

“知道，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特殊的。我们会做应该做的事。就这样吧。”烟灰还在雪茄上，但已出现裂缝，马上就有掉下来的危险。“您很少来彼得堡吧？”沃尔夫说，尽量拿稳

雪茄，不让烟灰掉下来。烟灰还是开始晃动，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往烟灰缸送去，烟灰到那儿一下塌落了。“卡缅斯基的事真是太可怕了！”他说。“一个出色的年轻人。独生子。特别是做母亲的处境。”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眼下整个彼得堡的人都在说的关于卡缅斯基的那些话。

沃尔夫还谈到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和她迷恋新宗教派别的事，他对这个派别持一种不褒不贬的态度，不过从他自以为比他人高贵的角度来看，这种东西显然对他来说是多余的。说完后，他按了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如果您方便的话，请来吃午饭，”沃尔夫说着，伸出手，“那就星期三吧。我那时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天色已晚，聂赫留朵夫坐上出租马车回家，也就是回姨妈家去了。

十七

伯爵夫人家七点半开饭，开饭的方式与众不同，聂赫留朵夫从没见过。饭菜摆上桌子，仆人们立即退出，由吃饭的人自己动手取。男人们不便让女人们有举手之劳，于是拿出做男人的样

子，英勇地肩负起给女士们和自己布菜斟酒的重担。每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下桌上的电铃，仆人们会悄无声息地走进来，迅速撤换餐具，端上下一道菜。饭菜讲究，酒也讲究。灯火明亮的大厨房里，一个法国厨师带领两个穿白衣服的助手在不停地忙活。吃饭的人共有六名：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也就是那个脸色阴郁、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国女教师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也谈起决斗。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皇上将如何对待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皇上很为那个母亲难过，于是大家也为那个母亲感到伤心。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深表同情，却不想严惩捍卫自己军人荣誉的凶手，于是大家也宽容了那个捍卫军人荣誉的凶手。只有伯爵夫人素来思想自由，对凶手表示了谴责。

“喝酒闹事，把一个好端端的年轻人打死，对这样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原谅。”她说。

“这我就不懂了。”伯爵说。

“我知道，你总是听不懂我讲的话，”伯爵夫人说完，把身子转向聂赫留朵夫。“大家都能听得懂，只有我丈夫听不懂。我是说，我很可怜那位母亲，但是我不想让一个杀了人的人还那么逍遥自在。”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儿子为凶手大抱不

平，反对母亲的看法，相当粗鲁地向她说，作为军官他没有别的办法，要不然他会遭到军官们的谴责，被驱赶出团。聂赫留朵夫听着，没有插嘴，他当过军官，对恰尔斯基少爷的话虽不认可，却能够理解，不过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把这个杀死人的军官同他在监狱里见到的那个打架误伤人命、被判处苦役的漂亮小伙子作了比较。两人都因醉酒成了杀人凶手。那个农民一时性起打死了人，只得抛别妻子、家庭、亲人，戴上镣铐，剃去半边头发，去服苦役，而这名军官却坐在漂亮的禁闭室里，吃着好饭，喝着好酒，看着书，今明两天就要释放，又可以像从前那样生活，而且还成了一个招人喜欢的人物。

他把心里想的这些话说了出来。开始伯爵夫人同意外甥的意见，后来不做声了。其他人也是这样，于是聂赫留朵夫感到，他说的这番话似乎有失体统。

晚上，吃过晚饭不久，大厅里好像举办讲座似的，特意摆上几排雕花高背椅，桌子后面为讲道人放了一把圈椅和一张放着玻璃水瓶的茶几。人们纷纷来到，听外国来的基泽维特讲道。

大门两旁停着名贵的马车。陈设华丽的大厅里，坐着女士们，身穿绸缎、丝绒和饰有花边的服装，头上戴着假发，腰身勒得又细又高。女士们中间坐着一些男人——军人，文官，还有五个

普通百姓：两个扫院子的，一个小铺掌柜，一个仆人和一个车夫。

基泽维特，一个身体强壮、头发花白的人，讲的是英语，有一个戴夹鼻眼镜的瘦个儿年轻姑娘流利地替他翻译。

他说，我们的罪恶极为重大，为此受到的惩罚也极为重大，而且无法避免，终日生活在惩罚的恐惧中是不行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只要想一想，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怎样生活，想一想我们怎样触怒仁慈的上帝，怎样使基督受难，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会得到宽恕，不会有出路，不会得到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注定会遭到灭亡。灭亡是可怕的，永恒的磨难在等着我们，”他用颤抖的哭腔说。“怎样才能拯救自己？兄弟们！怎样才能从这场可怕的烈火中逃出来？烈火已经包围了房子，只剩死路一条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泪真的沿着他的脸流下来。已经七八年了，每次他宣讲这篇得意之作，讲到这个地方，他都会准确无误地感到喉咙抽搐，鼻子发酸，泪水从眼睛里往外流。这些泪水也越发使他感动。房间里响起一片哭声。伯爵夫人坐在一张细工镶嵌的小桌旁，双手托着脑袋，肥胖的肩膀不住地抖动。车夫惊恐地瞧着这个德

国人，就像他车上的辕杠眼看要撞上他，而他却不躲开。大部分人坐在那儿，姿势和伯爵夫人一模一样。沃尔夫的女儿，长得像他，穿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双手捂着脸，跪在地上。

讲道人脸上突然绽露出演员们表现快乐时的那种可以乱真的笑容，声音柔和地说：

“拯救的方法是有的。它就在我们面前，多么轻松、快乐的方法。这种拯救，就是上帝惟一的儿子甘愿为我们受难，为我们流血。他的受难，他的鲜血，可以拯救我们。兄弟姐妹们，”他又噙着眼泪说，“我们要感谢上帝，他为人类的赎罪献出了他惟一的儿子。他那神圣的鲜血……”

聂赫留朵夫感到极为厌烦，悄悄站起身，皱着眉头，忍着羞愧难当的呻吟，踮着脚尖走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

十八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准备下楼，仆人给他送来莫斯科律师的名片。律师是因为自己的事情来的，不过如果参议院能很快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他可以就便出庭。聂赫留朵夫发出的电报，显然和他走岔了。听到聂赫留朵夫说玛丝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由哪几个参政官审理，

他笑了笑。

“恰好是参政官的所有三种类型，”他说。“沃尔夫是彼得堡的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学者型的法学家，沃罗比约夫是个讲求实际的法学家，因而是三人中最富有朝气的，”律师说。“希望全在他身上。上诉委员会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今天就去见沃罗比约夫男爵，昨天没能见到。”

“您知道，沃罗比约夫这个男爵是怎么来的吗？”律师说，听到聂赫留朵夫用带点儿滑稽的口吻说出这个外国爵位和这个纯粹的俄国姓氏，接着解释起来。“这个爵位是保罗皇上因什么事赐给他祖父的。他祖父好像是宫中的侍从，不知怎么讨得了皇上的欢心。赏他个男爵吧，于是就有了沃罗比约夫男爵。他现在非常以此自豪。其实是个大滑头。”

“我就是去找他。”聂赫留朵夫说。

“那正好，我们一起走。我用车送您。”

聂赫留朵夫正要出门，前厅里一个仆人迎上来，递给他玛丽艾特的一封信：

“为满足您的愿望，我完全不顾自己的习惯，在丈夫面前为您所庇护的人求情。此人立刻就可获释。丈夫已给要塞司令写了条子。那么，请常来吧……恭候您的光临。玛。”

“这算什么？”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这可太可怕了！一个女人被他们关进单人牢房都七个月啦，原来什么罪也没有，放她也简单，一句话就行了。”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嘛。不过，您至少达到了自己的愿望。”

“是的，可是这种成功让我感到痛心。那么，究竟是怎么搞的？他们为什么关她？”

“算啦，这种事是不能深究的。我送您吧，”律师说，这时他们来到台阶上，律师雇的那辆漂亮的马车也靠了过来。“您不是到沃罗比约夫那儿去吗？”

律师告诉车夫要去的地方，那几匹骏马很快就把聂赫留朵夫送到男爵住的房子前。男爵在家。进门第一个房间里有一个穿文官制服的青年，脖子细长，喉结突出，走路的样子异常敏捷，另外还有两个太太。

“贵姓？”喉结突出的青年官员异常敏捷而优雅地从那两个太太身边走向聂赫留朵夫，问。

聂赫留朵夫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男爵说起过您。请稍候。”

年轻官员走进一个关着门的房间，又从里面领出一个身穿丧服、满面泪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瘦削的手指放下乱成一团的纱巾，以便掩饰眼泪。

“请进，”年轻官员步子敏捷地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站在门口说。

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到一个身材中等而结实的人，穿着常礼服，头发剪得短短的，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圈椅上，快活地瞧着前方。看见聂赫留朵夫进来，他那张在雪白的胡须的衬托下显得特别红润的和蔼的脸上，立即露出亲切的微笑。

“非常高兴见到您，我和您母亲早就认识，我们是老朋友了。您小的时候，我见过您，后来当了军官，我也见过。好啦，请坐，说说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是的，是的，”他说，听到聂赫留朵夫说起费多西娅的事，又摇起白发剪得短短的头，“说吧，说吧，我全懂了：是的，是的，这件事的确感人。那么，上诉书递上去了吗？”

“我已准备好了上诉书，”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上诉书。“不过，我想求求您，希望对这个案子特别关照一下。”

“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去奏明，”男爵说，快活的脸上做出一副完全不像的怜悯表情。“非常感人。显然，她还是个孩子，丈夫待她很粗暴，招致了她的厌恶，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要好了……是的，我要去奏明。”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说，他想去求皇后。”

聂赫留朵夫的话还没说完，男爵的脸色就变了。

“您还是把上诉状交到办公室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这时，年轻官员走进房间，显然有意显示他那敏捷的步态。

“那位太太要求再说两句话。”

“好吧，叫她来。唉，老弟，在这儿得看见多少眼泪呀，要是把所有人的眼泪都擦干该多好呀！尽力而为吧。”

太太走进来了。

“我忘了求您别让他把女儿送人，他可是什么事都……”

“我不是说过，我一定会办的吗。”

“男爵，看在上帝分上，您救救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她抓住他的手，吻了起来。

“一切都会办到的。”

等这位太太走后，聂赫留朵夫也起身告辞。

“我们会尽力去办的。我们和司法部联系一下。他们一给我们答复，我们就能尽力去办。”

聂赫留朵夫走出书房，穿过办公室。又像在参议院一样，他在这间气派的办公室里看到许多气派的官僚，个个衣着整洁，彬彬有礼，说话清楚严肃，从服饰到谈吐，几乎无懈可击。

“他们怎么这么多，多得这么可怕，他们吃得这么饱，他们的衬衫和手这么干净，他们所有人的皮靴擦得这么亮，这一切都是谁做的呢？不要说和囚犯比，就是和乡下人比，他们这些人又是多么舒服呀。”聂赫留朵夫禁不住又想道。

十九

在彼得堡，操纵囚犯命运的，是一位德国男爵出身的老将军，战功显赫，获得过无数勋章，但平时从不佩带，只在上衣扣眼里别一枚白色十字勋章，大家都说他已年老昏聩。他在高加索任职时，得到了这枚特别让他引以为荣的十字勋章，因为他率领剪短头发、身穿军服的俄罗斯农民，使用上了刺刀的步枪，屠杀了一千多名捍卫自己的自由、家园和亲人的人^[11]。后来，他驻扎波兰时，又驱使俄罗斯农民犯下各种各样的罪行^[12]，因此又得到勋章和军服上的新饰物；后来他还在别的地方任过职，如今年事已高，接受了眼下这个可以给他提供好房子、好薪水和荣耀的职位。他严格执行上面的各项指令，而且特别重视它的执行情况，他认为上面的指令具有特殊的意义，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改变，惟有上面的指令不可改变。他的职责就把男女政治犯关在特别囚室和单人牢房，直到其中有一半人在十

年之内死去，还有一部分人发疯，一部分人死于痨病，一部分人自杀身亡：或绝食饿死，或用玻璃割破血管，或上吊，或自焚。

老将军知道这一切，这一切是在他的眼前发生的，可是这些事情并不能触动他的良心，就像暴风雨、洪水等天灾所引起的灾害不能触动他的良心一样。这些事情是执行以皇上的名义所发布的指令的结果。这些指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考虑它们的后果是毫无益处的。老将军不允许自己考虑这些事，他认为爱国军人的天职就是不考虑，以免在执行他看来非常重要的职责时，变得心慈手软。

老将军按照职责的要求，每星期到所有的特别囚室巡视一次，询问囚犯们有什么要求。囚犯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总是平静地、不露声色地听他们说，却从来没有满足过任何一个要求，因为所有的要求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当聂赫留朵夫乘坐的马车走近老将军的住所时，塔楼上的自鸣钟正用它精致的钟琴奏出《上帝颂》的乐曲，然后又敲了两下。聂赫留朵夫听着钟声，不禁想起他在十二月党人的笔记中读到，这种每小时响一次的甜美的乐曲，在那些终身监禁的囚徒们心中引起怎样的反应。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到了将军家的大门口，这时老将军正坐在昏暗的客厅里的一张嵌花小桌旁，和一个年轻

人在纸上转动小碟子。年轻人是个画家，是他部下的弟弟。画家那细润无力的手指放到老将军那僵硬干皱的手指中间，两只手合在一起，随着倒扣的茶碟，在写满字母的纸上转来转去。茶碟是在回答老将军提出的问题：人死后的灵魂怎样才能互相认出来。

那个担任侍仆职务的勤务兵拿着聂赫留朵夫的名片走进来的时候，贞德【13】的灵魂正通过茶碟在讲话。贞德的灵魂已经按字母说出：“能相互认出来”，并已记在纸上。勤务兵进来的那一刻，茶碟刚刚拼完“通过”这个词，正在犹豫不决地摆动。茶碟之所以来回摆个不停，是因为将军认为，下面的字母将拼成“清”也就是说贞德应当说，人的灵魂能相互认出来，只有通过清除所有的世俗观念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才能实现，而画家却以为，下面的字母拼的是“灵”，贞德的灵魂会说，人的灵魂能相互认出来，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的一种光实现的。将军阴沉着脸，拧紧浓密的白眉毛，目不转睛地盯着摆动的手掌，把碟子往能拼成“清”的字母上推，想像着是碟子自己在移动。面无血色的年轻画家，把稀疏的头发撩到耳后，一双无神的蓝眼睛望着客厅里的一个昏暗的角落，神经质地抖动着嘴唇，把茶碟往“灵”那边推。将军因正在兴头上的事被搅，皱起眉头，沉默片刻之后，才接过名片，戴上夹鼻眼镜，站

起来，肥胖的腰部疼得他哼哧一声，挺直他那高大的身躯，揉了揉发麻的手指。

“请他到书房。”

“大人，请让我一人做吧，”画家站起来说。“我觉得灵魂还在。”

“好，做吧，”将军果断而威严地说，迈开两条僵硬的大腿，脚步坚定匀整地向书房走去。“见到您很高兴，”将军粗门大嗓地对聂赫留朵夫亲切地说，指着写字台旁边的圈椅请他坐下。“到彼得堡很久了吗？”

聂赫留朵夫说，他刚到不久。

“您的母亲，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母亲去世了。”

“请原谅，太遗憾啦。儿子对我说，他见到您了。”

将军的儿子也和父亲一样，在官场上十分得意，军事学院毕业之后，进侦察局任职，并很为这个差事感到自豪。他的差事就是领导一群暗探。

“是啊，我和您父亲共过事。我们是老朋友，老同事。怎么样，您现在担任什么职务？”

“不，我没有任职。”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了头。

“我有事拜托您，将军。”聂赫留朵夫说。

“非……常……高兴。何事需要效劳？”

“如果我要拜托的事不妥当，那就请您原谅。可是我不得不麻烦您。”

“什么事？”

“您这儿关押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人。他母亲请求见见他，或者至少把一些书交给他。”

将军对聂赫留朵夫提出的问题，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侧着头，眯缝着双眼，好像在进行思考似的。其实他什么也没有思考，甚至对聂赫留朵夫的问题也不感兴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会依照法律敷衍他的。他不过是在什么都不想的情况下，闭目养神而已。

“这事，您要知道，并不由我做主，”他稍事休息后说。“关于探监的问题，有皇上御准的明文规定，凡是规定上准许的，都可以得到批准。至于书的问题，我们这里有图书馆，可以给他看准许看的书。”

“是的，可是他需要的是学术方面的书：他想搞研究。”

“您别信那一套，”将军沉吟了一下。“这不是做学问。这不过是不安分罢了。”

“那不会吧，他们总得做点儿什么来消磨他们的苦日子呀。”聂赫留朵夫说。

“他们总是抱怨，”将军说。“可我们是了解他们的。”他说起他们简直就像说一种品质低劣的特殊类型的人似的。“其实，他们在这里享受到

的舒适条件，在监狱里是很少能见到的，”将军继续说。

于是，他仿佛要证实自己的话似的，详细描述起为囚犯们提供的种种舒适条件，好像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囚犯们提供令人惬意的居住场所。

“先前的情况，确实相当艰苦，可是如今他们在这里好极了。他们每顿饭有三道菜，而且总有一道肉菜：牛排或者肉饼。星期天还加一道菜——甜食。真是上帝保佑，要是每一个俄国人都能吃到这样的饭菜就好啰。”

将军像所有老年人一样，显然一遇到他所熟悉的东西，总要反反复复地说上几遍，以证明他说的他们贪得无厌、忘恩负义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他们既可以得到宗教方面的书，又可以得到旧杂志。我们有一系列适合他们的书。只是他们很少去读。一开始他们好像还感兴趣，可是后来呢，新书纹丝没动，旧书就更没翻啦。我们甚至还做过试验，”将军似笑非笑地说，“故意在书里夹上纸片。结果纸片夹在书里一动也没动。还有，他们写字也是允许的，”将军继续说。“发给他们石板，又发给石笔，他们尽可以写字消遣的。可以擦掉再写嘛。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会完全静下心来的。只不过他们一开始的时

候烦躁不安，以后就会变得很安心的，甚至还会长胖呢，”将军说，根本没有想到他的话里包含着一种可怕的意义。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而苍老的声音，望着他那僵硬的手脚，白眉毛下的那双浮肿的眼睛，军服领子支撑着的那刮得精光的苍老而下垂的腮帮子，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那枚白色十字勋章，那是他因为异常残忍地屠杀了许多生灵得来的，于是聂赫留朵夫心里明白了，反驳或揭穿他那番话的含意，是徒劳无益的。不过，他还是稳定了一下情绪，又问起另一桩案子，问起女犯舒斯托娃，因为他今天得到消息，说有命令要释放她。

“舒斯托娃？舒斯托娃……我记不住所有犯人的名字。要知道他们人太多啦。”他说，显然责怪他们人数过于泛滥。他按了按铃，吩咐把文书叫来。

将军趁叫文书这点功夫，劝聂赫留朵夫出来担任职务，说凡是正直高尚的人，并暗示自己也属于这类人，都是皇上……“和祖国”特别需要的。他在这里加上“和祖国”三个字，显然不过是为了说起来朗朗上口而已。

“你看，我岁数大了，可我还在尽心尽力地工作嘛。”

文书是个干瘦而结实的人，生着一双惊恐不

安的机灵的眼睛，走来报告说，舒斯托娃关押在一个警卫森严的特别地方，有关她的公文暂时没有收到。

“等我们收到公文，当天就会把她放掉。我们不会留他们的，我们并不特别看重他们光顾这里，”将军说完，又想俏皮地笑一笑，结果反而使那张老脸变得更加难看了。

聂赫留朵夫站起来，竭力忍住不对这个可怕的老人流露出既憎恶又怜悯的复杂表情。老人也认为，对老同事的这个轻浮和显然不走正路的儿子，不必过于严厉，但也不可听之任之，不加开导。

“再见啦，亲爱的，请别见怪，我是爱护您才说这话的。不要和关在我们这儿的人打交道。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这些人都是道德败坏的家伙。我们可是很了解他们的。”他说，那口气分明不容人怀疑。他的确对此深信不疑，这倒不是因为事实已经如此，而是因为事实如果不如此，那他就不配以令人尊敬的英雄自居，不配过现在这种优裕的生活，而是成了一个出卖过良心、到了晚年还在出卖良心的恶棍。“最好还是出来任点儿职，”他继续说，“皇上需要诚实的人……祖国也需要，”他又添加一句。“是啊，要是我们大家都和您一样，不担任公职的话，那可如何是好呀？还能有谁呢？我们动不动就批评现

行的制度，自己却不愿意帮助政府。”

聂赫留朵夫深深地叹了口气，弯腰鞠了一躬，握了握故作大度地向他伸过来的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了房间。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揉着后腰，又走进客厅。画家已经记下贞德灵魂的答复，正在那儿等他呢。将军戴上夹鼻眼镜，看到的是：“他们可以通过灵魂本身发出的光，相互认出来。”

“啊，”将军闭上双眼，不无赞赏地说。“如果大家的光都是一个样子，那又怎么认得出来呢？”他问，在小桌旁坐下，又把手指和画家的手指交叉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坐的马车走出了大门。

“老爷，这地方真无聊，”他对聂赫留朵夫说。“我都想不等您就走啦。”

“是的，是无聊，”聂赫留朵夫表示同意，接着深深地吸了口气，心情平静地注视着天上的烟霞和涅瓦河上被小木船、轮船荡起的闪闪发亮的波浪。

二十

第二天，玛丝洛娃的案子就要审理，于是聂赫留朵夫赶往参议院。在参议院大厦的宏伟的大门口，律师和他碰到一块。门旁已经停着几辆马

车。他们沿着壮丽宏伟的楼梯上到二楼。律师熟悉所有的通路，往左拐进一道门，门上刻着诉讼条例制定的年份。在第一个长方形的房间脱掉大衣，从门房的口里打听到参政官已经到齐，最后一位刚刚进去，法纳林就那样穿着燕尾服，白胸衬上扎着白领带，愉快而自信地走进第二个房间。在这间房里，右边是一个大橱，然后是桌子，左边是旋转楼梯，这时正有一个穿文官制服、腋下夹着皮包的文雅的官员从上面下来。房间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小老头，模样像个族长，一头白色的长发，穿着短上衣和灰色长裤，身旁站着两个毕恭毕敬的跟班。

白发老头儿走进大橱^[14]，关上橱门。这时，法纳林看见一个同行，和他一样身穿燕尾服、扎白领带的律师，立即迎上前去兴奋地交谈起来；聂赫留朵夫打量了一下房间里的人。大约有十五个前来旁听的人，其中有两个太太，一个年纪很轻，戴一副夹鼻眼镜，另一个头发已经斑白。今天审理的是一桩报刊诽谤案，因此旁听者比往常要多，主要是来自新闻界的人士。

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的民事执行吏，身着精美的制服，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办哪一个案子，得知是办玛丝洛娃的案子，在纸上记了些什么，就走开了。这时，大橱的门打开了，族长模样的小老头走了出来，不过

身上穿的已经不是那件短上衣，而是一件镶着丝绦、前胸挂满耀眼的勋章的盛装，样子活像一只大鸟。

这件可笑的衣服，显然让小老头自己也感到难为情，于是他迈着比平时要快的步子，匆匆忙忙地走进入口处对面的房门。

“这是贝，一个非常可敬的人，”法纳林对聂赫留朵夫说，介绍他和自己的同事认识，然后讲起眼下就要审理这件让他十分感兴趣的案子。

案子很快开审了。聂赫留朵夫和其他旁听者从左边走进法庭。他们这些人，还有法纳林，来到栅栏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那个彼得堡的律师走到栅栏前面的斜面写字桌旁。

参政院的法庭比起地方法院的法庭要小，陈设也要简单，惟一的区别是参政官面前的桌子上铺的不是绿呢子，而是镶有金丝绦的深红色丝绒，不过行使审判职能的象征物却是一样的：有守法镜、圣像、皇上的肖像。民事执行吏也是那样庄严地宣布：“开庭了。”所有的人也是那样站起来，身穿制服的参政官也是那样走进法庭，那样坐到高背椅上，那样用胳膊肘支住桌子，竭力摆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参政官共有四人。首席参政官尼基京脸型狭长，胡子刮得精光，生着一双银灰色的眼睛；沃尔夫意味深长地紧抿嘴唇，用白净的小手翻着案

卷；再一个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身材肥壮，脸上有麻子，是学者型的法学家；第四个是贝，也就是那个族长模样的小老头，他是最后一个到的。随参政官们一起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长，后者是个中等身材、没留胡子的干瘦年轻人，脸色黝黑，黑色的眼睛带着忧郁的神色。尽管他穿着一身古怪的制服，尽管聂赫留朵夫有六年多的时间没有见过他，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是自己大学时代最要好的一个朋友。

“副检察长是谢列宁吗？”他问律师。

“是的，怎么？”

“我和他很熟，这是个极为出色的人……”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副检察长，精干。倒是可以托托他。”法纳林说。

“他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凭良心办事的。”聂赫留朵夫说，回想起他与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和友情，回想起他那纯洁、诚实和绝对正派的可爱品质。

“是的，现在也来不及了。”法纳林小声说，又全神贯注地去听已经开始的案情报告。

现在审理的是关于高等法院的判决没能改变地方法院的审判的上诉案。

聂赫留朵夫用心听起来，竭力想搞清眼下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可是又像在地方法庭上一样，妨碍他理解案情的是法庭根本不谈理应成为

要点的东西，而只是在一些完全次要的事情上兜圈子。这个案子涉及报上登载的一篇揭露某股份公司董事长舞弊行为的文章。问题的关键似乎应当只能是，公司董事长是否真的侵吞了股东们的利益，以及如何才能制止他的这种侵吞行为。可是，对这点只字未提。法庭上谈的只是报纸发行人按法律是否有权利刊登这篇小品文，刊登小品文犯的是什么罪行，是诽谤还是诬陷，是诽谤中包含诬陷，还是诬陷中包含诽谤，还谈到某个总署颁布的各种法令和条款，都是一些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

聂赫留朵夫搞懂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报告案情的沃尔夫尽管昨天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参议院不能根据案件的实质审案，可是在报告本案案情时却显然有意偏袒被告一方，以利于撤销高等法院的判决。谢列宁一反他那矜持的性格，突然情绪激动地发表了相反的意见。向来矜持的谢列宁一下激动得让聂赫留朵夫感到惊讶，是大有原因的，因为谢列宁知道公司董事长在金钱方面手脚不干净，此外又无意中得知，沃尔夫几乎就在开庭的头天晚上参加了这个商人的豪华宴会。现在，沃尔夫报告案情时，虽然十分谨慎，但还是明显地偏袒一方，谢列宁一听就炸了，用对一件普通案子来说显得过于冲动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番话显然伤了沃尔夫的面子：他的脸

涨得通红，身子不住地抖动，默默地做出惊讶的神态，然后带着威严而又受到冒犯的样子，随同其他几位参政官朝议事室走去。

“请问，您来办哪一个案子？”参政官们刚刚离开，民事执行吏又向法纳林问道。

“我已经对您说过，玛丝洛娃的案子。”法纳林说。

“是的。这案子今天要审理。不过……”

“怎么回事？”律师问。

“请注意，这个案子不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在宣布判决之后，参政官先生们是不见得会出来的。不过我可以去通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去通报，去通报。”民事执行吏又在那张纸上记了点什么。

参政官们果然打算在宣布诽谤案的判决后，不出议事室，就在里面边喝茶吸烟，边把其他的案子审完，其中包括玛丝洛娃一案在内。

二十一

参政官们刚刚在议事室里的桌子旁坐下，沃尔夫就非常激昂地摆出必须撤销原判的种种理由。

首席参政官向来对人不怀善意，今天的心情

尤其恶劣。他在法庭上听案情报告时，已经拟好了自己的意见，此刻坐在这里，并没有听沃尔夫发言，而是专心想着自己的心事。他想的是昨天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的任命维利亚诺夫的事，那是一个他向往已久的重要职位，却没有委任给他。首席参政官尼基京极为真诚地相信，他对自己任职期间接触过的各种各样的一二等文官所作的评论，将成为一份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昨天他写完了一章，对这两个品级的文官中的某些人，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原因是他们阻挠他，用他的话说，阻挠他拯救俄国，使它免遭灭亡，而当今的那些执政者们正在一步步地把它引向灭亡——而实际上的原因，不过是他们阻挠他领取比现在更多的薪俸罢了。此刻他想的是，在后代子孙那里，这样的事情将会得到一种全新的解释。

“是的，当然啦。”他回答沃尔夫对他说的话，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听到。

贝却神色阴郁地听沃尔夫讲话，同时在他面前放着的一张纸上画着花环。贝是个纯粹的自由派。他虔诚地保持着六十年代的传统，即使偏离严格的公正立场，也只是偏向自由派一边。比如，在眼下这个案子的审理中，贝就站在主张驳回上诉一方，除了因为提出上诉的公司商人是个手脚不干净的人之外，还因为指控新闻记者犯诽谤罪，无异于压制新闻自由。等沃尔夫说完他的

理由，贝丢下还没有画好的花环，面露忧郁——他之所以感到忧郁，是因为他不得不开口去讲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用柔和而悦耳的声音，简短有力地表明上诉缺乏根据，然后低下白发苍苍的头，继续画他的花环。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坐在沃尔夫的对面，不住地用粗实的手指捋着胡须往嘴里送，等到贝一讲完，立即停止咀嚼胡须，粗门大嗓地说，尽管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是个大坏蛋，他还是主张撤销原判，假如这样做有法律依据的话，可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所以他同意伊万·谢苗诺维奇（贝）的意见。他说完之后，心中暗自高兴，因为他把沃尔夫奚落了一通。首席法官同意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看法，于是这个案子被否决了。

沃尔夫感到不满，尤其不满的是他那不正当的偏袒心理仿佛被揭穿了，于是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打开下一个由他报告的玛丝洛娃的案卷，专心阅读起来。参政官们这时按铃叫人送茶，相互谈论起当时同卡缅斯基的决斗一起轰动整个彼得堡的另一件事。

这是关于一个司长的案子，他被当场抓住，触犯的是刑法第九九五条。

“多么下流。”贝厌恶地说。

“这算什么呀？我可以从我们的资料中找出一位德国作家的方案给您看看。这位作家直截了

当地提出，这种事不能算作犯罪，男人之间也可以结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贪婪地、津津有味地吸着夹在指根的一支皱巴的香烟，哈哈大笑。

“这不可能。”贝说。

“我可以告诉您。”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指出那本书的全名，甚至出版年代和地点。

“听说，任命他到西伯利亚的什么城市当省长去了。”尼基京说。

“太妙啦。主教一定会举着十字架迎接他。需要有这样一位主教。我倒想给他们推荐这样的主教。”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把烟头扔进茶碟，胡乱抓住胡须塞进嘴里咀嚼起来。

这时，民事执行吏走进来报告说，聂赫留朵夫和律师希望在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时能够出席旁听。

“瞧这个案子，”沃尔夫说，“倒是一件真正的风流韵事呢。”于是他把自己知道的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关系说了一遍。

参政官们谈论了一阵这个案子，吸足了烟，喝够了茶，然后走进法庭，先宣布对上一个案子的判决，接着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

沃尔夫用尖细的声音详细报告了玛丝洛娃要求撤销原判的申诉，语气中不无偏颇，显然希望撤销地方法庭的原判。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吗？”首席参政官问法纳林。

法纳林站起来，挺了挺穿着白胸衬的宽胸膛，极其生动而准确地表明法庭有六点事项违离了法律的准确含义，此外，他还大着胆子，简要地提了一下这个案子的实质和原判令人震惊的不公正。法纳林简短而有力的发言的语气带有某种歉意，似乎是说，他所坚持的意见，参政官先生们凭他们的洞察力和法律上的智慧，一定看得比他更清楚，理解得更透彻，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出于他承担责任的要求罢了。法纳林讲话之后，似乎让人觉得，参议院撤销原判，是势在必行的了。法纳林结束了发言，得意地笑了笑。聂赫留朵夫望着自己的律师，看见这样的笑容，心里相信官司准能打赢。可是，他又看了一眼参政官，发现只有法纳林一个人在微笑，一个人在洋洋得意。参政官和副检察长没有笑，也没有得意的样子，脸上倒是有一种厌烦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们这样人的发言我们听多了，统统都是废话。”只是当律师讲话结束和不再白白耽误他们时间的时候，他们才明显地露出满意的神情。律师的话音刚落，首席参政官立即转身请副检察长发言。谢列宁简洁而明确地表示维持原判不动，认为上诉的理由缺乏根据。随后，参政官们站起身，去开会商议。议事室里，大家的意见发

生了分歧。沃尔夫支持上诉；贝搞清事情的原委之后，也非常热情地支持上诉，并根据他对案子的正确理解，生动地向同事们描述法庭的情景和陪审员们产生误会的经过；尼基京像往常一样，主张严格办事和严格履行法律程序，反对撤销原判。于是，整个案子就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意见了。他的意见也是驳回上诉，原因主要是聂赫留朵夫为了道德上的需要同这位姑娘结婚，让他感到极为厌恶。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唯物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抽象的道德，或者更糟，宗教的任何表现，不仅是一种可鄙的疯狂，而且是对人身的一种侮辱。这个妓女惹出的这场官司，以及替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本人到参议院出庭这件事，都是让他感到极其厌恶的。他不停地往嘴里塞着胡须，做出一脸怪相，非常自然地装作一点儿也不了解这个案子，只知道上诉的理由不够充分，所以同意首席参政官驳回上诉的意见。

上诉被驳回了。

二十二

“太可怕了！”聂赫留朵夫和整理皮包的律师走进接待室，说。“这么清楚的一个案子，他们却在形式上挑毛病，驳回了上诉。可怕！”

“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砸的。”律师说。

“谢列宁也主张驳回上诉。可怕，太可怕了！”聂赫留朵夫又重复说。“现在可怎么办呢？”

“那我们去向皇上告御状吧。趁您在这儿，您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给您写。”

这时，身穿制服、佩戴着几枚星章的小个子沃尔夫走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没办法呀，亲爱的公爵。缺乏足够的理由。”他说完，耸了耸窄瘦的肩膀，闭上眼睛，然后走开干自己的事去了。

谢列宁也跟在沃尔夫后面走进来，他已从参政官们那里得知聂赫留朵夫，他从前的朋友，也在这里。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角挂着微笑，眼睛里却露出忧郁。“我不知道你来彼得堡。”

“我也不知道你当了检察长……”

“副检察长，”谢列宁纠正说。“你怎么到参议院来了？”他闷闷不乐地瞧着老朋友，问。“我知道你在彼得堡。可是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我到这儿来，是希望找到公正，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

“就是刚才审的那件案子。”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了，

说。“上诉的理由太不充分啦。”

“问题不是上诉，而是那个女人没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口气。

“这很可能，可是……”

“不是可能，而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呀。”他说。

“我声明了。”

“应当写在记录里。要是能附在上诉书里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很忙，不常来参议院，显然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故事一无所知；聂赫留朵夫觉察到这一点，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对他讲自己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啊，可现在不也很清楚，原判是荒唐的吗？”他说。

“参议院没有权利这样讲话。假如参议院可以根据自己对原判是否公正的看法来撤销原判，那么不要说参议院会失去基本的立场和冒不是维护正义而是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说到这里，想起了刚才的案子，“不要说这个案子，至

少陪审员们作出的决定也就失去它的全部意义了。”

“我只知道一点，这个女人完全无罪，她受到不应有的惩罚，现在救她的最后一丝希望也丧失了。最高机构批准了一件完全非法的事情。”

“这不是批准，因为参议院没有审查，也不能审查案件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吧，”他补充说，显然想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邀请我和你一同参加一个外国人的布道会，”谢列宁嘴角挂着笑，说。

“是的，我参加了，可是我觉得讨厌，又离开了，”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对谢列宁转移话题感到恼火。

“那又何必呢？这不过是宗教感情的一种表现，虽然有点片面，有点宗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一场闹剧。”聂赫留朵夫说。

“啊，不。值得奇怪的只是我们对我们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往往把一些基本的信条当作新的什么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观点告诉还不知道的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讶地注视着谢列宁。谢列宁的眼睛没有避开，目光里流露出的不仅仅是忧郁，而且还有一丝恶意。

“难道你真的相信教会的教义？”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我相信。”谢列宁面无表情地直视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回答说。

聂赫留朵夫叹了口气。

“真奇怪。”他说。

“我们还是以后再谈吧，”谢列宁说。“我就去，”他对恭恭敬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要聚聚，”他叹着气，补充说。“你都什么时候在家？我每天七点钟吃晚饭之前总在家。纳杰日津大街，”他说了门牌号码。“多少年没见面啦，”他临走时补充说，嘴角又挂起微笑。

“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去。”聂赫留朵夫说，感到当年那个亲切可爱的谢列宁，在这番短短的交谈之后，突然变得陌生、疏远和不可理解，也许还有点儿充满敌意。

二十三

当年聂赫留朵夫在大学里认识谢列宁的时候，他是一个优秀的子弟，忠诚的朋友和一个按年龄来说蛮够教养的上流社会中的人，极有分寸，总是那么文文雅雅，漂漂亮亮，同时又正直和诚恳。他功课学得十分出色，不用特别费力气，也没有丝毫的书呆子气，论文常常获得金质

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把为众人服务当作自己生活的目标。他认为实现为众人服务的惟一方式，就是进政府机关任职，所以大学一毕业，他系统地分析了他所能贡献力量的所有职业，最后决定到主管立法的某办公厅二处工作最为有益，于是就去了那里。可是，尽管他极其准确而勤恳地完成要求他做的所有事情，却无法从这一职务中得到做一个有益的人的满足，也无法在自己的心里引起他是在做他应当做的事的感觉。这种不满足的心理，由于他和非常庸俗而虚荣的顶头上司经常发生冲突，变得越来越强烈，终于他离开第二处，调到参议院。在参议院，他感觉好一点，但那种不满足的心理始终伴随着他。

他总有这么一种感觉，一切和他期望的完全不同，而且也完全不是应当有的那个样子。比如，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谋到宫中低级侍从的称号，于是他不得不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上马车四处向人家道谢，因为他们让他担任了仆人的差事。不管他费了多少心思，怎么也无法对这种差事作出合理的解释。他觉得这比在机关里任职更“不对头”，可是，一方面，他不能拒绝这一任命，生怕亲戚们伤心，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为他做的一件大好事，而另一

方面，这一任命也迎合了他天性中的低劣品质，当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穿着绣金制服的样子，当这一任命得到了某些人尊敬的时候，他心里又感到一种莫大的愉悦。

他在婚姻上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别人为他撮合的这门亲事，从上流社会的眼光看来，是一件极为美满的婚姻。他结婚的原因，主要也是无法拒绝，怕得罪和伤害想嫁给他的那位姑娘和撮合这门亲事的那帮人，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娶这样一个年轻、可爱的大家闺秀迎合了他的虚荣心，让他得到了满足。可是，这门亲事很快就被证实比在机关任职和宫廷当差更“不对头”。妻子生过第一个孩子之后，不想再要孩子，过起奢侈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也不得不奉陪。她不算特别漂亮，对他够得上忠诚，可是她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破坏了丈夫的生活，而且她自己除了消耗大量的精力和劳累之外，一无所获——她还是千方百计地过这种生活。他试图努力改变这种生活，但她在亲戚朋友们的支持下，相信生活就该这个样子，结果他的努力如同碰到石头墙上一样，撞得粉碎。

他们生的那个孩子是个女孩，长着一头长长的金色卷发，光着两条腿，在父亲的眼里完全是个陌生的小东西，主要因为她不是按他所希望的那样照看和培养的。夫妻之间经常出现不理解，

甚至不愿相互理解，还有在人前尽量掩饰和为了面子尽量克制的静悄悄的、不动声色的争斗，搞得家里的生活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极大的负担。因此，家庭生活显得比在机关任职和宫中当差，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同他那个圈子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随着智力的成长，不费一点儿气力就挣脱了他从小受其熏染的宗教迷信的束缚，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获得这种自由的。作为一个严肃而诚实的人，他并不讳言他在青年时代，在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大学时代，已经从官方的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位的提高，尤其是当时社会上的反动保守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成为他的障碍。且不说家庭方面，特别是他父亲死后做追荐仪式，以及他母亲要他持斋，社会上的某些人也要求他这么做，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无休止地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诸如此类的仪式：难得有一天空闲的时间不接触这些宗教仪式，简直无法躲避。面对这些宗教仪式，他必须在两种态度中选择一种：要么假装（就他诚实的性格来说，这是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信仰他本不相信的东西，要么承认这些仪式是骗人的把戏，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无须参加这些骗

人的勾当。可是，为了做到这件似乎无足轻重的事情，需要做的工作却很多：不仅要和周围所有亲近的人发生冲突，而且还要改变自己的地位，放弃公职和牺牲他给人们带来的所有利益，他认为他现在担任公职期间已经为人们谋得了不少利益，也希望将来能为他们谋取更大的利益。为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对自己想法的正确性坚信不疑，就像当代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只要多少懂得一点儿历史，知道一点儿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健康的想法是正确的。他知道他不承认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也是正确的。

然而，在生活环境的压力之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却也搞了一点儿骗人的小把戏。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东西是不合理的，首先必须研究这种不合理。这是一个骗人的小把戏，可是它却把他引向了骗人的大把戏，至今不能自拔。

他是在东正教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周围的人要求他信奉东正教，他不承认东正教就无法继续从事他那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当他向自己提出东正教是否正确的问题时，其实预先已经有了答案。为了搞清这个问题，他进行了研究，但他不去阅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15】

的著作，而是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和维奈、霍米雅科夫【16】的宗教论著，自然也就从这些著作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对东正教教义的某种满意和辩护，他受到过这种教义的熏染，他的理性早已把这种教义否定了，可是没有这种教义，整个生活就充满烦恼，而承认这种教义，所有烦恼就一扫而光。他还学会了当下流行的各种诡辩术，什么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认识真理，什么只有众人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什么认识真理的惟一途径是神的启示，什么神的启示隐含在宗教教义之中，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从此以后，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追荐仪式、弥撒和持斋，可以心安理得地对着圣像画十字，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在机关里担任能给人们带来益处同时也给自己缺少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的职务，丝毫不觉得是在搞骗人的把戏。他认为他是在信教，可是却又无比真切地感到，他的这种信仰有点儿完全“不对头”。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眼睛总显得那么忧郁。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看到聂赫留朵夫后，不由得想起自己认识他的时候，身上还没有沾染上这些虚伪的东西，他想起自己当时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他匆匆忙忙地向他暗示自己的宗教观之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地感到这一切“不对头”，于是他变得更加忧郁了。这样的感

觉——老友重逢的喜悦过后——聂赫留朵夫也同样体验到了。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两人相互约定还要见面，但两人都没有特意寻求见面，于是在聂赫留朵夫逗留彼得堡期间，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和律师从参议院出来，一同走在人行道上。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接着向聂赫留朵夫讲起参政官们提到的那个司长的事，说他被当场抓住，本应判处苦役，反而却被派到西伯利亚当省长去了。律师讲完这件事的经过和它那丑恶的内幕之后，还特别津津有味地讲了几个身居高位的人侵吞捐款的事，那些钱是用来修建一座总也不能完工的纪念碑的，就是今天早晨他们看见的那座，接着又讲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赚了几百万卢布，某人卖老婆，又被某人买去，还讲国家的一些高级官员营私舞弊，犯下各种罪行，却没有坐牢，依旧坐在各个机关的头把交椅上。这类多得显然无法讲完的故事，给律师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同时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他这个律师用来赚钱的手段，和彼得堡的高官们为了同一目的而采用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而清白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他讲完高级官员

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另雇马车回滨河街姨妈家的时候，不禁惊讶之至。

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愁闷。他感到愁闷的主要原因，是参议院驳回上诉，意味着无辜的玛丝洛娃必将遭受这场毫无来由的苦难：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上诉一经驳回，他要实现与玛丝洛娃共命运的愿望，可就难上加难了。这种愁闷的感觉，在听了律师眉飞色舞地讲了那些肆无忌惮的可怕丑事之后，越发变得沉重起来，除此之外，他还不断地回想着当年那个可爱、坦率、高尚的谢列宁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如今变得那么恶毒、冷酷和拒人千里之外。

聂赫留朵夫回到姨妈家里，看门人不无鄙夷地递给他一张字条，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字条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她写道，她来向女儿的救命恩人道谢，还恳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第五大街某号。她还写道，这对薇拉·叶甫列莫夫娜来说，是很必要的。请他不用担心，她们不会用过多的感激话让他为难的：她们不想说什么感激的话，只不过是很想见见他。如果方便的话，能否请他明天早晨来一趟。

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过去的同事、宫廷侍从武官博加特廖夫写来的，聂赫留朵夫曾请他把自己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亲手交给皇上。博加特廖夫用遒劲有力的笔迹写道，状子一定会像他

许诺的那样，亲自送到皇上手里，不过他想起一个主意：聂赫留朵夫先去拜访那个可以左右案子的人，当面托托他，是否更好一些。



聂赫留朵夫这两天在彼得堡得到的印象，使他对自己要办的事感到无比的绝望。他在莫斯科

拟定的那些计划，看来就像少年人的幻想，怀着这样的幻想进入社会，不可避免得要大失所望。不过既然已经来到彼得堡，他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做要做的事，于是决定明天先到博加特廖夫那儿，然后按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位能左右案子的人。

现在他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看看，不料伯爵夫人的仆人前来敲门，请他上楼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马上就来，他把状子叠好放入皮包，去姨妈那儿了。上楼时，他看了一眼窗外的街道，发现了玛丽艾特那对棕红色的马，心里突然有一种愉快的感觉，禁不住想笑。

玛丽艾特头上戴着一顶帽子，身上穿的已经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浅色的花连衣裙，手上端着一只茶杯，坐在伯爵夫人的圈椅旁，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笑盈盈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聂赫留朵夫进来的时候，玛丽艾特刚巧说了一句什么可笑的话，而且是一句可笑的粗话——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得出来——逗得心地善良、嘴唇上长着黑毛的伯爵夫人哈哈大笑，肥胖的身体前仰后翻，而玛丽艾特却以一种调笑【17】的神情，歪斜着微微带笑的嘴，侧倾着那张充满活力的开心的脸，默默地看着对方。

聂赫留朵夫没听几个词，就明白她们说的是

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那个西伯利亚新省长的丑事，玛丽艾特正是在这个地方说了一句什么好笑的话，引得伯爵夫人大笑不止。

“你可笑死我啦。”她说着，咳嗽起来。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想开口责怪玛丽艾特说话冒失，她已经察觉他脸上严肃和稍稍不满的神色，于是不仅立即改变了自己的面部表情，而且也改变了自己的整个心态，目的是讨他欢喜——自从见到他之后，她一直想这么做。她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仿佛寻求什么，渴望什么似的，这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的在她的心里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情——虽然她无法用言语说清，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种和聂赫留朵夫此刻一样的心情。

她问他事情办的结果如何。他讲了在参议院败诉的经过和遇见谢列宁的情形。

“啊！多么纯洁的一个人呀！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骑士。一个纯洁的人。”两位太太使用了上流社会经常形容谢列宁的那个有名的外号。

“她妻子是怎样一个人？”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噢，我可不想说她什么。反正她不理解他。怎么，难道他也同意驳回上诉？”她真心地同情说。“这太可怕啦，我多为她难过呀！”她叹息着补充说。

他皱起眉头，想改变话题，开始讲舒斯托娃的事，经她说情，她从关押的要塞里放了出来。他谢过她在丈夫面前讲的情，接着想说这个女人和她一家人吃了那么多苦，原因仅仅是没有谁想到过他们，这真令人觉得可怕，可是她不让他说下去，自己先表示了愤慨。

“别对我说啦，”她说。“丈夫刚告诉我，说她可以释放，我就对这种说法大吃一惊。如果她没犯罪，凭什么要关押她呢？”她把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说了出来。“这太可恶了，太可恶了！”

伯爵夫人看见玛丽艾特向外甥卖弄风情，觉得十分开心。

“听我说，”等他们不说话了，她说。“明天晚上你得去阿林家，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她对玛丽艾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他跟我讲，你说的那些话——我把你的话告诉他了——这是个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艾特，你对他说，让他去。你自己也去。”

“我，伯爵夫人，没有任何权利对公爵指手画脚，”玛丽艾特看着聂赫留朵夫说，那眼光仿佛表示，他和她之间在对待伯爵夫人和福音教派的态度上，已经取得了一种完全的一致，“第二，我不大喜欢，您知道……”

“你就是总爱跟别人反着来，另有一套。”

“怎么另有一套？我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信教，”她笑着说。“第三，”她接着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你看过那个……哦，她叫什么？”伯爵夫人说。

玛丽艾特说出那个著名的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看——真是好极了。”

“到底先看谁呢，我的姨妈，女演员，还是传教士？”聂赫留朵夫笑着说。

“请你别挑我话里的毛病。”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然后再看法国女演员，要不然听讲道就一点儿也没兴趣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先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艾特说。

“喂，不许你们拿我开心。传教是传教，看戏是看戏。要想拯救自己的灵魂，根本用不着把脸拉成一尺长，整天哭鼻子。只有信教，才会快乐的嘛。”

“您呀，我的姨妈，比任何一个传教士都会传教。”

“您听我说，”玛丽艾特稍作沉吟，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来吧。”

“我怕是不能去……”

一个仆人进来通报有客人来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来人是伯爵夫人主持的那个慈善团体的秘书。

“噢，这位先生无聊得很。我最好还是去那边接待他吧。一会儿我就回来。您给他倒点茶，玛丽艾特。”伯爵夫人说完，摇摇晃晃地快步向客厅走去。

玛丽艾特摘掉手套，露出一只有力的、相当扁平的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宝石戒指。

“您要茶吗？”她说，拿起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奇怪地翘着小手指头。

她的脸色变得严肃而忧郁。

“我总是非常非常痛苦地想，我是很尊重别人意见的，可是他们老是把我和我的身份地位混为一谈。”

她说到最后几个词时，好像差一点儿哭出来。如果把她说的话细想一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可是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沉、真诚和善良：这个年轻、美丽、衣着鲜亮的女人说这番话时，那双发亮的眼睛里闪动的目光，完全把他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望着她，眼睛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和您心里的那些想

法。其实，您做的事，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是赞赏您的行为，而且也钦佩您的。”

“不过，没什么好赞赏的，我还做得不够。”

“反正一样。我理解您的感情，也理解她——哦，好，好，我不谈这些，”她发现他脸上不快的神情，赶忙打住话头。“我还理解，您看到监狱里发生的所有惨痛的景象之后，”玛丽艾特说，一心想把他迷住，凭着她女人的敏感猜中了他认为重要和宝贵的东西，“您想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他们饱尝苦难，受人虐待，受到冷酷和残忍的虐待……我理解，如果能为此献出生命，我也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不过，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难道您对自己的命运不满意？”

“我？”她问，仿佛对这样的问题感到震惊似的。“我应当满意，实际上也满意。不过，我心里也有一种不安的东西在苏醒……”

“那就不应该让它再沉睡，要相信心灵的这一呼声，”聂赫留朵夫说，完全落入了她的圈套。

后来聂赫留朵夫多次惭愧地回想起他和她的这次谈话；回想起她那些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以及她脸上显露出来的类似深受感动的专注神情，她就是带着这种神情听他讲述监狱里的惨状和他回乡下的印象的。

等到伯爵夫人回来时，他们已经不仅像一对老朋友，而且像一对特别知心的老朋友似的无话不谈，仿佛周围的人全不理解他们，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相互理解自己。

他们谈论当权者的不公正、不幸的人们的苦难和老百姓的贫困，然而，他们相互注视的目光实际上却在谈话声中不停地探询：“你爱我吗？”——而且不停地回答：“爱。”——于是对异性的爱慕，通过最意想不到和最美好的形式，让他们相互吸引在一起。

她临走时对他说，她时刻准备着尽力为他效劳，并请他明天一定去戏院找她，哪怕待一分钟也行，她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和他谈。

“要不我什么时候再见到您呀？”她补充说，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往戴满宝石戒指的手上戴手套。“那您说您一定来吗？”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这天夜里，聂赫留朵夫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参政院的裁决，想起他依旧决定跟她走，想起他放弃土地所有权，突然仿佛回答这些问题似的，他的眼前出现了玛丽艾特的面庞，她说“我什么时候再见到你呀？”时的叹息和眼神，还有她的笑容——一切都那么真切，好像他真的看见了她似的，他不由得笑了。“去西伯利亚，我这么做好不好

呢？”他问自己。

在这个从没有挡严的窗帘缝隙里可以看见明亮月光的彼得堡月夜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却朦胧不清。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他尽力回忆自己以前的心情和思考的东西，可是它们已经失去了以前的那种说服力。

“万一这一切只是我头脑发热，我不能够这么生活：就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他对自己说，却无法对此作出回答，心里产生了一种很久不曾有过的苦闷和绝望。由于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他昏沉沉地睡去，就像以前赌输一大笔钱之后常有的那样。

二十五

第二天早晨醒来，聂赫留朵夫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昨晚做了一件卑鄙的事情。

他开始回想：卑鄙的事情没有过，恶劣的行为也没有过，可是却有过一些想法，一些恶劣的想法，觉得他现在的所有打算——同卡秋莎结婚和把土地交给农民，都是一些无法实现的幻想，所有这一切他都难以坚持下去，所有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都是不真实的，应当过去怎么生活，现在还怎么生活。

恶劣的行为是没有过，可是却有过比恶劣行

为更恶劣的东西：有过能产生所有恶劣行为的思想。恶劣的行为可以不再重犯，可以进行忏悔，而恶劣的思想却只能不断地滋生恶劣的行为。

一种恶劣的行为不过是在为其他恶劣行为铺路；恶劣的思想却诱使人难以抑制地走上这条路。

这天早晨，聂赫留朵夫把昨天的那些想法重新回忆了一遍，心中暗自吃惊，他怎么会相信那些想法，哪怕仅仅是一分钟。不论他想做的事多么新奇，多么艰难，可是他知道，这是目前惟一可以选择的生活，他也知道，不论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多么让他感到习惯和轻松，但那是自取灭亡。现在他觉得，昨天的诱惑，就好比一个人睡得很香，醒后虽然不想再睡，但还是懒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尽管他明明知道该起床了，有一件重要而快乐的事正等他去做呢。

今天是在彼得堡的最后一天，一早他就动身去瓦西里耶夫岛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的家在二楼。聂赫留朵夫按管院子的人的指点，从后门进去，沿着陡直的楼梯，直接走入充满饭菜气味的闷热的厨房。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挽着袖子，系着围裙，戴着眼镜，站在炉子旁边，正搅动着热气腾腾的锅里的什么东西。

“您找谁？”她从眼镜上方望着来人，口气生

硬地问。

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报上姓名，那个女人的脸上已经浮现出惊喜交加的神情。

“啊，是公爵！”女人用围裙擦着双手，叫了起来。“您怎么走后门的楼梯呀？您可是我家的恩人哪！我是她母亲。我家闺女差点就让他们毁啦。您是我们的救星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使劲吻起来。“我昨天去过您家。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儿。请这边走，这边，请跟我来，”舒斯托娃母亲说，领着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窄小的门和黑暗的过道，一路上不停地理着掖起的裙摆和头发。“我妹妹是科尔尼洛娃，您没准听说过吧，”她在门口站下，小声补充说。“她卷到政治事件中去了。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母亲推开过道的门，把聂赫留朵夫引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小沙发上坐着一个个子不高、体态丰满的姑娘，穿着条纹布上衣，淡黄色的卷发衬托着她那张十分苍白的圆脸，长得像母亲。她对面的圈椅上坐着一个穿俄式绣花领衬衫、留着黑色胡须的青年人，向前深深地俯着身子。他们两人显然谈得十分入神，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房门，才回头看了一眼。

“丽达，这是聂赫留朵夫公爵，是他……”

脸色苍白的姑娘慌忙跳起来，撩了撩耳后的乱发，用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瞧着来人。

“那么，您就是薇拉·叶甫列莫夫娜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啦？”聂赫留朵夫说，笑着伸过手去。

“是的，是我，”丽达说，露出一排漂亮的牙齿，像孩子一样善良地笑了笑。“是我姨妈特别想见您。姨妈！”她用柔和悦耳的声音朝门外喊道。

“薇拉·叶甫列莫夫娜为您被捕一事很伤心。”聂赫留朵夫说。

“您坐在这儿，还是坐这儿好些，”丽达说着，指了指青年人刚站起来的那张柔软的破圈椅。“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现聂赫留朵夫打量青年人的目光，说。

青年人也像丽达那样善良地笑笑，和客人打了招呼，等到聂赫留朵夫在他的位子上坐好，从窗口搬过一把椅子，在旁边坐了下来。从另一扇门里又走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一声不吭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叶甫列莫夫娜是姨妈的好朋友，我几乎不认识她。”丽达说。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进来一个女人，身旁白色短上衣，腰系一条皮带，有一张非常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

“您好，谢谢您能来这儿，”她挨着丽达在长沙发上刚一坐下，开口说。“怎么样，薇拉好吗？您见到她啦？她受得了吗？”

“她没有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的感觉好极了。”

“喏，这个薇拉，我知道她会这样的，”姨妈笑着摇摇头，说。“应当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总是想着别人，从来不为自己。”

“是的，她自己什么要求也没有，只是担心您的外甥女。她说，她主要是因为您外甥女无缘无故被抓，心里感到痛苦。”

“没错，”姨妈说，“这事太可怕了！她其实是替我受罪。”

“根本不是的，姨妈，”丽达说。“您就是不托我，我也会保管那些文件的。”

“算啦，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姨妈继续说。“您看，”她对聂赫留朵夫说，“这是因为有一个人要我暂时保管一下他的文件，可我没有住处，就把文件拿到她这儿了。当天夜里，这儿就遭到搜查，把她和文件一起带走了，一直把她关到现在，还要她说出文件是谁交给她的。”

“我可没说。”丽达急忙说，紧张地撩了撩头发，尽管那络头发并不碍她的事。

“我没说你说了嘛。”姨妈反驳说。

“他们抓米丁的事，可不是我供出来的。”丽

达红着脸说，不安地四下张望。

“你别说这事啦，丽达。”母亲说。

“为什么不说，我就是想说，”丽达说，涨红的脸上已经没有笑容，手也不再撩头发，而是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绕来绕去，但眼睛还是往四下里张望着。

“昨天你说这事，可是弄得挺不高兴的。”

“根本没有……您别管，妈妈。我没有说，什么也没说。他审问我两次，问到姨妈，问到米丁，我什么也没说，还告诉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个密探，是个宪兵和大坏蛋。”姨妈插嘴对聂赫留朵夫解释外甥女刚才的话。

“于是他，”丽达继续说，显得有些激动和着急，“开始劝我。他说：‘不管您对我说什么，谁都不会伤害的，而且恰恰相反……要是您说了，那就会解救无辜的人，这些人没准是我们不该关押的。’可是，我还是说，我不说。可是他说：‘那好吧，您不用说什么，不过我说出来，你别否认。’他就开始说一些人的名字，也说到米丁。”

“你别说啦。”姨妈说。

“哎，姨妈，别打岔……”她还在不停地拉扯那绺头发，四下张望着。“真没想到，第二天我

就听说——是别人敲墙告诉我的——米丁被捕了。我就想，是我出卖的。这件事让我痛苦极了，痛苦极了，差点没发疯。”

“已经弄明白了，他被捕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姨妈说。

“可我那时不知道呀。还以为是我出卖的呢。我在牢里走来走去，从这边走到那边，心里乱极了。老是想：是我出卖的。我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听见有人在我的耳边说：你出卖的，你出卖的米丁，米丁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是也得听着呀。我想睡觉，睡不着，想不想这事，也办不到。那是多么可怕呀！”丽达越说越激动，把头发缠在手指上，又松开，不停地四下张望。

“丽达，你冷静点儿。”母亲拍着她的肩膀说。

可是，丽达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这事可怕的是……”她还想说点儿什么，但没等说完就哭着从沙发上跳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间。母亲也跟了过去。

“把那些坏蛋统统绞死。”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问。

“我没说什么……我随便说说。”中学生回答，抓起桌上的一支香烟，吸起来。

二十六

“是呀，对青年人来说，单独囚禁是件可怕的事。”姨妈说完，摇摇头，也抽起烟来。

“我想，对谁都是这样的。”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姨妈回答。“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我听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衣食缺乏，既担心自己的安危，又担心他人的安危，还要担心事业的成败，等到被捕入狱，才算完事，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了：坐着休息吧。我听他们说，如果被捕，那才让人高兴呢。不过，对那些无辜的年轻人来说——像丽达这样无辜的年轻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是可怕的。这倒不是因为你失去了自由，受到粗暴对待，伙食太差，空气恶臭，总之，这些事情算不得什么。就是比这再坏上两倍，也容易忍受，最难忍受的是第一次被捕时遭到的精神打击。”

“难道您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坐过两次牢呢，”姨妈忧伤而又愉快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平白无故抓我的，”她继续说。“那时我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又怀了孕。我失去了自由，离开了丈夫和孩子，我感到十分痛苦，可是比起当我明白我不再

是人，而是成了东西时候的感觉，这一切又算不得什么了。我想和女儿告别，但他们让我走，上马车。我问带我去哪儿，他们说，等到了地方我就知道了。我问我犯的是什么罪，他们不说。审问过后，他们脱去我的衣服，给我穿上编号的囚衣，把我押往一个拱门，打开门，推我进去，然后锁上门走了，只留下一个哨兵，拿着枪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时不时地朝我房间的缝里张望一下——我这时心里难受极了。我记得，当时最让我吃惊的是，一个宪兵军官审问我时，请我吸烟。可见，他知道人是喜欢吸烟的，可见他也知道人是喜欢自由和阳光的，知道母亲爱孩子和孩子爱母亲的。那他们又为什么残酷无情地把我和我珍爱的一切隔开，把我像野兽一样关起来呢？遭遇到这种事的人是不会不在心里留下阴影的。如果一个人本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人与人是友爱的，那他遭到这种事之后就不会再相信了。我从那以后就不相信人，变得愤世嫉俗了。”她说完，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进去的那扇门里出来，说丽达很伤心，不出来了。

“到底为什么要摧残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呢？”姨妈说。“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这是我无意中造成的。”

“上帝保佑，她在乡下待段时间能好起

来，”母亲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多亏您，要不她就全完了，”姨妈说。“谢谢您。我见您的目的，是想请您给薇拉·叶甫列莫夫娜带封信，”她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没封口，您可以看完就撕掉，或者您就交给她，您看着办吧，”她说。“信里没有任何败坏别人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答应转交，然后起身告辞，走到街上。

那封信他没有去看，而是把它封上口，决定交给收信人。

二十七

聂赫留朵夫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是处理教派信徒的案子。他准备通过原来一个团的同事、现在是宫廷侍从武官的博加特廖夫把状子呈送皇上。他一早去找博加特廖夫，正碰上他还在家吃早饭，不过马上就要出门了。博加特廖夫是个身材不高而结实的人，天生具有罕见的力气——能把马蹄铁扭弯，为人善良，真诚，直爽，甚至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尽管具有这些品质，他却是一个亲近宫廷的人，热爱皇帝和皇室，而且还有一件惊人的本领，那就是生活在最上层的社会圈子里，只看到其中好的一面，而不参与任何

不好的和不诚实的活动。他从来不对人和事妄加指责，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用喊叫一般的大嗓门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往往还同样毫无顾虑地纵声大笑。他这么做不是在耍政治手腕，而是天生这种性格。

“啊，你来了，太好啦。不想吃点早点？要不你先坐下。煎牛排好极了。我每顿饭开头和最后总要吃点实在的东西。哈，哈，哈！怎么样，喝点酒，”他指着一瓶葡萄酒说。“我正想你的事呢。状子我会送上去的。送到皇上的手里，这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想法，最好你先去找找托波罗夫。”

聂赫留朵夫听到托波罗夫的名字，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一切由他说了算。反正要征求他的意见的。没准儿他就能满足你的要求呢。”

“既然你这么看，我就去找他。”

“那太好啦。怎么样，彼得堡给你印象如何，”博加特廖夫叫道，“说说看？”

“我觉得像是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催眠术？”博加特廖夫重复道，接着哈哈大笑。“你不想喝，那好吧。”他用餐巾擦擦胡子。“你去找他，是吧？要是他不办，那再交给我，我明天送上去，”他大声叫着说，从餐桌旁站起身，画了一个大十字，显然像他擦胡子一

样，是一种机械性的动作，然后佩带上军刀。“现在再见吧，我得走啦。”

“我们一起走，”聂赫留朵夫说，愉快地握着博加特廖夫那有力的大手，像往常一样，一种无意识的健康而又新鲜的感觉涌上心头，和他在门口台阶上分了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此行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还是按照博加特廖夫的劝告去找托波罗夫，也就是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那个人。

托波罗夫担任的职务，按它的使命来说，本身存在着一种矛盾，这一点只有头脑痴呆和缺乏道德感的人才会看不出来。托波罗夫正好具有这两种不好的品质。他所担任的职务的矛盾之处在于，这项职务的使命是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外在手段，来支持和保护教会，而教会按它的教义来说，是上帝亲手建立的，无论地狱之门，还是别的什么人为的力量，都不能动摇的。这个神圣的、不可动摇的上帝的机构，却要由以托波罗夫及其同僚主持的凡人机构来支持和保护。托波罗夫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愿看到这种矛盾，所以他非常严肃认真地时刻担心着，怕有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教派信徒会破坏连地狱之门都无法战胜的教会。托波罗夫像所有缺乏起码的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一样，完全相信老百姓是由一群和他截然相反的人组成的，他可以没

有信仰，他们没有信仰却是寸步难行的。他本人在心灵深处什么也不相信，并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舒服而愉快的状态，可是他害怕老百姓也进入这种状态，所以他说，他认为把老百姓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出来，是他的神圣职责。

有本烹调书上说，龙虾喜欢让人活着煮熟了吃，他也充分相信老百姓是喜欢做迷信的人的，不过烹调书说的并非龙虾的本意，他却认为他说的是老百姓的本意。

他对待他所支持的宗教态度，就像养鸡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所以就只得用它来喂。

不消说，所有那些伊维利亚的、喀山的、斯摩棱斯克的神像，都是非常愚昧的崇拜偶像，不过老百姓既然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所以也就应当支持这种迷信活动。托波罗夫这样想的同时，却没有料到他所以觉得老百姓喜欢迷信，原因就是由于过去和现在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存在，他们这些人受到教育之后，没有把学到的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而是用来加固他们身上的这种东西。

聂赫留朵夫走进托波罗夫接待室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和一个女修道院的院长谈话。这位院长是个活跃的贵族妇女，在西部地区那些被迫

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中间传播和维护东正教的教义。

在接待室里值班的一个负责处理特殊任务的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何贵干，得知聂赫留朵夫想把教派信徒的上诉状呈交皇上，就说能否让他把状子送去审阅。聂赫留朵夫递给他，他拿起状子进了办公室。女修道院长头上戴着修女帽，脸上蒙着飘动的面纱，身后掩着黑色长裙，指甲精心修剪的雪白双手交叉在胸前，拿着一串茶晶念珠，走出办公室，向大门口方向去了。聂赫留朵夫还在原处，没有被请入内。托波罗夫正在看诉状，不时地摇着头。他读着这份写得清楚而有力的状子，心中感到不快和震惊。

“这份状子一旦到了皇上手里，会惹出麻烦和误会的，”他读完诉状，想。他把状子放到桌上，摇了摇铃，吩咐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记得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已经收到过他们的诉状。案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告诫，然后被送交法庭，可是法庭判他们无罪。于是主教和省长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由，把丈夫、妻子和孩子拆散，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这些做父亲和妻子的要求不要把他们一家人拆散。托波罗夫回忆起这桩案子第一次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当时有过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不过，批准原来的决

定，把这些农民的家庭成员分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不会有什么坏处；要是让他们留在原地，却会对其他居民造成不良影响，使他们脱离东正教，再说这事也表明了主教对教务的热心，所以他对这个案子采取了听其自然的态度。

如今却来了一个聂赫留朵夫这样一个在彼得堡很有关系的辩护人，案子很可能被当作一件暴行捅到皇上那里，或者在国外的报上披露出来，因此他立即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装作公务十分繁忙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马上转入正题。

“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见这些名字，就想起了这件不幸的事，”他说着，拿起状子朝聂赫留朵夫晃了晃。“我非常感谢您提醒了我这件事。这是省当局做得有些过分……”聂赫留朵夫沉默不语，不无反感地望着那张苍白的脸上像假面目一样死板的表情。“我这就签发命令取消这种做法，把那些人送回原来居住的地方。”

“那么，我就不用往上送交这份状子啦？”聂赫留朵夫说。

“完全用不着。我可以答应这点，”他把“我”字说得很重，显然十分自信，他的气节，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那我还是写个东西吧。有劳您坐坐。”

他走到桌前写起来。聂赫留朵夫没有坐，站

着往下看着他那窄小的秃脑顶，那只快速运笔的青筋毕露的肥手，心中很是惊讶，这个显然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人，为什么做现在这件事，而且那么卖力气。为什么？

“好啦，”托波罗夫封上信口，说，“您把这信告诉您的当事人吧，”他补充说，撇嘴做出笑的样子。

“这些人因为什么遭这种罪呢？”聂赫留朵夫接过信，说。

托波罗夫抬头笑了笑，仿佛聂赫留朵夫的问题让他感到开心似的。

“这个问题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告诉您一点，我们所捍卫的老百姓的利益极为重要，所以对宗教问题的过分热心并不那么可怕和有害，可怕和有害的是目前流行的对宗教问题的过分冷淡。”

“可是怎么能以宗教的名义去破坏行善的最起码的要求，拆散家庭……”

托波罗夫依旧那样故作大度地笑着，显然认为聂赫留朵夫的话很是可爱。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总是从国家的大立场出发，认为他说的话既可爱又偏颇。

“从个人的观点看，也许是这样，”他说，“不过从国家的观点来看，那就是多少有点儿不一样了。啊，请原谅，”托波罗夫说着，俯身伸出手

来。

聂赫留朵夫握了握那只手，一句话也没说，匆匆走了出来，心中后悔同他握了手。

“老百姓的利益，”他重复着托波罗夫的话。“你们的利益，完全是你们的利益，”他走出托波罗夫的家门，想。

他在自己的头脑中逐个儿回想了一下那些受过标榜伸张正义、维护信仰和教育老百姓机关恩惠的人们：因贩卖私酒被监禁的农妇、因偷盗被监禁的小伙子、因流浪被监禁的流浪汉、因纵火被监禁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被监禁的银行家，还有这个仅仅因为想从她嘴里套问情报而被监禁的可怜的丽达、因反叛东正教被监禁的教派信徒、因要求制订宪法而被监禁的古尔凯维奇——于是聂赫留朵夫产生了一个异常清晰的想法：所有这些人被抓、被关押或者被流放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破坏了正义或者触犯了法律，而只是由于他们妨碍了那些官僚和财主们占有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财富。

不论是贩卖私酒的农妇，城市里游荡的小偷，保管传单的丽达，还是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这些人都碍他们的事。因此，聂赫留朵夫看得非常清楚，所有这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们和托波罗夫，到坐在各部办公室里的那些衣冠整洁、彬彬有礼

的官职卑微的先生们，他们丝毫也不会因无辜的人们受罪而感到良心不安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清除所有的危险分子。

因此，可以不必遵守宁可放过十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相反，却要宁可错抓十个没有危险的人，也不放过一个正直的危险分子。

用这种方法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聂赫留朵夫觉得再简单和清楚不过了，可是，正因为它太简单和太清楚了，聂赫留朵夫反而心生疑虑。对于这么复杂的现象，恐怕不至于用这么简单而可怕的理由来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恐怕也不至于是一些空话，仅仅是为了掩盖最野蛮的私欲和残忍吧。

二十八

聂赫留朵夫本来打算这天晚上离开，可是他答应了玛丽艾特去剧院看她，尽管他知道不应该这么做，可他还是昧着良心去了，自以为这是在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

“我能挡得住这种诱惑吗？”他不无虚伪地想。“那就最后一次试试看吧。”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院，久演不衰的《茶花

女》已演到第二场，那个国外来的女演员正在用一种新的处理方式表现害癆病的女人垂死时的情景。

剧院坐满了观众。聂赫留朵夫问玛丽艾特的包厢在哪里，立即有人指给他，并因他问起那个包厢而对他流露出敬意。

走廊里站着一个穿号衣的仆人，像见到熟人似的向他鞠躬，替他推开包厢的门。

对面一排排包厢里那些坐着和站在他们背后的人，正厅后排座位上的观众的背影，有白头发的、花白头发的、秃顶的、谢顶的、头上抹油的、髻发的——所有的观众都全神贯注地观看那个身裹漂亮的绸缎和花边饰物、瘦得皮包骨头的女演员扭扭捏捏、拿腔拿调地念独白。包厢的门打开时，有人嘘了一声，同时有一冷一热两股气流流向聂赫留朵夫迎面袭来。

包厢里坐着玛丽艾特和一个披红色披肩、梳着沉重的大发髻的陌生女人，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玛丽艾特的丈夫，一个高大英俊的将军，神情严峻，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长着鹰钩鼻子，军服的胸部用棉花和土布衬垫得高高隆起；另一个人头发浅黄，头顶半秃，两腮长着威武的络腮胡子，下巴剃得精光。玛丽艾特身材纤巧，风姿绰约，穿着袒胸夜礼服，裸露着从颈部往下斜溜的结实而健美的双肩，肩窝处有一颗黑痣，她立

即回头看了一眼，用扇子向聂赫留朵夫指了指她身后的椅子，欢喜而感激地对他笑了笑，他觉得这笑容是大有深意的。她的丈夫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平静地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点了下头。从他的姿态和与妻子交换目光时的神情，可以明显地让人看出，他是这个美人的主宰和所有者。

女演员的独白一念完，全场掌声雷动。玛丽艾特站起来，提着窸窣作响的绸裙，走到包厢的后半部分，把聂赫留朵夫介绍给丈夫。将军不住地用眼睛笑着，说声幸会之后，就平静而莫测高深地不言语了。

“我今天本来要走的，可是我答应过您。”聂赫留朵夫对玛丽艾特说。

“要是您不来看我，总得看看这位出色的女演员，”玛丽艾特一语双关地说。“她最后一场演得多好呀，是吧？”她对丈夫说。

丈夫点了点头。

“这戏打动不了我，”聂赫留朵夫说。“我这几天看到的不幸太多了，所以……”

“那您坐下来，讲一讲。”

丈夫留神听着，眼睛不时地笑着，笑里的讥讽味道越来越重。

“我到过那个救出来的女人家里，她被关押了那么长时间；完全折腾垮了。”

“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女人，”玛丽艾特对丈

夫说。

“是的，我很高兴她能得到释放，”他平静地说，点着头，小胡子底下露出明显嘲讽的微笑，聂赫留朵夫感到了这种笑里的意思。“我去抽烟了。”

聂赫留朵夫坐着，等待玛丽艾特对他说点儿什么，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甚至也没有想说的意思，而是不停地开玩笑，大谈这出戏，她觉得戏中表现的妓女的爱情故事应当特别打动聂赫留朵夫的心。

聂赫留朵夫看出，她根本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谈，只不过是想让他看看她穿上夜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的样子多么迷人罢了，一时间，他既感到愉快，又感到厌恶。

她那迷人的外表先前所掩盖的东西，现在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外表虽然没有揭去，但那外表下面的东西，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他望着玛丽艾特，十分欣赏她的美色，不过他知道，她是个虚伪的女人，她和那个用千百人的眼泪和生命换取高官厚禄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却对此视若无睹；他还知道，她昨天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她是想——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自己也同样不知道——要他爱她。他感受到她的魅力，又觉察到她的卑劣。他几次想走开，拿起了帽子，但还是留了下来。可是，当丈夫满嘴烟味地回到包厢，

不屑一顾地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仿佛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似的，聂赫留朵夫终于忍耐不住，不等包厢的门关上，走了出去，在过道里找到自己的大衣，离开了剧院。

他沿着涅瓦河大街往家走，无意中发发现前面有个身材高挑、匀称，装束十分惹眼的女人，在宽阔的沥青人行道上悠闲地走着，从她脸上的表情和身体的姿态上可以发现，她知道自己具有妖邪的魔力。所有迎面走来和后面赶上来的人，都会瞧她几眼。聂赫留朵夫的脚步比她快，也情不自禁地往她脸上看了一眼。她的脸长得很漂亮，好像施过一点脂粉。她忽闪着眼睛，对他笑了笑。说来奇怪，聂赫留朵夫忽然想起了玛丽艾特，因为他心里体验到了刚才在剧院时的那种着迷和厌恶的感觉。聂赫留朵夫很生自己的气，于是转到莫尔斯卡亚街，接着来到滨河街，在那儿走来走去，甚至引起了一名警察的注意。

“我进包厢的时候，那个女人也是这么对我笑的，”他想，“那个女人和这个女人笑里的含意都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的话，就把我带走。不需要，就走你的路好了。’那个女人却假装不想这种事，她的情操是高雅的，其实骨子里是一回事儿。这个女人至少要诚实些，而那个女人却很虚伪。何况这个女人是因为贫困才落入这步田地，那个女人

却是在玩弄这种美好而又可憎和可怕的情欲。这个街头女郎是一杯发臭的污水，专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饮用；剧院里的那个女人却是一杯毒药，谁喝了它，就会不知不觉地被毒死。”聂赫留朵夫想起了他和首席贵族妻子的暧昧关系，可耻的往事一下涌上心头。“人身上的兽性是可憎的，”他想，“当它赤裸裸地出现时，你可以从自己精神生活的高度审视它，鄙视它，不管你跌倒还是没有跌倒，你还是原来的你；可是，当这种兽性披上一层虚假的高雅而美丽的外衣，摆出一副迷人的架子时，你就会对它敬若神明，完全陶醉其中，好坏不分了。那才可怕呢。”

聂赫留朵夫现在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就像眼前的皇宫、哨兵、要塞、涅瓦河、木船和交易所那样清晰可辨。

如同今夜大地上没有那种令人静心、令人安歇的黑暗，有的只是一种不知来自何处、不清楚、不鲜明、不自然的光，聂赫留朵夫的心里也同样不再有那种令他安歇的无知的黑暗。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所有那些被当作重要和美好的东西，其实都是渺小和卑鄙的，他还知道，所有这些豪华和奢侈的东西，其实都在掩盖着一种习以为常的罪行，这种罪行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还盛行一时，被人们想尽

一切办法加以美化。

聂赫留朵夫很难忘掉这一切，不去看这一切，可是他又不能对此视若不见。尽管他看不出为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就像他看不出彼得堡上空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尽管这种光给他的感觉是不清楚、不鲜明和不自然的，他不能不看到这种光为他照亮的一切，然而他心里还是既高兴，又惶恐不安。

二十九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监狱医院，把参议院维持原判的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要她作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呈送皇上的状子，律师已经替他写好，现在就带到监狱让玛丝洛娃签字，不过他对此事不抱太大希望。而且说来奇怪，他现在反而不想打赢这场官司了。他已经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去西伯利亚，生活在流放犯和苦役犯中间，他甚至很难想像，如果玛丝洛娃真的无罪释放，他将如何安排自己和她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罗^[18]的话，他在美国还实行奴制的时候说，在一个奴隶制度具有合法地位并且受到保护的国家里，一个正直公民的惟一体面的地方，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恰恰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是在去了一趟彼

得堡和在那里亲眼见识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这种想法变得越发强烈。

“不错，在眼下的俄国，一个正直的人惟一体面的地方，就是在监狱里！”他想。当他来到监狱，走进那高高的围墙的时候，他甚至切身体验到了这一点。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聂赫留朵夫，马上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那儿了。

“那她在哪里？”

“又回牢房了。”

“怎么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她就是那种人嘛，公爵大人，”看门人鄙夷地笑着说。“她和一个医士勾搭上了，主任医师就打发她走了。”

聂赫留朵夫怎么也没料到，玛丝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竟会和他如此相似。这个消息让他大为震惊。他这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就要大难临头时的感觉一模一样。他心里难受极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耻。首先，他感到自己十分可笑，因为他竟然高兴地以为她的精神状态似乎有了变化。她说不愿意接受他作出的牺牲，她的责备，她的眼泪，所有这一切，他想，不过是一个心理反常的女人的手腕罢了，目的是要更好地利用他。他现在觉得，上次探监时他在她身上看到的那种不可救药的迹象，

如今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所有这些想法，是当他本能地戴上帽子，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在他的头脑中飞快地闪过的。

“现在如何是好呢？”他问自己。“还和她搅在一起吗？她既然干出这种事，我不正好可以脱身了吗？”他问自己。

然而，他刚刚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立即就明白过来，一旦自己抛下她不管，那么受惩罚的并不是他要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于是心中害怕起来。

“不！出了这种事，也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增强我的决心。让她做她想做的事好啦——要和医士勾搭，去勾搭好啦——那是她的事……我呢，我应当做我的良心要我做的事，”他对自己说。“我的良心需要我牺牲我的自由，去赎我的罪，我要和她结婚，哪怕是形式上的结婚，我要跟她走，不管她流放到哪里，这个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极为固执地对自己说，接着离开医院，迈着坚定的步子向监狱的大门走去。

他来到监狱的门口，要求值班看守报告监狱长，他想探望玛丝洛娃。看守像认识熟人一样，认得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一件重要的监狱新闻：原先的上尉被免职了，接替他的是一个严厉的长官。

“现在可是严得要命啦，”看守说。“他现在就

在这儿，我就去报告。”

监狱长果然在监狱里，很快出来见聂赫留朵夫。新监狱长是个瘦削的高个子，颧骨凸出，动作十分迟缓，脸色阴气沉沉。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在探监室和犯人见面。”他说，眼睛瞧也不瞧聂赫留朵夫。

“不过我需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字。”

“可以把它转交给我。”

“我需要亲自见见那个女犯。以前一直让我见的。”

“那是以前。”监狱长说，瞥了一眼聂赫留朵夫。

“我有省长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说，掏出皮夹子。

“请让我看看，”监狱长说，依旧没有看他，伸出瘦长干巴、食指戴着金戒指的白手，接过聂赫留朵夫递过来的许可证，慢吞吞地读了一遍。“请到办公室。”他说。

这一次，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监狱长坐在桌旁，翻看桌上放着的文件，显然打算在他们见面时留在这里。当聂赫留朵夫问他，是否可以见见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他干脆说这不行。

“政治犯是不准探望的。”他说完，又埋头看文件。

聂赫留朵夫的口袋里装着那封给博戈杜霍夫

斯卡娅的信，因而觉得自己像个企图犯罪的人，阴谋被揭穿并被粉碎了。

等到玛丝洛娃走进办公室，监狱长抬起头，既不看玛丝洛娃，也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可以谈啦！”又接着看起文件。

玛丝洛娃像以前一样，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戴着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到他脸上冷淡、愤怒的表情，她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一只手摆弄着衣角，垂下了眼睛。她的窘态，在聂赫留朵夫看来，恰好印证了医院看门人的话。

聂赫留朵夫想和上次那样待她，可是他不能像他想的那样同她握手；因为现在她十分令他反感。

“我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他声音平淡地说，既不看她，也没有伸过手去，“参议院驳回了上诉。”

“我就知道准会这样的。”她声音怪怪地说，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

如果是从前的话，聂赫留朵夫早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准会这样了；现在他只是看了她一眼。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然而，这不仅没有使他心软，反而更加重了对她的反感。

监狱长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尽管聂赫留朵夫心里对玛丝洛娃感到反感，但他还是应当向她表示一下对参议院驳回上诉的遗憾。

“您别灰心，”他说，“向皇上递的诉状会有结果的，我希望……”

“我可不是为这事……”她说，斜视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可怜兮兮地望着她。

“那是什么事？”

“您去过医院，那儿的人一定对您说我……”

“那有什么，这是您的事。”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冷冰冰地说。

因自尊心受到屈辱而产生的恶感，本来已经平息，这时听她提起医院，马上又从他的心里重新冒了上来。“他这样一个体面的人，任何一个上等人家的姑娘都会觉得嫁给他是莫大的幸福，他却情愿做这个女人的丈夫，可是她竟然等不及，和一个医士勾搭上了。”他想，愤愤地看着她。

“您在这个状子上签个字。”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状子抽出来放在桌上。她用头巾角儿擦了擦眼泪，在桌旁坐下，问在哪儿写，写什么。

他指给她在哪儿写和写什么，她用左手捋着右手的袖子，在桌旁坐好；他站在她背后，默默地看着她俯在桌子上的后背，因忍住哭泣时而颤

动几下，于是他心里有两种感情争斗起来：一种是恶的感情，另一种是善的感情，前者是受到屈辱的自尊，后者是对这个受苦的女人的怜悯，结果后者获得了胜利。

究竟何者在先——是他先在心里可怜她，还是他先想起自己，想起自己的罪过和自己的卑劣行径，想起他正是因这些东西而责备她的——他已经记不得了。他似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感到自己有罪，又感到可怜她。

她签完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了擦，站起来，望了望他。

“不管结果怎么样，也不管出了什么事，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聂赫留朵夫说。

想到要原谅她，他对她的惋惜和柔情油然而生，他打算安慰她一下。

“我会怎么说，就怎么做的。不管把您发配到哪儿，我都跟着去。”

“用不着的。”她急忙打断他的话，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想想看，您路上需要什么东西。”

“好像不大需要什么。谢谢您。”

监狱长走到他们面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说话，就向玛丝洛娃告辞，走了出来，心里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静静的快乐、安宁和爱一切人的感觉。这种喜悦的感觉把聂赫留朵夫的精神提升

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意识到，不论玛丝洛娃做了什么事，丝毫也不能改变他对她的爱。就算她和医士勾搭吧，那是她的事：他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其实，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玛丝洛娃和医士勾搭并因此被赶出医院一事，经过无非是这样的：玛丝洛娃遵照女医士的吩咐，去走廊尽头的药房拿一种婴儿用的草剂，在那儿遇到了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季诺夫，她早就对他的纠缠感到厌烦，为了摆脱他，使劲儿推了他一把，他撞到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上掉下，摔碎了。

主任医师这时刚好从走廊经过，听到瓶子摔碎的声音，又看见玛丝洛娃满脸通红地跑出来，生气地对她喊道：

“喂，小娘儿们，你要是在这儿跟人勾搭，我就让你走人。怎么回事？”他对那个医士说，从眼镜上方严厉地看着他。

医士笑着为自己辩解。医师没等他说完，抬起头，透过眼镜注视着他，然后去了病房，当天就告诉监狱长，要他再派一个稳重点儿的女助手顶替玛丝洛娃。所谓玛丝洛娃和医士勾搭，情况不过就是如此。玛丝洛娃对因与男人勾搭的罪名被赶出医院一事，感到特别难过，因为自从和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那种她早已厌烦的与男人的关系，更加让她憎恶了。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

粉刺的医士，根据她过去和现在的身份，无不认为自己有权欺辱她，还对她的拒绝表示惊讶，这种处境让她感到极为气恼，她不由得对自己的凄惨身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今天，她出来见聂赫留朵夫，本想向他解释，他听到的对她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可是，她刚要开口辩解，就感到他不相信，她的辩解只会加重他的怀疑，于是泪水涌上喉头，她不说话了。

玛丝洛娃依旧认为，并且依旧要自己相信，她还像第二次见面时对他说的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可实际上她早已重新爱上了他，而且爱得那么深，不由自主地去做他希望她做的一切事情：不再喝酒吸烟，不再卖弄风情，进医院去当看护。她做这些事情，只是因为她知道，他希望她这样。如果说他每次提起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接受他的这种牺牲，那也不过是因为她既然对他说过那些高傲的话，现在不便改口，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知道，他和她结婚，只能给他带来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可是她一想到他现在瞧不起她，以为她还是原来的老样子，看不到她身上已经发生的变化，心里就感到痛苦。他现在可能以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这对她来说，比听到她被终审判处服苦役的消息，更让她感到痛苦。

玛丝洛娃有可能随第一批犯人出发，所以聂赫留朵夫作起了上路的准备。可是，他要办的事情实在太多，他觉得不论有多少空闲时间，也总不够用。现在的情况变得和以前正好相反。以前需要费尽心思，才能想出该做什么，而想出的事情总是围绕着一個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不过，尽管生活的全部兴趣当时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但所有那些事情却是枯燥乏味的。如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他自己，所以这些事情变得有意义，也具有吸引力，所以这些事情也就多得不可胜数。

不仅如此，以前聂赫留朵夫办自己的事的时候，往往总是感到烦恼和怨恨；现在办别人的事，大多让他感到愉快。

聂赫留朵夫目前需要办的事，可以分为三类；他按他一贯的学究作风，这样分了类，并据此把相应的文件分别放入三个皮包里。

第一类事情是关于玛丝洛娃和要给予她的帮助。眼下要办的事是为告御状奔走，寻求支持，还要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

第二类事情是处理地产。帕诺沃的土地已经交给农民，条件是他们缴纳地租，作为他们自己的公积金。不过，为了确定这个协议，需要立下

契约和遗嘱，并要签上名字，在庫茲明，一切按照他原来安排的那样办，就是说他还要收取地租，不过需要规定交租的期限，并且还要确定从这笔钱里提取多少生活费，留下多少用作农民的福利。由于不知道他这次去西伯利亚需要多大用项，所以他还不敢放弃这里的收入，只是把它减去了一半。

第三类事情是帮助犯人们，前来求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刚开始接触向他求助的犯人的时候，他立即为他们到处奔走，尽力减轻他们的不幸遭遇；可是后来求助的犯人实在太多，他感到无法帮助他们每一个人，于是他又不自主地担负起第四类事情，近来使他倾注了更多注意力的事情。

第四类事情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个被称作刑事法庭的奇怪的机构，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必要存在，以及它是怎么出现的。它产生了监狱，他同其中的一部分犯人有过交往，它还产生了彼得堡到萨哈林岛的所有监禁人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作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刑法的牺牲品，在那里饱受煎熬。

聂赫留朵夫通过与犯人的亲自交往，通过与律师、监狱牧师、监狱长的谈话，以及被押犯人的经历，得出一个结论，被捕者，也就是所谓的罪犯，可以分为五种人。

第一种是完全无罪的人，是审判过失的牺牲品，例如被诬告纵火的梅尼绍夫，例如玛丝洛娃等其他的人。这一种人的数量不是很多，据一位牧师估计，约占百分之七左右，但这些人的境遇格外让人同情。

另一种是因激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况下的行为而被判罪的。他们的这些行为，所有那些审讯和判他们的刑的人，如果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多半也会做出来的。这种人的数量，据聂赫留朵夫估计，几乎超过全体罪犯的半数。

第三种人被惩处的原因是他们做了自认为极其普通，甚至是好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在与他们格格不入的、编写法律的人看来，却是犯罪。属于这种人的有卖私酒的、走私的、在地主家和公家的大树林割草和拾柴的。属于这种人的还有偷东西的山民和抢劫教堂的不信教的人。

第四种人被列入罪犯的原因，不过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品质高于社会的一般水平。这种人有教派信徒，有为争取独立而暴动的波兰人、切尔克斯人，还有政治犯——因反对政府当局而被判刑的社会主义者和罢工者。这种社会的最优秀分子的比例，据聂赫留朵夫的估计，是相当大的。

最后是第五种人，社会对他们犯的罪远比他们对社会犯的罪要大得多。这些人被社会所抛弃，在不断的欺压和诱惑下变得头脑迟钝，就像

那个偷地毯的小伙子和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内外所见到的数百个那样的人一样，生活的环境仿佛经常不断地迫使他们必须去做那种被称之为犯罪的事情。有很多的小偷和杀人凶手，据聂赫留朵夫的观察，也属于这一种人，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接触过其中的一些人。至于那些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人，经聂赫留朵夫深入了解之后，也可以划入这种人的范畴，新的犯罪学派称他们为犯罪型，他们在社会上的存在被看作刑法和惩罚的必要性的有力证明。这些所谓的道德败坏型、犯罪型、非正常型，照聂赫留朵夫的观点，也同样是那些社会对他们犯的罪远比他们对社会犯的罪要大得多的人，不过，社会并非现在直接对他们犯罪，而是以前对他们的父母和祖先们犯的罪。

在这点上，惯盗犯奥霍京可谓是这种人中最让聂赫留朵夫吃惊的。他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夜店里长大，显然在三十岁之前从没有见到一个比警察更高尚的人，自少年时代起就在小偷团伙中鬼混，天生具有不同寻常的幽默本领，非常能吸引人。他请求聂赫留朵夫帮助他，同时又嘲笑自己，嘲笑法官，嘲笑监狱，嘲笑所有的法律，不仅嘲笑刑法，而且还嘲笑宗教的戒律。另一个是美男子费多罗夫，他领着一伙人杀死了一个年老的官吏，并把他家洗劫一空。他是个农民，父亲的房子被人家非法霸占，他后来当了

兵，因爱上一个军官的情妇，吃尽了苦头。这是一个招人喜欢和充满热情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只知道享乐的人，从未见过人可以为了别的目的而克制自己的享乐，也从未听说过生活中除了享乐还会有别的什么东西。聂赫留朵夫心里明白，这两个人的本质是很出色的，只是像无人照管的植物一样，畸形生长，变得不成器了。他看见一个流浪汉和一个女人，他们的麻木不仁和似乎残酷无情的样子，十分令人反感，可是他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像是意大利犯罪学派所说的那种犯罪型，只是觉得他们是令他厌恶的人，就像他在大街上看见的那些穿着礼服、佩戴肩章和满身绣花饰物的男女一样。

于是，弄清为什么这些身份各异的人在坐牢，而另一些人却在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走，甚至还要审判他们的问题，成了聂赫留朵夫目前所关心的第四类事情。

聂赫留朵夫起初想从书本中找到这个问答的答案，并买了所有涉及这一问题的书。他买了龙勃罗梭、嘉罗法格、费里、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德^[19]的著作，认真阅读起来。可是，他越读下去，越感到失望。他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凡是研究学问不是为了在学术界扮演一个角色：著书、辩论、教书，而是为了解决一些直接、简单而实际的问题的人总会遇到的麻烦；这些学术著

作为他解答了上千个与刑法有关的艰难而深奥的问题，惟独没有解答他要寻找的问题。他想知道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他想知道：为什么以及凭什么一些人可以关押、折磨、流放、鞭打和杀戮另一些人，他们和他们不一样都是人吗？可是他得到的却是关于人是否有意志的自由的各式回答。能否用测量头盖骨之类的方法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犯罪型？遗传在犯罪行为中起什么作用？是否存在天生的道德不端？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疯狂？什么是退化？什么是气质？气候、食物、愚昧、模仿、催眠、情欲对犯罪有什么影响？什么是社会？社会的责任有哪些？诸如此类，等等。

这些议论让聂赫留朵夫想起有一次他从一个放学回家的男孩那里得到的答复。聂赫留朵夫问男孩，是否学会了拼写。“学会了，”男孩回答说。“那好，请拼一下：爪子。”“什么爪子——狗爪子吗？”男孩一脸狡黠地回答。聂赫留朵夫从那些学术著作中为他的那个根本性的问题找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反问式的答案。

这些著作中有许许多多精辟、深奥和有趣的东西，然而却没有解答最根本的问题：凭什么权利一些人可以惩罚另一些人？不仅仅没有对此作出解答，所有的议论反而倾向于替惩罚辩解，把惩罚的必要性看作一条颠扑不破的公理。聂赫留

朵夫读了很多，但时断时续，他把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归咎于自己下功夫不深，希望以后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还不敢相信近来频频萦绕在他头脑中的那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

三十一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在七月五日出发。聂赫留朵夫准备那天同她一起走。他动身的前一天，他的姐姐和姐夫进城来看弟弟。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拉戈任斯卡娅，比弟弟大十岁。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她的影响下长大的。他小的时候，她很爱他，后来，到了她要出嫁的时候，他们几乎像同龄人一样亲密无间：她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她当时爱上了他现在已经故去的朋友尼科连卡。他们两人都爱他，爱的是他和他们身上共有的一种能把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好品质。

但那以后，他们两人却堕落了：他是因为军队里的不良生活，她是因为嫁错了人。她对那个人充满了性爱，可是他不仅不喜欢她和弟弟当年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东西，而且甚至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并把她那时所追求的道德完善和为大众服务的愿望，当作他理解的那种虚荣心作

怪，想在人前出风头的行为。

拉戈任斯基是个没有名望和产业的人，但却是个精明的官场老手，巧妙地周旋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哪一派当时能给他带来好处，就依附和利用哪一派，而更主要的，他还善于利用他能讨好女人的特殊本领，为自己在司法界谋得了显赫的官位。他在国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年纪已经不轻，他让娜塔丽娅这个年纪也已经不轻的姑娘爱上了自己，几乎违背她母亲的心意同她结了婚。母亲认为这门亲事并非门户相当。聂赫留朵夫憎恨自己的这位姐夫，尽管他不愿承认这一点，尽管他尽量克制这种情绪。他所以对他反感，是因为他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自命不凡，更主要的是因为姐姐竟然如此炽烈、自私和放荡地爱上了这个卑下的家伙，为了奉承他，不惜扼杀自己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每当想到姐姐做了这个满身汗毛、秃顶发亮、自命不凡的人的老婆，聂赫留朵夫就心头火起。他甚至按捺不住对他的孩子们的厌恶。每次听到她要生孩子，他都会产生一种类似悲痛的心情，她又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那里感染上了什么坏的东西。

拉戈任斯基夫妇没有带孩子来——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住在了最好的一家饭店最好的一间客房里。娜塔丽娅立即去了母亲原来的房子，可是没有见到弟弟，听阿格拉

菲娜·彼得罗夫娜说，他搬到一套带家具的公寓里，于是又赶往那里。有个脏乎乎的茶房在昏暗、恶臭、白天也点灯的走廊里，迎着她说，公爵不在家。

娜塔丽娅想进弟弟的房间，给他留张字条。茶房领她去了。

她走进他那两个小房间，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她看见处处都是她熟悉的那种清洁和整齐，还有令她吃惊的他从来没有过的简朴陈设。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她熟悉的带青铜小狗的吸墨器；还有她熟悉的放得整整齐齐的皮包、纸张、文具、几本刑法条例、一本英文版的亨利·乔治的著作、一本法文版的塔尔德的著作，还有她熟悉的那把弯曲的大象牙刀夹在塔尔德的那本书里。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给他写了张条子，要他今天一定得去她那儿一趟，然后对她见到的一切吃惊地摇着头，回到自己住的饭店。

现在，娜塔丽娅有两件事对弟弟放心不下：一是他和卡秋莎结婚的事，这是她在她那个城市听说的，因为满城都在议论；二是他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事，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了，许多人把它当作某种含有政治意味的危险举动。和卡秋莎结婚之事，从某一方面来说倒是让她欢喜。她欣赏这种果敢的精神，因为她从中看到了他和自己，也就是他们姐弟两人在她出嫁前那段美好岁月里的

样子。可是另一方面，她想到她的弟弟要和这样一个下作的女人结婚，又感到非常可怕。后一种心情来得更为强烈，所以她决定要尽可能劝导他，阻止他，尽管她知道这是很难的。

至于另外那件事，把土地交给农民，并不那么让她痛心；可是她的丈夫却对此十分愤慨，要她对弟弟施加影响。他说，这种行为是轻率、浮躁和自满的极端表现，简直无法解释，如果硬要解释的话，那只能说是有意自我标榜，出风头和哗众取宠。

“把土地连同租金一块儿交给农民，这究竟有什么意义？”他说。“如果他真想这么做，可以通过农民银行卖给他们嘛。这样还算是件有意义的事。总之，这是一种近似荒唐的行为。”他说，心里已经盘算起监护的问题，并要妻子认真和弟弟谈谈他的这一古怪的念头。

三十二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桌上姐姐留下的字条，立即赶往她那里。这时已是晚上了。姐夫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姐姐一个人接待弟弟。她穿着紧腰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红色花结，黑色头发松松地挽成当下时髦的样式。她显然刻意修饰自己，以便显得比同龄的丈夫年轻一些。看到

弟弟，她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向他迎去，弄得绸裙窸窣作响。他们相互亲吻，微笑着打量对方。这是一种神秘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意味深长的对视，目光里充满了真情，接着是对话，里面已没有了刚才的那份真情。自从母亲去世后，他们还没有见过面。

“你胖了，也更年轻了。”他说。

她高兴得撅起嘴唇。

“你可瘦了。”

“哦，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好吗？”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夜里他没睡好。”

要说的话很多，可是这些话没能说出来，倒是两人的目光说出了该说而没有说出的话。

“我去过你那儿了。”

“是的，我知道。我从家里搬出来了。我嫌那儿太大，孤单，烦闷。那儿的東西我用不上了，你全拿走吧，就是那些家具——所有的东西。”

“是的，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告诉我了。我去过那儿。太谢谢你啦。不过……”

这时，饭店的茶房送来银制的茶具。

茶房摆茶具的功夫，他们没有说话。娜塔丽娅坐到茶几后面的圈椅上，默默地斟茶。聂赫留朵夫也沉默不语。

“我说，季米特里，我全知道。”娜塔丽娅看了他一眼，语气坚决地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她有过那种经历，你真的相信能改好她吗？”娜塔丽娅说。

他坐在小椅子上，挺直身子，胳膊肘没有支在什么地方，留心听她讲话，尽力好好领会她的意思，好好回答她的话。自从这次见到玛丝洛娃之后，他的情绪一直很好，心里充满了安宁、快乐和对所有人的好感。

“我不是改造她，而是改造我自己。”他回答。

娜塔丽娅叹了口气。

“除了结婚，也有别的方法嘛。”

“可我以为，这是最好的方法；此外，这会把我带进那一个天地，在那里我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我想，”娜塔丽娅说，“你不会幸福的。”

“问题不在我是不是幸福。”

“当然，不过，如果她有良心的话，她也不会幸福，甚至也不应当有这种想法。”

“她并没有这么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

“生活怎么样？”

“应当另有所求呀。”

“除了我们做该做的事，不应当再有别的要求。”聂赫留朵夫说，瞧着她那张依旧美丽的脸，尽管眼角和嘴角已出现了细细的皱纹。

“我不明白。”她说着，叹了口气。

“可怜的姐姐呀！她怎么会变成这样了？”聂赫留朵夫想，回忆起娜塔丽娅出嫁前的样子，心中充满了由无数童年的往事勾起的对她的脉脉温情。

这个时候，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房间，像往常一样昂首挺胸，眼镜、秃顶和黑色的胡子闪闪发光。

“您好，您好。”他用矫揉造作的腔调说。

（尽管婚后最初的一段时间，他们尽力相互称“你”，后来还是改回原来用“您”的称呼。）

他们握了握手，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轻松地坐到圈椅上。

“我不妨碍你们谈话吧？”

“不，我从不对人隐瞒我说的话和做的事。”

聂赫留朵夫刚一看见这张脸，看见这双毛烘烘的手，听见这种以保护人自居的、自以为是的腔调，他心中的那份温情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

“对啦，我们在谈他的打算呢，”娜塔丽娅说。“给你倒杯茶？”她拿起茶壶，补充说。

“好吧，谢谢，到底是什么打算？”

“和一批犯人去西伯利亚，其中有一个女

人，我认为自己对她有罪。”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了，不光是陪她去，还有别的呢。”

“是的，同她结婚，只要她愿意的话。”

“原来如此！如果您不嫌烦，请对我解释一下您的理由。我不了解是什么理由。”

“理由是，这个女人……她在堕落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表达方式，很生自己的气。“理由是，我犯的罪，受惩罚的却是她。”

“既然她受到惩罚，恐怕不能说她没罪。”

“她完全没有罪。”

于是，聂赫留朵夫以不必要的激动心情把案子的审理过程说了一遍。

“是的，这是庭长的疏忽大意，造成陪审员裁定时考虑不周。不过，这种情况可以向参政院上诉。”

“参政院已经驳回上诉。”

“已经驳回上诉，那就是说上诉理由不充分，”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说，显然完全赞同那种公认的观点，法庭辩论的结果就是真理。“参政院不可能深入审查案件的实质。如果法庭的审判的确有误，那就得上告皇上了。”

“状子递上去了，多半没有什么把握。他们要询问司法部，司法部要询问参政院，参政院再重复一遍自己的裁定，这么一来，无罪的人照样

还是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询问参议院，”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故作宽容地笑着说，“而是向法院调阅案子的原卷，如果发现有错误，就会加以纠正；第二，无罪的人受到惩罚，从来是，或者至少是一种罕见的例外。受惩罚的人都是有罪的，”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不紧不慢、自鸣得意地笑着说。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不无反感地说，“我确信，被法庭判刑的人，绝大部分人是无辜的。”

“这话怎么讲？”

“无辜的意思就是纯粹冤枉好人，比如那个被控毒死人的女人是无辜的，比如那个被控杀人的农民是无辜的，我现在了解到，他根本没有杀人；比如被控纵火的那母子二人，也是无辜的，火是房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点被判刑。”

“是的，不用说，错判的事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过去有，将来还会有。人类的机构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嘛。”

“还有很大一部分无辜的犯人，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应当被看作是犯罪。”

“对不起，这话可就没道理了；任何一个小偷都知道，偷东西不是好事，不应当去偷，偷东

西是不道德的，”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说，脸上露出那种心安理得、自以为是、多少有点轻蔑的微笑，这让聂赫留朵夫大为恼火。

“不，他们不知道；大家对他们说：别偷东西，可是他们明明看见，工厂老板用扣工资的方法偷窃他们的劳动所得，政府和政府的所有官员，通过税收的方法，不断地盗取他们的财物。”

“这可是无政府主义啦。”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不慌不忙地对内弟的话下了定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我说的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政府偷去他们的财物，我们这些地主早就在偷窃他们的东西，从他们手里抢去了本应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然后当他们从被偷去的土地上捡点树枝生炉子，我们却把他们关进监狱，还要他们相信，他们是小偷。可是他们知道，小偷不是他们，而是偷去他们土地的人，想办法弥补他们被偷去的东西，是他们对的家庭应负的责任。”

“我不懂，就算懂了，也不赞成。土地不可能不是某些人的私有财产。如果您把土地分配，”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说，心中确信聂赫留朵夫是个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则就是平均分配所有的土地，这种平分土地的思想极其愚蠢，简直不堪一驳，“如果您把土地平均分

配，明天这些土地又会回到那些勤劳能干的人手里。”

“谁也没有想过平均分配土地，土地不应该成为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应该成为买卖或租佃的对象。”

“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人天生带来的。没有私有权，也就没有耕种土地的兴趣。一旦消灭私有权，我们就会倒退到野蛮状态，”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盛气凌人地说，重复着维护土地私有制的陈词滥调，这种不容置辩的论调认为，对土地私有制的渴望，正是土地私有制的标志。

“恰恰相反，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土地才不会像现在这样荒芜，现在的地主占着茅坑不拉屎，自己不会种地，又不让会种地的人种。”

“听着，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这可是完全发疯了！难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消灭土地私有制是行得通的吗？我知道，这是您很久以来经常思考的问题。请恕我直言……”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脸色煞白，声音颤抖：显然这个问题触到了他的痛处。“我奉劝您在实际处理这个问题之前，要好好地考虑考虑。”

“您说的是我的产业？”

“是的。我认为，所有我们这些处在一定地位上的人，应当承担与这种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应当维护这样的生活条件，我们是在这样的生活

条件中成长起来的，那是我们从我们的祖先手里继承下来的，还要把它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认为，我的责任……”

“请让我说完，”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不容别人打断他的话，继续说，“我这么说并不是为我和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的情况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够我们用的，我认为，孩子们以后的生活不至于贫困，所以，我反对您的这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恕我直言，绝不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我不能同意您的做法。我劝您多想想，多读些书……”

“好啦，请您让我自己处理我的事吧，我知道该读什么书和不该读什么书，”聂赫留朵夫说，脸色发白，同时感到双手发凉和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于是不再说话，喝起茶来。

三十三

“哦，孩子们怎么样？”聂赫留朵夫稍稍有点儿平静，问姐姐。

姐姐讲起孩子们，说他们留在奶奶那里，心里很高兴，弟弟不再和她丈夫争论，开始讲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像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叫黑奴，另一个叫法国女人。

“你还记着呢？”聂赫留朵夫笑着说。

“你想不到，他们的玩法跟你那会儿一样。”

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娜塔丽娅放下心来，可是不愿意在丈夫面前只说弟弟才能懂的话，于是找了个大家都能谈论的话题，说起已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缅斯基的母亲在独子决斗身亡后，忍受了多大的悲痛。

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表示不赞成目前这种把决斗中打死人的行为，排除在普通刑事犯罪之外的做法。

他的看法遭到聂赫留朵夫的反对，于是他们又就刚才那个没有说清的话题争论起来，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感到，聂赫留朵夫在谴责他，瞧不起他的全部事业，他心想，一定要让他明白他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说姐夫干涉他处理土地的事所引起他的恼火（他从内心深处知道，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们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这么做的），他心中感到愤恨的是，这个目光短浅的人依旧信心百倍和心安理得地坚持认为，现在对聂赫留朵夫来说是绝对荒谬和罪恶的东西，在他那里却是正确而合法的。这种自以为是的作风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您看法院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问。

“应该把决斗的一方当作普通的杀人犯判服

苦役。”

聂赫留朵夫又感到两手冰凉，情绪激动地说起来。

“那又会怎么样呢？”他问。

“那样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来，法院审判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啦。”聂赫留朵夫说。

“还能有别的吗？”

“是维护等级的利益。依我看，法院只是维护现行等级制度的一种行政工具，是有益于我们所处的等级的。”

“这完全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观点，”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平静地笑着说。“通常认为法院的使命是另一种样子。”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我亲眼所见，并非如此。法院的目的只是保持社会的现状，为此就需要迫害和惩罚那些道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一水平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谓的政治犯，同时还需要迫害和惩罚那些低于这一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犯罪型的人。”

“第一，我不能同意您说的，犯人，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犯人受惩罚，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平高于一般人的缘故。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社会的渣滓，像你所说的那些低于一般水平的犯罪型一样，也是堕落的，只是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可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法官们不知要高出多少呢；所有那些教派信徒，也是道德高尚、意志坚定的人……”

可是，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这个人说话有个习惯，不容别人打断，他没有听聂赫留朵夫说什么，尤其让他恼火的是，他说话时聂赫留朵夫也在继续说话。

“我不能同意法院的目的是维护现行制度这种说法。法院自有法院的目的；或者改造……”

“关在监狱里改造，多妙呀。”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或者铲除，”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固执地继续说，“道德败坏分子和那些危害社会的可怕的家伙。”

“问题就出在这里，既做不到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一点。社会还不具备这种办法。”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干笑着问。

“我想说，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古时候施行的两种方法：体罚和绞刑，不过，由于社会风气日趋和缓的缘故，这两种方法渐渐不再使用了。”聂赫留朵夫说。

“我从您这儿听到的东西，真是又新鲜又奇怪。”

“是的，把一个人痛打一顿是合理的，为的

是让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砍下一个危害社会的危险分子的脑袋，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两种惩罚具有合理的意义。可是，把一个因游手好闲和学坏人的样子而堕落的人关进监狱，放到一个生活有保障和必须游手好闲的环境里，和那些最堕落的人在一起，这有什么意义呢？或者为点什么事，用国库的钱——每个人要花费五百多卢布——把一个人从图拉省转押到伊尔库茨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转押到……”

“不过，人们是害怕这种官费旅行的，假使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现在也就不会安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些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会永远关在里面，总要放出来的。而且这些机构往往把那些人搞得更坏，更堕落，也就是说加大了危险。”

“您是说，惩罚制度需要改善吧。”

“改善是不可能的事。改善监狱的费用要超过国民教育的费用，又会把新的负担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

“不过，惩罚制度的缺陷无论如何不能说明法院本身也有缺陷。”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又没听内弟说的是什么，继续说他自己的话。

“这些缺陷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抬高声音说。

“那又怎么办？应当杀人吗？还是像一位政府要人提议的，挖眼珠子？”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说，胜利地笑了笑。

“不错，这是很残忍，不过倒能奏效呢。现在的这种做法，既残忍，又不能奏效，而且还极其愚蠢，简直让人无法理解，一个精神健康的人怎么会参与像刑事法庭这样荒唐而残忍的事情。”

“我就参与这种事情。”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脸色煞白地说。

“这是您的事。不过，我不能理解。”

“我想，您不理解的事情多着呢。”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声音颤抖地说。

“我在法庭上看见，副检察官竭尽全力指控一个可怜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在任何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的心里，只会引起同情；我还知道，另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认为读福音书触犯了刑法；甚至法院的全部审理活动就干这种毫无意义而又残忍的勾当。”

“我可没这么想，要不就不干这一行了。”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说完，站起身来。

聂赫留朵夫看到姐夫眼镜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闪亮。“难道这是眼泪？”聂赫留朵夫想。的确如此，这是屈辱的眼泪。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走到窗前，掏出手帕，咳嗽一声，擦起眼镜，并把

眼镜摘下来，擦了擦眼睛。他回到沙发上，点上一支雪茄，不再说话。聂赫留朵夫看到自己让姐姐和姐夫伤心到这种地步，心里感到难过和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走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不无尴尬地向他们告辞，回家了。

“很有可能，我说的是对的，至少他没有驳倒我。不过，不应该这么说话的。我心中既然有这样不良的感情作怪，这样侮辱他和让可怜的姐姐伤心，可见我的改变还是很小的。”他想。

三十四

那批犯人，玛丝洛娃也在其中，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所以，为了等他们从监狱出来并跟他们一起去火车站，聂赫留朵夫打算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整理东西和信件时，看到自己的日记，把最近写的几段日记重新读了一遍。临去彼得堡之前的日记写道：“卡秋莎不想要我作出牺牲，宁肯牺牲她自己。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她令我欣喜的是她的内心变化，我觉得，她身上正在发生这种变化，尽管这我不大敢相信。我不敢相信，可是我有种感觉，她正在复活。”紧接这段话之后，还写道：“心情很沉重，同时又很愉快。听说她在医院行为不端。顿时备

感痛苦。没想到会这么痛苦。我以一种厌恶和憎恨的心情同她讲话，可是后来突然想到自己，想到我多次做过我痛恨她做的那种事，就是现在，也还有那种念头，于是我一下子厌恶起自己，可怜起她来，于是我的心情大为好转。只要能经常及时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20】，我们就会变得善良起来的。”他今天的日记写的是：“去娜塔丽娅那儿，正巧因自满而变得很坏，很凶，直到此刻心情仍十分沉重。唉，有什么办法呢？明天起，开始新生活。别了，旧生活，永别了。脑子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

第二天醒来，聂赫留朵夫的头一个感觉，就是后悔和姐夫的那场争论。

“不能这样一走了之，”他想，“得去他们那儿一趟，赔个不是。”

可是一看表，他发现已经没有时间，该赶紧动身，不然赶不上那批犯人出门了。聂赫留朵夫急忙打点行装，吩咐看门人和随他一起走的费多西娅的丈夫塔拉斯直接把行李送到火车站，他出门随便叫了一辆马车，直奔监狱。犯人的火车比聂赫留朵夫乘坐的邮政火车早开两个小时，所以他把公寓的房租全部付清，不打算再回来了。

正是暑气熏蒸的六月。大街上的石头路面、房屋的石墙和铁皮顶，经过了一夜的闷热之后，还没有冷却，不断地向静止不动的、炎热的空气

中散发着余热。没有风，即使偶尔起一点儿风，送来的也是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臭烘烘的热气。街上行人很少，仅有的几个人也尽量在背阴的地方走路。只有晒黑的农民修路工坐在街心，脚上穿着树皮鞋，用锤子往热沙子里砸着鹅卵石；还有一些阴沉着脸的警察，身穿未经漂白的布制服，挎着带黄穗的手枪，无精打采地倒换着两只脚，站在大街的中央；还有公共马车叮当作响地在大街上来回奔跑，车厢朝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戴着白色头罩，只露两只竖立着的耳朵。

聂赫留朵夫来到监狱的时候，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监狱里正忙着移交犯人，这项紧张的工作从早晨四点钟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要走的这批犯人共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所有的人都需按名册一一核对，检出有病和体弱者，然后再移交给押解人员。新上任的监狱长、他的两个副手、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坐在院子靠墙阴凉处的桌子旁，桌上摆放着公文册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个喊叫犯人的姓名，查验和登记一个接一个向他们走来的犯人。

现在，桌子已经有一半暴露在太阳底下了。天气越来越热，由于没有风，再加上成群的犯人站在这儿不住地呼出热气，显得更加闷热。

“这是怎么搞的，没完没了啦！”押解官又高又胖，红脸膛，端肩膀，短胳膊，小胡子遮盖的嘴里叼着香烟，不停地喷着烟雾。“都累死我啦。你们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很多吗？”

书记官查了查名册。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几个女的。”

“喂，站着干吗，往前走！……”押解官对那些挤在一起，还没有查验过的犯人喊道。

犯人们排成队，站在大太阳底下，等了足足有三个小时了。

这项工作在监狱里面进行，而在监狱外面，大门口像往常一样，站着持枪的哨兵，门旁停着二十几辆装犯人行李和病弱犯人的大车。拐角处站着犯人的亲属和朋友，等犯人出来见一面，如果可能，说几句话，送上点儿东西。聂赫留朵夫也在这堆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大门里面响起铁镣的叮当声、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大队人群的咳嗽声和低低的说话声。这种情形持续了大约五分钟的光景，这中间几名看守从小门里进进出出。最后，传来了口令声。



大门隆隆地打开，铁镣的叮当声更响了，一

队身穿白色军服的押解兵，肩上扛着枪，走了出来，在大门外排成一个整齐的大圆圈，显然这成了他们熟悉的习惯动作。等他们站好队形，响起一声新的口令，于是剃去头发的脑袋上顶着薄饼样子的帽子和背着行李的犯人们，拖着脚镣，一只手按着背上的行李，另一只空闲的手晃来晃去，两个人一排地往外走。先出来的男苦役犯，穿着一样的灰色长裤和灰色囚袍，背上缝着一块方形的黄布。他们当中有年轻的、年老的，有瘦的、胖的，有脸色发白的、发红的、发黑的，有小胡子的、大胡的、没胡子的，有俄罗斯人、鞑靼人、犹太人，个个脚下铁镣叮当作响，一只胳膊麻利地来回摆动，仿佛准备去远处的什么地方似的，可是走出十几步后，又停了下来，顺从地四人一排，依次站好。紧跟在后面的，是一批跟他们穿同样服装、同样剃光头发的男犯，脚上没戴脚镣，但每个人的一只手和另一个人的一只手用手铐铐在一起。这是流放犯……他们也是那样麻利地走出来，也是那样四个人站成一排。随后出来的是各村社判处的犯人，接着是女犯，也按同样的顺序排列，先是女苦役犯，穿灰色囚服，系灰色头巾，然后是女流放犯，还有自愿跟随丈夫同行的妇女，各自穿着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服装。有几个女犯还抱着吃奶的孩子，用灰色囚袍的前襟包裹着。

和女犯们一起走的还有一些儿童，有男孩，也有女孩。这些儿童像是马群里的马驹，夹杂在女犯中间。男犯们默默地站在那儿，只偶尔咳嗽几声，或者简短说一两句话。女犯队列里却说话声不断。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好像看见玛丝洛娃出来了，可是后来在人群里一晃又不见了，他只看见一群仿佛失去了人类特征、尤其是女性特征的带着孩子和背着行李的灰色群体，涌向男犯的背后。

尽管在监狱的大墙里面已经清点过人数，押解兵们又重新清点起来，核对一下与先前数过的人数是否不同。这次清点持续了很长时间，特别是因为有些犯人走来走去，挪动地方，影响了押解兵的清点。押解兵一边骂，一边推搡那些老是移动的犯人，犯人们表面顺从，内心里却充满愤恨。押解兵们就这样把人数又点了一遍。等到清点全部结束，押解官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里顿时骚动起来。病弱的男犯、女犯和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向大车，把行李往上一放，就往车上爬。爬上大车坐下的有怀抱啼哭婴儿的女犯，有争抢座位快乐的儿童和神情沮丧、脸色阴沉的男犯。

几个男犯摘掉帽子，走到押解官面前，向他哀求着什么。后来聂赫留朵夫知道，他们是想坐车。聂赫留朵夫看到，押解官一声不吭，眼睛不瞧这些人，只顾自己吸烟，可是后来突然对一个

男犯扬起他那粗短的胳膊，犯人知道要挨打，急忙缩起剃光的脑袋，跑开了。

“我就让你尝尝当贵族老爷的滋味，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不许坐车，步行！”押解官喝道。

押解官只让一个戴脚镣的、走路颤巍巍的高个老头儿上车。聂赫留朵夫看见这个老头摘下薄饼似的帽子，画了个十字，向大车走去，可是到车前费了半天劲也没能爬上去，脚镣妨碍他抬起衰老的腿脚，幸亏先上车的一个女人抓住他的一只手，把他拉上车。

等到所有的大车装满行李，获准坐车的人在行李上坐好，押解官摘下军帽，用手帕擦了擦额头、秃顶和粗红的脖子，然后画了个十字。

“全体犯人，起步走！”他发出口令。

士兵们把枪弄得叮当作响，犯人们摘下帽子，有的还画着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喊着什么，犯人们也大声喊着回答，女人当中有人号啕大哭。犯人的队伍在穿白色军服的士兵的包围下，移动起来，无数双戴铁镣的脚踏起阵阵灰尘。士兵们走在最前面，后面是戴铁镣的犯人，四人一排，他们后面是流放犯，然后是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两个人铐在一起，然后是妇女。最后是装满行李和病弱犯人的大车，其中一辆大车上高高坐着一个裹头巾的女人，不停地尖叫着痛哭。

三十五

队伍非常长，当前面的人已从视线中消失，后面装行李和病弱犯人的大车才刚刚起动。等车辆一起动，聂赫留朵夫坐上等他的马车，吩咐车夫赶到队伍的前面去，以便看看罪犯中有没有熟人，然后在女犯中找到玛丝洛娃，问她有没有收到他送去的东西。天气更热了。没有风，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一直在沿路中央行走的犯人们的头顶上聚着不散。犯人们走路的步子很快，聂赫留朵夫车上套的不是快马，只能在后面慢慢地追他们。一排又一排可怕而陌生的怪物，迈着上千只穿同样鞋袜的脚，合着脚步的节拍晃动空闲的那只手，好像是在给自己鼓劲儿。他们人数那么多，样子那么千篇一律，而且又处在那么特别奇怪的条件，以致聂赫留朵夫觉得，他们似乎不是人，而是一群特殊而可怕的物体。他的这种印象，直到他从苦役犯中认出杀人犯费多罗夫，从流浪犯中认出爱逗笑的奥霍京和一个求过他的流浪汉，才得以消失。几乎所有的犯人都回过头来，斜眼瞧着追上来的这辆轻便马车和坐在车上打量他们的这位先生。费多罗夫朝车上扬扬头，表示认出了聂赫留朵夫；奥霍京挤了挤眼睛。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向他鞠躬行礼，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当马车走到女犯旁边时，聂赫留朵夫一

眼认出了玛丝洛娃。她走在女犯的第二排。边上那个女犯，红脸儿，黑眼睛，短腿，长相十分难看，囚袍下摆掖在腰里——这是霍罗莎芙卡。她里边是个孕妇，吃力地拖着两条腿走路。第三个就是玛丝洛娃。她肩上背着行李，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她脸色平静而坚毅。这排的第四个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身穿短囚袍，头上像农妇那样扎着头巾，走路的样子很带劲儿——这是费多西娅。聂赫留朵夫下了马车，走近女犯的队伍，想问问玛丝洛娃是否收到东西，身体怎么样，可是队伍这边走着的一个押解军士立即发现有人靠近队伍，连忙向他跑来。

“不行，先生，靠近犯人是不可许可的。”

他边走边喊。

等他走到跟前，认出是聂赫留朵夫（监狱里所有的人都认识聂赫留朵夫），立即举手行了个军礼，站在他身边说：

“现在不行。到火车站就可以了，在这儿是不可许可的。别掉队，快走！”他对犯人们大喊一声，然后抖擞精神，不顾炎热，甩开穿着时髦新皮靴的双腿，快步跑回自己的位置。

聂赫留朵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车夫赶车跟在他身后，他自己随着队伍往前走。犯人的队伍不管经过哪里，都能引来人们同情而又恐惧的注意。坐在马车里的人，从车窗探出脑袋，看看犯

人，目送他们走过去。行人停住脚步，既惊奇又害怕地望着这些恐怖的场面。有人走上前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把钱收下。有人像中了催眠术似的，跟着队伍走，后来又停了下来，摇着头，目送队伍远去。有人相互招呼着，从家里跑出来，或是从窗子里探出身子，默默地、呆呆地望着这支可怕的队伍。在一个十字路口，队伍挡住了一辆豪华马车的去路。马车驭座上坐着一个满脸油光、屁股肥大、背上有两排扣子的车夫，后面座位上坐着一对夫妻：妻子身材削瘦，脸色苍白，戴一顶浅色女帽，撑着一把花伞；丈夫戴高顶礼帽，穿着一件讲究的浅色大衣。他们对面的前座上，是他们的孩子：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像花朵一样鲜艳的女孩，披着淡黄色的头发，也撑着一把小花伞；另一个八岁模样的男孩，脖子又长又瘦，锁骨突出，戴着水兵帽，装饰着长长的飘带。父亲生气地责怪车夫没有及时抢在犯人的队伍前面过去，母亲却厌恶地眯起眼睛，皱起眉头，把绸伞完全贴在脸上，遮挡阳光和灰尘。大屁股车夫生气地紧锁眉头，听着主人的无理责怪，因为是主人吩咐他走这条路的。他吃力地勒住那几匹油光闪亮、笼头和脖子底下汗淋淋、一个劲儿想往前走的黑马。

一名警察真心诚意地想为这位豪华马车的主人效劳，拦住队伍，让他过去，可是他感到这支

行进的队伍里有一股阴森庄严的气氛，即使为了这位阔老爷，也不能打破。他只是举手行了个礼，表示他对阔人的尊敬，并且严厉地注视着犯人，好像准备一有情况就挺身而出，保护车上的贵客。于是，这辆马车只好让整个队伍先走，等最后一辆装着行李和坐着女犯的大车轰隆隆地驶过，它才重新赶路。大车上坐着的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本来已经安静下来，可是一看见这辆豪华的马车，又尖叫着痛哭起来。豪华马车的车夫轻轻一抖缰绳，那几匹黑马迈开脚步，蹄铁踏着路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拉着柔软舒适的胶轮马车向别墅奔去，丈夫、妻子、女孩和细脖子、尖锁骨的男孩去那儿消闲。

不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没有对女孩和男孩解释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孩子们只好自己来解答这种场面究竟意味着什么问题了。

女孩从父母脸上的表情，得出这样的答案：这些人同她的父母和父母的熟人完全不同，这是坏人，就应当这样对待他们。因此，小女孩只是觉得害怕，等到他们看不见了，心里才高兴起来。

可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犯人队伍的细长脖子的男孩，对这个问题却有另外的看法。他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坚定地知道，这些人像他自己，像所有的人一样，也是人，所以

必是有人对他们做了坏事——这种事是不应当做的；他觉得可怜他们，他害怕这些戴手铐脚镣和剃光头的人，也害怕那些给他戴手铐脚镣和剃去他们头发的人。由于这个缘故，男孩的嘴唇越撅越高，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有哭出来，因为他认为在这种场合哭，是件丢人的事。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走路的步子和犯人一样快，可是尽管他衣着单薄，穿的是薄大衣，还是感到热得十分难受，主要是因为扬起的灰尘和街上一动不动的热气，让他感到闷得透不过气来。他步行了四分之一俄里的样子，又坐上马车往前走，但是坐马车走在马路中央，他感到更热了。他试图去想昨天和姐夫的那场谈话，可是这件事已不像早晨那样让人激动了。它已被犯人们走出监狱和眼前的情景所冲淡。而更主要的，是酷热难当。围墙旁边的树阴下，有两个实科中学的男生，摘掉帽子，站在一个盘脚坐着的卖冰淇淋的小贩面前。其中一个男孩正舔着牛角小匙，津津有味地吃着，另一个男孩却在等小贩往杯子里盛黄乎乎的东西。

“这儿有地方喝点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自己的车夫，心里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要喝点儿什

么的欲望。

“马上就有一家很好的馆子。”车夫说完，在街角处把车一拐，拉着聂赫留朵夫到了一个挂着大招牌的门脸儿前。

坐在柜台里的穿衬衫的胖掌柜和坐在桌子旁无事可做的穿脏得发黑的白工作服的堂倌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不寻常的客人，赶忙迎上去伺候。聂赫留朵夫要了瓶矿泉水，在离窗户稍远的一张铺着脏台布的小桌旁坐下来。

有两个人坐在另一张桌旁，桌上放着茶具和白玻璃瓶，不住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和和气气地算计着什么事。其中一个人脸色很黑，秃顶，只有后脑勺的周围剩下一圈黑发，和伊格纳季·尼基福罗维奇的一模一样。这种感觉不由得让他想起昨天和姐夫的谈话，以及同姐夫和姐姐在临行之前见上一面的愿望。“走之前恐怕来不及了，”他想。“最好写封信吧。”于是，他要来信纸、信封和邮票，一边喝着冒气泡的清凉的矿泉水，一边思考着该写什么。可是，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一时无从下笔。

“亲爱的娜塔莎，我无法在昨天和姐夫谈话之后，带着这样沉重的心情离开……”他开始写道。“下面写什么呢？请他原谅我昨天说的话？可那是我的心里话呀。他一定以为我放弃了自己的看法。再说，这是他干涉我的私事……不，不

能这么写。”于是，聂赫留朵夫心里又出现了对这个和他格格不入又自以为是的人的愤恨，他把没写完的信装进口袋，付过账，走到大街上，追赶队伍去了。

天气热得更厉害了。墙壁和石头仿佛在散发着热气。脚踩在滚热的路面上，给人一种烫伤的感觉。聂赫留朵夫的手碰到马车的油漆挡泥板，立即被烫了一下。

马无精打采地小步跑着，蹄子有节奏地踏在尘土飞扬、坑洼不平的路面上，吃力地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车夫不停地打着瞌睡；聂赫留朵夫坐在车上，漠然地望着前方，什么也不想。在一条街道下坡的地方，有一堆人和一个拿枪的押解兵站在一座大房子的门前。

“这是怎么啦？”他问一个管院子的人。

“有个男犯出了点事儿。”

聂赫留朵夫下了马车，向那堆人走去。在靠近人行道的坑洼不平的、倾斜的石头路面上，头朝坡下躺着一个不年轻的犯人，宽肩膀，红胡子，红脸膛，扁鼻子，穿着灰色囚袍和同样颜色的长裤。他仰面躺着，伸展双手，手心朝下，手背上满是斑点，厚实而强壮的胸脯均匀地起伏着，但间隔的时间很长，嘴里同时发出呼哧的声音，两眼充血，呆滞地望着天空。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紧皱眉头的警察、一个小贩、一个邮差、一

个店员、一个打伞的老妇和一个提着空篮子的光头男孩。

“坐牢坐的，身体虚了，太虚了，让他们在这么毒的太阳底下走路。”店员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语气像是责怪什么人。

“怕是要死了。”打伞的老妇声带哭腔地说。

“得把衬衫解开。”邮差说。

警察用颤抖的粗手指笨拙地去解犯人青筋毕露的红脖子上的带子。他显得非常激动和慌乱，不过还是没忘掉要对围观的人说点什么。

“围着干什么？天这么热。把风都挡住了。”

“得请个大夫检查检查。把有病的留下来。现在可好，把快死的人都拉出来了。”店员说，显然有意卖弄自己懂得办事的章程。

警察解开衬衫上的带子，站起来挺直身子，往四外打量了一眼。

“我说，你们都散开。不关你们的事，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转身向聂赫留朵夫寻求支持，可是从他的目光里没有看到支持的表情，又转向押解兵。

那个押解兵却站在一旁，只顾看自己磨歪了的鞋后跟，对警察的困难处境无动于衷。

“该管的人不管，这是哪门子事。把人活活折磨死啦，哪有这样的章程？”

“犯人是犯人，可也是人呀。”人群中有人

说。

“把头放高点儿，再给他点儿水喝。”聂赫留朵夫说。

“有人拿水去了。”警察回答，抓动犯人的腋下，吃力地把犯人的身体往高处拖了拖。

“为什么围这么多人？”突然响起一个强硬的、官味十足的声音，有个穿白得耀眼的制服和更加耀眼的长筒靴的警官，快步向这堆人走来。“散开！用不着站在这儿！”他对人群喊道，还没有看清为什么围着一群人。

待他走到跟前，看见那个要死的犯人，他赞许地点点头，好像早就料到这件事似的，对那个警察说：

“怎么回事？”

警察报告说，犯人的队伍走到这儿，有个犯人摔倒了，押解人员吩咐把他留下。

“这有什么？送分局。叫辆马车。”

“管院子的去了。”警察举手行礼，说。

店员刚要说天气热的事。

“关你什么事？啊？走你的路去吧。”警官说，狠狠瞪了他一眼，店员不吭声了。

“应当让他喝点儿水。”聂赫留朵夫说。

警官狠狠瞪了聂赫留朵夫一眼，不过什么也没说。等到管院子的取回一杯水，警官吩咐那个警察给犯人喝。警察托起犯人垂着的脑袋，想把

水倒进他的嘴里，可是犯人没有反应；水顺着胡子往下流，弄湿了外衣的前襟和满是尘土的亚麻衬衫。

“往头上浇！”警官命令道，于是警察摘下薄饼似的帽子，把水浇在犯人火红色的鬃发和秃顶上面。

犯人的眼睛好像害怕似的，睁得更大了，不过他的状况并没有变化。他的脸上流着沾了尘土的脏水，嘴巴还是那样均匀地呼呼哧哧，身体也还在不停地抽动。

“这不是马车吗？就用这辆，”警官指着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对警察说。“过来！喂，说你哪！”

“有客人了。”车夫眼睛也没抬，阴沉地说。

“这是我雇的车，”聂赫留朵夫说，“你们用吧。我付钱，”他对车夫补充了一句。

“喂，还等什么？”警官喊道。“快动手！”

警察、管院子的和押解兵抬起奄奄一息的犯人，送到马车那儿，放在座位上。可是犯人自己无法坐着：他的脑袋向后垂着，整个身子从座位上滑下来。

“让他躺着！”警官命令道。

“不要紧，长官，我就这样送他去吧。”警察说，紧挨着奄奄一息的犯人在座位上坐稳，用他那有力的右手从犯人的腋下搂住他的身体。

押解兵托起犯人光脚穿着囚鞋的双腿，放到驭座底下，并把它们拉直了。

警官四下扫了一眼，发现马路上犯人那顶薄饼似的帽子，拾起来，戴到犯人那向后垂着的湿淋淋的头上。

“走吧！”他命令道。

车夫生气地回头看了看，摇了摇头，在押解兵的陪随下，掉转马头，向警察分局驶去。和犯人坐在一起的警察，一路上紧拽着脑袋四下摇晃、身体一直往下滑的犯人不放。押解兵走在旁边，不时地把犯人的双腿放好。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走。

三十七

马车拉着犯人，来到分局，从站岗的消防队员身旁，驶进院子，停在一个房门的前面。

院子里有一些消防队员，挽着袖子，大声说笑着，刷洗几辆大车。

马车刚一停下，几个警察围了上来，从腋下抓住犯人没有知觉的身体和双脚，把他从被他们踩得嘎吱作响的马车上抬下来。

那个送犯人来的警察跳下马车，甩了甩发麻的胳膊，摘下帽子，画了个十字。死者被抬进门，沿着楼梯往上送。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

边。他们把死者抬进一个不大的脏房间，里面摆着四张床。有两张床上坐着两个穿睡袍的病人，一个歪着嘴，脖子上缠着绷带，另一个是害肺病的。还有两张床空着。死者放在其中的一张床上。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眼睛闪亮，眉毛不停地动弹，只穿着内衣和袜子，轻手轻脚地快步走到抬进来的犯人跟前，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又看了看聂赫留朵夫，接着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个被关在急诊室里的疯子。

“想吓唬我，”他说。“没门儿，办不到！”

一个警官和医士紧跟着抬死者的警察们走了进来。

医士走到死者跟前，摸了摸死者满是斑点的黄手，手还是软的，但已呈现出死人的惨白色，他握了一下，然后放开了。那只手毫无知觉地落在死人的肚子上。

“死了，”医士说，摇了摇头，不过显然为了例行程序，又解开死者湿淋淋的麻布衬衫，把自己的鬓发往身后撩了撩，耳朵贴在死者发黄的、一动不动的厚实胸膛上。大家都不出声。医士直起身子，又摇了摇头，用手指先翻了一下死者大睁着的呆然不动蓝眼睛的眼皮，接着又翻了一下另一个眼皮。

“别吓唬我，别吓唬我，”疯子说，一个劲儿地朝医士吐唾沫。

“怎么样？”警官问。

“怎么样？”医士重复说。“送太平间。”

“您仔细看看，真的死啦？”警官问。

“这不会错的，”医士说，不知为什么拉了拉衬衫，盖住死者裸露的胸膛。“那我叫人找一下马特维·伊万诺维奇，让他再看看。彼得罗夫，你去一趟，”医士说完，离开了死者。

“抬到太平间去吧，”警官说。“你到办公室来一下，签个字，”他对一直没有离开犯人的押解兵说。

“是。”押解兵回答。

几个警察抬起死者，又顺着楼梯往下走。聂赫留朵夫也想跟他们去，可是那个疯子拦住了他。

“您没和他们串通一气，那就给我一支烟吧。”他说。

聂赫留朵夫掏出一盒烟，给了他。疯子挑动着眉毛，说话速度很快，大讲他怎样受到暗示法的折磨。

“他们可是全跟我作对，找降神的家伙害我，折磨我……”

“对不起。”聂赫留朵夫说，不等听完他的话，走到院子里，想看看他们把死者送到哪里。

那几个警察已经抬着死者穿过院子，正进入地下室的门。聂赫留朵夫想走到他们那边去，可

是警官拦住了他。

“您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回答。

“没事儿，请您走开吧。”

聂赫留朵夫顺从地走回自己的马车。车夫正在打瞌睡。聂赫留朵夫把他叫醒，又向车站走去。

他还没有走出百步远，迎面又碰上一辆大车，由一名持枪的押解兵护送，车上也躺着一个犯人，看样子已经死了。那犯人仰面朝天躺着，留着黑胡子，剃去头发的脑袋上戴着薄饼似的帽子，那顶帽子已滑到鼻子尖上，大车每颠簸一次，他的脑袋就晃动和碰撞一下。车夫穿着肥大的靴子，走在车旁赶着马。大车后面跟着一个警察。聂赫留朵夫捅了捅自己车夫的肩膀。

“干的好事！”车夫说着，勒住马。

聂赫留朵夫下了车，跟在大车后面，又从站岗的那个消防队员身旁，进了分局的院子。这时，院子里的消防队员已经把大车冲刷完毕，他们原来干活的地方，站着又高又瘦的消防队长，戴着镶蓝帽圈的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仔细地察看消防队员牵着的一匹脖子肥壮的浅黄色公马。公马的一条前腿有点儿瘸，消防队长生气地对站在那儿的兽医说着什么。

警官也站在那儿。他看见又拉来一个死人，

就向大车走去。

“从哪儿拉来的？”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问。

“从老戈尔巴托夫大街。”警察回答。

“是犯人吗？”消防队长问。

“是。”

“今天这是第二个人。”警官说。

“哼，太不像话了！天气多热呀。”消防队长说完，转身对那个牵黄马的消防队员喊道：“牵到拐角那个单马栏里！你这狗崽子，看我不教训你，是你把它弄瘸了，那马比你这浑蛋还值钱呢。”

这个死者也像第一个那样，被几个警察抬下车，送到候诊室。聂赫留朵夫像中了催眠术似的，跟在他们后面。

“您有事吗？”一个警察问他。

他没有回答，径直朝送死人的地方走去。

疯子坐在床上，正贪婪地吸着聂赫留朵夫给他的香烟。

“啊，回来啦！”他说着，哈哈大笑。可是一看到死人，皱起了眉头。“又一个，”他说。“看够啦，我又不是孩子，对吧？”他带着疑问的笑容，对聂赫留朵夫说。

聂赫留朵夫这时看了看死者，现在没人围着他了，那张脸原来用帽子遮着，现在全露出来

了。刚才那个犯人长得很丑，这个犯人无论相貌和身材，都非常漂亮。这是个正当年轻力壮的人。尽管他的脑袋被剃去半边头发，样子难看，但那不高而饱满的前额和如今已毫无知觉的黑眼睛，却很漂亮，那不大的鹰钩鼻子和唇上细小的黑胡子也很漂亮。眼下已经发青的嘴唇做着笑的样子；脸的下半部长着一圈短短的胡子，剃光的那半边脸上露出一只不大、结实而漂亮的耳朵。脸上的表情既平静，又严肃，又善良。暂且不说从这张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大好的精神生活已被断送——仅从他的双手和戴着铁镣的双脚细小的骨骼和匀称的四肢上强壮的肌肉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出色、强健和灵巧的人类动物，就是作为一个动物，他在同类中也比那匹因受伤而惹得消防队长大为光火的浅黄色公马完美得多。可是，他被活活折磨死了，不仅没有谁把他当作人来可怜——也没有谁把他当作白白送命的会干活的动物来可怜。他的死在所有人的心里引起的惟一情感，是一种厌烦，一种因为必须要处理这具即将腐烂的尸体所带来的麻烦而引起的厌烦。

医师带着医士跟随警察分局长走进候诊室。医师是个壮实的矮个子，穿一件茧绸上衣和一条茧绸裤子，裤子紧裹着他那肌肉发达的大腿。分局长是个小胖子，有一张像皮球似的红脸，当他习惯性地吧空气吸进腮帮子，接着再慢慢地吐出

来的时候，他那张脸变得更圆了。医师坐在死者的床边，也像医士刚才做的那样，摸了摸死者的手，听了听心脏，然后站起来，提了一下自己的裤子。

“完全死了。”他说。

分局长吸了满满一嘴空气，又慢慢地吐了出来。

“是哪个监狱的？”他问押解兵。

押解兵回过话，提起死人腿上的脚镣。

“我叫人取下来；感谢上帝，我们有铁匠。”分局长说，又鼓起腮帮子，向门口走去，接着把气吐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聂赫留朵夫问医师。

医师从眼镜里瞧了瞧他。

“什么怎么回事？怎么会中暑死了吗？这很简单，整天坐着不活动，一冬天没见过阳光，突然走到太阳底下，像今天这么热的天，那么多人挤在一块儿走路，空气又不流通。这就中暑了。”

“那为什么还流放他们呢？”

“您去问他们吧。您是什么人？”

“我是过路人。”

“啊！……对不起，我没工夫。”医师说完，恼火地往下拉了拉裤子，走到病人的床前。

“喂，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那个脸色苍白、

脖子上缠着绷带的歪嘴病人。

疯子这时坐在自己的床上，不再吸烟，而是朝医师那边吐口水。

聂赫留朵夫从楼上走到院子里，从消防队的马、母鸡和戴铜盔的岗哨旁边走出大门，坐上车，叫醒车夫，又向火车站驶去。

三十八

等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所有的犯人已经坐在窗子上装有铁格子的车厢里。站台上有几个送行的人：不许他们靠近车厢。押解人员今天显得特别心烦。从监狱到车站的路上，除去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个人之外，还有三个人中暑死亡：一个像前两个一样，被送往附近的警察分局，另两个是在这儿，在车站上倒下的^[21]。押解人员心烦的不是因为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五个本来可以不死的人。这事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他们心烦的只是还得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把死者及其文件和物品送到有关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押送到下诺夫戈罗德的犯人名册中勾销，这些事办起来非常麻烦，尤其在这种鬼天气里。

押解人员正忙着办理这些事，所以在没有办理完毕之前，不许聂赫留朵夫等人走近车厢。不过，聂赫留朵夫还是走了过去，因为他给了押解

军士一些钱。这个军士放聂赫留朵夫进去，只是请他快点儿，说完话就离开，免得让长官看见。车厢一共有十八节，除去长官们的那节车厢之外，所有的车厢全塞满了犯人。聂赫留朵夫走过一节节车厢，留心听着里面的动静。每节车厢里都能听到镣铐声、忙乱声、说话声，其中夹杂着无聊的下流话，不过没有一节车厢谈论路上倒下的同伴，这使聂赫留朵夫感到意外。他们谈的更多的是行李、饮用水和挑选座位的事。聂赫留朵夫朝一节车厢的窗子里望了一眼，看见押解兵正在中间的过道上给犯人开手铐。犯人们伸出手，一个押解兵用钥匙打开手铐上的锁，然后取下手铐。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敛在一块儿。聂赫留朵夫走过所有男犯的车厢，来到女犯车厢跟前。第二节女犯车厢里传出一个女人均匀的呻吟声，其中还有说话声：“哎哟哟，老天爷！哎哟哟，老天爷！”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按一个押解兵的指点，来到第三节车厢的窗子前。聂赫留朵夫刚把头凑近窗子，里面立即涌出一股充满人体汗臭味的热气，同时还清楚地听到女人们尖细的说话声。所有的座位上都坐满了脸色通红、汗水淋漓的女人，她们穿着囚袍和短上衣，大声说着话。聂赫留朵夫的脸凑到铁格上，引起了她们的注意。近处的几个女人不说话了，靠了过来。玛丝

洛娃只穿短上衣，没系头巾，坐在对面的窗旁。坐在离这边近一点儿的是肤色白皙、正在微笑的费多西娅。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捅了捅玛丝洛娃，用手指指窗子。玛丝洛娃急忙站起身，把头巾往黑头发上一披，红润而汗津津的脸上浮现出愉快的笑容，走到窗前，抓住铁格子。

“真热呀。”她说，高兴地笑了笑。

“收到东西啦？”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感到从热烘烘的车厢里冒出的热气，就像从蒸汽浴室里冒出的热气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弄点儿水来就好了。”费多西娅说。

“对，弄点儿水就好了。”玛丝洛娃重复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

“送来着，都喝光了。”

“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向押解兵要去。现在我们到下诺夫戈罗德之前见不到面了。”

“你真要去吗？”玛丝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事似的，高兴地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趟火车走。”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几秒钟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怎么回事儿，老爷，有十二个犯人被折腾死了，是真的吗？”一个表情严肃的老年女犯用男人般的粗嗓门说。

这是科拉布列娃。

“我没听说有十二个。我看见了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都说是十二个。他们干出这种事，就没人管？真是魔鬼呀。”

“妇女当中没人得病吧？”聂赫留朵夫问。

“女人身板结实点儿，”另一个矮个儿女犯笑着说，“只是有一个要生孩子。您听，她正在哼哼呢，”她说，指了指隔壁的车厢，从那里传来的正是刚才的呻吟声。

“您不是说还需要什么吗，”玛丝洛娃说，强抿住嘴唇，不让快乐的笑容露出来，“能不能让那个女人留下，要不然她可要遭罪了。您去跟当官的说说吧。”

“好，我去说。”

“还有，能不能让她见见自己的丈夫塔拉斯，”她又补充说，用眼光指了指正在笑的费多西娅。“他可是跟您一起走呢。”

“先生，不能和犯人讲话。”一个押解军士说。这不是放聂赫留朵夫进来的那个军士。

聂赫留朵夫离开车厢，去找押解官，以便为要生孩子的女人和塔拉斯说说情，可是好久没能

找到他，从押解兵那里也打听不出什么来。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一些人押着一名犯人去什么地方，另一些人跑着给自己买食物，把自己的行李放到车厢里，还有一些人在伺候随押解官一起走的太太，所以全都不乐意回答聂赫留朵夫的问题。

聂赫留朵夫看到押解官时，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押解官用他的短手擦拭盖住嘴巴的小胡子，耸着肩膀，正为什么事训斥司务长。

“您到底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

“你们车上有个女人要生孩子，我想是不是……”

“那就让她生好啦。到时候再说。”押解官说完，麻利地摆动着他的短胳膊，走向自己的车厢。

这时候，列车长手里拿着哨子走过来；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声响起，站台上和女犯车厢里传出一片哭叫声。聂赫留朵夫同塔拉斯一起站在站台上，注视着一节节装有铁格窗和车窗里露出的剃去半边头发的男犯的脑袋的车厢，从身旁驶过。然后过去的是第一节女犯车厢，车窗里可以看见披散着头发和扎着头巾的女犯；然后是第二节车厢，那个女人的呻吟声还能听到；再后是玛丝洛娃的那节车厢。她和其他女犯站在窗前，望着聂赫留朵夫，凄楚地对他笑着。

三十九

聂赫留朵夫乘坐的那趟旅客列车，还有两个小时才开车。聂赫留朵夫起初想利用这段时间再去姐姐那儿一次，可是现在，经历了上午的这些事情之后，他感到身心疲惫，打不起精神，往头等车候车室的沙发上一坐，顿觉睡意袭来，于是侧转身子，把手掌垫在腮下，立即睡着了。

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戴着证章、手里托着餐巾的茶房把他唤醒。

“先生，先生，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吗？有位太太找您。”

聂赫留朵夫一下站起来，揉了揉眼睛，这才记起他在哪里，想起今天早晨发生的所有事情。

他满脑子里全是刚才发生的事：犯人的队伍，死人，带铁格窗的车厢和关在车厢里的妇女，其中有一个正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忍受着临产的痛苦，另一个从铁格子里对他凄楚地微笑。而眼前的情景却是另一种样子：摆满酒瓶、花瓶、烛台和餐具的桌子，围着桌子转悠的动作麻利的茶房。在候车室的另一端有一个食品部，一个侍者手拿水果盘和酒在忙活，几个走过去的旅客，背朝外站在那里。

这个时候，聂赫留朵夫已从卧姿变为坐姿，头脑也清醒了许多，他发现候车室所有的人正好

奇地望着门外。他往那儿看了看，看见走来一帮人，用圈椅抬着一位蒙面纱的太太。前面抬椅子的是个仆人，聂赫留朵夫觉得有些面熟。后面那个帽子上镶金绦的看门人，也是个熟面孔。圈椅后边跟着一个体态优美的侍女，头发髻曲，系着围裙，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几把小伞和一个装在皮套里的圆乎乎的东西。跟在后边的还有生着厚嘴唇和易中风脖子的科察金公爵，挺着胸脯，头上戴着旅行帽，再后面是米西，米西的表哥米沙，还有聂赫留朵夫认识的外交官奥斯登，伸着细长的脖子，喉结突出，内心和外表总是那么快活。他边走，边起劲儿地对面带笑容的米西说着什么，不过显然带有开玩笑的味道。最后边是医生，一脸怒气地吸着烟。

科察金一家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位于下诺夫戈罗德庄园里去。

抬圈椅的仆人、侍女和医生组成的队伍，鱼贯而行，直奔女客候车室，引起了所有在场人的好奇和尊敬。老公爵在桌旁坐下，立即把茶房叫过来点菜。米西和奥斯登也在餐厅停住脚步，正要坐下，忽然看见门口有一个熟识的女人，就迎了上去。这个熟识的女人是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在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的陪伴下，一边往餐厅里走，一边朝四下张望。她几乎同时看到了米西和弟弟。她先走向米

西，只是对聂赫留朵夫点了点头；不过，她和米西互吻之后，立即转向他。

“我可找到你啦。”她说。

聂赫留朵夫站起来，跟米西、米沙和奥斯登打过招呼，站在那儿同他们聊天。米西对他说他们在乡下的房子着了火，不得不搬到姨妈家去。奥斯登乘机讲起一个有关火灾的笑话。

聂赫留朵夫没有听奥斯登的笑语，转身对姐姐说：

“我很高兴，你能来这儿。”他说。

“我早就来了，”她说。“我和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一块儿来的。”她指了指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女管家戴顶女帽，披着雨披，带着亲热而稳重的神情，不好意思地从远处向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不愿意过来打搅他。“我们到处找你。”

“我在这儿睡着了。你来了，我真高兴，”聂赫留朵夫重复说。“我给你写信来着，”他说。

“真的？”她有点儿害怕地说。“什么事？”

米西和她的男伴发现姐弟俩谈起私事，知趣地走开了。聂赫留朵夫和姐姐在靠窗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来，紧挨着沙发上放着的别人的行李、毛毯和帽盒。

“我昨天从你们那儿出来后，本想再回去赔个不是，可是不知道他会怎么看，”聂赫留朵夫

说。“我和你丈夫话不投机，这让我心里很难受，”他说。

“我知道，我相信，”姐姐说，“你不是有意的。可是你要知道……”

泪水一下涌上了她的双眼，她碰了碰他的手。她这句话说得并不明确，可是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为她的真情所感动。她的意思是说，除了对丈夫的挚爱之外，她心中对弟弟的热爱也是十分重要和宝贵的，因此他们之间出现任何不和，对她都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谢谢，谢谢你……唉，今天我看见的是些什么事呀，”他说，忽然想起第二个死去的犯人。“两个犯人被害死了。”

“怎么害死的？”

“就这么害死的。这么热的天，押他们上路。有两个人中暑死了。”

“不可能！怎么会？今天？刚才？”

“对，就是刚才。我看见他们的尸体了。”

“可为什么害死他们呢？谁害死的？”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说。

“害死他们的人，就是那些强押他们出来的人。”聂赫留朵夫气愤地说，觉得她是在用她丈夫的眼光看待这件事。

“哎呀，我的上帝！”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走到他们跟前，说。

“是的，我们一点也不清楚这些不幸的人的遭遇，但是我们应当了解这一切，”聂赫留朵夫补充说，同时向老公爵那边看了看，老公爵已系好餐巾，坐在放着一瓶混合酒的桌旁，这时正巧回头瞧了一眼聂赫留朵夫。

“聂赫留朵夫！”他喊了一声，“要不要来点儿冷饮？上路前喝点儿再好不过了！”

聂赫留朵夫谢绝后，又转过身来。

“你打算怎么办呢？”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继续说。

“尽我所能吧。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应当做点儿什么。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去做。”

“是的，是的，这我明白。不过，跟这家人，”她说，笑着用眼睛指了指科察金，“难道真的全结束啦？”

“全结束了，我想，双方都不会觉得遗憾的。”

“可惜。我觉得可惜。我喜欢她。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她小心翼翼地补充说。“你为什么跟着去呢？”

“我去，是因为应当去。”聂赫留朵夫严肃而冷淡地说，仿佛不愿意谈这个话题似的。

可是，他马上因自己对姐姐的冷淡态度而感到惭愧。“为什么不把我心里的话全告诉她呢？”他想。“让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听听也

好。”他瞧了一眼老女仆，对自己说。有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在场，这对聂赫留朵夫也是一种鼓励，他要把自己的决定再对姐姐说一遍。

“你说的是我想和卡秋莎结婚的事吧？你瞧，我决心这么做，可是她却一口拒绝了，”他说，声音有些颤抖，每次谈起这件事，他总是这样。“她不想让我作出牺牲，她想牺牲她自己，从她的情况来说，她牺牲得太多了，我不能接受这种牺牲，如果这种牺牲是一时冲动的话。所以，我跟她走，她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还要尽最大可能帮助她，减轻她的痛苦。”

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什么也没有说。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用疑惑不解的眼光看着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摇了摇头。这时，那帮人又从女客候车室走出来。还是由那个漂亮的仆人菲利浦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她吩咐他们停下，朝聂赫留朵夫招了招手，要他过去，然后露出一副疲惫不堪的可怜样子，向他伸出一只戴满宝石戒指的白手，恐惧地等着被他有力地握一下。

“太可怕啦！”她说，议论起炎热的天气。“我受不了啦。这种天气真要我的命。”她谈过俄罗斯气候的可怕和邀请聂赫留朵夫上他们那儿做客之后，向抬圈椅的下人打了个手势。“那您可一定来呀。”她从抬着走起来的圈椅上转过她那张长脸，对聂赫留朵夫补充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来到站台上。公爵夫人那帮人往右边头等车厢的方向去了。聂赫留朵夫和行李工及自己拿着行李的塔拉斯，朝左边走去。

“瞧，这就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他的遭遇他以前告诉过她。

“你坐的是三等车厢？”当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前面站住，行李工搬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进了车厢，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问道。

“我和塔拉斯在一起，这样更方便些，”他说。“对了，还有一件事，”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把库兹明的土地交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的孩子们继承。”

“德米特里，别说啦。”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说。

“就算我把土地交出去，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也由他们继承，因为我不一定结婚，就是结婚，也不会要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不要说这种话，求求你啦。”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见，她听到这些话显得很高兴。

前面头等车厢那边，站着一小堆人，仍旧在看公爵夫人被抬进去的那节车厢。其余的人都已经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迟到的乘客踩着站台的木板咚咚地跑来，列车员砰砰地关着车门，请没坐下的乘客坐下，送行的人下车。

聂赫留朵夫走进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的车厢，立即又出来，走到车厢后面的刹车台上。

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戴着时髦的女帽，披着披肩，和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站在车厢旁边，显然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甚至连“写信来呀”也不能说，因为她和弟弟早就嘲笑过送行的人老爱挂在嘴上的这句话。那次短暂的关于财产和继承问题的谈话，一下子破坏了他们之间原有的手足亲情；他们现在觉得彼此生疏了。所以，当火车开动时，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心里有一种高兴的感觉，她只是对弟弟点点头，忧伤而亲切地说：“再见，嗯，再见啦，德米特里！”可是，等这节车厢刚一离开，她就想到了该如何把她和弟弟的谈话告诉丈夫的事，于是她的脸上出现了严肃而忧虑的神情。

聂赫留朵夫呢，尽管和姐姐一向十分亲近，有事从不瞒她，现在和她在一起却觉得难受和别

扭，想快点离开她。他感到，当年那个和他亲密无间的姐姐已不复存在，她如今成了那个同他格格不入、令人讨厌、皮肤很黑而且毛发很多的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只是在他说起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把土地交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的事的时候，她的脸色才特别兴奋起来。这一点很让他伤心。

四十

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坐上了不少人，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没进车厢，仍旧留在刹车平台上。不过，这里也闷得难受，直到火车从房屋群中开出去，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深深地吸进一口新鲜空气。“是，给害死了。”他把对姐姐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在他的脑海里，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从今天的所有印象中异常清晰地浮现出来，那嘴唇上挂着的微笑、额头上的严峻神情、剃得发青的半边脑壳下那只不大的结实的耳朵，仿佛就在眼前。最可怕的，就是他被害死了，却没人知道是谁把他害死的。确确实实是被害死的。他和所有的犯人一样，是依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上路的。马斯连尼科夫大概也和平常一样，发布了一道普普通通的命令，并在印

好抬头的公文纸上签上他那难看的签名，自然不会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那个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师更不会认为自己负有责任。他十分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把病弱体虚的犯人剔了出去，而且也不会料到天气热得这么厉害，犯人这么迟才被押出来，这么多人又挤在一起。监狱长呢？……监狱长不过是执行命令上的要求，在某天把若干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押解上路罢了。押解官也不能负有责任，他的职责就是按名册在哪里接收多少犯人，又到哪里交出多少犯人。他同往常一样，照规矩押送犯人上路，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强壮的人，比如像聂赫留朵夫见到的那两个人，竟会经不住折腾，一命呜呼了。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害死了，而且就是这些对犯人的死没有责任的人给害死的。

“这种事情所以会发生，”聂赫留朵夫想，“那是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监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么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无须保持人的关系。要知道，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罢，监狱长也罢，押解官也罢，假如他们不是省长、监狱长和押解官，他们准会考虑上二十次，要不要在这么天热的天，押送这么多人一块上路，上路以后，也会在途中停下来休息二十次，而且看到有人走不动，气喘吁吁，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

他到阴凉地方去休息一下，给他点儿水喝，如果发生了不幸的事，也会表示同情的。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反而不让别人这么做，无非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眼前这些人看作人，也没有看到应对他们负有责任，而看到的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官职和官职的准则，他们把这些东西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如果承认没有任何东西比仁爱之心更重要，哪怕只承认一个小时，或者哪怕只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才承认，那就不会存在这种罪行，即使对人犯下这种罪行，也不会认为自己不负任何责任。”

聂赫留朵夫一心只顾思考问题，竟然没有发现天气起了变化：太阳被先过来的几块低垂的散云遮住，西方天边还有一大片浅灰色的浓云渐渐涌来，远处的田野和树林的上空已经下起了密集的斜雨。乌云带来潮湿的雨气。闪电不时把乌云划破，车厢的隆隆声和隆隆的雷声越来越频繁地混合在一起。乌云越来越近了，斜落的雨点被风吹进刹车平台和聂赫留朵夫的大衣上。他走到平台的另一侧，呼吸着湿润的新鲜空气和久盼雨水土地上庄稼的气息，望着从车旁掠过的果园、树林、发黄的黑麦地、依然呈绿色的燕麦地和开着深绿色土豆花的黑黑的田垄。所有的东西都仿佛罩了一遍漆：绿的更绿了，黄的更黄了，黑的更

黑了。

“下吧，下吧！”聂赫留朵夫说，高兴地看着田野、果园和菜园在这场好雨下露出的勃勃生机。

大雨并未下多久。乌云一部分变作雨水倾泻下来，一部分随风飘了过去，湿漉漉的地面上落下的只是最后一阵垂直的、密密的雨丝。太阳又露了出来，周围的一切闪闪发亮，东方天边上出现了一道彩虹，位置不高，但色彩鲜艳，紫色十分突出，只是有一端若有若无。

“哦，刚才我想什么来着？”聂赫留朵夫自己问自己，这时大自然中发生的变化已经结束，火车正驶入一个两壁又高又陡的凹沟。“对了，我想的是，所有这些人：监狱长、押解官，所有这些担任官职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些温厚、善良的人，他们之所以变得这么凶恶，就是因为他们担任了公职。”

他回想起对马斯连尼科夫讲监狱里的情况时，他表现出的冷漠神情，回想起监狱长的冷酷和押解官的残忍，押解官竟然不准许病弱犯人坐大车，对火车里那个备受临产痛苦折磨的女犯，完全无动于衷。“所有这些人，显然连起码的一点同情之心也没有，就是因为他们担任了公职。他们一旦有了官职，仁爱之心就渗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就像这石头砌的坡面渗不进雨水一

样，”聂赫留朵夫望着凹沟两壁用杂色石头砌成的坡面，见雨水渗不进去，而是顺着坡面流下来，想。“也许，这凹沟需要砌上石头，不过，看着这本可以像沟顶上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的土地，如今却失去了生长力，不免让人伤心。人也同样如此，”聂赫留朵夫想，“也许，这些省长、监狱长、警察之类的人是需要的，可是看见这些丧失了人的主要品质——友爱与怜悯的人，却让人感到可怕。”

“问题的关键在于，”聂赫留朵夫想，“这些人把不能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手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法律为法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和这些人相处是件痛苦的事，”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害怕他们。真的，这些人真的很可怕。比强盗还要可怕。强盗尚且具有怜悯之心，这些人连怜悯之心也没有：他们就像石头和草不搭边一样，和怜悯之心也不搭边。他们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大家都说，普加乔夫、拉辛[【22】](#)之类的人十分可怕。这些人要比他们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假如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怎样才能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仁慈的人、善良的人，做出最可怕的兽行而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那么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要维护现存的一切，要让这些人当他们的省长、监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

第一，要他们相信，有一种叫做国家公职的事情，从事这种事情，可以把人当物品看待，不必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第二，要让这些国家公职人员相互联系，唇齿相依，以便无论他们对人做出什么事情，责任都不由一个人单独承担。没有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个时代就绝对不会做出像我今天看到的这么可怕的事。整个问题就在于，人们总以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用仁爱之心待人，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对待物品可以不用仁爱之心：砍树、制砖、打铁，做这些事情用不着仁爱；可是对待人，却不能不用仁爱之心，就像对待蜜蜂不能不小心一样。蜜蜂的本性就是这样。如果你对它们不加小心，那么你既伤害蜜蜂，同时又伤害自己。对待人也同样如此。而且不能不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不错，人无法像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就说，可以不用仁爱之心待人，特别是如果你对人有所求的话。当你感觉不到对人的这种爱心的时候，那就老实地坐着好啦，”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尽管去关心自己，料理自己的东西，只是不要去和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了想吃东西的时候，吃东西才会是有益无害的，与人交往的道理也是一样，只有你喜欢这么做的时候，这种交往才会是无害而有益的。只要你能容忍自

己毫无爱心地去对待他人，就像你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我见到的那种对别人的残忍和野兽般的行径，就会没有极限，而且自己所受的痛苦，也会没有极限，我在自己的一生中对此深有体会。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这太好啦，太好啦！”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一种双重的喜悦：一是酷热之后感到凉爽，二是很久以来困扰他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乘坐的那节车厢，只有一半旅客。他们当中有仆人、手工匠人、工厂工人、肉铺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位太太：一位年纪很轻，另一位上了些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手镯，另外还有一位表情严峻的先生，黑色的制帽上佩着帽徽。所有这些人已经找到自己的座位，安下心来，静静坐在位子上，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在和邻座兴奋地聊天。

塔拉斯满腔快活地坐在过道的右边，替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也在兴奋地和对面的人聊天。这个人肌肉发达，穿一件敞着扣的粗呢长外衣。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一个花匠，

要到上班的地方去。聂赫留朵夫还没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过道上一个样子可敬的白胡子老人的位子旁停住脚步。老人穿着土布长外衣，正和一个乡下人装束的年轻女人谈话。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女孩，穿一件新的无袖连衣裙，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发辫，两脚晃摇着够不到地面，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看了一眼聂赫留朵夫，往身下掖了掖长外衣的下摆，指着他人坐的光亮亮的长椅，亲热地说：

“请坐下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让出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刚坐好，那个女人又继续讲她的话。她说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是从丈夫那儿回乡下去。

“谢肉节【23】的时候我去过一次，这不，托上帝的福，现在又去了一次，”她说。“现在，愿上帝保佑，圣诞节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眼睛看着聂赫留朵夫，说，“应当常去看看，要不年轻人住在城里，会染上坏毛病的。”

“不会的，老大爷，我那位可不是这号儿人。他像个大姑娘，什么胡来的事跟他都不沾边儿。钱一个不剩地寄回家。他就是喜欢女儿，喜欢得没法说。”女人笑着说。

边嗑葵花子边听母亲讲话的小女孩，仿佛要

证实母亲的话似的，用平静而聪明的眼睛看了看老人和聂赫留朵夫的脸。

“要是个聪明的人，那再好不过，”老人说。“他也不好那东西吗？”他补充说，眼睛指着坐在过道另一侧的一对夫妻，他们显然是工厂的工人。

那个当工人的丈夫把一个酒瓶对着嘴，仰起头，正大口地喝着伏特加；妻子手里拿着装酒瓶的袋子，两眼紧盯着丈夫。

“不，我那位不喝酒，也不吸烟，”同老人说话的女人说，趁机又夸奖起丈夫。“像他那样好的人，老大爷，真是世上少有呢。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也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不过啦。”老人瞧着那个喝酒的工人，重复说。

工人喝了几口，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拿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凑到嘴上。

工人发现聂赫留朵夫和老人看着他，转身对他们说：

“怎么啦，老爷？我们喝点儿酒又怎么啦？我们干活儿的时候，谁也看不见，现在喝点儿酒，就都看见了。我挣了钱，喝几口酒，也让老婆喝两口。这有什么好说的。”

“是的，是的。”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如何回答。

“对吧，老爷？我老婆可是个靠得住的女人！我对老婆很满意，因为她知道疼人。我说得对吧，玛芙拉？”

“好啦，给你，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说着，把瓶子递给他。“你胡扯什么呀。”她又加上一句。

“瞧，她老这样，”工人继续说，“一会儿好，一会儿吱吱喳喳，像没上油的大车。玛芙拉，我说得对吧？”

玛芙拉笑着，略带几分醉意地摆了摆手。

“得啦，又瞎扯……”

“瞧，老是这样子，好是好，就是长不了，一发牛脾气，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说的是实话。请您，老爷，多包涵点儿。我多喝了两口，唉，有什么办法呀……”工人说完，便脑袋枕在笑个不停的妻子的膝盖上，躺下睡了。

聂赫留朵夫和老人坐了一会儿。老人对他讲起自己的身世，说他是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了，一生砌的炉子无数，如今打算歇歇了，可总没得工夫。这次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点儿事，现在回乡下看望家里人。听完老人的话，聂赫留朵夫站起身，朝塔拉斯给他留的位子走去。

“好吧，老爷，您请坐。我们把东西往这儿挪挪。”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头看了看聂赫留朵夫，亲热地说。

“宁愿挨挤，也不愿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的声音说，接着用那双强有力的双手，像拿一根羽毛似的，把两普特重的行李袋提起来，放到窗口。“位子很多，要不站着也行，钻到位子底下也行啊。这儿可真安静。想吵架也吵不起来呀！”他一脸忠厚，语气亲热地说。

塔拉斯讲起自己，说他这人不喝酒没话说，一喝酒就说个没完，什么都说。的确，当他不喝酒时，大多不怎么说话；可是，当他喝过酒之后，尽管他难得喝酒，而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喝，就变得特别喜欢说话。这时候他的话又多又好，非常朴实，也非常真诚，而更主要的，是非常亲切，这种亲切的感觉从他善良的蓝眼睛和彬彬有礼的笑容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他今天正处在这样的状态里。聂赫留朵夫一来，打断了他的话。可是，等他放好行李袋，又像先前那样坐下，把两只有力的、干惯活儿的手放到膝盖上，直盯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话。他向这位新结识的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的事，讲她为什么遭到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着她去西伯利亚。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详细经过，因此很感兴趣地听了下去。他正赶上他讲下毒的事发生后，家里的人也就知道了这是费多西娅干的。

“我这是在讲自己的伤心事呀，”塔拉斯像对老朋友一样亲切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上了一个知心的朋友，我们谈得很好，我就讲讲我的事。”

“是的，是的。”聂赫留朵夫说。

“喂，老哥，这事儿是这样弄清楚的。我妈拿起那块饼。‘我去’她说，‘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人。‘慢点儿’他说，‘老婆子，这小媳妇完全是个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应当可怜她才是。她没准会明白的。’不管用啊，我妈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要是把她留下，’她说，‘她会把我们像蟑螂一样都毒死的。’老哥哟，她一下就去报警啦。那个警察马上冲进我们家……马上就找证人。”

“那你当时怎么着了？”花匠问。

“我吗，老兄，肚子疼得直打滚儿，还一个劲儿地吐呢。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啦，话也讲不出来了。我爹马上套了辆车，拉上费多西娅，去了警察局，又从那儿去了侦讯官那里。她可是，我的老兄，一下全招认了，把事情原原本本全告诉了侦讯官。从哪儿弄到的砒霜，怎么掺到饼里。侦讯官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她说：‘因为他让我讨厌。我宁可去西伯利亚，也不跟他过。’她是说不愿意和我过啦，”塔拉斯笑着说。“这就是说，她全招啦。这不，关进监狱

了。我老爹一个人回来了。眼看农忙季节到啦，我家里就剩下我妈一个女人，她身体又不好。我们想，怎么办好呢，能不能保她出来。老爹去找了一个长官，不行，又找另一个。他一共找了五个当官的。我们已经不打算再找了，没想到碰上了一个当小官的。那可是个少见的机灵鬼。他说：‘给五个卢布，我把她保出来。’最后讲定给三个卢布。这也好办，老哥，我把她织的布押出去换了钱，给了他。他在公文纸上这么一写，”塔拉斯拉长声音，像形容放枪似的，“刷地一下就写好了。我当时能下地走动了，赶车去城里接她。我的老哥，我到了城里。我把那匹母马往大车店里一拴，拿上公文，就去了监狱。‘你有什么事？’我这么这么一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儿。‘有公文吗？’我一下把公文递上去。他看了眼，说：‘等着。’我坐在那儿的长凳上。太阳已经歪了。一个当官的走出来说：‘你是瓦尔古肖夫吗？’‘我是。’‘好啦，接走吧。’大门一下子打开了。她被带出来，还穿那身衣服，整整齐齐的。‘行啦，我们走吧。’‘你是走着来的？’‘不，我赶车来的。’我们来到大车店，我付了账，套上车，把吃剩的草料铺到车上，再盖一块麻布。她坐上去，扎好头巾。我们赶着车走了。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快到家了，她才说：‘怎么样，妈妈好吗？’我说：‘好。’‘爹呢？’‘也好。’‘塔拉

斯，请你原谅我干的蠢事。我自己也不知道都干了什么。’我说：‘别说这些了，我早就原谅啦。’我再也没说什么。到家后，她马上给我妈跪下。我妈说：‘上帝会宽恕你的。’老爹打过招呼，说：‘过去的事儿不提啦。好好过日子吧。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地里的庄稼该收了。斯科罗德内那边儿，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托上帝的福，黑麦长得可真不赖，都下不去镰刀啦，全连在一起，倒在地上了。该割啦。你明天就和塔拉斯去割麦子吧。’从那时候起，我的老哥，她就干起活儿来了。干活那个卖劲，真让人吃惊。当时，我家租了三俄亩地，托上帝的福，黑麦，还有燕麦，长得出奇的好。我割，她捆，有时还两人一块儿割。我很会干活，什么都难不住我这双手，她比我更会干活，不管干什么都很利落。她是个伶俐的女人，正是年轻力壮的好时候。她干活呀，我的老兄，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慢点儿。回家后，手指头都肿了，胳膊也疼，该歇一歇了，可是她晚饭也不吃，跑进板棚，搓第二天要用的草绳。全变啦！”

“怎么样，对你也亲热起来了？”花匠问。

“那还用说，她跟我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心里想什么，她全都知道。我妈本来挺生气的，可她也说：‘咱们的费多西娅像是换了个人，全变样儿啦。’有一次，我们赶着两辆车去拉麦

捆，我和她坐在前面那辆车上。我说：‘费多西娅，你怎么想起干那件事的？’她说：‘怎么想起的，不愿和你过了呗。我当时想，宁可去死，也不过啦。’“那现在呢？”我说。‘现在呀，你在我心里呀。’”塔拉斯停下不说了，高兴地笑着，惊讶地摇了摇头。“我们刚收完地里的庄稼，我要去泡一下麻绳，回到家里，”他沉默片刻，继续说，“一看，传票来了，要去受审。可是我们早把那件事忘了，也忘了要受审的事。”

“没别的，准是恶鬼附身，”花匠说，“要不一个人好好的，怎么会想到害死别人呢？我们那儿也有这么一个人……”花匠刚说到这里，火车渐渐停了下来。

“好像是一站，”他说，“去喝点什么。”

谈话就此中断，聂赫留朵夫也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四十二

聂赫留朵夫还没走出车厢，就发现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套着三匹或四匹肥壮的骏马，马脖子上挂着响铃。等他走到被雨淋得发黑的湿漉漉的站台上，看见头等车厢前面站着一堆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头戴插着珍贵羽毛的帽子，肩披雨披；另一

个是细长腿的高个儿年轻人，身穿自行车服装，牵着一只硕大的肥狗，狗脖子上套着贵重的项圈。他们后面站着几个拿雨衣、雨伞的仆人，还有一个车夫，都是来接客人的。这一堆人，从胖太太到一只手提着长衣下摆的马车夫，无不带着安然自信的神气和衣食优裕的标记。在这堆人的四周，立即围上了一圈好奇而又贪慕富贵的人：戴红制帽的站长，一名宪兵，一个身穿俄罗斯服装、戴着珠串项链、夏天里每逢火车到站必在场的瘦个姑娘，一个电报员和几个乘客：有男人也有女人。

聂赫留朵夫认出那个牵狗的年轻人是上中学的科察金少爷。那个胖太太是公爵夫人的姐姐，科察金一家就是搬到她的庄园去住的。列车长穿着耀眼的镶金绦的制服和皮靴，打开车厢的门，毕恭毕敬地把着它，直到飞利浦和系白围裙的搬运工小心翼翼地用那把折叠圈椅把长脸的公爵夫人抬下车；两姐妹相互问好，用法语商量公爵夫人是坐轿式马车还是篷式马车，然后这支队伍以手持小伞和伞套的髻发侍女殿后，缓缓向车站的门口走去。

聂赫留朵夫不愿意碰上他们，免得再次告别，没到门口就站住了，等整个队伍走过去。公爵夫人和儿子、米西、医生、侍女一个接一个地先走了出去，老公爵和妻姐留在后边，聂赫留朵

夫没有靠近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他们用法语交谈的几句话。其中公爵说的一句话，不知怎的，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连同他的腔调和声音，一下子印在聂赫留朵夫的脑海中。

“噢！他可真称得上是个上等人，真正的上等人，”公爵用他那洪亮而自信的声音说着什么人，并在毕恭毕敬的列车员和脚夫们的簇拥下，同妻姐一起走出车站。

这个时候，车站拐角处出现了一帮不知从哪儿来到站台上的工人，脚上穿着树皮鞋，背上背着短皮袄和行李。工人们迈着坚定而轻快的步子走到最近的一节车厢前，想上去，可是立即被列车员赶走了。他们没有停下，急急忙忙、你踩我我踩你地往前走到旁边的一节车厢，背上的行李刮碰着车角和车门，挤挤插插往车上钻，这时另一个列车员从车站门口那儿看见他们要上车，厉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们赶忙从车上下来，又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子向下面的另一节车厢，也就是聂赫留朵夫坐的那节车厢走去。列车员又把他们拦住。他们没有上车，打算继续向前走，可是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们，车上有空位子，叫他们上去。他们听了他的话，聂赫留朵夫也跟着他们走进车厢。工人们刚想找地方坐下，可是那个帽子上有帽徽的先生和那两位太太，却认为他们胆敢坐这节车厢是对他们的人身侮辱，

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开始轰他们下车。这群工人——他们有二十人左右——有年老的，有十分年轻的，个个面带倦容，又黑又瘦，马上又穿过车厢往前走，背上的行李刮碰着坐椅、车壁和车门，显然觉得全是他们错了，显然准备走到任何地方，让他们坐哪儿都行，哪怕坐到钉子上也不在乎。

“往哪儿闯，浑蛋！就在这儿找位子坐下。”另一个迎着他们走来的列车员喊道。

“真新鲜！”两位太太中年轻的那个说，自信她那口流利的法语定能引起聂赫留朵夫的关注。戴手镯的那位太太只是不停地嗅来嗅去，皱着眉头唠唠叨叨，说什么跟这些臭气烘烘的乡巴佬坐在一起，真让人心情愉快得很呢。

工人们却像躲过一场灾难似的，感到高兴和轻松，于是停住脚步，纷纷找到位子，肩膀一抖，从背上放下沉重的行李，塞进坐椅底下。

和塔拉斯聊天的花匠坐的不是自己的位子，起身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因此塔拉斯的旁边和对面空出三个座位。有三个工人坐到了这些位子上，可是当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时，他那身老爷的装束让他们惊慌不安，他们站起来想走开，聂赫留朵夫要他们尽管坐着，自己在坐椅靠过道的扶手上坐下来。

两个工人中一个五十岁模样的人，疑惑不解

甚至有些害怕地和年纪轻的那个交换了一下眼色。聂赫留朵夫没有摆出老爷的架子骂他们，赶他们走，反而给他们让座位，这一点让他们感到非常吃惊和不知所措。他们甚至担心这会引出对他们不利的后果。可是，他们稍后看出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圈套，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谈话也很随便，就放下心来，并让那个小伙子坐到行李上，请聂赫留朵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来。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的上年纪的工人，起初蜷缩着身子，尽量把穿树皮鞋的双脚往后挪，免得碰到老爷，可是后来却十分热乎地跟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聊起来，当他想让聂赫留朵夫特别注意他讲的什么话时，还用手背拍拍他的膝盖。他讲他的情况，讲他们在泥炭田里干活，干了两个半月，现在带着挣到的钱回家，每人有十卢布，因为有一部分工钱在他们受雇时提前支用了。照他所说，他们是在没膝深的水中干活儿，从日出干到日落，中间只有吃午饭在内的两个小时休息时间。

“那些没干惯的人，自然觉得很苦，”他说，“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就是伙食得真正像那么回事。起初伙食可不好。后来大伙全都抱怨，伙食就好起来了，干活也觉得轻松了。”

然后，他说他二十八年来一直到处做工，挣的钱全都寄回家，起先寄给父亲，后来寄给大哥，现在寄给当家的侄子，每年挣五六十卢布，

他自己只零用两三个卢布：买烟草和火柴。

“有时候累了，也喝两口酒，罪过呀。”他补充说，惭愧地笑了笑。

他还讲到，女人怎样替他们操持家务，今天回家之前包工头怎么请他们喝了半桶酒，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怎么死了，另一个怎么病了，他们要送他回去。他说的那个病人就坐在这节车厢的一个角落里。这是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他显然是发疟子，而且正在发作。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可是小伙子看了他一眼，目光十分严厉而痛苦，聂赫留朵夫不便问他什么来打搅他，只是劝年长点儿的那个给他买奎宁吃，并把药名写在一张纸条上。他想给点儿钱，但年长些的那个人说不用：他用自己的钱买。

“我常年在外面跑，这样的老爷可没见过。他不仅不揍你，还给你让位子。可见这老爷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啊。”他对塔拉斯最后说。

“是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不同的新世界。”聂赫留朵夫想，望着这些干瘦而强健的四肢、粗糙的土布衣服，以及黧黑、亲切和疲惫的脸庞，感到自己周围都是些全新的人，他们具有真正的、劳动的、人的生活才有的那种严肃的情趣、欢乐和痛苦。

“瞧，他们才真称得上真正的上等人。”聂赫

留朵夫想，回忆起科察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同时也回忆起科察金一家那个闲散而奢靡的世界和他们那种卑劣无聊的生活情趣。

于是，他像一个旅行家发现了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心中感到无比的高兴。

注 释

【1】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2】 原文为英文。

【3】 原文为英文。

【4】 原文为英文。亨利·乔治主张实行单一税，即把土地收归国有，以便使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

【5】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家。《摩西》是他的著名雕塑。摩西是《旧约全书》中的先知。

【6】 四人组成两对，包括六个舞式的舞蹈。

【7】 霍华德（1726—1790），英国慈善家，曾致力于改良监狱制度。

【8】 指聂赫留朵夫的母亲。

【9】 原指《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的从良妓女。

【10】 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事件。

【11】 十九世纪上半叶，高加索地区少数民族举行反抗沙皇统治的斗争，遭到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

压。

【12】 指一八三〇年沙皇军队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罪行。

【13】 贞德（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

【14】 更衣室。

【15】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基督教。

【16】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维奈，十九世纪瑞士神学家；霍米雅科夫（1804—1860），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他们在不同的立场上承认基督教义。

【17】 原文为英文。

【18】 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反对奴隶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

【19】 关于龙勃罗梭和塔尔德，参看第一部第二十一章注释。嘉罗法格（生于1852年）和费里（1856—1929），意大利犯罪学家。李斯特（1789—1846），德国经济学家。摩德斯莱（1835—1918），英国心理学家。

【20】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想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21】 八十年代初期，有一批犯人从布特尔监狱押往下诺夫戈罗德火车站，一天里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列·托尔斯泰原注

【22】 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农民起义领

袖。

【23】 基督教节日，一般在大斋开始前三天举

行。

一

玛丝洛娃他们那批犯人，走了近五千俄里的路。在到彼尔姆以前，玛丝洛娃一直和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赶路，只是到了彼尔姆，聂赫留朵夫才打通了关节，把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的行列里，这也是在这批政治犯中的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为他出的主意。

到达彼尔姆之前的那一路上，玛丝洛娃在肉体和精神上可是吃尽了苦头。从肉体上说，是拥挤、肮脏和一刻也不让人安宁的讨厌的小虫，而从精神上说，是像小虫一样讨厌的男人们，每到一个旅站总有那么一些人，死皮赖脸地纠缠不休，让她不得安宁。在女犯人和男犯人、男看守、押解人员之间，存在着一种无耻的淫乱风习，因此任何一个女犯，尤其是年轻的女犯，如果她不想利用自己的色相，必须处处加以提防。这种一刻也不停的恐惧和戒备状态，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玛丝洛娃因为她迷人的外貌和众所周知的身世，特别容易遭到这类骚扰。她现在对纠缠她的男人一概坚决抗拒，这让他们觉得是一种侮辱，因而也更引起了他们对她的恼怒。她同费多

西娅和塔拉斯的密切关系使她在这方面的处境有了好转。塔拉斯得知妻子时常受到纠缠以后，为了保护她，自愿加入犯人的行列，因此自下诺夫戈罗德起，他像犯人一样，跟他们一起行路。

调到政治犯这边后，玛丝洛娃在各方面的状况都得到了改善。且不说政治犯的膳宿条件比较好，受到的粗暴待遇比较少，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这里的一个好处是，她不再遭受男人们的骚扰，可以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可以不再让她时时想起她如今极想忘记的过去。不过，她这次调动的最大好处，却是她认识了几个人，他们对她起了极为有益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玛丝洛娃获准在旅站上和政治犯一起住，但她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女人，必须和刑事犯们一起走路。她从托木斯克起，一直这样步行。和她一同步行的还有两名政治犯：一个是玛丽娅·巴甫洛夫娜·谢季宁娜，也就是聂赫留朵夫探望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时感到惊讶的那个有一双又圆又鼓眼睛的漂亮姑娘；另一个是流放到雅库茨克省的名叫西蒙松的男犯，也就是聂赫留朵夫那次探监时见到的那个头发蓬乱、眼睛深陷、肤色黧黑的人。谢季宁娜步行的原因，是她把自己在大车上的位置让给了一个怀孕的女刑事犯；西蒙松是因为他认为享受阶级特权^{[\[1\]](#)}是不合理的。他们三个人和稍晚些坐大车走的政治犯不同，一大清早

就和刑事犯一起上路。在到达大城市之前的最后一个旅站，他们一直这样分着走，到大城市后，又有新的押解官来接管这批犯人。

这是九月的一个阴沉的早晨。时而下雪，时而下雨，夹杂着阵阵寒风。所有的犯人，四百名男犯和五十来名女犯，站在旅站的院子里，一部分人围着向犯人班长分发两天伙食费的押解官，另一部分人从进了院子的女小贩手里买食品。犯人们数钱时的嗡嗡说话声和女小贩们尖嗓叫卖声，乱哄哄地响成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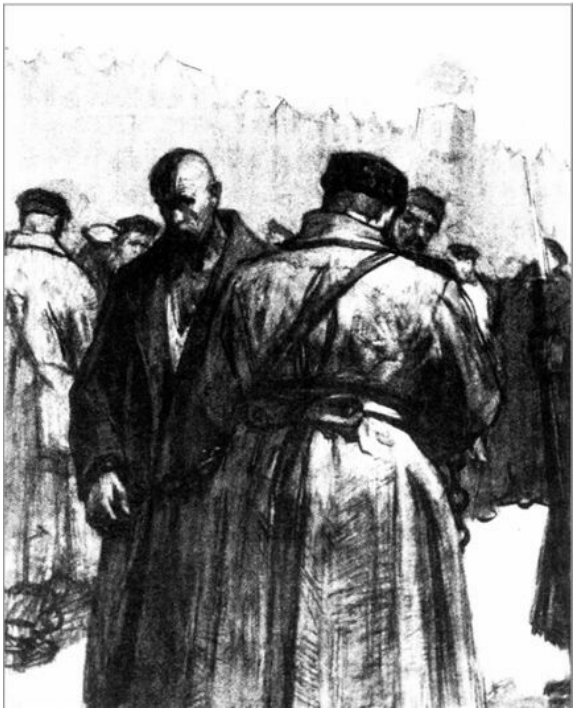
玛丝洛娃和谢季宁娜两人穿着高腰靴子和短皮袄，系着头巾，从旅站的房间来到院子里，向女贩们走去。这些小贩坐在北墙脚下背风的地方，争先恐后地叫卖她们的食品：新烤的面包、馅饼、鱼、面条、粥、牛肝、牛肉、鸡蛋、牛奶；有个小贩甚至还有一只烤乳猪。

西蒙松身穿杜仲胶上衣，脚穿羊毛袜，外套胶鞋，并用带子扎紧（他是个素食主义者，不使用动物的皮革和皮毛制品），也在院子里，等着队伍出发。他站在台阶上，往笔记本上记着他头脑中刚刚出现的一种想法。这个想法是这样的：

“假如细菌，”他写道，“能够观察和研究人的指甲，它准会认为指甲是无机体。正如我们在观察地壳时，认为地球是无机体一样。这是不正确的。”

玛丝洛娃同小贩讲妥价钱，把几个鸡蛋、一串面包圈、几条鱼和几个新鲜的小麦面包包装进袋子里，谢季宁娜也在和小贩算账，这时候犯人们已向院子中央走动。他们都不说话，纷纷排好队。押解官走了出来，作了出发前的最后安排。

所有的程序还和平常一样：清点人数，检查脚镣，把戴手铐走路的犯人，两人一起铐好。可是，突然响起押解官那威严的怒斥声、打人的响声和孩子的哭声。人群里顿时安静下来，可是接着发出一片低低的埋怨声。玛丝洛娃和谢季宁娜向喧闹的地方走去。



玛丝洛娃和谢季宁娜来到喧闹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身体强壮、留着浓密的浅色胡子的军官，皱着眉头，正用左手揉着打了犯人耳光的右手，嘴里不停地骂着不堪入耳的粗话。他面前站着一个人剃去半边头发的瘦长男犯，身穿短囚袍和更短的裤子，一只手擦着被打出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尖声啼叫的裹着头巾的小女孩。

“我叫你（不堪入耳的脏话）狡辩（又是一句脏话）；把孩子交给娘儿们，”军官喝道。“戴上。”

押解官要给这个村社判处流放的犯人戴上手铐，可是这个犯人一路上要用手抱孩子，他妻子在托木斯克得伤寒病死了，留下了这个女孩。他借口抱孩子，不想戴手铐，这惹恼了本来心情不佳的押解官，他把这个敢于违抗命令的犯人毒打了一顿。[【2】](#)

挨打的犯人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还有一个留黑色大胡子的男犯，一只手戴着手铐，阴沉着脸，皱着眉头一会儿看看押解官，一会儿看看挨打的抱孩子的犯人。犯人们的埋怨声越来越大。

“从托木斯克到这儿，一直没让他戴嘛。”后排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又不是只小狗，是个娃娃呀。”

“让他把女娃往哪儿放啊？”

“这可不合法啦。”还有人说。

“这是谁说的？”押解官像被蜇了一下似的，扑向人群，大吼起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合法。谁说的？你？你？”

“大家都说。因为……”一个宽脸、矮个儿的男犯说。

他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押解官两手左右开弓，给了他一顿耳光。

“你们要造反啊！我让你们尝尝造反的滋味。我要把你们像狗一样，统统枪毙。上司准会奖励我呢。把娃娃拿走！”

人群静了下来。一个押解兵拿过拼命哭叫的小女孩，另一个押解兵往犯人顺从地伸出的手上戴手铐。

“送到娘儿们那儿去。”押解官一边整理挂着军刀的皮带，一边对押解兵嚷道。

女孩使劲儿挣扎，想把小手儿从头巾里伸出来，不停地尖声哭叫，脸涨得血一样红。谢季宁娜从人群里出来，走到押解兵跟前。

“军官先生，让我抱这孩子吧。”

押解兵抱着小女孩站住了。

“你是谁？”押解官问。

“我是政治犯。”

显然，谢季宁娜漂亮的脸蛋和她那双美丽的鼓眼睛（他接管犯人时已经见过她）对他起了作

用。

他默默地看了看她，好像在考虑什么。

“我倒无所谓，您想抱，就抱吧。你可怜他们不要紧，可是他逃跑的话，谁负责任？”

“他带着孩子，怎么能逃跑呢？”谢季宁娜说。

“我没功夫跟您闲扯。你愿意，就抱去吧。”

“可以交给她吗？”押解兵问。

“给吧。”

“到我这儿来。”谢季宁娜说，起劲地逗女孩过来。

可是，小女孩却从押解兵的手里朝父亲那边探着身子，继续尖声哭叫，不肯到谢季宁娜这边来。

“等一等，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她会到我这儿来的。”玛丝洛娃说着，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面包圈。

小女孩认得玛丝洛娃，看见她和面包圈，朝她走了过来。

风波平息了。大门已经打开，犯人们走到外面，排好队；押解兵们重新清点人数；把行李放到大车上捆好，让体弱的犯人坐到车上去。玛丝洛娃两手抱着女孩，走到女犯队列里，站在费多西娅旁边。西蒙松一直注视着刚才发生的事，这时大步走到押解官跟前。押解官已把所有的事情

安排妥当，正要坐上他的四辆马车。

“您这样做很不好，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这不关您的事。”

“我就是要告诉您，我也告诉您了，您这样做很不好。”西蒙松说，浓眉下的那双眼睛直盯着押解官的脸。

“准备好了吗？全体注意，起步走。”押解官不理睬西蒙松，喊完话后，扶着赶车士兵的肩膀，爬上马车。

队伍动了起来，拉得很长，沿着两边是沟、被马车轧坏的泥路，在密林中间行进。

三

玛丝洛娃在城市里过了六年放荡、奢侈和娇惰的生活，又在监狱里和刑事犯关了两个月之后，现在同政治犯在一起，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她觉得这种生活非常好。每天走二十到三十俄里路，伙食也不错，隔两天还能休息一天，这样她的身体渐渐结实起来；而和新伙伴们的交往，则给她揭示了她闻所未闻的生活乐趣。现在和她一起走路的这些人，照她的说法，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人，她以前不仅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也没有想到过。

“判我刑的时候，我还哭了呢，”她说。“我真

得终生感谢上帝才是。要不我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我现在知道的这些事。”

她很容易理解这些人的行动理由，不费任何力气，作为一个出身平民的人，她也完全支持他们。她懂得，这些人是为了老百姓才去反对贵族老爷们的；这些人原本就是老爷，却为了平民百姓，不惜牺牲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这一点让她格外敬重他们，钦佩他们。

她钦佩她认识的所有新同伴；但她最钦佩的是谢季宁娜，不仅仅钦佩她，而且怀着一种特殊的、恭敬的、兴奋的心情热爱她。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出身于富贵的将军家庭的漂亮姑娘，会讲三种外语，却像个普通女工似的，一点儿也没有架子，把有钱的哥哥寄给她的东西，全都分给别人，衣服鞋袜不仅仅简朴，而且有些寒酸，丝毫也不注重自己的外表。她从不卖弄风情，这一点尤其让玛丝洛娃感到惊讶，因而对她更加敬佩。玛丝洛娃看得出，谢季宁娜知道，甚至高兴地知道自己长得漂亮，但她不仅不为自己的外貌能给男人留下印象感到快乐，反而对此有些害怕，并对恋爱抱着厌恶和恐惧的态度。她的同志们，知道她这一特点的男人们，即使对她产生爱慕之心，也不敢向她表白，而是像对待男同事一样，和她相处。不过，那些陌生的男人们，却常常纠缠她，据她讲，全凭她力气大才能摆脱他

们，她对自己的力气特别引以自豪。“有一次，”她笑着讲道，“有一个先生在大街上纠缠我，怎么也不肯罢手，于是我抓住他摇晃了几下，他吓得一下就跑掉了。”

她之所以会成为革命者，照她说，是由于她从小就厌恶贵族生活，而喜欢普通人的生活。那时她经常挨骂，因为不愿待在客厅里，偏爱待在女仆房、厨房和马棚里。

“我和厨娘、车夫们在一起，觉得很快活，和我们那些老爷太太们在一起，就觉得枯燥无味，”她讲道。“后来，当我懂事了，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坏透了。我母亲去世了，我不喜欢父亲，十九岁那年，我离开家，跟一个同伴进工厂当了女工。”

后来，她离开工厂，住到乡下，后来回到城里，在设有秘密印刷所的公寓里被捕，并被判处流放。谢季宁娜本人从来不提这件事，可是玛丝洛娃从别人嘴里知道，她被判处流放的原因，是她主动承担了开枪的罪名，那一枪是搜查时一个革命者在黑暗中放的。

玛丝洛娃自从认识她的那一天起，她就发现，她不论在哪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从不考虑自己，她心里想的只是如何在大事或小事上替别人出力，为别人帮忙。她现在的同志中，有个姓诺沃德沃罗夫的，常常开玩笑地说，她迷上了

慈善运动。这话一点也没错。她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寻找机会为别人服务，就像猎人寻找猎物那样。这项运动已经成为习惯，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十分自然，没有半点儿虚假在里面，以致所有认识她的人，只是要求她的帮助，而不再对此赞不绝口。

当玛丝洛娃刚刚调来的时候，谢季宁娜对她感到厌恶和嫌弃。玛丝洛娃察觉到这一点，后来也察觉到她竭力克制自己，对她特别亲热和友善。这种来自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的亲热和友善，使玛丝洛娃深受感动，她把整颗心都交给她，不知不觉地接受她的观点，不由自主地处处模仿她。玛丝洛娃的这片真情感动了谢季宁娜，她也喜欢上了玛丝洛娃。

这两个女人十分投缘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对性爱持有同样厌恶的态度。一个憎恨性爱，是因为备受它的摧残；另一个虽然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却把它看作一种不可理解的、可憎的和有辱人格的东西。



四

谢季宁娜的影响只是玛丝洛娃接受的其中一种影响。这是因为她喜欢谢季宁娜的缘故。另一种影响来自西蒙松。这却是西蒙松喜欢玛丝洛娃的缘故。

所有人的生活和行动，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他人的思想。人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依照他人的思想生活，这是人与人之间的重大差别之一。有些人往往像做智力游戏一样，运用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理智当作卸去传动皮带的飞轮，而在行动上一味顺从他人的思想——习俗、传统、法律；另一些人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自己所有行动的主要动力，几乎总是倾听自己理智的要求，并且顺从它，只是偶尔才遵从他人的决定，而且也是在经过批判性的斟酌之后才付诸行动的。西蒙松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一切事情都用理智来衡量和决定，一旦作出决定，就会照着去执行。

还在念中学的时候，他就断定父亲做军需官时挣得的家产是不义之财，于是向父亲申明，应当把它交还给老百姓。当时，父亲不仅不听，还痛骂了他一顿，他离家而去，从此不再用父亲的钱。他断定，现在的种种罪恶所以能够存在，那是因为老百姓没有受到教育，因此他离开大学，

加入了民粹派，去乡下当教师，大胆地向学生和农民宣传他认为正确的东西，批驳他认为错误的东西。

他遭到了逮捕和审讯。

在法庭上，他断定法官无权审讯他，并把这一点说了出来。等到法官不同意他的意见，继续对他进行审讯，他决定不回答问题，对他的讯问，一概置之不理。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在那里，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宗教学说，用来指导他的所有行动。这种学说的内容是，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活的，死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所有我们认为死的和无机的东西，只不过是是无法理解的庞大的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为庞大的有机体的一个小分子，人的任务就是要维护这一机体及其一切活的组成部分的生命。因而，他认为杀生是一种不赦的罪行：他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和一切杀生的行为，不仅反对杀人，而且反对杀动物。在婚姻方面，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繁衍后代仅仅是人的低级功能，而为现存的活人服务，才是它的高级功能。他从血液中存在吞噬细胞这一现象，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依据。独身的人，照他看来，正是这种吞噬细胞现象，它的使命就在于帮助有机体的病弱部分。尽管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沉湎于女色，但自从确立这套理论之后，却一直身体力行

地过这种生活。现在，他认为自己和谢季宁娜一样，是世界上的吞噬细胞者。

他对玛丝洛娃的爱，并不违背这种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这样的爱情不仅不妨碍他像吞噬细胞那样为弱者服务，反而更加鼓励他去从事这项活动。

除去精神方面的问题按自己的一套方式解决外，他也按自己的方式解决大部分实际问题。他处理各种实际事情都有自己的理论：定出很多规则，应当工作几个小时，休息几个小时，如何吃饭，如何穿衣，如何生炉子，如何点灯。

尽管如此，西蒙松与人交往时，却显得异常胆怯和谦逊。不过，他一旦决定做什么事情，那是任何力量也拦不住他的。

就是这样一个人，以他对玛丝洛娃的爱，深刻地影响了她。玛丝洛娃凭她女性的敏感，很快就觉察到了这一点，想到自己竟能引起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的爱，一下提高了她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聂赫留朵夫提出和她结婚，是出于自我牺牲，还因为有过过去的事；可是西蒙松爱的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她，而且爱她的原因，纯粹是由于爱。除此之外，她还感到，西蒙松认为她是个不平凡的、与众不同的女人，具有特别高尚的道德品质。她不大清楚他究竟认为她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以免使他失望，她竭

尽全力把她能想像到的最好品质表现出来。这样一来，也促使她努力去做一个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人。

这事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天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的共同探监日，她发现他那双纯洁善良的深蓝色眼睛，从隆起的额头和眉毛底下，十分专注地看着她。那时她就发现，这个人有点儿特别，看她的目光也有点儿特别，她还发现，那直立的头发和紧皱的眉头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神态与目光中孩子般的善良和纯真，竟在一张脸上惊人地结合在一起。后来到了托木斯克，她调到政治犯这儿，又一次见到了他。尽管他们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可是他们那对视的目光却表明，他们相互还记得对方，而且相互也看重对方。后来，他们之间也没有过什么意味深长的谈话，可是玛丝洛娃感觉得出来，如有她在场，他说话总是给她听的，是为她而说的，所以说得尽量明白易懂。他们之间的关系，自西蒙松和刑事犯们一起步行赶路之后，才特别亲切起来。

五

从下诺夫戈罗德到彼尔姆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仅仅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下诺夫戈罗德，犯人们正要登上拉着铁丝网的驳船的

时候；另一次是在彼尔姆，在监狱的办公室里。这两次见面，他发现她变得不愿袒露心迹，甚至不大友善。他问她身体好不好，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起来支支吾吾，神色慌乱，而且他觉得还有一种她以前曾经有过的充满责怪的敌意。她这种阴郁的情绪，不过是当时她受到男人们的纠缠才引起的，可是聂赫留朵夫却对此感到烦恼。他担心她一路上处在艰苦而容易使人堕落的条件下，又会重新陷入自我矛盾的状态和生活的绝望之中，又会对他产生怨恨情绪，拼命抽烟喝酒，放肆胡来。可是他无法帮助她，因为上路后的最初阶段，他没有机会见到她。直到她调到政治犯的队伍里，他才确信自己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恰恰相反，每一次见到她，都能看到她内心中有越来越明显的变化，这正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又变得像出发前一样了。她看见他，不再紧皱眉头，也不再心情不安，反而高高兴兴、神态自若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做的事，特别是把她调到现在这些人中间来。

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的变化也在外表上反映出来。她瘦了，晒黑了，似乎也有点显老了；眼角和嘴角四周出现了细小的皱纹，头发用头巾扎住，额头上不再飘着一绺头发，不论是装束、发式，还是待人的态度，丝毫也没有先前那

种卖弄风情的迹象。这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总是让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高兴。

他现在对她产生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情。这种感情不同于最初的充满诗意的迷恋，更不同于后来他尝到的肉体的爱，甚至也不同于法庭审判后他决心同她结婚时的那种自我欣赏的履行责任的心情。这种感情是一种纯粹的怜悯之情，他第一次去监狱看她时曾经体验到过这种心情，后来在医院里他克服了对她的厌恶，原谅了她和医士的那件莫须有的事时（这事是后来解释清楚的），又更加强烈地体验到了这种心情；这种感情就是当时的那种心情，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当时他是一时体验到这种感情，现在却是无时无刻不感到这种感情的存在。现在他不论想什么，做什么，他的心里总出现这种怜悯之情，不仅仅对她一个人，对所有的人也同样如此。

这种感情仿佛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原先找不到出口的爱的激流，现在涌了出来，流向所有他遇到的人。

聂赫留朵夫在整个旅行期间，一直感到自己情绪高昂，他不由得对所有他打过交道的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到监狱长和省长，都充满了关心和体谅之心。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里的原因，聂赫留朵夫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政治

犯，先是在叶卡捷琳堡，他们很自由地共同关在一个大房子里，后来在路上又认识了与玛丝洛娃同行的五名男政治犯和四名女政治犯。聂赫留朵夫同政治犯接近以后，完全改变了他对他们的看法。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3\]](#)开始以来，特别是三月一日事件之后，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不无反感和蔑视。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政府的斗争中使用残酷和秘密的手段，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进行残忍的暗杀行动，还有就是他们个个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特点。可是，进一步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经常无辜遭到政府的迫害之后，他才明白，他们除此之外，实在别无选择。

不论所谓的刑事犯忍受怎样极为无理的折磨，但在审判前后，对他们总算还有点儿依照法律审理的样子；然而对政治犯，连这点样子也不装，聂赫留朵夫在舒斯托娃身上，以及后来在许许多多新结识的朋友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对待这些人的方法，仿佛是在大网捕鱼：凡是进入网中的鱼统统拖到岸上，然后把有用的大鱼拣出来，而小鱼却无人过问，任凭它们在岸上活活干死。就这样，抓捕了数百名显然无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关进监狱，往往一关就是几年，他们在狱中染上肺病，发疯或者自杀；关押他们的原因，仅仅是缺乏释放他们的理

由，还有把他们关在附近的监狱里，当需要查清某个问题的时候，可以方便地提审他们。这些甚至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也是无罪的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宪兵军官、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大臣的个人意愿、时间和心情。这样的官僚常常闲得无聊或者有意邀功请赏，就去抓人，然后根据自己或上司的心情，决定是关进监狱还是释放。至于更高级别的长官，也要根据他是否有请功的愿望，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来决定是流放到边远地区，还是单独囚禁，是判处流放、苦役、死刑，还是如果有某位太太来讲情，就把人放掉。

既然对他们采取如此敌对的态度，他们自然也就使用起人家对付他们的那种手段。正如军人们总是生活在一种社会舆论的氛围中，这种舆论不仅为他们掩盖他们行为的犯罪性质，而且把这些行为当作功勋一样——对政治犯来说，他们也处在他们那个团体的舆论氛围之中，因此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最宝贵的东西的危险所做出的残酷行为，在他们眼里，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英勇的行动。于是，聂赫留朵夫弄清楚了这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一些性情极为温和的人，平时不要说伤害小动物，就是看到它们受罪也不忍心，却能坦然自若地准备去杀人，而且几乎个个都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杀人，把它作为自卫

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一崇高目的手段，是合法的，也是正当的。他们对他们的事业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由此也对他们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其实那是政府关注他们，对他们实行残酷惩罚的自然结果。他们必须对自己有高度的评价，不然无力承受他们所承受的一切。

聂赫留朵夫在深入了解他们之后，确信他们并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是十足的恶棍，也不像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他们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当中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有好人，有坏人，有不好也不坏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有责任与现存的恶势力作斗争；但有些人选择革命活动，是出于个人的动机和虚荣心；不过大多数人投身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时期熟悉的那种冒险和以生命取乐的愿望，这种愿望是一般精力旺盛的青年所特有的。他们比一般人优越的地方，是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一般人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认为自己不仅要清心寡欲、生活刻苦、真诚老实、大公无私，而且要准备为共同的事业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些人中间，凡是高于一般水平的人，往往水平极高，可以成为罕见的道德高尚的典范；而那些低于一般水平的人，则水平极低，往往成为谎话连篇、装腔作势，同时又自以为

是、骄傲自大的人。所以，聂赫留朵夫对一些新结识的朋友，不仅满怀敬意，而且衷心热爱，可是对另一些人却依旧十分冷淡。

六

聂赫留朵夫尤其喜欢一个姓克雷利佐夫的青年，他患有肺病，是被流放服苦役的，玛丝洛娃调来后，他和她在一个小队行路。聂赫留朵夫早在叶卡捷琳堡就和他认识了，后来路上又见过他几次，还和他聊过天。夏天里的一个休息日，聂赫留朵夫几乎和他在一起消磨了一整天的时间。克雷利佐夫谈得兴致勃勃，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自己成为革命者的经过。他入狱之前的经历非常简单。他父亲是南方省份的一个富有的地主，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独子，由母亲抚养长大。他中学和大学念得很轻松，大学毕业时以数学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学士学位。学校建议他留校，并去国外深造。可是他犹豫不决。他爱上了一位姑娘，想同她结婚，还想到地方自治会工作。他什么都想做，但没有一件事定得下来。这时，几个大学同学要他给公共事业捐些钱。他知道，这种公共事业其实是革命事业，但那时他对此毫无兴趣，只是出于同学情谊和自尊心，怕别人说他胆小怕事，才捐了钱。收钱的

人被捕了；搜出一张字条，发现钱是克雷利佐夫捐的；他被捕了，先是关押在警察分局，后来关进监狱。

“在我进的那个监狱里，”克雷利佐夫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坐在高高的床铺上，胸部塌陷，胳膊支在膝盖上，只是偶尔用那双明亮、兴奋、漂亮、聪明和善良的眼睛看一下聂赫留朵夫），“那个监狱不算特别严：我们不仅可以敲墙互通消息，还可以在走廊里走动，谈话，交换食物和烟丝，晚上甚至可以一齐唱唱歌。我有一副好嗓子。是啊，如果没有我母亲非常伤心这件事的话，我在监狱里过得挺不错的，甚至还过得挺愉快，挺有意思呢。我在里面，顺便说一句，认识了著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狱中用玻璃割破喉管自杀了），也有别的人。但我那时不是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是在波兰宣言^[4]传单的案子中被捕的，后来因为在押往火车站的路上企图逃跑，受到审判。一个是波兰人洛津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佐夫斯基。是啊。那个罗佐夫斯基还完全是个孩子呢。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也就是十五岁左右的样子。瘦瘦小小，眼睛明亮，活泼，跟所有犹太人一样，很有音乐才能。他还在变嗓音，可是唱得好极了。是啊，我眼瞧他们俩被提去受审。是早上押走的。晚上，他们回来了，说他们

被判了死刑。谁也没料到会这样的。他们的案子并不重，仅仅是企图从押解兵手里逃走，而且也没伤什么人。再说，处死像罗佐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也太不近情理了。所以我们牢里的人全都认为，这不过是吓唬他们罢了，判决不会得到批准的。我们先惊慌了一阵子，后来就放心了，大家又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是啊。可是有一天晚上，一个看守走到我的门口，神秘地告诉我，木匠来了，在竖绞架呢。我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什么绞架？可是老看守十分慌张，我看了他一眼，这才明白，绞架是为我们那两个伙伴准备的。我想敲墙，和同伴们谈谈，可是又怕他们两个听见。同伴们也不出声。显然，大家都知道了。走廊和各个牢房里，一晚上死一样的安静。我们没有敲墙，也没有唱歌。十点钟左右，看门人又过来告诉我，从莫斯科调来了一名刽子手。他说完就离开了。我唤他回来。突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从他的牢房里隔着走廊对我喊道：‘您怎么啦？您叫他做什么？’我假装说来给我送烟丝的，可是他好像猜到了，问我们为什么不唱歌，也不敲墙了。我不记得我对他说了些什么，反正我急忙走开了，免得再和他说话。是啊。那天夜里真可怕。整夜我都在留神听外面的各种声音。凌晨的时候，我突然听见——走廊的门开了，有谁进来，有很多人。我凑到门上的小洞那儿。走

廊里点着一盏灯。第一个走过去的是监狱长。他是个胖子，平时给人的感觉是个自信而又果断的人。可是这会儿他的脸色全变了：苍白，无精打采，好像吓破了胆似的。他后面是副监狱长，眉头紧皱，脸上带着果断的神气。再后面是卫兵。他们从我的门口走过去，在隔壁的门前停住了。于是我听见——副监狱长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叫道：‘洛津斯基，起来，换上干净衣服。’是啊。然后我听见，牢门嘎吱一响，他们朝他走去，接着我听见罗佐夫斯基的脚步声：他走向走廊的另一头去了。我只能看见监狱长一个人。他脸色煞白地站着，一会儿解开扣子，一会儿又系上，还不住地耸动肩膀。是啊，他好像害怕什么似的，突然往旁边一闪。原来是洛津斯基从他身边走过，来到我的门前。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您知道吗，就是那种典型的英俊的波兰人：前额宽阔平直，有一头细密的淡黄色鬈发和一双漂亮的蓝眼睛。那是个多么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呀。他站在我门上的小洞前面，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整个脸。那张脸灰白、消瘦而又可怕。‘克雷利佐夫，有烟吗？’我刚要把烟递给他，可是副监狱长仿佛怕误了时间似的，掏出自己的烟盒递了过去。他拿起一支烟，副监狱长给他点上火。他抽起烟来，似乎在想心事。然后好像想起了什么，开口说：‘残忍，不公道。我没犯罪。我……’我

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那年轻而白净的脖子，看见他的喉头颤抖起来，他说不下去了。是啊，这个时候，我听见罗佐夫斯基用他那尖细的犹太人的嗓音在走廊里喊着什么。洛津斯基扔掉烟头，离开了牢门。小洞里出现了罗佐夫斯基。那张孩子气的脸红扑扑、汗津津的，黑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他也穿着干净的衣服，但裤子过于肥大，两只手不住地往上提，浑身直打哆嗦。他把可怜的脸贴在小洞上：‘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医生给我开了润肺汤，是吧？我不舒服，我还要喝润肺汤。’谁也没吭声，于是他疑问地看看我，又看看监狱长。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也没搞懂。是啊。突然副监狱长脸色一沉，又用刺耳的尖声叫道：‘开什么玩笑？我们走啦。’罗佐夫斯基显然不清楚有什么事在等着他，好像很着急似的，沿着走廊走了，几乎跑到所有人的前面。可是，后来他走着走着不肯走了——我听见他尖利的叫声和哭声。传来一阵嘈杂声和沉重的脚步声。他连喊带叫地尖声大哭。后来哭声越去越远……——走廊的门砰地一响，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是的。就这么着绞死了。两人都是用绳子绞死的。另一个看守看见了，告诉我说，洛津斯基没有反抗，可是罗佐夫斯基却挣扎了好久，所以他是被拖上绞刑台，硬把他的脑袋塞进绳套里去的。是啊。这个看守是个傻里傻气的小伙

子。‘老爷，我听说这事很吓人的。其实一点儿也不可怕。他们吊上去的时候——就这么动了两次肩膀，’他表演了一下，肩膀猛地往上一耸，又垂了下来，‘接着刽子手又把绳子一拉，就是要把绳套拉紧点儿，就完啦：他们再也不颤抖了。’“一点儿也不可怕，”克雷利佐夫重复着看守的话，想笑一笑，可是没笑出来，反而放声大哭了。

这之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吃力地喘着气，强压住涌上喉咙的哭声。

“从此，我成了一个革命者。是啊。”他说，心情平静下来，又简短地讲了他后来的经历。

他加入了民意党，甚至还当了一个破坏小组的头头，小组的使命是对政府搞恐怖活动，迫使政府放弃政权，好让人民掌权。他带着这一使命时而去彼得堡，时而去国外，时而去基辅，时而去敖德萨，到处都获得成功。一个他完全信任的人出卖了他。他被捕了，受到审讯，在牢里关了两年，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终身流放。

在狱中，他得了肺病，而在目前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显然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他知道这一点，对自己做过的事并不后悔，还说，如果有第二次生命的话，仍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这项事业——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他亲眼目睹的那些事情，有可能还会发生。

这个人的身世以及同他的接近，使聂赫留朵夫明白了许多他以前不懂的东西。

七

离开这个旅站的那天，也就是押解官和犯人们因为孩子的事发生冲突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歇在客店里，醒得很迟，又写了几封信，准备到省城时发出去，因此离开客店的时间比平常晚了些，没能像以前那样，半路赶上犯人的队伍，当他到达小旅站旁边的村子时，天色已经擦黑。聂赫留朵夫在一个白脖子格外粗壮的胖老寡妇开的客店里，烘干衣服，又在装饰着大量圣像和绘画作品的干净客房里喝足了茶水，赶忙去旅站找押解室，要求准许他和玛丝洛娃见面。

在前面的六个旅站上，所有的押解官，尽管换了几次，全都不许聂赫留朵夫进旅站的房子，因此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玛丝洛娃了。这么严格的原因，是有一位主管监狱的要员将从这条路线经过。如今要员已经过去了，对这些旅站看也没看，所以聂赫留朵夫希望今天早晨刚刚接管犯人的军官，会像以前那些军官一样，准许他同犯人们见面。

客店女掌柜劝聂赫留朵夫坐马车去位于村头的旅站，可是聂赫留朵夫更愿意走着去。一个年

轻的茶房，肩膀宽阔，身体魁梧，脚上穿着一双刚擦过气味很浓的松焦油的大皮靴，送他到那儿去。天上下着大雾，四处一片昏暗，小伙子只要在窗子里射出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走出三步远，聂赫留朵夫就已经看不见他，只能听见他的大皮靴在又黏又深的泥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茶房，穿过教堂前的广场和一条两旁房屋的窗子灯火明亮的长街，来到村边的黑暗中。不过，黑暗中很快就看见了亮光，那是旅站旁边的灯笼在雾中发出的亮光。浅红色的光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色身影、带条纹的柱子和岗亭，渐渐辨得出来了。哨兵声音平静地对走过来的人喊了一声：“谁在那儿？”——当他发现不是自己人，一下变得严厉起来，不准他们靠近栅栏。可是，给聂赫留朵夫带路的茶房对哨兵的态度一点儿也不在意。

“喂，你这家伙，脾气倒不小！”他对哨兵说。“你把领哨儿的叫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冲着栅栏门里喊了一声，然后站住，眼睛紧盯着宽肩膀的小伙子，看他借着灯笼的光亮用木片刮聂赫留朵夫靴子上粘的泥巴。栅栏里面可以听见男男女女嘈杂的说话声。大约过了三分钟的样子，铁锁哗啦一响，栅栏门打开了，领哨的披着大衣，从黑暗中来灯光

下，问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把自己的名片和一张写着有私事求见的字条递过去，请他转交给押解官。领哨的不像哨兵那么严厉，可是特别好奇。他一定要知道知道聂赫留朵夫为什么见押解官，他又是谁，显然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不愿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有件特别的事，还说会感谢他的，请他把字条送上去。领哨的接过字条，点了一下头，走了。他走后不久，栅栏门又哗啦一响，从里面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拿着篮子、树皮筐、牛奶壶和口袋。她们一边用西伯利亚方言大声交谈，一面跨过栅栏门的门槛。她们都不是乡下人的打扮，而是像城里人一样，穿着大衣和皮袄，裙子掖得高高的，头上扎着头巾。她们借着灯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他的带路人。有一个女人显然见到宽肩膀的小伙子很高兴，立即用西伯利亚骂人话亲热地骂起他来。

“你这个该死的，钻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对他说。

“瞧，我是带客人来的，”小伙子回答，“你送的是什么东西？”

“牛奶做的东西呀，叫我明天早上还来呢。”

“没让你留下过夜吗？”小伙子问。

“你胡扯什么，嚼舌根子的家伙！”她笑着叫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吧，你送我们。”

小伙子又说了句什么话，不仅引得女人们，

而且也引得哨兵大笑起来，然后问聂赫留朵夫：“怎么样，您一个人找得到路吗？不会走岔了吧？”

“找得到，找得到。”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起，右边第二家就是。喏，拐棍给您吧，”他说完，把他拄着走路的一根一人多高的棍子递给聂赫留朵夫，吧唧着那双大皮靴，和女人们消失在黑暗中。

他那不时被女人们打断的说话声，远远地从夜雾中传来；栅栏门又哗啦响了一下，领哨的走了出来，请聂赫留朵夫跟他去见押解官。

八

这个小旅站和西伯利亚沿途大小旅站的样式大同小异：在四周用尖头圆木桩围住的院子里，有三座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座装有铁格子窗户，是犯人们住的，另一座是押解兵们住的，第三座是押解官住的，办公室也设在里面。这三座房子眼下灯火通明，尤其是在这种地方，这往往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以为灯火明亮的房子里面一定很舒服自在。每座房子的门前都点着灯笼，墙上还有五盏灯笼，照亮了院子。这个军士领着聂赫留朵夫走过一块木板，来到最小的那座房子的门前。登上三级台阶，他让聂赫留朵夫走在自己

前面，进入点着一盏小灯、充满了煤烟的前室。火炉旁有个士兵，身着粗布衬衣和黑色长裤，系着领带，一只脚穿长筒黄皮靴，弯着腰用另一只皮靴的靴筒给茶炊扇风。看到聂赫留朵夫，士兵丢下茶炊，替聂赫留朵夫脱去皮大衣，然后走进里间。

“他来了，长官。”

“嗯，叫他进来。”传出一个生气的声音。

“请进。”士兵说完，又去扇茶炊。

在吊着一盏灯的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脸色通红、唇上生着很长的淡黄色胡子的军官，穿一件紧裹着他那宽大的胸膛和肩膀的奥地利式上装，坐在桌旁，桌上铺着桌布，放着吃剩的饭菜和两只酒瓶。在这间暖和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押解官看到聂赫留朵夫，欠了欠身子，仿佛带着嘲讽和怀疑的神情盯着走进来的这个人。

“有何贵干？”他说，不等回答，又冲门外喊道：“别尔诺夫！茶炊什么时候烧好？”

“马上就好。”

“瞧我不马上揍你，让你好好记住！”军官叫道，两眼气得直冒火。

“来啦！”士兵喊着，把茶炊端进来。

聂赫留朵夫等士兵把茶炊放好（军官用恶狠狠的小眼睛盯着他的动作，好像要找准一个地方

打他一下似的)。可是茶炊刚刚摆好，他就忙着煮起茶来。随后，他从旅行食品箱里拿出一方形瓶子的白兰地酒和一些夹心饼干。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到桌上后，他又转向聂赫留朵夫：

“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

“我想见见一名女犯。”聂赫留朵夫说，还没有坐下来。

“政治犯吗？这可是违法的。”押解官说。

“这个女人不是政治犯。”聂赫留朵夫说。

“啊，请您快坐下。”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了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重复说，“不过，经我请求，最高长官批准她跟政治犯一起走。”

“哦，我知道，”押解官打断他的话。“是那个黑头发的小娘儿们吧？行，这可以。您吸烟吗？”

他把一包香烟往聂赫留朵夫跟前推了推，小心翼翼地接满两杯茶，把其中一杯推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请。”他说。

“谢谢，我还想见见……”

“夜长着呢。您来得及的。我派人去叫她。”

“能不能不叫她，让我到住的地方去？”聂赫留朵夫说。

“去政治犯那儿？这可违法啦。”

“以前让我去过好几次呢。要是怕我传递东西，我也可以通过她传递的呀。”

“不，她要被搜身的。”押解官说完，发出令人不快的笑声。

“那好吧，先搜搜我。”

“算啦，咱们不搞这一套，”押解官说，把起了塞子的酒瓶举到聂赫留朵夫的杯子上。“来一点儿？好，您随便。住在西伯利亚这种地方，能见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真让人高兴啊。我们这个职业，您知道，可怜透了。一个人过惯了别的生活，那就更苦啦。可是，人们一提起我们这些人，就有一种看法，押解官吗，那是粗人，没有教养的人，就是不想想，我们生来也完全能干别的事的。”

这位押解官的红脸、他的香水味、宝石戒指，尤其是令人不快的笑，都让聂赫留朵夫非常反感，可是他今天，也像整个旅行期间一样，怀着一种认真和关注他人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之下，他不允许自己对任何人态度轻率和轻蔑，认为和每一个人说话必须“认认真真”，这是他自己定下的原则。他听完押解官的话，以为他心情沉重是因为参与了折磨手下犯人的缘故，于是对他认真地说：

“我想，您可以在您的职位上，设法减轻这些人的痛苦，从中也就得到安慰了。”他说。

“他们有什么痛苦？他们就是这号人。”

“他们怎么是特殊的人呢？”聂赫留朵夫说。“他们是和大家一样的人。有些人还是无辜的呢。”

“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值得可怜。别人一点儿小事都不放过，可我呢，总是尽量减轻他们的痛苦。宁可让我自己受罪，也不让他们吃苦。别人遇上点儿什么事，就依法处置，要不就枪毙，可我总是可怜他们。再喝点茶？吃点东西吧，”他说着，又接了一杯。“您想见的那个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他问。

“这是个不幸的女人，落到妓院里，在那儿被诬告毒死了人，她其实是个好人。”聂赫留朵夫说。

押解官摇了摇头。

“是啊，这种事常有的。我告诉您吧，在喀山就有这么一位，叫艾玛。是个匈牙利女人，长着一双地道的波斯人的眼睛，”他继续说，想起这段往事禁不住露出微笑。“那风度，就是伯爵夫人也比不上……”

聂赫留朵夫打断押解官的话，又回到原来的话题。

“我想，他们在您接管的时候，您是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的。我相信，您这么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快乐，”聂赫留朵夫说，尽量把话讲得

明白易懂，就像跟外国人或孩子们说话那样。

押解官眼睛闪亮地看着聂赫留朵夫，显然急切地等他把话说完，以便继续讲那个有一双波斯人眼睛的匈牙利女人的事，那个女人显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中，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是的，就算这是对的吧，”他说。“我也可怜他们。不过我想跟您讲讲这个艾玛的事。您猜怎么着，她……”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不瞒您说，虽然我以前也是那种人，可是我现在痛恨这种对女人的态度。”

押解官惊讶地看了看聂赫留朵夫。

“那再来点儿茶吧？”他说。

“不啦，谢谢。”

“别尔诺夫！”他喊了一声，“带这位先生去瓦库洛夫那儿，告诉他，让这位先生到政治犯住的那个房间去；可以在那儿待到点名的时候。”

九

聂赫留朵夫在传令兵的带领下，又来到灯笼的红光暗淡地照射着的昏黑的院子里。

“去哪儿？”迎面过来的一个押解兵，问替聂赫留朵夫带路的传令兵。

“隔离室，五号。”

“这儿过不去，锁着呢，得绕那个门廊。”

“为什么上锁？”

“领哨班长锁的，他去村子里了。”

“好吧，从这边走。”

传令兵领着聂赫留朵夫向另一个门廊走去，踩着木板，来到另一个门前。还在院子里就听到嗡嗡的说话声和里面的动静，好像一群热热闹闹、正准备分窝的蜜蜂。当聂赫留朵夫走过去，门也打开了的时候，嗡嗡声更响了，变成了一片叫喊声、对骂声、哄笑声。还能听见镣铐的叮当声，闻到 he 熟悉的粪便和煤焦油的呛人气味。

这两种印象——夹杂着铁镣声的嗡嗡说话声和那种可怕的臭味，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往往总汇成一种感受，一种由精神上的恶心变为生理上的恶心的痛苦感受。这两种印象混合在一起，一个比一个强烈。

走进放着一个被称作“马桶”的臭烘烘的大木桶的门廊，聂赫留朵夫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女人坐在木桶的沿上。她对面站着一个剃去半边头发的男人，歪戴着薄饼般的帽子。他们在聊着什么事。那个男犯看到聂赫留朵夫，挤了挤眼睛，说：

“皇上也得撒尿呀。”

女人把囚服的下摆放下，低了头。

从门廊往里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牢房的门

敞开着。第一间是带家眷的犯人牢房，然后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走廊顶头是两间专关政治犯的小牢房。旅站的房子设计容纳一百五十人，现在却住进四百五十人，因此十分拥挤，牢房里住不下，走廊上也住满了人。有些人在地板上坐着或躺着，另一些人进进出出，手里提着空茶壶或装满开水的茶壶。塔拉斯也在这些人当中。他赶上聂赫留朵夫，亲热地打着招呼。塔拉斯那张和蔼的脸变得很难看，鼻子和眼睛底下青一块紫一块的。

“你这是怎么啦？”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点儿事。”塔拉斯笑着说。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地说。

“是为了娘儿们，”走在他们后面的一个男犯补充说，“为费多西娅和瞎子干了一架。”

“费多西娅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她挺好，这不我打开水给她沏茶。”塔斯拉说完，走进带家眷的犯人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门里看了一眼。整个牢房里挤满了女人和男人，有的在床铺上，有的在床铺下。牢房里全是湿衣服散发出的蒸汽，还有女人们无休止的叫声。下一个开着门的是单身男牢房。这里更加拥挤，甚至连门口和门外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一群闹哄哄的穿湿衣服的犯人，在分什么或是在商量什么。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解释

说，这是犯人组长根据用纸牌做的票据，把犯人预先支取或输掉的钱从伙食费里扣下，还给赌场老板。一些站得近的犯人看到军士和一位先生，不做声了，带有恶意地瞧着这两个人。聂赫留朵夫在分钱的人当中发现了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他身边总带着一个高挑着眉毛、皮肤白净、好像有些浮肿的可怜小伙子，还有一个令人讨厌的、没有鼻子的麻脸流浪汉，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好像他逃进原始森林的时候，杀了自己的同伴，还吃了他的肉。这个流浪汉站在走廊上，用半边肩膀披着一件湿囚袍，讥讽而蛮横地瞧着聂赫留朵夫，不肯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从他身边绕了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很熟悉这种场面，尽管这三个月来他常常在各种情况下看到那四百名刑事犯：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拖着脚镣扬起团团灰尘，或者他们在途中休息，或者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们在旅站院子里公开淫乱的可怕情景，可是他每次来到他们中间，像现在这样发觉他们的目光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心里总有一种痛苦的羞耻感和负疚感。最让他难受的是，在这种羞耻感和负疚感里面，还掺杂着一种难以克制的厌恶感和恐惧感。他知道，他们被迫处于他们目前的这种境况之下，不可能会是别的样子，可他还是压抑不住对他们的厌恶心情。

“他们倒很自在，吃闲饭的家伙们。”聂赫留朵夫已经走到政治犯的牢门前，听见有人说，“这些魔鬼，他们能有什么事；反正不会肚子疼。”一个沙哑的声音说，又补充了一句不堪入耳的骂人话。

响起一阵不友善的哄笑声。

十

走过单身男犯的牢房，给聂赫留朵夫带路的军士对他说，点名之前来接他，然后转身回去了。军士刚一离开，一个男犯提着镣铐上的铁链，光着脚，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浑身散发着浓重的汗酸味，悄悄地对他说：

“老爷，您去管一下吧。那个小伙子完全上当啦。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卡尔马诺夫。您去说说吧，我们不能说，会被打死的。”男犯说完，慌里慌张地四下望了一眼，立即从聂赫留朵夫身旁走开了。

事情是这样的，苦役犯卡尔马诺夫怂恿一个相貌和他相似、判处终身流放的小伙子跟他互换姓名，为的是让他去流放，而让小伙子替他去服苦役。

聂赫留朵夫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因为那个犯人在一个星期以前就把这场骗局告诉过他。聂赫

留朵夫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将尽力去办，接着目不斜视地继续往前走。

聂赫留朵夫是在叶卡捷琳堡认识这个犯人的，他那时请聂赫留朵夫替他说情，准许他妻子跟他一起去服刑的地方。聂赫留朵夫对他今天的举动感到惊讶。这是一个中等身材、三十岁左右的人，长着一副极为普通的农民相貌，因谋财杀人未遂罪判服苦役。他叫马卡尔·杰夫金。他犯罪的经过十分奇特。犯罪的人，照他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不是他，马卡尔，而是他，魔鬼。他说，有个过路人找到他父亲，出两个卢布租辆车，去四十俄里以外的地方。父亲让他送客人。马卡尔套上马，穿好衣服，和客人喝起茶来。客人喝茶时说，他去成亲，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的五百卢布。听到这话，马卡尔走到院子里，把斧子放在雪橇的草垫下面。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带了把斧子，”他说。“有个声音说：‘带上斧子。’我就带上了。我们坐上去，走了。我们走啊，什么事也没有。我把斧子的事都忘了。眼看快到村子了——剩下六七俄里了。从小道转上大路，向山坡上爬。我下了雪橇，跟在后面，他小声说：‘你还想什么？等上了坡，大路上都是人，前头儿就是村子啦。他就把钱带走喽；要干，现在正是时候——有什么好等的。’我弯下腰，装着整理雪橇上

的草垫子，那斧子好像自动跳到我手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你做什么？’他说。我抡起斧子，想砍下去，可是他人挺麻利，一下子从雪橇上跳下来，抓住我的双手。说：‘你这恶棍，想干什么？……’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没还手，由他摆布。他用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到雪橇上。直接送到警察局。把我关进监狱。受到审讯。村社替我说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从来没做过坏事。我的东家也说好话。可是没钱请律师。”马卡尔说，“所以我被判了四年。”

现在，就是这个人想搭救他的同乡，尽管他知道说这些话是有生命危险的，可还是把这件犯人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为这事——万一他们知道这是他干的——一定会勒死他的。

十一

政治犯住的地方是两间小牢房，房门朝着一截被隔开的走廊。进入走廊，聂赫留朵夫看到的第一个人是西蒙松，穿着短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劈柴，蹲在炉子旁生火，炉门被热气吸住，不停地颤动。

他看见聂赫留朵夫，没有站起来，浓眉下的眼睛往上瞧着，伸手握了一下。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正想找您呢。”他直

接看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意味深长地说。

“到底有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

“等会儿再说。现在正忙着呢。”

西蒙松又去生他的炉子，用的是他自己的一套能最大限度减少热能损耗的特殊原理。

聂赫留朵夫正想走进第一个牢门，玛丝洛娃却从第二个牢门里出来了，她弯着腰，手里拿着笤帚，正把一大堆垃圾和脏土往炉子跟前扫。她身穿白上衣，裙子下摆掖在腰里，脚上穿着长筒袜。为了挡住灰尘，她头上齐眉包了一块白头巾。她看见聂赫留朵夫，直起腰，放下笤帚，在裙子上擦了擦手，脸色红润而兴奋地站在他面前。

“您在收拾房间？”聂赫留朵夫说，伸过手去。

“是啊，我的老本行了，”她说，笑了笑。“脏得不像样子啦。我们扫了一遍又一遍。怎么样，毛毯干了吗？”她问西蒙松。

“差不多了。”西蒙松说，用一种令聂赫留朵夫惊讶的特别目光瞧着她。

“好吧，我过会儿取，我再拿皮袄来烤烤。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她指着近处的一个门对聂赫留朵夫说，自己向另一个门走去。

聂赫留朵夫推开门，走进不大的牢房，里面有一盏小铁皮灯，放在低低的床铺上，光线暗

淡。牢房里很冷，满是尘土、潮气和烟草的气味。铁皮灯只照亮了周围的地方，而床铺还在阴影里，墙上跳动着黑色的影子。

在这间不大的牢房里，除了两个管伙食的男犯去打开水和买食品之外，其余的人都在。聂赫留朵夫的老熟人薇拉·叶甫列莫夫娜也在这里。她更瘦，脸色也更黄了，睁着那双惊恐的大眼睛，额头上露着一道青筋，上身穿着灰色短棉衣。她坐在一张放着烟丝的报纸前面，动作很快地卷着烟卷儿。

艾米丽娅·兰采娃也在这里。她是聂赫留朵夫最有好感的女政治犯之一，负责管理内务，给他的印象是，即使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也能显示出女性持家的本能和魅力。她坐在灯旁，卷着袖子，用那双晒黑的、漂亮而又灵巧的双手擦拭茶杯和茶碗，再摆放到床上铺着的一块毛巾上。兰采娃是个不漂亮的年轻女人，脸上带着聪明而温顺的表情，这种表情有一个特点，在笑的时候会突然改变样子，显得快活、迷人和富有朝气。她现在正是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回俄罗斯了呢。”她说。

谢季宁娜也在这儿，在稍远的黑暗角落里，正和一个浅黄头发的小女孩做着什么事，那个小女孩不停地用可爱的童音呀呀地说着话。

“您来啦，太好了。见到卡秋莎啦？”她问聂

赫留朵夫。“瞧，我们这儿的小客人。”她指了指小女孩。

克雷利佐夫也在这里。他面色消瘦而苍白，盘着两只穿毡靴的脚，坐在远处角落里的床铺上，弓着腰，双手揣在皮袄的袖筒里，浑身打着哆嗦，用那双害热病的眼睛看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想走到他跟前，可是门的右边，坐着一个身穿杜仲胶上衣、戴副眼镜的鬻发男人，一边清理行李袋里的东西，一边和容貌秀丽、面带微笑的女犯格拉贝茨说话。这人是著名的革命家诺沃德沃罗夫，聂赫留朵夫赶忙和他打招呼。他所以这么急着打招呼，是因为在所有的政治犯当中，只有这个人让他讨厌。诺沃德沃罗夫透过眼镜对聂赫留朵夫闪动了一下他的蓝眼睛，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瘦长的手。

“怎么样，您旅途愉快吗？”他不无嘲讽地说。

“是的，有趣的事挺多。”聂赫留朵夫说，装作没有听出这句话的讽刺意味，而把它当成亲热的表示，然后朝克雷利佐夫走去。

表面上聂赫留朵夫显得心平气和，但内心对诺沃德沃罗夫却远非如此。诺沃德沃罗夫说的话，他显然有意惹人不快的举动，破坏了聂赫留朵夫今天的良好心情。他感到沮丧和悲伤。

“怎么，身体不好吗？”他说，握住克雷利佐

夫冰凉而颤抖的手。

“还好，只是身上不暖和，湿透了，”克雷利佐夫说，急忙把手揣进袖筒里。“这儿真冷得要死呀。瞧，窗户都破了。”他指了指铁格窗户上两处打破的玻璃。“您怎么，为什么一直没来？”

“不让我进来，当官的很严。今天这个押解官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和气！”克雷利佐夫说。“您问玛丽娅，他今天早上都干了什么？”

玛丽娅·谢季宁娜坐着没站起来，讲了早晨从旅站出发时因这个小女孩而发生的事。

“依我看，必须提出集体抗议，”薇拉·叶甫列莫夫娜语气坚定地说，同时却胆怯而不坚定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西蒙松提出过抗议，但这还不够。”

“还提什么抗议呀？”克雷利佐夫烦恼地皱着眉头说。显然，薇拉·叶甫列莫夫娜的不朴实，不自然的腔调和神经质的样子，早就让他心中有气了。“您在找卡秋莎吧？”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一直在干活，打扫房间。这间，我们男的这一间打扫干净了；这会儿打扫女的那间呢。就是跳蚤扫不掉，咬死我们了。玛丽娅在那儿做什么呢？”他用头往谢季宁娜那个角落点了一下，问。

“给养女梳头呢。”兰采娃说。

“她不会把虱子带给咱们吧？”克雷利佐夫说。

“不，不会的，我留着神呢。她现在干干净净了，”玛丽娅·谢季宁娜说。“您抱抱她吧，”她对兰采娃说，“我去帮帮卡秋莎。再把毛毯给他拿回来。”

兰采娃接过女孩儿，像母亲一样慈爱地把她那光溜溜、胖乎乎的小手放到自己胸前，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给了她一小块糖。

谢季宁娜走了出去，紧接着那两个打开水和买食品的犯人回来了。

十二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人是个身材不高的瘦瘦的年轻人，身上穿着吊面短皮袄，脚下穿着高筒皮靴。他走路轻快，提着两个冒热气的大茶壶，腋下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噢，是我们的公爵来啦，”他说，把一个茶壶放在茶碗中间，把面包递给玛丝洛娃。“我们买到一些非常好的东西，”他说着脱掉皮袄，从众人头上扔到床铺的角落里。“马克尔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啦。艾米丽娅也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漂亮了，”他笑咪咪地看着兰采娃，说。“好，你现在可以泡茶啦。”他对她说。

这个人的外表、动作、嗓音和眼神，无不透着一股朝气和欢乐劲儿。进来的另一个人——身量也不高，骨瘦如柴，灰白的瘦脸上颧骨非常突出，长着一双相距很宽的漂亮的、淡绿色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却完全相反，样子阴郁而沮丧。他身上穿的是一件旧棉大衣，皮靴上套着套鞋。他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到兰采娃面前，对聂赫留朵夫弯一下脖子算是鞠了一躬，鞠躬的时候，眼睛仍不停地瞧着他。然后不情愿地向他伸过一只汗津津的手，接着慢吞吞地把食品从篮子里拿出来摆好。



这两名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马克尔参加革命活动时已是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纳巴托夫却是从十八岁起参加革命的。纳巴托夫才能出众，由乡村小学考入中学，一直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得到金质奖章，但他没有进入大学，因为在七年级的时候已经下了决心，要到他出身的平民中去，教育那些被遗忘的弟兄们。他正是这样做的：先到一个大村子当文书，可是很快就被捕入狱，因为他给农民们读小册子，还在他们中间创办了一个生产消费合作社。第一次被捕，他在牢里关了八个月，释放后暗中受到监视。他一出狱，立即到另一个省的另一个村子，在那里当小学教师，仍从事那样的活动。他又被抓起来，这一次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狱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第二次出狱后，他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被抓起来，关了七个月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因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处流放雅库茨克省；所以，他成年后的一半生活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这些经历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暴躁，不仅没有减弱他的斗志，反而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胃口很好，总显得那么精力充沛、快乐和积极。他从不后悔过去的事，也从不

预测未来的事，而是用他全部的智慧、才干和经验做好当前的事。他出了监狱，为自己既定的目标工作，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民为主的劳动者；而进了监狱，他同样精力旺盛和踏踏实实地进行活动，以便同外界沟通联系，在现有的条件下，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自己的团体，尽量把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他首先是一个属于团体的人。对他自己来说，他似乎什么也不需要，一无所有也可以心满意足，而为了团体的利益，他却有很高的要求，他可以做任何工作，不论是体力工作，还是脑力工作，甚至可以不休息，不吃饭，不睡觉。作为农民，他工作中不怕吃苦，灵巧而又能干，善于克制自己，待人彬彬有礼，不仅尊敬别人的感情，而且倾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老母还在，是个不识字的乡下寡妇，满脑子迷信思想。纳巴托夫一直照顾她，没坐牢的时候，常去看她。他每次回家，总要细心地了解她的生活，帮她干活儿，并且和他以前的伙伴，那些农村的小伙伴们来往不断，同他们一起抽卷成狗腿形状的大烟卷儿，跟他们比赛拳脚，向他们解释他们全都受到了欺骗，应当从这种欺骗中摆脱出来。每当他思考和讲解革命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时，他心里就会想像出这么一幅画面，像他那样出身的老百姓，几乎仍生活在原来的条件下，只是他们已拥有土地，而且没有了地主老爷

和官吏们。革命，按照他的观点说，不应当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同诺沃德沃罗夫和诺沃德沃罗夫的信徒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有分歧——在他看来，革命不应当摧毁整座大厦，而应当只是把他热爱的这座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可以了。

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个典型的农民：从来不考虑空洞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本源，也不考虑阴间的生活。他同阿拉哥^[5]一样，认为上帝是一种假设，他至今也没有看出这种假设的必要性。世界是怎么创造的，是摩西的说法正确，还是达尔文的说法正确，他根本不去关心。他的同事们认为达尔文主义十分重要，可是在他眼里，达尔文主义和六天创造世界一样，不过是一种思想游戏。

他不关心世界的起源问题，因为在世界上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的问题，时时刻刻摆在他的面前。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也从不去考虑，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种祖辈传下来并为种田人广为接受的坚定而稳固的信念：正如动植物界任何东西都不会消亡，只是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大粪变成粮食、粮食变成小鸡、蝌蚪变成青蛙、蛹虫变成蛾子、橡子变成橡树一样，人也同样不会消亡，只不过是变化而已。

他相信这一切，所以他总是精神爽快，甚至快乐地面对死亡，坚定地忍受可以导致死亡的痛苦折磨，可是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一切。他喜欢工作，时常忙于各种实际性的事情，而且推动他的同志们也这样做。

这批犯人中，另一个平民出身的政治犯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却是另一种气质的人。他从十五岁起开始做工，也开始抽烟和喝酒，以排遣心中隐约意识到的屈辱。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屈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这些童工被领到工厂老板娘布置的圣诞树前，他和伙伴们得到的礼物是一支值一戈比的小笛子、一个苹果、一个金纸包着的核桃和一个无花果，可是老板的孩子们得到的却是玩具，他觉得那简直是女魔术师送的礼物，后来听说要值五十多卢布。他二十岁那年，一个著名的女革命家到工厂来做女工，发现了他的出众才能，开始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同他谈话，并向他解释他的处境、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和改变它的方法。等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别人可以从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这种不合理的处境让他感到比以前更残酷，也更可怕，于是他不仅热切地要求获得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那些建立和维护这种残酷不合理现象的人。人家对他说，只有知识才能把希望变成可能，于是他热切地去获取知识。虽然他搞不明白，怎样

依靠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可是他相信，知识既然使他懂得了他的处境是不合理的，那么知识也一定能够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此外，知识还让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变得高明了。因此，他戒绝烟酒，把自己的所有空闲时间——他做了仓库保管之后，这种空闲时间更多了——全都用在学习上面。

女革命家教他学习，并对他永无止境地吸收各种知识的惊人能力钦佩不已。两年的时间，他学习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欢的历史，读遍了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尤其是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

女革命家被捕，他也一起被捕了，因为在他那里查到了禁书。他坐了牢，后来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那里，他认识了诺沃德沃罗夫，又读到许多革命书籍，全都记在心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流放期满后，他领导了一次工人大罢工，捣毁了工厂，打死了厂长。他又被逮捕，判处褫夺公权和流放。

他对宗教也像对现行的经济制度一样，持否定的态度。当他看出自小信奉的宗教是一种荒谬的东西，便毅然摆脱了它的束缚，起初还有些害怕，后来却感到异常高兴。从此，他好像要为他和他的祖辈们受到的欺骗进行报复似的，经常尖刻而愤恨地嘲笑那些教士和宗教教条。

他是个习与性成的禁欲主义者，对物质的需求很低，而且像所有从小习惯干活儿的人一样，肌肉发达，对任何体力工作都能轻轻松松地胜任，既干得多，又干得巧，不过，他最珍惜的是时间，在监狱和旅站上也学习不止。他现在正在研读马克思的第一卷[【6】](#)，非常仔细地把这本书藏在自己的行李袋中，当作无价之宝。他对所有的同志都很疏远和冷淡，只有诺沃德沃罗夫是个例外，他对他特别信赖，把他的所有见解，全部奉为不可辩驳的真理。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认为她们是一切正当工作的障碍。但对玛丝洛娃却表示同情，对她很亲热，因为他觉得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一个典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和他说话，也不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同他打招呼，他才伸出自己的手。

十三

炉子生好，牢房暖和起来。茶煮开后，倒在一个个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变成了白色。面包圈、新鲜的精粉面包、白面面包、熟鸡蛋、奶油、牛头和牛蹄都一一摆了出来。大家凑到当桌子用的板铺前，又喝，又吃，又聊。

兰采娃坐在一只箱子上，给大家倒茶。所有的人，除了克雷利佐夫，全都围在她的身旁。克雷利佐夫脱掉湿皮袄，用烤干的毛毯裹着身子，躺在自己的床上和聂赫留朵夫说话。

他们在寒冷和潮湿的天气里走了一天路，发现这里又脏又乱，花去不少力气清理干净，现在吃到东西，喝到热茶，大家的心情显得十分开心和高兴。

隔墙传来刑事犯们跺脚、喊叫和对骂的声音，似乎在提醒他们周围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这反而更加强了他们此刻的舒适感。这些人仿佛是在大海中的孤岛上，一时间没有感觉到周围那些屈辱和痛苦的浪潮向他们袭来，因而处在昂扬的状态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只是对他们目前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避而不谈。除此之外，他们也像一般的青年男女一样，尤其是他们这些被迫朝夕相处的人，相互之间自然会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匹配或不匹配的感情。他们几乎都在谈恋爱。诺沃德沃罗夫爱上了漂亮而爱笑的格拉贝茨。这个格拉贝茨是高等女校的学生，年纪很轻，不爱思考问题，对革命毫无兴趣。可是，她受到时代的影响，卷入某个案件，被判处流放。入狱之前，她生活的主要兴趣是博取男人的欢心，而且总是大获成功，后来在审讯中，在狱中，在流放中，她也同样如此。这次流放途

中，诺沃德沃罗夫迷恋她，让她感到安慰，她自己也爱上了他。薇拉·叶甫列莫夫娜是个很多情的女子，却不能引起别人对她的爱，她时而爱上纳巴托夫，时而爱上诺沃德沃罗夫，总希望对方能有回应。克雷利佐夫对玛丽娅·谢季宁娜的态度也有点儿恋爱的意思。他像男人爱女人一样地爱她，可是他知道她的恋爱观，于是把自己的感情巧妙地伪装成友情和感激，感激她对他特别悉心的照顾。纳巴托夫和兰采娃陷入了十分复杂的爱情关系。如果说玛丽娅·谢季宁娜是个完全贞洁的处女，那么兰采娃也是个完全忠贞的妻子。

她十六岁上中学的时候，爱上了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兰采夫，十九岁嫁给了他，他当时还在大学读书。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入学潮，被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她放弃正在学习的医学课程，同他一起出走，也成了革命者。假如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世界上最出色和最聪明的人，她不会爱上他，更不会嫁给他。既然她爱上并嫁给了一个在她看来是世界上最出色和最聪明的人，她自然就按她的这位世界上最出色和最聪明的人的观点，来理解人生和人生的目的。他起初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学习，她也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学习。他成了革命者，她也成了革命者。她能够很好地证明现行的制度是不可容忍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与这种制度作斗争，并建立一种新的

政治经济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人的个性可以得到自由的发展，等等。她以为，她真的是这么想的，也真的是这么认识的，然而实际上，她想的不过是丈夫所想的一切都是真理罢了；她追求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和丈夫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才能在精神上获得满足。

别离丈夫和孩子——孩子已由她的母亲领去——这是让她很痛苦的事。可是，她坚强而镇静地忍受着与亲人的别离，因为她知道，她忍受这一切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这一事业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在为它奋斗。她的心永远同丈夫在一起，正如她以前除了丈夫，没有爱过别的人，现在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别的人。可是，纳巴托夫对她的忠贞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使她无法平静。他是一个道德高尚、意志坚强的人，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像对待妹妹那样关怀她，可是在他对她的态度中，却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超越常情的东西，这种感情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目前的艰苦生活。

因此说来，在这群人当中，只有玛丽娅·谢季宁娜和马克尔·孔德拉季耶夫与情爱毫不相干。

十四

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等大家喝过茶、吃过晚

饭之后，才能和玛丝洛娃单独谈谈，所以仍坐在克雷利佐夫旁边和他聊天。他顺便对他讲了马卡尔刚才说的话和他犯罪的经过。克雷利佐夫目光炯炯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注意听他讲话。

“是啊，”克雷利佐夫突然说。“我常常在想，我们是和他们一起，肩并肩地走路——‘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我们为之去流放的那些人。可是我们不仅不了解他们，而且也不想了解他们。他们呢，比这更糟，他们恨我们，认为我们是他们的敌人。这才可怕呢。”

“没有什么可怕的，”一直在听他们谈话的诺沃德沃罗夫说。“群众总是只认权力的，”他用他那刺耳的嗓音说。“政府掌权，他们认政府，仇恨我们；明天我们掌权，他们就认我们……”

这时，隔墙传来一阵叫骂声、推人撞墙声、铁镣的叮当声、尖叫声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喊：“救命啊！”

“瞧，他们这群野兽！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什么好来往的？”诺沃德沃罗夫平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刚才聂赫留朵夫讲了这么一件事，”克雷利佐夫激动地说，接着他把马卡尔冒着生命危险救同乡的事讲了一遍。“这可不是野兽干得出来的，这是一种舍己为人的英勇行为。”

“温情主义！”诺沃德沃罗夫讽刺地说。“我们

很难理解这些人的情感和他们的行为动机。你说这是舍己为人，没准儿这是对那个苦役犯的嫉妒呢。”

“你怎么这么不愿意看见别人身上有一点儿好的东西。”谢季宁娜突然生气地说（她对所有的人都称“你”）。

“没有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怎么没有，那个人不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救人吗？”

“我以为，”诺沃德沃罗夫说，“如果我们想干我们的事业，那么首要的条件（孔德拉季耶夫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注意听自己导师的讲话），就是不要瞎想，而是要如实地看待事物。要为人民大众做一切能做的事情，而不要指望他们会怎么样；大众是我们工作的对象，可是只要他们像现在这样消极怠惰，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作者。”他如同演讲似的说起来。“所以，在我们没有帮助他们完成自身的发展之前，期望他们来帮助我们，那纯粹是幻想。”

“什么自身发展？”克雷利佐夫涨红了脸，说。“我们常说，我们要反对恣意妄为和独断专行，难道你这不是最可怕的独断专行？”

“这自然不是什么独断专行，”诺沃德沃罗夫平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该走哪条路，我可以给他们指出这条路。”

“可是你凭什么说你指出的路是正确的呢？难道这不是产生宗教裁判所和大革命屠杀【7】的那种独断专行吗？他们也是凭书本理论知道那是惟一正确的道路的。”

“他们迷失了方向，并不意味着我也迷失方向。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和精密的经济学数据是有很大差别的嘛。”

诺沃德沃罗夫的声音充满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他的人都沉默不语。

“老是争论。”等他稍有停顿，谢季宁娜说道。

“您自己对这事怎么看？”聂赫留朵夫问她。

“我想，克雷利佐夫是对的，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人民。”

“那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着问，心中却害怕她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

“我想，老百姓是受欺负的，”她说，脸一下红了起来，“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得对，卡秋莎，说得对，”纳巴托夫大声说，“老百姓受尽了欺负。要让他们不再受欺负。我们的全部事业就是为了这个。”

“这是一种关于革命任务的奇谈怪论。”诺沃德沃罗夫说完，不再作声，生气地抽起烟来。

“我没法儿和他说话。”克雷利佐夫小声说了句，也不做声了。

“那就最好别说。”聂赫留朵夫说。

十五

尽管诺沃德沃罗夫受到所有革命者的很大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算得上是个聪明的人，聂赫留朵夫却把他归入在道德品质上低于一般水平的革命者之内，尽管他们的道德品质比他还要低。这个人的智力——好比分子——很高；但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更高，高到不可不约分的地步，而且早就超过了他的智力。

这个人的精神生活，恰好与西蒙松完全相反。西蒙松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主要具有男人气质，他们的行为源于思想的活动，并受到它的制约。诺沃德沃罗夫却属于另一类人，他们主要具有女人气质，他们思想的活动，一部分用于达到感情所确立的目标，另一部分用于证明由感情所引起的行为是正确的。

诺沃德沃罗夫的整个革命活动，尽管他善于用各种令人信服的理由把它说得头头是道，在聂赫留朵夫看来，却仅仅是出于虚荣心和想出人头地罢了。起初，他凭着善于领会别人的思想和准确表达这些思想的能力，在求学期间，在极为看重这种能力的师生当中（在中学、大学和硕士学位班），他做到了出人头地，并因此感到心满意

足。可是，等他领到文凭，离开学校之后，这种出人头地的情况不复存在，于是，正如不喜欢诺沃德沃罗夫的克雷利佐夫对聂赫留朵夫说的，为了能在新环境中出人头地，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从渐进主义的自由派，一下变成了红色民意党人。由于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令人产生怀疑和犹豫的道德和审美方面的特点，他很快在革命者的圈子里占据了党的领导者的位置，虚荣心又一次得到满足。一旦选定方向，他从不怀疑，从不犹豫，所以也就相信他从不犯错误。他觉得，一切事物都是非常简单、清楚和无可怀疑的。而在这种狭隘和片面的眼光里，一切的确是十分简单和清楚的，人需要的仅仅是，正如他说的，仅仅是一个有逻辑的头脑。他的自信心过于强大，致使别人要么对他敬而远之，要么惟命是从。因为他是在非常年轻的人们中间开展活动的，这些年轻人往往把他的极度自信当成深谋远虑和英明果断，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也就在革命者的圈子里赢得了很大的威望。他活动的内容是准备暴动，通过暴动夺取政权，然后召开大会，并在会上提出由他拟定的纲领。他完全相信，这个纲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必须予以实施。

同志们因他勇敢和果断而尊重他，却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把所有杰出的人物看成

自己的对手，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很乐意用老公猴对待小猴的办法对待他们。他恨不得把别人的智慧和才能全部夺过来，免得他们妨碍他发挥自己的才智。他仅仅对那些崇拜他的人笑脸相待。如今在前往流放地的路上，他就是这样对待接受他宣传的工人孔德拉季耶夫，还有薇拉·叶甫列莫夫娜和漂亮的格拉贝茨，因为她们俩人爱上了他。虽然他原则上赞成解决妇女问题，但在内心深处却认为所有女人都是愚蠢和卑鄙的，只有他所热恋的女人除外，比如他现在爱上格拉贝茨，所以现在他就认为她们是不同寻常的女人，不过她们的优点仅仅他一个人才能发现。

两性关系的问题，在他看来，如同其他的问题一样，是非常简单而清楚的，只要承认恋爱自由，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有过一个非正式的妻子，还有一个正式的妻子，但同后者已经分手，因为他确信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他又打算和格拉贝茨缔结新的自由婚姻。

他鄙视聂赫留朵夫，因为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用他的话说，是在“装模作样”，尤其因为聂赫留朵夫在思考现行制度的缺陷和纠正的方法时，竟敢和他诺沃德沃罗夫的想法不一致，甚至竟敢有自己的一套，公爵老爷的一套，也就是混账的一套。聂赫留朵夫知道诺沃德沃罗夫对自己

的态度，可是令他伤心的是，尽管他一路上心情很好，却对诺沃德沃罗夫不得不以牙还牙，而且怎么也无法抑制对这个人的极度反感。

十六

隔壁牢房里传来长官说话的声音。大家安静下来，随后走进班长和两个押解兵。这是要点名了。班长用手指指着每一个人，清点人数。当数到聂赫留朵夫时，他和颜悦色地说：

“公爵，一会儿点完名就不能待在这儿了。该走啦。”

聂赫留朵夫明白这话的意思，走到他跟前，把事先准备好的三个卢布塞给他。

“哎，真拿您没办法！您再坐坐吧。”

班长正要走，另一个军士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瘦高个儿的犯人，留着稀稀的胡子，一只眼睛带着伤。

“我来看孩子。”犯人说。

“瞧啊，爸爸来了。”忽然响起一个清脆的童音，接着有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从兰采娃的身后探出来。兰采娃正和谢季宁娜、玛丝洛娃一起，用兰采娃贡献出来的裙子给小女孩缝一件新衣服。

“是我，闺女，是我。”布佐夫金亲切地说。

“她在这儿很好，”谢季宁娜痛苦地看着布佐夫金被打伤的脸，说。“把她放在我们这儿吧。”

“太太们给我做新衣服呢，”小女孩说，指着兰采娃手里的活儿让父亲看。“好看，红……红色的，”她咿咿呀呀地说。

“你想睡在我们这儿吗？”兰采娃抚摩着小女孩说。

“想。还有爸爸也睡。”

兰采娃笑了。

“爸爸可不行，”她说。“您把她留下吧，”她对父亲说。

“好吧，留下吧。”班长站在门口说，然后和军士一起走了。

押解人员刚一出去，纳巴托夫走到布佐夫金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

“喂，老哥，你们那儿的卡尔马诺夫想和人调包，是真的吗？”

布佐夫金那温和忠厚的脸一下变得阴郁起来，眼睛也像是蒙上了一层薄膜。

“我们没听说。不会吧，”他说，眼睛上的薄膜还没有去掉，又加上一句：“好啦，阿克休莎，你就和太太们享福吧。”然后，急忙走了出去。

“他全知道，没错，调包了，”纳巴托夫说。“您想怎么办呢？”

“到城里我告诉当官的。我知道他们俩的长相。”聂赫留朵夫说。

大家没有说话，显然怕再次引起争论。

西蒙松双手枕在脑后，一直默默不语地躺在角落里的床铺上，这时果断地站起来，小心地绕过坐着的人，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您现在能听我说几句话吗？”

“当然。”聂赫留朵夫说完，站起来要跟他走。

卡秋莎看了一眼站起身的聂赫留朵夫，和他的目光相遇之后，脸红了，仿佛不解似的摇了摇头。

“我跟您说的是这么一件事，”等他和聂赫留朵夫一起来到走廊上，他开口说。走廊里，刑事犯那边的嗡嗡说话声和叫喊声听得特别清楚。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西蒙松显然对此并不在意。“我知道您和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8]的关系，”他用那双善良的眼睛认真地望着聂赫留朵夫，继续说，“所以我认为有责任，”他说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因为门口有两个声音一齐喊叫起来，像是在争吵什么。

“告诉你吧，笨蛋：不是我的！”一个声音喊道。

“卡死你，魔鬼。”另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这时，谢季宁娜来到走廊上。

“这儿怎么能说话呀，”她说，“到这儿来吧，那儿就薇拉一个人。”于是她在前面走，进入旁边一个很小的房间，显然是单身牢房，现在归女政治犯使用。薇拉·叶甫列莫夫娜蒙头躺在床铺上。

“她偏头疼，睡着了，听不见的，我走啦！”谢季宁娜说。

“别走，你留下吧，”西蒙松说，“我没有秘密瞒着别人，更不要说瞒着你了。”

“那好吧。”谢季宁娜说完，像小孩儿那样来回挪着身子，挪到床铺里面坐下，准备听他们讲话，那双羔羊般美丽的眼睛望着远处。

“我要说的事儿是，”西蒙松重复说，“我知道您和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的关系，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告诉您我和她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事呀？”聂赫留朵夫问，对西蒙松这种坦率而真诚的态度，不由得十分赞赏。

“就是说，我想和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结婚……”

“真奇怪！”谢季宁娜说，眼睛不停地看着西蒙松。

“……我决定向她提出，要她做我的妻子……”西蒙松继续说。

“我能做什么呢？这要看她的意思呀。”聂赫留朵夫说。

“是的，可是这个问题不经过您，她自己不能解决。”

“为什么？”

“因为在您和她的关系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以前，她不好作出选择。”

“从我这方面说，问题已经得到明确的解决。我不过是在做我认为应当做的事，此外，就是改善她的处境，可是绝不希望她受到约束。”

“是的，可是她不愿意接受您的牺牲。”

“根本不是什么牺牲。”

“而且我知道，她这个主意是毫不动摇的。”

“那您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呢？”聂赫留朵夫说。

“她想要您也承认这一点。”

“我怎么能承认我不应该去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呢。我能说的只有一点，这就是我没有选择的自由，而她是有这种自由的。”

西蒙松沉思起来，片刻没有出声。

“好，我就这样告诉她。您不要以为我是迷上她了，”他继续说。“我爱她，因为她是个少见的好人，吃了许多苦。我对她毫无所求，只是非常想帮助她，减轻她的苦……”

聂赫留朵夫听到西蒙松说话时声音发抖，不由得感到惊讶。

“……减轻她的苦难，”西蒙松继续说。“如果

她不想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帮助吧。要是她同意，我就要求把我流放到她监禁的地方去。四年的时间，又不是一辈子。有我在她身边，也许会减少她的痛苦的……”他又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我怎么说才好呢？”聂赫留朵夫说。“我很高兴，她找到了您这样的保护人……”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西蒙松继续说。“我想知道，既然您爱她，愿意让她幸福，那您认为她和我结婚会幸福吗？”

“肯定会有的。”聂赫留朵夫语气坚决地说。

“这事要由她做主，我只是希望这个受尽苦难的人能够得到安宁。”西蒙松说完，用孩子般亲热的神情望着聂赫留朵夫，这个一向脸色阴沉的人会有这种表情，是让人想像不到的。



西蒙松站起来，握住他的手，把脸凑到他面前，腼腆地微微一笑，吻了吻他。

“那我就这样告诉她。”他说完，走了出去。

十七

“啊，怎么搞的？”谢季宁娜说。“他恋爱了，真的恋爱了。没想到啊，弗拉基米尔·西蒙松也恋爱了，而且是一种最蠢笨的、最孩子气的恋爱。太奇怪了，说真的，也太让人伤心了。”她叹了口气，最后说。

“可是她，卡秋莎呢？您认为她会怎么看这事儿？”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谢季宁娜顿了一下，显然想尽可能准确一些回答这个问题。“她吗？您要知道，她过去虽然有过那事，可她本性上是个品行很端正的人……很能体贴人……她爱您，爱得很纯真，要是能为您做点儿事，哪怕是像是拒绝您的好意这样的事，免得您跟她受拖累，她也会觉得很幸福。对她来说，同您结婚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前的那些事更坏，所以她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再说，您总是出现在她身边，让她感到不安。”

“那怎么办呢，我得离开吗？”聂赫留朵夫说。

谢季宁娜天真而可爱地笑了笑。

“是的，离开一部分。”

“怎么能离开一部分呀？”

“我瞎说呢；不过，我想对您说说她的情况，她大概看出他那种狂热的爱有点儿荒唐（他还没对她说什么），所以她是又高兴，又害怕。您知道，我在这方面并不在行，可是我觉得，从他那方面说，这是最普通的男人的感情，尽管有点儿遮遮掩掩。他说，这种爱情能激发他的力量，还说这种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不过我知道，如果说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爱情的话，那它的基础肯定也还是肮脏的……就像诺沃德沃罗夫和格拉贝茨一样。”

谢季宁娜一谈到她喜爱的话题，总是偏离本题。

“可我到底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问。

“我想，您应当告诉她。把事情说清楚，总是一件好事。您同她谈谈，我去叫她。行吗？”谢季宁娜说。

“好吧。”聂赫留朵夫说。于是谢季宁娜出去了。

当小小的牢房里剩下聂赫留朵夫一个人的时候，他听着薇拉·叶甫列莫夫娜轻微的呼吸和偶尔发出的呻吟，以及隔着两个牢门从刑事犯那里传来的喧闹，心中出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西蒙松对他说的话，为他解除了他肩上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往往让他觉得沉重而别扭，不过，他的心情却没有因此变得轻松，反而变得有些不快和痛苦。在这种心情里面还存在着这样的成分，那就是西蒙松求婚的举动破坏了他的行为的特殊性，也降低了他所做的牺牲在他自己和别人心目中的价值：既然一个跟她毫不相干的人，当然也是个高尚的人，尚且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同她结合在一起，那么他的牺牲行为也就微不足道了。这里面也许还有一种醋意在作怪：他早已习惯了她对她的爱，容不得她再去爱别的人。再有，这样一来，打破了他的原定计划——在她服刑期间同她生活在一起。假如她嫁给西蒙松，他的存在已属多余，他不得不重新设定生活方案。他还没有来得及理清自己的心绪，牢门已被打开，一阵更为嘈杂的刑事犯的吵闹声涌入房内（今天他们那里出了一件特别的事），接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

她快步走到他跟前。

“是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叫我来的。”她说，站在他身旁很近的地方。

“是的，我有些话要说。请坐下来。弗拉基米尔·西蒙松对我说了。”

她坐下，两手放在膝上，显得十分平静，可是，聂赫留朵夫刚一说出西蒙松的名字，她立即

变得满脸绯红。

“他对您说什么啦？”她问。

“他告诉我，想同您结婚。”

她的脸突然皱了起来，露出痛苦的样子。她闭口不语，只是垂下双眼。

“他问我是不是同意，还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这一切要由您做主，您来决定。”

“哎呀，这算什么？何必呢？”她说，用那种怪怪的、一向总能强烈打动聂赫留朵夫的斜视的目光看了看他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这种对视的目光是意味深长的。

“您来决定吧。”聂赫留朵夫重复说。

“我决定什么？”她说。“一切早就决定了。”

“不，您应当决定，是不是接受弗拉基米尔·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

“我这个苦役犯，算什么样的妻子呀？我何必要把弗拉基米尔·西蒙松也给毁了呢？”她皱起眉头，说。

“可要是您得到特赦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别管我啦。没什么要说的了。”她说完，站起身，走了出去。

十八

当聂赫留朵夫随着卡秋莎回到男牢的时候，

那里的人心情都很激动。喜欢到处走动、喜欢同所有人打交道和留心观察一切事物的纳巴托夫，带回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个消息就是，他在墙上发现一个字条，是被判处苦役的革命家佩特林写的。大家都以为佩特林早已到了喀拉河流域，现在才知道他原来不久前和刑事犯一起刚刚从这条路上过去。

“八月十七日，”字条上写着，“我一个人随刑事犯出发。涅韦罗夫原先和我在一起，可是在喀山时，他在疯人院里吊死了。我身体还好，精神也不错，希望一切如意。”

大家议论起佩特林的处境和涅韦罗夫自杀的原因。克雷利佐夫脸上带着专注的神情，一言不发，两只发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前方。

“丈夫对我说过，涅韦罗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就常常看见幽灵。”兰采娃说。

“是啊，他是个诗人、幻想家，他们这样的人蹲单身牢房是受不了的，”诺沃德沃罗夫说。“比如我吧，关在单身牢房里的时候，从不让自己胡思乱想，而是非常有条理地支配我的时间。这样我就总能熬过来。”

“有什么不好熬的？把我抓进牢房，我还常常高兴呢，”纳巴托夫用令人振作的声音说，显然想驱散阴郁的气氛。“原来什么都怕：怕自己被捕，怕牵连别人，怕毁了事业，一旦坐了牢，

就什么责任也没有啦，可以歇歇啦。坐着抽烟好啦。”

“你和他很熟吗？”谢季宁娜问，不安地打量着克雷利佐夫突然变了颜色的瘦脸。

“幻想家涅韦罗夫？”克雷利佐夫忽然像是喊了很久或唱了很久似的，喘着粗气说。“涅韦罗夫是这样一个人，就像我们的门房说的，天下少见……是啊……这是个像水晶一样通体透明的人。是啊……他不要说撒谎，连装假也不会。他不仅皮肤细嫩，而且全身像剥去皮似的，神经全露在外面。是啊……是个复杂而内心丰富的人，不是那种……唉，说这个干什么呀！……”他沉默了片刻。“我们总是争论，怎么做才好，”他愤愤地皱着眉头说。“是先教育人民，然后再改变生活方式，或者是先改变生活方式，然后再争论怎么斗争：是和平宣传，还是恐怖手段？我们争论，是啊。可是他们却不争论，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们根本不在乎死多少人，几十人，几百人，而是要死什么样的人！他们恰恰就是要所有的好人都死光。是啊，赫尔岑说过，十二月党人一遭取缔，整个社会的水平就降低了。怎么能不降低呢！后来连赫尔岑和他的同辈人也遭到取缔。现在轮到涅韦罗夫们了……”

“人是消灭不光的。”纳巴托夫用他那令人振奋的声音说。“总会有人留下传种的。”

“不，如果我们对他们心慈手软，就留不下人来，”克雷利佐夫不让人打断他的话，提高嗓门说。“给我支烟。”

“这对你不好，阿纳托里，”谢季宁娜说，“请不要吸烟。”

“哎，别管，”他生气地说，抽起烟来，可是马上就开始咳嗽；难受得好像要吐。他吐了口痰，继续说：“我们的做法不对劲儿，对，不对劲儿。不要光发议论，大家要团结……去消灭他们。是啊。”

“可他们也是人呀。”聂赫留朵夫说。

“不，他们不是人，他们能做出那些事，就不是人……不过，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还有飞艇呢。是啊，要是坐着飞艇飞上天，向他们扔炸弹，把他们像臭虫一样统统炸死……是啊，因为……”他正要說下去，可是脸涨得通红，突然更厉害地咳嗽起来，嘴里有血涌出。

纳巴托夫跑出去取雪。谢季宁娜拿来缬草酊给他，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一只又白又瘦的手把她推开，艰难而急促地喘着气。等到雪和冷水使他稍稍镇定下来，又扶他躺下，聂赫留朵夫同大家告辞，跟着早已来接他并等候多时的军士向大门口走去。

刑事犯们这时不再吵闹，大部分人已睡着了。尽管牢房里的床上和床下睡满了人，过道上

也睡满了人，但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人，于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睡在走廊的地板上，头枕着行李袋，身上盖着潮湿的囚袍。

从牢门里和走廊上传出鼾声、呻吟声和梦呓声。到处都能见到盖着囚袍、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犯人的身体。只有单身男刑事犯的牢房里有几个人没有睡，他们围着一个蜡烛头坐在墙角里，一看见士兵过来，就把蜡烛火熄灭了；走廊里还有一个老头儿，坐在灯的下面，光着身子捉衬衫上的虱子。政治犯牢房里被污染过的空气，同这里又臭又闷的空气相比，似乎显得干净多了。那盏冒烟的灯，看起来像是在雾里一样，人呼吸都感到困难。要想穿过走廊而不踩着或绊着睡觉的人，必须先看好一个空地，把一只脚落下去，然后再找另一个落脚的地方。有三个人，显然在走廊里没有找到地方，睡到了门廊里，紧挨着从裂缝里往外渗粪汁的臭烘烘的便桶。三人当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在路上常常见到的痴老头。另外还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躺在两个男犯中间，头枕着一个男犯的大腿。

走出大门后，聂赫留朵夫停住脚步，舒展开胸膛，久久地用力呼吸着寒冷的空气。

外面已是满天星光。聂赫留朵夫沿着上了冻、只有个别地方还有些发软的土路，回到客店，敲了敲黑糊糊的窗户，宽肩膀的茶房光着脚给他开开门，把他让进门廊。从门廊右首一间黑暗的小屋里传来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大门内的院子里，可以听见许多马咀嚼燕麦的声音。左首是通往上房的门。在干净的上房里，充满了艾蒿和汗臭的气味，隔板后面不知是谁那强壮的肺发出均匀的鼾声，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红玻璃罩的长明灯。聂赫留朵夫脱去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到漆布沙发上，放好枕头，躺下身子，头脑里回想起一天来的所见所闻。在聂赫留朵夫今天见到的所有景象当中，最让他感到可怕的是那个头枕男犯的大腿、睡在便桶渗出的粪汁里的男孩。

尽管今晚他与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出乎意外，而且也很重要，但他没有再费心思去想这件事：他和这件事的关系过于复杂，结果如何还不知道，因此索性不去管它。于是，他更为清楚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们在窒闷的空气里喘息和在臭烘烘的便桶渗出的粪汁里睡觉的情景，尤其是那个一脸天真的男孩，他睡在男犯大腿上的样子，久久萦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知道远处什么地方有一些人折磨另一些人，让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腐蚀、非人的屈辱和苦难，与三个月来亲眼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

些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聂赫留朵夫现在体验到的正是这一点。他在这三个月当中，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究竟是我疯了，所以才看见这些别人看不到的人，还是那些人疯了，所以才做出我看得见的那些事？”不过，既然这些人（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在做那些让他震惊和恐惧的事时，那么心安理得地相信，他们的做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和十分有益——那就很难让人认为他们是疯子；他也不能认为自己是疯子，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头脑非常清醒。因此，他经常处在困惑之中。

聂赫留朵夫这三个月当中的所闻所见，使他得出了以下的看法：经由法院和行政机构从自由人中间挑选出来的是一些最易冲动、最易急躁、最易激动、最具才气和最刚强，同时也比别人最少狡猾和谨慎的人，这些对社会来说并不比那些仍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或更危险的人，第一，被囚禁在监狱、旅站牢房和服苦役的地方，在那里一关就是几个月或者几年，让他们无所事事，衣食无忧，远离自然、家庭、劳动，也就是处在人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外。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人在这些机构中遭受各种不必要的凌辱——戴镣铐、剃去半边头发、穿耻辱服，也就是让这些弱小的人失去良好生活的主要动力——失去对他人意见的关注，失去羞耻心和人的尊严

感。第三，他们经常有生命危险——且不说中暑、溺水、火灾这些意外情况——监禁地时常流行的传染病，体力衰竭和遭到毒打，都能让他们丧命，经常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一个最善良、最有品行的人，也会出于自卫心理，干出最残忍可怕的事来，而且还会原谅别人干这种事。第四，这些人被迫同那些被生活腐蚀（尤其是像这种机构的腐蚀）的淫棍、杀人犯和歹徒们朝夕相处，他们像酵母发面一样，对所有还没有被常用的手段完全腐蚀的人，起到发酵的作用。最后，第五点，凡是遭到这种戕害的人，无不通过最具说服力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非人道的行径，通过虐待儿童、妇女和老人，通过用树条或皮鞭抽打，通过奖励捕捉或杀死逃犯的人，通过拆散夫妻和促使有夫之妇与有妇之夫私通，通过枪毙、绞刑的方式——通过这种最具说明力的方式，明白了一个道理：各种各样的暴行、残酷行为和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不仅不会遭到禁止，而且还会得到政府的许可，如果这一切施之于那些贫困、不幸和没有自由的人身上，就会更加得到许可。

所有这类机构似乎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其他环境中不可能得到的这种集中的腐化和罪恶，然后再把它们最大限度地散布到全民中去。“就像规定任务一样，要用最好的、最有

效的方法尽量去多腐蚀人。”聂赫留朵夫仔细分析着监狱和旅站上发生的事情，想。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最严重的腐蚀，等他们被完全腐蚀之后，再放出来，目的是让他们把在监狱里学到的腐化的东西，带到民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以及在沿途的各个旅站上，聂赫留朵夫亲眼见到，这个似乎由社会自己设定的目标，正在顺利地实现着。那些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本来具有俄国的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准则，却放弃了这些观念，而接受了监狱里流行的新观念，这种观念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的任何侮辱、暴虐乃至杀害，只要是有利的，就是可以容许的。凡是蹲过监狱的人，往往通过他们亲身的遭遇，明白了一个道理，教会和道德大师们所宣扬的那套尊重人和同情人的道德信条，在现实生活中已被废弃，所以他们也不必去遵循这些信条。聂赫留朵夫在所有他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费多罗夫是这样的，马卡尔是这样的，甚至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待了两个月后，也以他那不道德的见解让聂赫留朵夫感到吃惊。聂赫留朵夫在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逃去原始森林，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逃，然后却杀死同伴，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过一个人，被控犯有这种罪行，而且供认不讳。更为可怕的是，这

种吃人的现象并非绝无仅有，而是经常发生。

只有在这类机构制造的罪恶的特别培育下，一个俄罗斯人才会落到这种流浪汉的可怕境地，他们甚至走在了尼采最新学说^[9]的前头，他们认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去做，都不会受到限制，并把他们这种学说先在犯人当中散布，然后再传播到全体人民中间去。

对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的惟一解释，照书本上所说的，是为了制止犯罪，威慑罪犯，改变罪犯和依法惩处。然而，事实上这四种作用根本就不存在。不仅没有制止犯罪，反而推广犯罪。不仅没有威慑罪犯，反而鼓励罪犯，其中有不少罪犯，像流浪汉那样，是自愿入狱的。不仅没有改造罪犯，反而系统地传播恶行。至于依法惩处的必要，不仅没有因政府的刑罚而减少，反而在原本没有这种必要的人民中间培植了这种必要。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无法找到答案。

最令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一切不是出于偶然，不是出于误会，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几百年来屡见不鲜的现象，区别仅仅在于，以前是削鼻子、割耳朵，后来是打烙印、鞭笞，现在是戴镣铐，押运犯人不用大车，而用火车和轮船。

有些政府官员对他说，这些令他愤慨的事，是由于监禁和流放地点的设施不完备造成的，一

旦建成新式监狱，这一切都可以得到纠正——这种论调不能让聂赫留朵夫感到满意，因为他知道，这些令他愤慨的事并不是由监禁地点的设施造成的。他读过有关改良监狱的书，塔尔德推荐安装电铃、使用电刑，这种改良的暴力更令他愤慨。

聂赫留朵夫感到愤慨的，主要是坐在法院和政府各部门里的那些人，拿着从人民身上搜刮的高薪，干的却是这样的勾当：他们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的本本，把违反他们所写法律的人们的行为，纳入条款，并根据这些条款把这些人发配到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地方去，到了那里他们这些人在残忍粗暴的监狱长、看守和押解官兵的淫威之下，成千上万地从精神和肉体上一一消亡。

聂赫留朵夫对监狱和旅站的情况进一步了解之后，发现犯人之间日益加重的恶习：酗酒、赌博、残忍，以及囚犯们所干的种种可怕的罪行，乃至人吃人的兽行——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那些麻木不仁的学者为迎合政府而说的退化、犯罪型、畸形发展的表现，而是一些人可以惩罚另一些人这种谬论的必然结果。聂赫留朵夫看到，人吃人的现象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而是从政府各部、各委和各司里开始的，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完成而已；比如他的姐夫，以及所有

的法官和其他的官吏，从民事执行吏到大臣，丝毫不关心常挂在他们嘴边的正义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关心的只是卢布，而付给他们卢布的目的，是要他们去做那些产生腐化和苦难的事情。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这一切能说是误会吗？怎样既发给这些官吏薪水，甚至还发给他们奖金，才能让他们不干现在干的这些事呢？”聂赫留朵夫想。当他想到这里，公鸡已经叫过两遍，尽管他稍一动弹，跳蚤就像喷泉一样溅落到他身体的周围，他还是酣然入睡了。

二十

等聂赫留朵夫一觉醒来，马车夫们早已上路了。老板娘喝足了茶，用手绢擦着汗津津的粗脖子，走过来说，旅站上有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谢季宁娜写的。她说，克雷利佐夫这次发病比他们想的要严重得多。“我们一度想把他留下，我们也留下来照顾他，可是没有得到准许，所以只好把他带走，可是又非常担心。请您到城里设法疏通一下，如果能让他留下，最好也让我们当中留下一个人。假如这事需要我嫁给他，我自然义不容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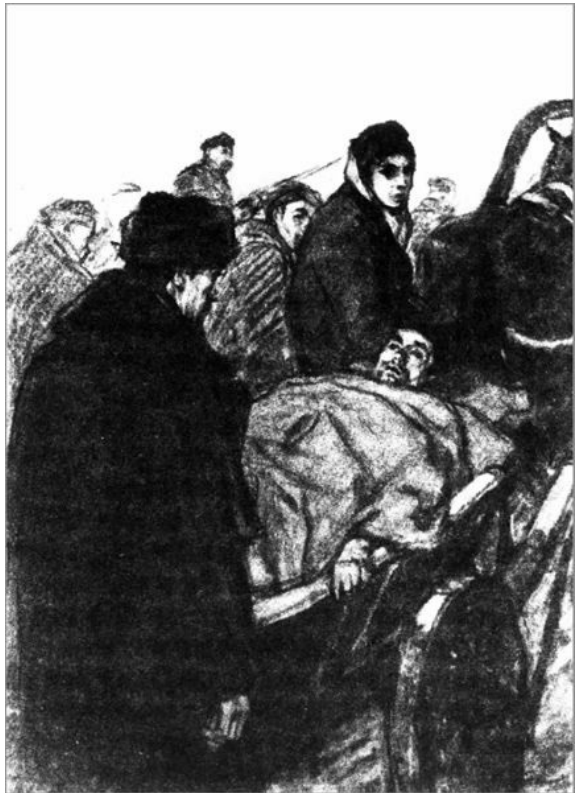
聂赫留朵夫打发茶房到驿站叫马车，他自己

也赶忙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有一辆三驾马车，响着铃铛，车轮在冰冻的泥地上发出像在石头马路上一样轰隆的声音，朝大门口驶来。聂赫留朵夫和粗脖子老板娘算过账，匆匆出了门，在马车的软座上坐好，吩咐车夫赶快一些，希望能追上犯人的队伍。他的马车过了牧场大门不远，真的赶上了犯人的大车，车上装着行李和病号，在开始打滑的冰地上发出笨重的辘辘声（押解官不在，他到前面去了）。士兵们显然多喝了点儿酒，快活地说东道西，在后边大路两旁走着。车辆很多，前头的大车每辆坐六个刑事犯，显得很挤，后头三辆车上——每辆三个人——坐的是政治犯。最后一辆车上有诺沃德沃罗夫、格拉贝茨和孔德拉季耶夫，倒数第二辆车上是兰采娃、纳巴托夫和那个害风湿病的弱女人，她的位子 是谢季宁娜让出来的。第三辆车上铺着干草，放着枕头，克雷利佐夫躺在上面。谢季宁娜挨着他坐在驭座上。聂赫留朵夫让马车在克雷利佐夫旁边停下，然后向他走去。一个醉醺醺的押解兵朝聂赫留朵夫摆了摆手，可是聂赫留朵夫没有理睬他，径直走到大车前，抓着车上的栏杆，跟着车往前走。克雷利佐夫穿着皮袄，戴着羊羔皮帽，嘴上包着一块手绢，样子更瘦，也更苍白了。那双漂亮的眼睛显得特别大、特别亮。他的身子随着车的颠簸微微晃动，眼睛眨也不眨

地看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只是闭上眼睛，生气地摇摇头。他的力气显然全被大车颠簸光了。谢季宁娜坐在大车的另一侧。她意味深长地和聂赫留朵夫交换了一下目光，表示她对克雷利佐夫身体状况十分担忧，然后立即又用快活的调子说起话来。

“看来，押解官有些不好意思啦，”她大声说，以便让聂赫留朵夫在轰隆的车轮声中听清她的话。“把布佐夫金的手铐摘掉了。他自己抱着孩子，卡秋莎、西蒙松，还有接替我的薇拉，同他们一起走呢。”

克雷利佐夫用手指着谢季宁娜，说了句含糊不清的什么话，接着皱起眉头，显然强压着咳嗽，摇起头来。聂赫留朵夫把头凑过去，想听清他说什么。于是，克雷利佐夫从手绢里露出嘴巴，低声说：



“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聂赫留朵夫肯定地点点头，并和谢季宁娜交换了一下眼色。

“喂，三个天体的问题怎么样啦？”克雷利佐夫又低声说，吃力地苦笑了一下。“不好解决吧？”

聂赫留朵夫不明白这话的意思。谢季宁娜向他解释说，这是一个确定太阳、月球、地球三个天体关系的著名数学问题，克雷利佐夫开玩笑，把聂赫留朵夫、卡秋莎、西蒙松三人的关系比作那个问题了。克雷利佐夫点点头，表示谢季宁娜正确地解释了他的玩笑。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我。”聂赫留朵夫说。

“接到我的字条了吗？您能办吗？”谢季宁娜问。

“一定办，”聂赫留朵夫说完，发现克雷利佐夫脸上有不悦的神情，于是走回自己的马车，爬上凹陷的车座，双手扶住两边的栏杆，因为马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得很厉害。他开始追赶步行的犯人，他们穿着灰色囚袍或短皮袄，脚上戴着铁镣或两人戴着一副手铐，排成一俄里长的队伍。聂赫留朵夫在道路的另一侧认出了卡秋莎的蓝头巾、薇拉的黑大衣，还有西蒙松的短上衣、绒线帽子和白色羊毛长袜，袜子上系着带子，像是穿了凉鞋似的。他和她们并排走着，嘴里起劲

几地说着什么事。

看到聂赫留朵夫，两个女人朝他点头致意，西蒙松郑重地摘了摘帽子。聂赫留朵夫没有话要说，于是没让车夫停下，走到他们前边去了。马车又上大路之后，车夫把车赶得更快了，不过得时常离开大道，以便绕过排成两行的长长的车队。

这条坎坷不平、布满深深的车辙的大路通过一座阴暗的针叶林，路的两旁有白桦树和落叶松，还没有落尽的树叶，呈现出耀眼的土黄色。这天的路程走了一半的样子，树林已到了尽头，道路两侧出现了开阔的田野，修道院的金十字架和圆顶清晰可见。天气放晴，云雾消散，太阳升到树林的上空，潮湿的树叶、水塘、教堂的圆顶和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右前方，在灰蒙蒙的天边，有一道遥远的白色山峦。聂赫留朵夫的马车驶入城郊的一个大村子。街上全是人：有俄罗斯人，也有衣帽古怪的非俄罗斯人。喝醉的和没喝醉的男男女女，在商铺、饭馆、酒馆和货车前挤来挤去，吵吵嚷嚷。这里已给人一种靠近城市的感觉。

车夫给了右边拉套的马一鞭子，拉住右边的缰绳，并在驭座上侧转身子，好让缰绳往右收。他显然想显显本事，赶着马车在大街上飞跑，一直没有放慢速度，跑到河边。过这条河要搭乘渡

船。渡船正在水流湍急的河中央，从对岸向这边驶来。这边岸上有二十来辆大车等着过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多久。渡船逆流而行，偏向上游的高处，又被急流冲下来，很快靠在码头的木板上。

几个身材高大、肩膀宽厚、肌肉发达、寡言少语的船夫，灵巧而熟练地抛出缆索，在木桩上拴好，然后打开船门，让停在船上的车辆上岸，放岸上的车辆上船，把马车和见了水直蹿的马匹一一在船上排好。宽阔湍急的河水拍击着船舷，缆索绷得紧紧的。等渡船装满了，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和卸下的三匹马挤在车辆中间，靠船边停好，船夫关上船门，不理睬没有上船的旅客，收起缆索开了船。渡船上十分安静，只能听到船夫沉重的脚步声和马匹倒换蹄子踩在船板上的声音。

二十一

聂赫留朵夫站在船的一侧，望着宽阔而湍急的河水。他的头脑里交替浮现出两个人的形象：一个是濒危的克雷利佐夫，满脸悲愤，脑袋被大车颠得摇来晃去；一个是卡秋莎，精神饱满地和西蒙松一起沿着路边步行。前一个印象——是濒临死亡而又不想死去的克雷利佐夫——让他感到

难过和忧伤。后一个印象——是精神饱满的卡秋莎，她得到了像西蒙松这样的人的爱，从此走上坚实可靠的幸福之路——本应让人高兴，可是聂赫留朵夫对此也感到难过，而且怎么也无法消除这种难过的心情。

从城里传来教堂大钟的声音，嗡嗡颤动的钟声在河面上飘荡。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的车夫和所有赶大车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摘下帽子，画起十字来。站在离栏杆最近处的一个身材不高、头发蓬乱的老头儿，没有画十字，而是抬着脑袋，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起初没有注意他。这个老头儿穿着打补丁的上衣、粗呢长裤和一双修过的旧长筒靴。他的肩上背着行李袋，头上戴一顶高高的破皮帽。

“老头儿，你怎么不做祷告？”聂赫留朵夫的车夫戴正帽子，说。“你不是教徒吗？”

“向谁祷告？”头发蓬乱的老头儿语气坚决、不无挑衅地说，话讲得虽快，但吐字十分清楚。

“还用说向谁，上帝呗。”车夫嘲笑地说。

“那你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上帝在哪儿呢？”

老头儿的神态中有某种严肃而坚定的东西，让车夫感到他是在和一个刚强的人打交道，他多少有些心慌，但表面上却装出镇静的样子，不肯认输，不想当众丢脸，连忙回答说：

“在哪儿？那还用说，在天上。”

“你去过天上？”

“不管去过没去过，反正大家都知道，应当向上帝祷告。”

“谁也没在什么地方见过上帝。上帝是活在天父心里的独生儿子说出来的，”老头儿严厉地皱着眉头，又那样快地说。

“看样子，你不是基督徒，是洞穴人。你向洞穴祷告。”车夫说着，把鞭子别在腰上，理理拉边套的皮的皮套。

有人笑起来。

“老大爷，那你信什么教呀？”站在船边马车旁的一个不年轻的人问。

“我什么教都不信。因为除了我自己，我谁也不，谁也不信。”老头儿还是那样又快又坚决地回答。

“怎么能光信自己呢？”聂赫留朵夫插嘴说。“会做错事的。”

“一辈子都没错过。”老头儿把脑袋一扬，坚决地回答。

“那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呢？”聂赫留朵夫问。

“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就是因为只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我以前也相信别人，结果就像走进原始森林，迷了路；简直晕头转向，别想

找到出路。有人信旧教，有人信新教，有人信安息会，有人信鞭身教，有人信教堂派，有人信非教堂派，有人信奥地利教派，有人信莫罗勘教派【10】，有人信阉割派。每一个教派都说自己好。其实全都像瞎眼的狗崽儿一样，乱滚乱爬。信仰很多，可是灵魂只有一个。你有，我有，他也有。就是说，只要人人都相信自己的灵魂，大家就都联合起来了。只要人人都能保持本色，大家就会齐心啦。”

老头儿说话声音很大，不住地四下张望，显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听他讲话。

“您有这样的想法很久了吧？”聂赫留朵夫问。

“我吗？很久了。他们迫害我都二十三年啦。”

“怎么迫害？”

“耶稣那时候怎么受迫害，我现在就怎么受迫害。把我抓起来，交给法院和教士，也就是交给书呆子和伪君子；还把我送进疯人院。可他们拿我没办法，因为我自有主张。他们说：‘你叫什么名字？’以为我总该有个名字的。可是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放弃了所有的东西：我没有名字，没有籍贯，没有祖国——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我。我叫什么？我就叫人。‘多大岁数？’我说，没数过，也没法数，因为我过去存在，将来也永

远存在。他们说：‘你父母是谁？’没有，我说，我没有父亲和母亲，只有上天和大地。上天是我父亲，大地是我母亲。他们说：‘你可承认皇上？’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他的皇上，我是我的皇上。他们说：‘没法和你说话。’我说：我又没求你和我说话。我就是受的这种折磨。”

“您现在去哪里？”聂赫留朵夫问。

“走哪儿算哪儿。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要饭。”老头儿发现船就要靠岸，结束了讲话，得意洋洋地扫了所有在场的听众一眼。

渡船在岸边停住。聂赫留朵夫掏出钱包，要给老头儿钱。老头儿拒绝了。

“这我不要。面包我就要啦。”他说。

“噢，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得罪我。要得罪我其实是不可能的。”老头儿说完，把放下的口袋重新背到肩膀上。这时，聂赫留朵夫的马车也套好马，上了岸。

“老爷，您何必跟他费话呢，”等聂赫留朵夫付给身强力壮的船夫小费，坐上马车，车夫对他说。“哼，没脑子的流浪汉。”

二十二

马车上坡后，车夫转过身来。

“上哪家旅馆？”

“哪家好些？”

“没有比西伯利亚旅馆更好的了。其实久科夫也不错。”

“随你的便好啦。”

车夫转回身子坐好，让车加快了速度。这座城市和所有的城市一样：一样的带阁楼和绿色屋顶的房子，一样的大教堂、小铺和街上的商店，甚至还有一样的警察。不过房子几乎都是木头的，街道也没有铺石子。在一条最繁华的街上，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家旅馆的门前。可是这家旅馆没有空房，只好又到另一家。刚好这家有间空房，于是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第一次重新回到熟悉的干净和舒适的环境中。尽管聂赫留朵夫的这个房间算不上豪华，但在饱尝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滋味之后，他还是感到十分痛快。最要紧的是清除身上的虱子，自打他时常出入旅站以来，这东西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完全干净过。安置好行李，他立即坐车去澡堂，从那儿出来时，他已换上城里人的装束——穿上浆硬的衬衫、压出褶子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去拜访地方长官。旅馆门房给他叫的这辆套着膘肥体壮的吉尔吉斯马的四轮马车，又嘎嘎吱吱地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座漂亮的大宅子前，宅门两旁站着哨兵和警察。宅子前后是一座花园，园里的杨树和白桦树的叶子

已经落尽，露出光秃的树枝，但枞树、松树和冷杉却枝繁叶茂，一片苍绿。

将军身体不适，不见客。聂赫留朵夫说通听差把他的名片递进去，听差出来时，带回令人满意的答复：

“将军有请。”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镶木地板擦得锃亮的客厅——这一切同彼得堡很相像，只是略脏一些，但更阔气一些。聂赫留朵夫被领进书房。

将军脸色浮肿，鼻子长得像土豆，额头生着几个鼓包，头顶光秃，眼下有眼袋，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穿着鞑靼式绸袍，手里拿着香烟，坐在那儿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老兄！请原谅我穿睡袍接待您：不过总比不接待要好，”他说着，拉了拉绸袍，盖上他那堆着肥肉褶子的后脖颈。“我身体不大好，没出门。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啦？”

“我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和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我是来请阁下帮忙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件事。”

将军深吸一口烟，喝了一口茶，然后在孔雀石烟缸上把烟捻灭，用细小、浮肿、发亮的眼睛

紧盯着聂赫留朵夫，认真地听他讲。他只打断他一次，问他要不要吸烟。

将军属于那种有学问的军人，他们认为可以把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同他们的职业调和在一起。不过，他生来是个聪明而善良的人，很快感到这种调和是不可能的，为了忘掉经常出现的内心矛盾，他越来越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以至于在担任军职三十五年之后，成了医生们所谓的酒精中毒患者。他身体里面浸透了酒精。他随便喝点儿什么酒，都能喝醉。喝酒已成为他的一种需要，没有酒他就无法生活。每天一到晚上，他总是喝得大醉，不过他已适应了这种状态，走路不摇晃，说话也不特别荒唐。即便他说了也没关系，因为他身居高位，蠢话也会被人奉为醒世格言。只有早晨，也就是聂赫留朵夫见到他的这个时候，他才像个头脑清醒的人，才能听懂别人说的话，也才或多或少地以行动出色地证实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谚语：“酒醉心不醉，难得又可贵。”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不过他受的教育毕竟比别人多一点儿——尽管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之前的水平上——人又胆大、灵活、仪表堂堂，即使喝醉酒的情况下也能举止得体，所以让他一直留在他目前担任的重要位置上。

聂赫留朵夫对他说，他所关心的那个人是个

女人，她是被错判的，本人并没有犯罪，关于她的事已向皇上呈递了诉状。

“是这样。您的意思？”将军说。

“彼得堡方面答应我，有关这个女人的命运的消息，最晚这个月通知我，通知书寄到这里……”

将军眼睛没有离开聂赫留朵夫，伸出手指头很短的手，按了一下桌上的铃，依旧一言不发地听着，嘴里喷着烟雾，特别响亮地清着喉咙。

“所以我请求您，如果可能的话，在没有收到诉状的批复之前，让这个女人留在这里。”

一名穿军服的听差，也是勤务兵，走了进来。

“你去问问，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床没有，”将军对勤务兵说，“再送点茶。还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

“我还有一个请求，”聂赫留朵夫继续说。“是关于一名政治犯的，他也在这批犯人里面。”

“原来这样！”将军意味深长地点着头说。

“他病得很重，是个就要死的人了。恐怕得把他留在这儿的医院里。有一名女政治犯愿意留下来照顾他。”

“她不是他的亲属吧？”

“不是，可她准备嫁给他，如果只有这样才能让她留下来的话。”

将军用那双发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聂赫留朵夫，没有说话，显然想用这种目光让对方感到局促不安，而且一直不停地吸烟。

等聂赫留朵夫把话说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很快地舔了一下手指头，翻着书，找到有关婚姻的条款，读了一遍。

“她判的什么刑？”他从书上抬起眼睛，问。

“她判的是苦役。”

“哦，判这种刑的人，不能因结婚改善其状况。”

“可是……”

“请让我把话说完。如果是一个自由人和她结婚，她照样也得服满她的刑期。这里有个问题：谁的刑更重，是他，还是她？”

“他们俩人判的都是苦役。”

“噢，倒是挺般配的，”将军笑着说。“他怎么样，她也怎么样。他因为有病，可以留下，”他继续说，“而且自然会尽力减轻他的痛苦；可是她呢，即使嫁给他，也不能留在这里……”

“将军夫人正在喝咖啡。”勤务兵报告说。

将军点了点头，继续说：

“不过，我再考虑考虑。他们叫什么名字？请您写一下，就写在这儿。”

聂赫留朵夫写下他们的姓名。

“这事我也办不到，”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想

和病人见面，说。“我当然对您并不怀疑，”他说，“您关心他，关心别人，您又有钱。在我们这儿什么都可以买通的。人们常对我说：要根除收受贿赂。可是大家都在受贿，怎么根除得了？官职越低，受贿越多。唉，他在五千俄里之外受贿，怎么管呀？他在那儿是个小皇帝，就像我在这儿一样，”他笑了起来。“您一定常和政治犯见面，给了钱，就放您进去，是吧？”他笑着说。“是不是这样？”

“是的，确实如此。”

“我明白，您必须这么做。您想见见政治犯。您可怜他。监狱长或押解官接受贿赂，因为他就那么点儿薪水，有一家子人要养活，他不得不受贿。我要是他或者是您的话，也会像他或您这么做。可是，我在现在的位置上，却不能允许自己有丝毫违背最严格的法律条文的举动，这恰恰因为我也是人，也容易动恻隐之心。我是个善于执行命令的人，是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信任的，我应当不辜负这种信任。好啦，这个问题到此为止。现在请您谈谈你们京城里的事吧？”

于是，将军开始询问，同时也发表意见，显然既想打听一些新闻，又想表明自己的重要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哦，还有：您住哪家旅馆？是久科夫吗？哦，那地方糟得很。您到我这儿吃午饭吧，”将军一边送聂赫留朵夫，一边说，“下午五点。您会说英语吧？”

“会说。”

“那太好啦。您知道，这儿来了个英国人，是个旅行家。他在研究西伯利亚的流放和监狱状况。今天他要到我家吃饭，您一定得来。我们五点钟开饭，我妻子要求严守时间。我到时会给您答复，怎么处理那个女人的事，还有那个病号的事。也许可以留一个照顾他。”

辞别将军以后，聂赫留朵夫心情特别振奋，又乘马车去了邮局。

邮局是个带拱顶的低矮房子；几个邮务员坐在斜面办公桌后面，向挤在那儿的一些人分发邮件。一个邮务员歪着脑袋，熟练地把一个个信封拉到面前，不停地盖邮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多久。邮务员听他说出自己的名字，马上交给他一大堆邮件。其中有汇款、几封信、几本书，还有最新一期的《祖国纪事》。聂赫留朵夫收下邮件，走到木板长凳旁，凳上坐着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正等着领什么东西。聂赫留朵夫挨着他坐下，翻看收到的那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挂号信，信封很精致，盖着清晰的鲜红色火漆印。他拆开信封，看谢列宁的信，还附了一份公

文，顿时感到血涌上他的脸，心也缩紧了。这是对卡秋莎案子的批复。是个什么样的批复呢？难道是驳回了？聂赫留朵夫急忙把字迹很小、笔力刚劲、但潦草得难以辨认的信看了一遍，这才高兴地舒了口气。批复是令人满意的。

“亲爱的朋友！”谢列宁写道。“我们上次的谈话，让我感触良多。关于玛丝洛娃一案，你是对的。我仔细查阅了案卷，发现她所受到的不白之冤，的确令人发指。此事只能由你递交诉状的上诉委员会来纠正。我得以协同该委员会裁决了此案，现随信寄上减刑公文的副本，地址是由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写给我的。公文正本已送往她受审时关押的地方，即将转送西伯利亚总署。特此将这一令人欣慰的消息通知你。友好地握手。你的谢列宁。”

公文内容如下：“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案卷某某号，案件处理某某号。某某科，某年，某月，某日。奉皇帝陛下受理上告御状办公厅主任令，兹通知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如下：皇帝陛下批阅玛丝洛娃所递之御状，恩准所请，下旨将该名犯人原判之苦役改为流放，在西伯利亚较近处执行。”

这个消息既令人高兴，又意义重大：聂赫留朵夫为她，同时也为自己所企盼的东西，如今实现了。不错，她地位的这一改变，为他和她的关

系造成了新的麻烦。如果她还是苦役犯，那他向她提出的结婚，不过是一种假婚，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改善她的处境。现在呢，却变成没有什么可以妨碍他们共同生活了。而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并没有做好准备。再有，她和西蒙松的关系呢？她昨天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假如她同意和西蒙松结合，是好还是坏呢？他无法理清这些头绪，索性不再去想它们。“以后这一切会搞清楚的，”他想，“眼下要紧的是赶快见到她，把这个喜讯告诉她，把她释放出来。”他心想，他手里有公文副本，足可以把这件事办妥的。他走出邮局，吩咐车夫去监狱。

尽管上午将军没有准许他探监，但他凭经验知道，在上级长官那里怎么也办不成的事，在下级军官那里往往很容易办到，因此他决定还是去试试，以便把高兴的消息通知她，也许还可以把她释放出来，同时打听一下克雷利佐夫的健康情况，再把将军说的话告诉他和谢季宁娜。

监狱长身材高大，威武雄壮，留着唇胡和弯到嘴角的大络腮胡子。他非常严厉地接待了聂赫留朵夫，直截了当地说，未经长官批准，他不能让任何人进入监狱。对于聂赫留朵夫说的他在京城都能探监的话，监狱长回答说：

“这很有可能，不过我这儿不行。”他讲这话的口气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京城的老爷们，自

以为能把我们吓住和难住；我们在东西伯利亚是严格执法的，倒要让你们尝尝厉害。”

皇帝陛下办公厅的公文副本对监狱长也不起作用。他坚决不让聂赫留朵夫跨入监狱半步。聂赫留朵夫本以为，一出示这份公文副本，玛丝洛娃就能得到释放，但监狱长对他这天真的建议，仅仅轻蔑地一笑，说，要释放任何人犯，必须要有他的顶头上司的指令。他所答应的只有一点，他可以通知玛丝洛娃，说她已获得减刑，他一旦接到上司的命令，一个钟头也不会多留她。

关于克雷利佐夫的健康，他也拒绝提供任何情况，并说他甚至不能告诉他，是否有这名犯人。聂赫留朵夫就这样一无所获地坐上他的马车，向旅馆走去。

监狱长所以这样严厉，主要是因为超员一倍的监狱里，这时正流行伤寒。聂赫留朵夫这辆车的车夫路上告诉他：“监狱里死的人太多啦。他们得了一种什么病。每天都埋掉二十几个人呢。”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尽管在监狱里一无所获，但还是精神振奋地坐车去省长办公室，打听玛丝洛娃减刑的公文是否到达。公文没有到，因此聂赫留朵

夫一回到旅馆，立即刻不容缓地急忙给谢列宁和律师写信说明这一情况。写完信，他看了眼表：是去将军家吃饭的时间了。

路上他又想到，不知卡秋莎会怎样对待自己减刑的事。会把她安置在什么地方住呢？他怎样同她一起生活呢？西蒙松怎么办？她对他究竟是什么态度呢？他还想起她身上发生的变化。由此又想到她的过去。

“必须忘掉，一笔勾销，”他想，急忙把有关她的念头丢开。“到时候就清楚了，”他对自己说，接着思考该对将军说些什么。

将军家的午宴十分奢华，是聂赫留朵夫见惯的那种富豪和达官家的气派场面，在久违这种奢华之后，尤其是在经历了连最起码的方便条件也没有的生活之后，这样的午宴更令他格外愉快。

女主人是彼德堡的老派贵夫人，在尼古拉朝代的宫廷里做过女官，法语说得十分流利，俄语反而十分不流利。她总是把身子挺得笔直，两手不论做什么动作，胳膊肘从不离开腰部。她对丈夫十分恭顺，但态度平静而略带忧郁；对自己的客人却异常亲切，尽管亲切的程度往往因人而异。她把聂赫留朵夫当作自己人，对他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微妙的、不易察觉的奉承之意，聂赫留朵夫因而重又意识到自己的优越之处，不禁感到洋洋得意。她让他感觉到，她理解他的西伯利

亚之行虽然有些古怪，但却是十分高尚的，认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种微妙的奉承和将军家优雅奢华的生活排场，结果使聂赫留朵夫完全沉醉在漂亮的陈设、美味的菜肴以及与自己所熟悉的圈子里有教养的人进行的轻松愉快的周旋之中，仿佛最近这段时间他生活里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现在梦醒了，他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似的。

在宴席上就座的，除了家里人——将军的女儿、她的丈夫和副官，还有一个英国人、一个开采金矿的商人和一个从西伯利亚边远城市来的省长。所有这些都让聂赫留朵夫感到愉快。

那个英国人身体健壮，脸色红润，法语讲得十分差劲儿，但英语讲得极为出色，像演说家那样动听。他是个见识广博的人，那些有关美国、印度、日本和西伯利亚的故事，让人听了很有趣。

年轻的金矿商人是农民的儿子，身上穿着在伦敦定做的燕尾服，衬衣上配着钻石袖扣，家里有丰富的藏书，为慈善事业捐过许多钱，坚持欧洲自由主义主张，是个让聂赫留朵夫感到喜欢并发生兴趣的人，也是欧洲文化通过教育嫁接到健康农民身上的全新的好典范。

这个来自边远城市的省长，就是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时人们街谈巷议的那个某司的司长

【11】。这个人身体肥胖，鬈曲的头发稀稀拉拉，浅蓝色的眼睛十分柔和，下肢粗壮，保养得很好的白手上戴着宝石戒指，脸上挂着愉快的微笑。这位省长深得男主人的赏识，因为在惯于受贿的官员当中，只有他一个人不受贿。女主人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也很赏识他，因为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常和她四手联弹。聂赫留朵夫今天的心情实在太好，所以这个人也没有使他反感。

性情快乐、精力充沛、下巴刮得发青的副官，处处为人着想，也以自己的好心肠让人感到愉快。

不过，最让聂赫留朵夫感到愉快的，是将军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对可爱的年轻夫妇。将军的这个女儿是个不漂亮，但心地善良的年轻女人，全部心思都用在她那两个孩子身上了；她的丈夫，她是在和父母长期抗争之后经自由恋爱嫁给他的，是个自由主义者，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学士学位，聪明而又谦逊，在官府任职，从事统计工作，尤其是非俄罗斯人的统计，他研究这些非俄罗斯人，喜欢他们，竭力想把他们从绝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所有的人不仅对聂赫留朵夫态度亲热又殷勤，而且显然因同这位风趣的新面孔结交而感到高兴。将军身着军服，脖子上挂着白十字勋章，

出来主持午宴，像见到老熟人一样和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立即请客人们品尝小菜和白酒。将军问聂赫留朵夫从他家出去后做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说去过邮局，已经知道上午谈过的那个女人得到了减刑，同时再次请求将军准许他探监。

将军显然对吃饭时谈公事感到不满，皱起眉头，没有说话。

“您来点儿伏特加吧？”他用法语对走过来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喝下一杯白酒，说他今天参观了大教堂和一家工厂，不过还想看一看大型监狱。

“这太好啦，”将军转向聂赫留朵夫说，“您和他一起去吧。请给他们开一张通行证。”他对副官说。

“您想什么时间去？”聂赫留朵夫问英国人。

“我想最好是晚上，”英国人说，“晚上所有人都在，事先没有准备，一切都是本来的样子。”

“啊，他想领略一下所有的美妙之处吧？让他看好啦。我写过呈文，他们不听我的。那就让他们从外国报纸上去了解吧。”将军说完，走到餐桌前，女主人正招待客人们就座。

聂赫留朵夫坐在女主人和英国人中间。他对面坐的是将军的女儿和某司前任司长。

餐桌上的谈话时断时续，一会儿谈印度——是英国人先谈起的，一会儿谈远征东京【12】——

将军对此事痛加谴责，一会儿谈西伯利亚普遍流行的欺诈和受贿行为。聂赫留朵夫对这类话题不太感兴趣。

不过，饭后在客厅里喝咖啡时，英国人和女主人关于格拉斯顿^[13]的谈话，却让人非常感兴趣。在这场谈话中，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出色地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引起了和他谈话的人们的注意。于是，聂赫留朵夫在吃过美餐和好酒之后，坐在柔软的沙发上品尝咖啡，置身在亲切而有教养的人们中间谈论有趣的话题，心里越发高兴起来。而当女主人应英国人所请，同前任司长一起在钢琴上弹起他们弹得十分熟练的贝多芬

《第五交响曲》时，聂赫留朵夫的心里更是出现了很久不曾有过的自我陶醉感，他仿佛直到如今才认识到自己是个多么好的人似的。

三角大钢琴音色优美，交响曲弹得也很出色。至少喜欢并熟悉这支交响曲的聂赫留朵夫有这样的感觉。他听着优美的行板，感到鼻子一阵发酸，他被自己和自己的所有美德深深打动了。

聂赫留朵夫谢过女主人，说他很久没有得到这样的享受了，正要告辞离开，将军的女儿忽然神情果断地走到他跟前，红着脸说：

“您刚才问起我的两个孩子；您想看看他们吗？”

“她总是以为人人都有兴趣看她的孩子，”母

亲说，对女儿可爱的冒失举动微微一笑。“公爵才不感兴趣呢。”

“不，正好相反，我非常、非常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被这种溢于言表的幸福的母爱所感动，说。“请带我去看看吧。”

“领公爵去看自己的娃娃呀，”将军正同女婿、金矿商人和副官打牌，从牌桌那边笑着大声说。“您去吧，去尽义务吧。”

年轻的母亲显然因为马上有人要评价她的孩子，心情很激动，领着聂赫留朵夫快步向内室走去。在第三个贴着白色墙纸的高房间里，点着一盏罩着深色灯罩的小灯，并排放着两张小床，小床之间坐着一个保姆，披着白色披肩，有一张颧骨高高的西伯利亚人的脸，样子很和善。保姆站起身，鞠躬行礼。母亲走到第一张小床前，俯下身去，床上安静地睡着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儿，张着小嘴，长长的鬈发披散在枕头上。

“这个是卡佳，”母亲说着，拉了拉天蓝条纹的线毯，把露出来的一只白白的小脚盖好。“漂亮吗？她才两岁呢。”

“太漂亮啦！”

“这个叫瓦夏克，是外公起的名字。完全是另一种模样。西伯利亚人。不是吗？”

“好可爱的孩子。”聂赫留朵夫打量着趴着睡觉的胖男孩，说。

“真的？”母亲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了镣铐、剃去半边头发的脑袋、殴打、腐化、垂死的克雷利佐夫、卡秋莎和她的全部遭遇。他不由得心生艳羡，渴望自己也能有一份眼前这种美好、纯洁的幸福。

他连声夸奖两个孩子，虽然其中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贪婪地想听赞扬的母亲的愿望，然后跟她回到客厅。英国人已在客厅等他，以便照他们约好的，一起去监狱。同主人一家告别后，聂赫留朵夫和英国人一起出来，走到将军家的大门口。

天气变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已经把道路、屋顶、花园里的树木、门前的台阶、马车的车顶和马背，全遮盖住了。英国人自己有一辆轻便马车，聂赫留朵夫吩咐英国人的车夫去监狱，然后上了自己的四轮马车，怀着去履行一项不愉快的义务的沉重心情，坐在柔软的、在雪地上艰难滚动的马车里面，跟在英国人后边，向监狱驶去。

二十五

那座门前有岗哨和门灯的阴森森的监狱，尽管整个建筑——大门前的台阶、屋顶、墙壁——现在蒙上了一层洁白的雪幕，但正面墙上却布满

了一排灯火明亮的窗子，给人的印象反而比早晨更加阴森。

神态威武的监狱长走到大门口，就着灯光把聂赫留朵夫和英国人的通行证看了一遍，困惑地耸了耸强壮的肩膀，但还是执行命令，请两位来访者随他进去。他先领他们走进院子，然后走进右边的门，沿着楼梯来到办公室。他请他们坐下后，问有何事可以为他们效劳，得知聂赫留朵夫希望现在见到玛丝洛娃，就派一个看守去找她，自己准备回答英国人通过聂赫留朵夫当场提出的问题。

“这座监狱设计容纳多少人？”英国人问。“现在有多少囚犯？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儿童？多少苦役犯、流放犯、自愿跟随的人？多少病号？”

聂赫留朵夫翻译英国人和监狱长的话，并没有注意他们说的是什么，因为即将同玛丝洛娃的见面，完全出乎意料地搅乱了他的心。当他正翻译英国人说的一句话时，听见一阵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办公室的门开了，像历次探监一样，走进一名看守，跟着是包着头巾、身穿囚服的卡秋莎，他一见到她，心情立即沉重起来。

“我要生活，要家庭、孩子，要过人的生活。”就在她垂着眼睛，快步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他的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他站起来，走了几步上去迎她，她的脸上让他觉得有一种冷淡和不快的表情。这种表情又变得像她上次责怪他时的那个样子。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手指颤抖地卷着衣服下沿儿，一会儿抬眼看看他，一会儿低下眼睛。

“您知道减刑的批复下来了吗？”聂赫留朵夫说。

“知道，看守说了。”

“这样，只要公文一到，您就可以出去，可以住到您愿意去的地方。让我们来考虑一下……”

她急忙打断他：

“我有什么考虑的？弗拉基米尔·西蒙松到哪儿，我就跟他去哪儿。”

尽管她心中十分慌乱，她还是抬起眼睛看着聂赫留朵夫，把这两句话又快又清楚地说了出来，仿佛事先准备好了该说什么似的。

“是这样！”聂赫留朵夫说。

“这没什么，德米特里·西蒙松，既然他要我和他一起生活，”她惊慌地打住，急忙改口，“要我待在他身边。我还能再指望什么呢？我该觉得这是我的福分。我还想怎样呢？……”

“不是她爱上了西蒙松，根本不需要我为她作出的这种我认为是牺牲，就是她仍在爱我，为了我的幸福才拒绝我，并索性破釜沉舟，把自己

的命运永远和西蒙松结合在一起，二者必居其一。”聂赫留朵夫想，不由得羞愧起来。他感到，他的脸在发烧。

“要是您爱他的话……”他说。

“什么爱不爱的？我早就丢掉那一套了，不过弗拉基米尔·西蒙松确实是个特别的人。”

“是的，没错儿，”聂赫留朵夫说。“他是个很出色的人，我想……”

她又一次打断他，仿佛害怕他说出什么不必要的话，或者她不能把所有的话说完似的。

“不，德米特里·西蒙松，请您原谅我，要是我的事违背了您的心意，”她用她那斜视的神秘目光看着他的眼睛，说。“是的，看来只好这样了。您也要生活呀。”

她说的正是他刚才头脑里说的话，可是现在他已经不这么想了，他的想法和感觉完全变成另一种样子了。他不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惋惜他失掉了和她有关的一切。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他说。

“您何必在这儿生活和受罪呢。您受的罪够多了。”她说完，怪怪地笑了笑。

“我没有受罪，我过得很好，我还想多为您做点儿事，如果我还能做的话。”

“我们，”她说“我们”的时候，看了一眼聂赫留朵夫，“什么也不需要。您为我做的事已经够

多的了。假如没有您……”她想说什么，声音颤抖起来。

“您可千万别谢我。”聂赫留朵夫说。

“还算什么账呀？我们的账上帝会算的。”她说，乌黑的眼睛里闪起泪花。

“您是个多么好的女人呀！”他说。

“我是个好女人？”她噙着眼泪说，凄苦的微笑为她的脸上增添了一点儿亮色。

“您谈完了吗？”[【14】](#)这时英国人问道。

“马上就好。”[【15】](#)聂赫留朵夫回答，又问起克雷利佐夫的状况。

她定了定心，平静地讲了她知道的情况：克雷利佐夫的身体路上更糟了，一到这里立即被送进了医院。谢季宁娜非常担心，要求去医院照顾他，可是不准她去。

“要不我走吧？”她说，发现英国人在等他。

“我不向您告别，我还要和您见面的。”聂赫留朵夫说。

“再见啦，”[【16】](#)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说。他们的目光遇在一起，从她那怪怪的斜视的眼神中，从她说含有“请原谅”意思的告别用语时的那凄苦的微笑中，聂赫留朵夫明白了，在他刚才关于她作出选择的两种推测中，只有第二种是正确的：她爱他，认为如果同他结合，就会毁掉他的一生，而跟西蒙松走，却会使他得到解脱，而且

她现在因为她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感到高兴，同时又因为与他分手，而感到痛苦。

她握了握他的手，迅速转过身去，走了。

聂赫留朵夫回头看了一眼英国人，准备和他一起走，可是英国人正在他的笔记本上记着什么。聂赫留朵夫没有打搅他，坐在靠墙的一张小木榻上，忽然感到极其疲倦。他所以疲倦，不是因为夜里失眠，不是因为长途跋涉，不是因为心情激动，而是他感到整个生活让他太疲倦了。他往木榻背上一靠，闭上眼睛，立刻昏沉沉地睡着了。

“怎么样，愿不愿意现在去各个牢房走走？”监狱长说。

聂赫留朵夫醒过来，对自己在这儿睡着了，感到惊讶。英国人记完了笔记，想参观牢房。聂赫留朵夫疲倦而无兴趣地跟他走去。

二十六

监狱长、英国人和聂赫留朵夫在几名看守的陪同下，穿过门廊和臭得令人作呕的走廊，在走廊上竟吃惊地看见两个直接对着地板撒尿的男犯，接着走进第一间苦役犯牢房。牢房中央放着几排板床，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躺下了。他们共有七十几个人。他们头挨头、身子挨着身子躺在板

床上。参观的人一进来，所有的人立即从床上跳下来，弄得铁镣哐啷乱响，站在床边，新剃的半边头闪闪发亮。只剩下两个人还躺在床铺上。一个是年轻人，脸色通红，显然正在发烧；另一个是老头儿，嘴里不住地哼哼。

英国人问，那个年轻的犯人是不是病了很久了。监狱长说，是早上病的，不过那老头儿害胃病已经很久了，可是没地方安置，因为医院早就满员了。英国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想对这些人讲几句话，并请聂赫留朵夫来翻译。原来英国人这次旅行，除去描写西伯利亚的流放和监禁地的情况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宣讲只有通过信仰和赎罪才能得到拯救的道理。

“请告诉他们，基督怜悯他们，爱他们，”他说，“也是为他们而死的。如果他们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会得救。”在他讲话的时候，所有的犯人们一声不响地站在床前，双手伸直，贴着裤缝。“在这本书里，请告诉他们，”他最后说，“所有的道理都写着呢。有认识字的吗？”

结果，有二十多个人识字。英国人从手提包里掏出几本精装的《新约全书》，于是几只长着坚硬黑指甲的有力大手，从粗麻布衣袖里伸出来，争先恐后地去要书。他在这间牢房里发了两本福音书，然后向下一间牢房走去。

下一间牢房里也是那个样子。也是那样闷，

那样臭；也是在前面，两个窗子的中间挂着圣像，门的左边放着便桶，犯人们也是身子挨着身子挤在一起，也是那样从床上跳下，挺直身子站好，几乎也是那样有三个人没有下床。有两个人起来坐在床上，一个仍旧躺着，甚至对进来的人瞧也不瞧一眼；这也是病人。英国人也讲了一番那样的话，也发了两本福音书。

第三间牢房里传出叫嚷声和吵闹声。监狱长敲了敲门，喊道：“立正！”等门打开后，所有的人也挺直身子站在床旁，只有几个病号和两个正在打架的人除外。两个打架的人，恶狠狠的一脸凶相，一个抓住头发，另一个揪住胡子，互相扭打在一起。直到看守跑到他们跟前，他们这才松开手。一个鼻子被打出了血，鼻涕、口水和血流得满脸都是，他不住地用外衣的袖子去擦；另一个从络腮胡里往外择揪掉的胡子。

“班长！”监狱长厉声喊道。

一个漂亮而强壮的人走了出来。

“怎么也管不住他们，长官。”班长眼睛快活地笑着说。

“瞧我来管教他们。”监狱长皱着眉头说。

“他们因为什么打架？”[【17】](#)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问班长打架的原因。

“为了一块包脚布，拿错了，”班长仍旧笑着说。“这个推了一把，那个还了一拳。”

聂赫留朵夫告诉了英国人。

“我想对他们说几句话。”英国人转向监狱长说。

聂赫留朵夫把这句翻译出来。监狱长说：“可以。”于是，英国人拿出他那本面皮精装的福音书。

“请您翻译一下，”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吵架和打架，可是为我们而死的基督，却向我们提出了另一种解决争吵的方法。您问问他们，他们是不是知道，按照基督教规应当怎么对待欺负我们的人。”

聂赫留朵夫翻译了英国人的话和问题。

“告诉长官，由他发落，是吧？”一个犯人斜眼瞧着威严的监狱长，用询问的口气说。

“揍他一顿，他就不敢欺负人了。”另一个人说。

有几个人发出赞同的笑声。聂赫留朵夫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英国人听。

“请告诉他们，按基督教规，正好相反：如果有人打你这边的脸，你应该把另一边的脸也送上去。”英国人说着，做出把脸送上去的样子。

聂赫留朵夫翻译了这几句话。

“他最好自己去试试。”有个声音说。

“要是另一边脸也给打了，那他还送上去什么呀？”躺在床上的一個病号说。

“那就让人家把你打个稀巴烂呗。”

“好呀，试试吧。”后面有人说着，愉快地笑起来。整个牢房里响起一阵抑制不住的哈哈大笑；甚至那个挨打的犯人也带着鼻血和鼻涕哈哈大笑起来。几个病人也笑了。

英国人没有窘住，请求转告他们，有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但对信徒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

“请问一问，他们是不是喝酒？”

“是的，喝。”一个声音说，同时又是嗤鼻声和哈哈的笑声。

这间牢房有四个病号。对于英国人提的为什么不把病号集中到一个牢房里的问题，监狱长回答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这些病号不是传染病人，有一个医士照料他们，给他们治疗。

“他有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一个声音说。

监狱长没有理睬这个问题，领客人去了下一个牢房。又是打开牢门，又是犯人们站起来一声不吭，又是英国人分发福音书；在第五间牢房、第六间牢房、右边的牢房、左边的牢房，两边的所有牢房，都是这个样子。

从苦役犯牢房到流放犯牢房，从流放犯牢房到村社判刑的农民牢房，再到自愿跟随者的房间，到处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到处都是那些受冻、挨饿、无所事事、染上疾病、受尽凌辱、遭

到囚禁的人，像是被关起来的野兽一样。

英国人发完原定数量的福音书之后，不再分发，甚至也不再发表讲话。令人难受的场面，主要是令人窒息的空气，显然耗尽了精力，所以当他从这间牢房走到另一间牢房时，对监狱长报告的每个牢房里有什么样的犯人，仅仅随口说一句“好的”。聂赫留朵夫像在梦中一样走着，没有勇气离他们而去，但心里依旧感到疲倦和绝望。

二十七

在流放犯的一个牢房里，聂赫留朵夫吃惊地看到早晨在渡船上见过的那个古怪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头发蓬乱，满脸皱纹，上身只穿一件肩头磨破了的灰色脏衬衫，下身穿同样又脏又破的裤子，赤着双脚，坐在床边的地板上，目光严厉而疑问地看着进来的人。他那从肮脏衬衫的破洞里露出的干瘦身体，显得可怜而衰弱，可是他脸上的神情比在渡船上时更专注、更有生气。所有的犯人，也像其他牢房里的犯人一样，见长官进来，都跳起来，挺直身子站好；老头儿却坐着不动。他眼睛闪着亮光，愤怒地皱着眉头。

“站起来！”监狱长冲他喊道。

老头儿没有动，只是轻蔑地一笑。

“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奴才。我不是你的奴才。瞧你的烙印……”老头儿指着监狱长的额头说。

“什……么？”监狱长一边向他逼近，一边威胁地说。

“我认识这个人，”聂赫留朵夫急忙对监狱长说。“为什么抓他？”

“警察局送来的，因为他没有身份证。我们要求他们别送，可他们还是送。”监狱长生气地斜眼看着老头儿，说。

“你看样子也是反基督部队的啦？”老头儿对聂赫留朵夫说。

“不，我是来参观的。”聂赫留朵夫说。

“怎么，你们来开开眼界，看看反基督的家伙怎么折磨人吗？那就看吧。把人抓起来，在笼子一样小的屋子里关了这么一大堆人。人应当在地里流汗干活儿才是，可他把他们关起来，像猪一样喂着，不干活儿，让他们变成野兽。”

“他说什么？”英国人问。

聂赫留朵夫说，老头儿指责监狱长把人囚禁起来。

“请您问问，按他的意见，该怎样对待不遵守法律的人？”英国人说。

聂赫留朵夫把问题翻译了一遍。

老头儿怪里怪气地笑了，露出整齐的牙齿。

“法律！”他轻蔑地重复着这个词。“他先把所有的人抢光了，把人家的所有土地、所有财产霸占了，拿回去算自己的，把反对他的人全都打死，然后制定法律，不准抢劫，不准打人。他应当先制定法律才对。”

聂赫留朵夫翻译了他的话。英国人笑了笑。

“可是，对盗贼和杀人凶手又该怎么办呢，您问问他。”

聂赫留朵夫又翻译了这个问题。老头儿严厉地皱起眉头。

“告诉他，让他去掉他身上的反基督烙印，那他就不会遇上盗贼和杀人凶手了。就这样告诉他。”

“他是个疯子。”[【18】](#)英国人听了聂赫留朵夫的翻译，说，然后耸耸肩膀，走出牢房。

“你做自己的事吧，别去管他们。各人管各人的事。上帝知道，该惩罚谁，该宽恕谁，我们并不知道，”老头儿继续说。“自己作自己的主，这样就用不着当官儿的了。走吧，走吧，”他补充说，生气地皱着眉头，瞪着亮眼睛看着在牢房里迟迟不走的聂赫留朵夫。“看够了反基督的家伙怎么拿人喂虱子了吧。走吧，走吧！”

聂赫留朵夫走进走廊，英国人和监狱长正站在一间敞着门的空牢房的门口。英国人问这间牢房是做什么用的，监狱长解释说，这是停尸房。

“噢！”英国人听完聂赫留朵夫的翻译，说，然后要求进去看看。

停尸房是间不大的普通牢房。墙上挂着一盏小灯，暗淡地照着墙角里堆放的行李和木柴，也照着右边床板上的四具死尸。第一具尸体穿着麻布衬衣，身材高大，留着小小的尖胡子，脑袋上剃去了半边头发。尸体已经僵硬；两只发青的手原来显然是交叉在胸前的，现在却是分开的；两只赤脚也是分开的，往两边撇着。他旁边躺着一个老年妇女，身穿白色衣裙，没有包头巾，梳着一条稀疏的短辫子，布满皱纹的脸又小又黄，鼻子很尖。老妇人那边还有一具男尸，穿着浅紫色的衣服。这颜色让聂赫留朵夫想起了什么。

他走上前去，打量起来。

往上翘起的、又小又尖的下巴胡，挺拔漂亮的鼻子，白净、高耸的前额，稀疏的鬈发。他认出了这些熟悉的特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他看到这张脸还充满着激愤和痛苦的表情。现在这张脸却变得一动不动、宁静安详和可怕的美丽。

是的，这就是克雷利佐夫，或者至少是他物质生命留下的痕迹。

“他受苦受难为的是什么呢？他活着为的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他现在弄明白了吗？”聂赫留朵夫想，然而他觉得这些问题没有答案，除了死亡，

什么也没有，于是他感到头脑一阵晕眩。

聂赫留朵夫没有同英国人告辞，请一名看守领他来到院子里，他觉得必须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以便好好思考一下他今天晚上所体验到的一切。他乘车回旅馆了。

二十八

聂赫留朵夫无法入睡，在旅馆的房间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和卡秋莎的事已经结束。她不需要他，这让他感到既忧伤又羞愧。不过，现在让他痛苦的并非这件事。而是另一件事，这件事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让他感到痛苦不堪，而且也更迫切地需要他拿出行动。

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今天在这座恐怖的监狱里他亲眼目睹的种种可怕的恶，把可爱的克雷利佐夫也毁灭了的种种可怕的恶，气焰嚣张，横行无忌，不仅看不出战胜它的任何可能，甚至让人不知道，如何才能战胜它。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成百上千人的影子，他们被那些冷漠无情的将军、检察官、监狱长关进病菌弥漫的污浊空气里，受尽凌辱；他想起那个怒斥长官、被当作疯子的独往独来的古怪老头儿，还想起在愤恨中死去的克雷利佐夫夹杂在死尸中间的那张英俊、蜡黄、没有表情的脸。于是，以

前的那个老问题：是他，聂赫留朵夫，疯了，还是那些自以为头脑清醒而做这些事的人疯了——更加顽强地出现在他面前，要求给予回答。

他走累和想累之后，坐在灯前的沙发上，随手打开英国人送他作纪念的福音书，那是他刚才清理口袋里的东西时丢在桌上的。“据说，这里面有所有问题的答案。”他想，翻开福音书，开始读翻开的那一页。《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一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二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三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四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他想，回忆起他只有在他降低自己的身份时，才体验到生活的安适和快乐。

五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六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为什么这里说接待，怎么接待呢？凡为我的名是什么意思？”聂赫留朵夫问自己，感到这些话并没有对他说什么道理。“为什么要把大磨石拴在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不，这有点儿不对头：不确切，不清楚，”他想，回忆起他一生中几次读福音书，总是有这些不清楚的地方让他读不下去。他又读了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节，是关于将人绊倒的事，讲到人必须进入永生，讲到把人丢进地狱的火里作为惩罚，讲到孩子的使者常见到天父的面。“可惜，这不那么连贯，”他想，“不过，可以感觉得到，这里面有些好东西。”

十一 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十二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十三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十四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失丧一个。

“是的，天父的意愿并不是让他们死去，可是他们在成百上千地死去。而且没有办法拯救他们。”他想。

二十一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

二十二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二十三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二十四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来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二十五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二十六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二十七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二十八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二十九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三十 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三十一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三十二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三十三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

“难道仅仅如此？”聂赫留朵夫读完这些话，忽然出声地喊道。有个声音在他心里说：“是

的，仅仅如此。”

于是，在聂赫留朵夫那里，出现了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常常遇到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往往一种想法，起初让他觉得怪异、荒诞甚至可笑，但随着它在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证实，终于有一天让他明白，这原来是一条最简单而又最不容置疑的真理。现在，他正是这样弄清楚了一个想法：把人们从遭受可怕的恶的折磨中拯救出来的惟一的、不容置疑的办法，就是让人们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永远有罪，因此他们既不能惩罚别人，也不能改造别人。他现在十分清楚，他在各地监狱里亲眼目睹的那种可怕的恶之所以会发生，以及制造这种恶的那些人之所以会那么心安理得地自以为是，仅仅是因为人们想做不可能的事：自己原本也恶，却要去改造恶。道德败坏的人想要改造道德败坏的人，而且还想使用机械的方法达到目的。然而，这一切只能造成这样的结果，那就是贫困而贪财的人把这种虚假的惩罚和改造人的行为当成自己的职业之后，本身会腐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还会永无止地去腐化那些受他们折磨的人。他现在十分清楚，他亲眼目睹的恶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如何才能消灭这种恶。他久久无法找到的答案，其实正是基督告诉彼得的那段话：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宽恕人，因为不存在本身无罪因而可以惩罚和改

造别人的那些人。

“不过，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吧。”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同时又毫无疑问地看到，尽管这一答案对他这个习惯了相反说法的人来说，起初十分奇怪——但它又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仅在理论上如此，而且在实际上也如此。至于人们通常会反驳说，怎么对待作恶的人——难道让他们放任自流、逍遥法外吗？——这个问题现在丝毫也难不住他。假如事实能够证明，惩罚可以减少犯罪，可以改造犯人，那么这种反驳或许会有点儿道理；可是既然事实证明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一些人明显地无权改造另一些人，那么惟一理智的做法，就是停止做这种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甚至不道德和残忍的事。“数百年来，你们一直在惩罚你们认为是罪犯的人。怎么样呢，他们绝迹了吗？没有绝迹，他们的人数反而在增加，不仅增加了一些因受惩罚而堕落的罪犯，而且还增加了那些审判人和惩罚人的法官、检察官、侦讯官和狱吏。”聂赫留朵夫现在懂了，整个社会和社会秩序所以能够存在，并不是因为有这些审判和惩罚别人的合法的罪犯，而是因为尽管到处可以见到这种道德腐败，但人们还是在相互怜悯，相互友爱。

聂赫留朵夫希望在这本福音书里找到可以证实这种想法的文字，从头读了起来。当他读到一

向令他感动的《登山训众》时，第一次发现这段训诫并非抽象的美好思想，所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也并非过分和难以实现，而是一些简单、明了和实际可行的戒律，这些戒律一旦得以实施（这是完全办得到的），就会建立起人类社会的全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仅聂赫留朵夫极为愤恨的所有暴力会自行消灭，而且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天国，也会实现。

这些戒律有五条。

第一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六节）说的是，人不仅不应当杀人，而且不应当对弟兄动怒，不应当认为别人微不足道，是“拉加”[\[19\]](#)，如果同人发生争吵，应当在向上帝献礼之前，也就是在祈祷之前，同那人和好。

第二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至第三十二节）说的是，人不仅不应当奸淫，而且不应当贪恋女色，一旦同一个女人结成夫妇，应当对她永不变心。

第三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至第三十七节）说的是，人不应当在许诺什么事的时候起誓。

第四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至第四十二节）说的是，人不仅不应当以眼还眼，而且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连左脸也转过去

让他打，应当宽恕别人的欺侮，温顺地忍受欺侮，不论人们对你提出什么要求，一概不应当拒绝。

第五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至第四十八节）说的是，人不仅不应当恨仇敌，和仇敌打仗，而且应当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力。

聂赫留朵夫目光凝视着灯光，愣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回忆起我们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的东西，然后设想，假如人人都信守这些戒条的话，那生活该是怎样一种样子呀，于是很久没有体验到的喜悦涌上了他的心头。他仿佛在经受了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之后，突然一下找到了安宁和自由。

他一夜没睡，就像许许多多读福音书的人常有的那样，读着读着，第一次明白了以前读过多次而没有注意的字里行间的全部意义。他如同海绵吸水似的，使劲吸收这本书向他揭示的那些急需的、重要的和可喜的道理。他读到的一切似乎都是他熟悉的，似乎肯定并使他认清了他以前早就知道却没有充分认识和相信的道理。现在，他认识到了，而且也相信了。

不过，他不仅仅认清和相信，只有履行这些戒律，人们才会得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他现在还认清和相信，人只要能履行这些戒律，

便无须再做别的，人生惟一理智的意义就在这里，任何违背这一点的行为都是错误的，立即会招致惩罚。这是从全部教义中归纳出的结论，并且在关于葡萄园的比喻【20】中得到了极其鲜明而有力的说明。园户被派到葡萄园替园主干活，可是他们却把葡萄园当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认为，园里的一切都是为他们置办的，他们有权在这个葡萄园里享受他们的生活，他们忘记了园主，谁要是向他们提起园主和他们对园主应尽的责任，他们就把谁杀掉。

“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正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我们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在生活，认为我们自己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这显然是荒谬的。要知道，既然让我们来到世上，那一定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志，也是为了某种目的。可是，我们却认为，我们活着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享乐，那么事情明摆着呢，我们不会有好下场的，就会像不执行园子主人意志园户们的下场一样。主人的意志就在这些戒律里面。只要人们奉行这些戒律，那么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国，人们就会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21】。可是我们先求的却是这些东西，显然是求不到的。

“这样看来，这就是我终身的事业。一件事

刚做完，另一件又开始了。”

从这一夜起，对聂赫留朵夫来说，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不仅仅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遇到的一切，对他说来已经具有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一生中这个新时期会如何结束，将来定会明白的。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译自《列·尼·托尔斯泰文集》（二十二卷集）第十三卷，莫斯科，苏联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

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注 释

【1】 俄国民粹派大多出身贵族，享有坐车行路的权利。

【2】 这是Д.А.利尼奥夫在《在旅站上》一书中描写的一件真事。——作者注

【3】 指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运动。

【4】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波兰反对沙皇专制的运动宣言。

【5】 阿拉哥（1786—1853），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6】 指俄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七二年。

【7】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实行革命的恐怖手段。

【8】 玛丝洛娃的名和父称。

【9】 尼采（1844—189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提倡“超人”学说。

【10】 十八世纪俄国产生的一个否认一切宗教仪式的教派。

【11】 参见本书第二部第二十一章。

【12】 指一八八二至一八九八年法国侵略越南北部的战争。“东京”是欧洲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旧称”。

【13】 当时的英国首相。

【14】 原文为英文。

【15】 原文为英文。

【16】 在俄语中有多种表达“再见”的说法，但只有这一说法含有“再见”和“请原谅”两种意思。

【17】 原文为英文。

【18】 原文为英文。

【19】 意即“废物”。

【20】 事见《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二节至第四十一节。

【21】 见《马太福音》第六章。

1、小编希望和所有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成为朋友，小编：QQ和微信491256034备注书友！小编有300多万册电子书。您可以在微信上呼唤我，放心，绝对不是微商，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2、扫面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回复电子书，既可以看到我这里的书单，回复对应的数字，我就能发给你，小编每天都往里更新10本左右，如果没有你想要的书籍，你给我留言，我在单独的发给你。

3、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



扫描二维码，加小编微信 扫描二维码，加小编个人公众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公众号ID：d716-716

小编：行行：微信号：491256034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12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2、 20世纪最优秀的100部中文小说

- 3、 10部豆瓣高评分的温情治愈系小说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就关注这个微信号。